

#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研究

苏云

(滁州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滁州 239000)

**摘要:** 新质生产力能够赋能乡村产业升级, 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传承、保护和创新乡村优秀文化的内涵和外延, 构建宜居宜业绿色生态乡村, 以及提升基层组织建设等。厘清新时代乡村面临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劳动力结构失衡、乡村文化发展滞后、生态环境保护缺失、基层组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足等现实困境, 提出需要优化产业结构、统筹人才资源、加强文化建设、践行绿色理念、提升组织引领等措施, 以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 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乡村振兴; 农业农村现代化; 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24)06-0001-06

## Realistic Dilemma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under the Condi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SU Yun

(School of Maxism, Chuzhou University, Chuzhou, 239000, Anhui)

**Abstract:**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can empower rural industrial upgrading, promot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people, inherit, protect and innovate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rural excellent culture, build green and ecological rural communities that are suitable for living and working, and enh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It clarified the realistic dilemmas faced by rural areas in the New Era in this paper, such as unreasonable industrial structure, imbalanced labor force structure, lagging behind rural cultural development, lack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insufficient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 of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and proposed measures such as optimiz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coordinating talent resources, strengthening cultural construction, practicing green concepts, and enhancing organizational leadership, it also promoted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and empowered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with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forces.

**Key words:**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Rural Revitalization;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 随着人类与自然  
界的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人们逐步加深了对生产  
力和生产关系的认识。马克思深刻指出, 生产力和  
生产关系既相互矛盾又相互统一, 不同的生产关系  
对应着不同水平的生产力, 其中劳动者、劳动资料和

劳动对象是构成生产力的最基本要素。在人类历史  
上, 生产力发展过程经历了原始生产力、传统生产  
力、新兴生产力<sup>[1]</sup>和新质生产力四个阶段。以蒸汽  
机发明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 人类先后经  
历了广泛应用大机器和电气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和互

收稿日期: 2024-05-15

基金项目: 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程教学研究项目(2022jyxm525); 滁州学院校级五育融合示范课程项目(2023wykc006); 滁州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项目(2024SZ12)。

作者简介: 苏云(1981-), 男, 安徽黄山人, 讲师, 硕士。E-mail: 273861508@qq.com

联网迅猛发展下的信息化和网络化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在此阶段劳动者具有一定的农业专业基础知识,能够操作较为基础的半人工半自动的农业劳动工具,劳动资料较之前也有较大改进,进一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劳动对象的产出率也获得较大提升,形成了新兴生产力。进入 21 世纪,随着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新技术、新概念的不断涌现为特征,形成了不同与以往生产力的具有“新”和“质”特征的全新生产力。在此生产力情境下,劳动者不仅需要具备较扎实的专业知识,还需要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统筹能力、创新创造能力和人机协同操作能力<sup>[2]</sup>,才能应对新时代生产力发展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成为新质劳动者。此阶段的劳动资料已经具有数字化、自动化和智能化等特征,进一步把劳动者从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成为新质劳动资料。新质劳动者利用新质劳动资料对劳动对象开展劳动时,劳动对象也相应发生质的变化:一是劳动对象的范围更为广泛。在农业生产中劳动对象由原来单一的第一产业逐渐延伸到其他相关产业链,包括农产品加工在内的第二产业和以农村康养生态旅游在内的第三产业,同时数据、信息等成为生产要素的一部分并融入到劳动对象当中。二是对劳动对象的质量要求更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递增,劳动对象已不再是基本物质的生产,而是转为高质量高品质的物质再生产,所以劳动对象已转变为新质劳动对象,此阶段开始逐步形成了新质生产力。

202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时首次提出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理论上升到新的生产力理论高度;同年 12 月 12 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他强调要通过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动能、新模式,将新质生产力视为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基点<sup>[3]</sup>。2024 年 1 月 3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系统阐述了新质生产力,即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sup>[4]</sup>。新质生产力概念一经提出,学术界随即开展相关研究,截止到 2024 年 5 月 10 日,在中国知网通过关键词“新质生产力”进行搜索发现,共有 520 篇相关论文,同时再以“乡村振兴”为关键词搜索,共有相关论文 4 篇;以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同时按来源类别 CSSCI 进行搜索,共有 290 篇相关论文,再限定关键词“乡村振兴”进行搜索,共发表相关论文 2 篇。由此可见,目前学术界将新质生产力与乡村振兴进行结合的研究较少。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党的使命任务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sup>[5]</sup>。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短板之一,以新质生产力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是推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及农业农村现代化,进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笔者遵循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三要素的相关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及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创新理论和重要论述,对乡村振兴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进行探讨,以期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借鉴和参考。

## 1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

生产力三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新质生产力相较于传统生产力具有“新”和“质”的双重特性,即是一种全新的生产力同时在质态上也发生了颠覆性改变,继而形成新质生产力三要素,即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资料和新质劳动对象。新质生产力是全新的生产力,具有颠覆性和创新性,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能够进一步驱动乡村产业升级,提升从事三农工作的劳动者素质,丰富乡村传统文化,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环境,提升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最终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和美乡村愿景。

### 1.1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产业升级

乡村传统产业主要是以第一产业为主,其生产者无明确分工,产业产量低,科技含量低,在市场上竞争力不强,一直处于产业链最底端。随着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的不断发展,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全新的可能<sup>[6]</sup>。一是数字技术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嵌入乡村产业当中,为乡村产业赋能。数字等非实物要素融入乡村传统产业可以提升传统产业的布局,促进传统产业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协调发展,同时数据要素的融入可以监测乡村传统产业质量,进而推动乡村传统产业的改造和升级。二是通过基因编码技术、抗病毒育种技术、农产品生长过程检测技术等最新科技成果融入乡村传统产业,尤其是融入关系国计民生的最基础最重要的相关产业,不断推动乡村

重点领域产业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三是积极对接国际农业前沿科技,分析判断国际农业发展趋势,积极布局发展乡村未来产业。四是通过数字技术的融入,可以有效监测判断产量低、品质低、污染高的乡村传统产业并逐步进行淘汰。五是通过数字技术赋能乡村传统产业,构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产业新模式,如乡村电商直播、乡村特色旅游等,为乡村产业振兴赋能。

## 1.2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人的全面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大量农村年轻劳动力开始涌向城市,尤其是近年来乡村劳动力锐减,只有老人、妇女和儿童留守乡村,乡村出现空心化现象。乡村振兴离不开乡村人,而能力提升迫在眉睫。一是新质生产力中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从乡村走出去的人才可以不受时空限制,从而能够在地化为乡村振兴做出各自应有的贡献。二是新技术、新业态的不断涌现,促使乡村青壮年不得不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使用新的劳动资料来应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技术革命。三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很多原来由人工开展生产劳动的活动逐渐被机器所代替,从而进一步释放了人的劳动时间,使得劳动者有更多时间去学习和促进自身全面发展。

## 1.3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传统文化发展

中华民族在其发展进程中,通过对自然界的改造逐渐形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乡村传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来源。自近代鸦片战争以来,乡村传统文化渐趋落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文化自信,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可以赋能乡村传统文化发展,提升乡民的文化自信。一是新能源新材料不断涌现并用于乡村传统实体建筑的保护,可以进一步保护好具有乡村特色的古建筑、古文物等。二是通过数字虚拟技术、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为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好保护和传承。三是通过主流媒体、现代技术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乡民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传播,引导乡民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1.4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宜居宜业绿色发展

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新质生产力所倡导的生产力就是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绿色发展,一是通过智慧农业技术、无人机、自动化清洗、数字技术等创新技术的使用,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和

农业生产风险,改善耕种土壤质量,减少农业农村环境污染,真正做到生产、加工、流通一体化绿色发展,保障农产品和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提升。二是通过加大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不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充分利用现代化数字技术优化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助力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农村基层治理水平,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

## 1.5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基层组织建设

乡村基层组织是国家在乡村最小的组织单元,具有向基层一线乡民传达并贯彻落实国家大政方针政策,组织开展生产生活等重要功能。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基层组织建设,一是通过数字化技术可以随时随地向村民传达上级有关文件精神;二是建立大数据服务平台,收集农业农村生产生活各类数据,为更好优化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和服务乡村振兴提供数据支撑;三是建立公共服务平台,优化村民办事流程,通过在线办理等进一步提升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

## 2 现阶段乡村振兴工作中的现实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脱贫攻坚全面胜利,乡村振兴稳步推进,人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但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 2.1 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乡村产业发展质量不高

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我国乡村存在产业发展单一,发展质量不高等问题。一是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新质生产力赋能产业振兴的关键问题。2023 年全国互联网普及率为 77.5%,而我国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 66.5%<sup>[7]</sup>(2022 年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 61.9%),反映了我国农村地区互联网较前一年有一定提升,但相较于全国平均水平还有较大差距,影响了农村地区信息资源的获取和普及,进而导致农村地区信息资源不足,产业发展单一和发展质量不高等问题。二是农村地区数字发展较为缓慢,数据创造、数据处理、数据分析和数据应用不足也会导致农村产业发展受限。三是自动化、智能化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低下,无人机技术、智能灌溉技术、温度湿度实时监测技术等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因此,加强农村地区互联网、人工智能、信息技术和大数据等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不断拓宽乡村产业链,提升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 2.2 高素质人才不足,乡村人口出现“空心化”

新质生产力赋能人才振兴,可以进一步实现人

的全面发展,但是乡村人才不足是推动乡村振兴的一大挑战。202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是29753万人,比2022年增长了0.6%,其中外出农民工为17658万人,增长了2.7%,本地农民工12095万人,下降了2.2%,说明我国农村地区外出务工人员呈逐年增长态势,这就更加导致了乡村人才的流失。一方面,农村地区受教育水平较高的群体通过升学、参军等渠道离开了乡村,而留在农村地区较多的则为受教育水平低的群体,他们对信息科技、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等新质生产力知之甚少,严重限制了乡村的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城乡结构失衡,乡村产业单一,农产品投资成本大、投资时间长、收益率低等特点,而城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势头迅猛,需要大量劳动力,且薪酬待遇、生活水平等远高于从事农业的情况,从而导致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因此,在农村地区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可以吸引新农人<sup>[8]</sup>留在乡村,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 2.3 亟待移风易俗,乡村文化发展有待加强

新质生产力赋能文化振兴,可以进一步提升乡村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进一步深入乡村提供动力支持。但是目前我国乡村文化建设与城市相比较为落后,同时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背离的遗风旧俗。一是在婚丧嫁娶过程中,农村还存在着收取高额的彩礼、不同程度的大操大办现象,个别地区还存在着少量违背公序良俗现象。二是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存在濒临灭绝、后继无人的现象,由于这些优秀传统文化不能立即带来丰厚的收益,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去传承之或成为非遗传承人。三是乡村文化建设较为落后,农民业余文化生活匮乏,从而造成个别农村地区存在赌博等现象。因此,在农村地区加强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利用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新质生产力向农民推送优质文化内容、提升农民文化水平成为发展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 2.4 整体规划统筹不足,乡村生态环境有待改善

新质生产力也包括绿色生产力,是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生产力,能够为乡村生态振兴赋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得到了飞跃式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有些是以资源消耗、环境破坏为代价换来的,是不可持续的发展,相较于城市,乡村地区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一是在农作物生产过程中长期使用农药、化肥,出现部分土壤板结等现象,使得土壤质量下降,土壤肥力减弱,造成高质量耕地面积减少。二是在部分农村地区还存在着侵占耕地和基本农田等挪为他用的现象。三是城市人口的聚

集效应,导致城市垃圾不断增多,乡村地区成为城市垃圾的集中处理地,从而造成乡村地区环境压力的增大。四是农村地区村民卫生意识较差,人畜居住环境未能进行有效区分,同时农民重经济利益轻生态保护意识,成为乡村生态振兴的一大阻碍。因此,要通过数字技术在农村地区大力宣传生态保护知识,提高农民生态意识,利用物联网、人工智能、生物育种等新质生产力提高土壤和种子质量,加强生态保护,赋能乡村生态振兴。

### 2.5 公共服务能力不足,乡村组织建设有待加强

在当前新质生产力推动乡村振兴过程中,存在应对乡村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等问题。一是农村地区公共服务需求多元化和乡村组织供给单一化之间的矛盾显著突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增强,虽然在农村地区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服务有一定的提高,但是在互联网发展、文化建设、养老等方面还远远不能满足乡村社会的发展需求,需要乡村基层组织进一步加强公共服务建设。二是农村地区基层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相较于城市机关工作人员,乡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存在文化水平低、综合素养不高等问题,对于基层治理工作往往采取简单粗暴方式,对新质生产力了解不深,不能很好地利用大数据、智能化平台等新质生产力做好基层治理工作。三是乡村基层组织与外界联系较少,尤其是未能与社会资本合作共同开展乡村公共服务建设,主要原因是缺乏相关产权明晰的管理制度和利益分配机制,制约了乡村公共服务的进一步发展。

## 3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

新时代以来,我国在开展脱贫攻坚方面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围绕党的二十大报告主要任务,我国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乡村振兴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在五大振兴方面仍然存在短板和弱项。为此,需要将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改造提升传统乡村产业,积极优化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推动乡村高质量绿色发展,构建美好乡村,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满足感和幸福感,推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 3.1 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发展

新质生产力能够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产业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一是构建乡村产业基础设施。地方政府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积极引进建设具有开创性、先导性的乡村产业基础设施,包括乡村网络建

设、道路交通建设、水利水电灌溉系统、高新育种技术、无人机、农业农村机械化作业技术、GPS 耕地测量技术等新质生产力,推动乡村产业向科技化、自动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不断提升生产效率。二是积极构建以第一产业上下游之间的延伸链,逐步将第一产业和第二、第三产业相融合,不断提高农产品高附加值,提升产品市场价值,这就需要将智能化和自动化的设备应用到产业链中,以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产业提质增效。三是数字技术为媒介,加强数智技术在农业产业中的应用,如通过植物生长监测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过程,不断优化生长环境来提高农作物生长质量和产量,实施精准农业,不断开拓农业新兴产业和农业未来产业。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乡村地区要积极抓住契机,充分利用大数据、新媒体技术开通并融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包括乡村生态旅游、农产品电商、乡村康养等。四是积极构建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型生产关系<sup>[9]</sup>,形成具有创新创造、包容失败及兜底保障制度的新型社会关系,全面提升农业产业生产效率。

### 3.2 统筹人才资源,提升人才质量

新质生产力能够统筹乡村人才资源,不断提升人才规模和质量。优秀人才为乡村全面振兴的实现提供了支持,需要通过教育培养、人才引进双向发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一是不断提升乡村本土人才技术技能。通过聘请在本地区具有丰富农业经验的中老年农民进行现场指导,发挥好他们的传帮带作用,把农业生产中的精耕细作、吃苦耐劳的精神传承并发扬光大;通过与地方政府、地方高校和科研机构合作,对乡村本土人才开展技术技能培训、技术技能练兵比赛等,鼓励乡村本土人才在干中学、在学中干,努力熟练掌握和应用农业生产生活知识和最新科技成果,进一步培养技术技能型新农人。二是建立健全政策吸引机制,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乡村地区吸引力,鼓励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创业,激发他们热爱家乡、服务家乡的热情,为乡村振兴赋能。三是搭建由政府、地方高校和科研机构三方合作的平台,设立专项基金,健全分配机制,大力吸引高水平农业科研人员开展乡村振兴工作的应用研究,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以此通过非在地化的方式吸引高水平人员服务乡村振兴。四是加强乡村基础教育工程。乡村受教育人员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能进入大学深造并走出乡村,而大部分人员则会留在乡村,要充分利用数字多媒体技术,引进优质资源开展乡村教育工作,进一步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提高乡村人

才培养质量,为乡村振兴储备人才资源。五是在鼓励乡村振兴人才创新创业的同时,积极研究构建开放包容的容错机制和社会环境,建立信贷支持政策和社会兜底保障政策,积极营造不怕失败和包容失败的良好社会风尚。六是积极探索建立终身学习机制。建立终身学习机制是成为新质人才的必要途径,也是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建立由政府主导购买教育服务、地方院校和开放大学协同参与的模式,开展新农人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服务体系,提升乡村人才质量。

### 3.3 加强文化建设,推动文化繁荣

新质生产力能够赋能乡村文化建设,不断推动乡村文化繁荣发展。乡村文化繁荣发展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精神引领,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挖掘、保护、传承和发扬好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创造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乡村主流文化。一是利用同位素探测技术、卫星定位探测等新质生产力充分挖掘乡村优秀传统文化资料,通过史学资料、历史典故、古文物古建筑等信息搜集了解乡村文化发展历程,并赋予其符合时代意义的文化内容。二是做好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研究工作,加强与地方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开展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合作研究,邀请相关专家学者做好地方志的编撰和相关编辑出版工作,对于濒临灭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音像视频录制等开展抢救性保护工作,通过使用新能源新材料等新质生产力对古文物古建筑开展保护工作。三是做好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创作和宣传工作,充分利用史学资料、历史典故、文学作品等资料,结合现代数字化技术<sup>[10]</sup>、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开展文化创作,通过大数据运算了解村民的个性化需求,以村民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传播和宣传。

### 3.4 践行绿色理念,推动绿色发展

新质生产力也是绿色生产力,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产力。乡村绿色发展是保持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践行习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两山论的生态发展理念。一是在产业发展方面遵循绿色发展之路<sup>[11]</sup>,通过加强农业水利水电基础设施建设,充分选用优质农产品品种,利用物联网等新质生产力技术对土壤肥力、空气湿度、环境温度进行控制,营造适合农作物生长环境,提高农产品产量和质量;通过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算法技术计算市场需求变化,随时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建立符合市场需求的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做到产出与市场相匹配。二是在农村

居住环境方面遵循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利用智能模型等做好乡村人居环境的统筹规划,根据乡村地区环境特色打造宜居宜业的美好乡村,推动“厕所革命”“垃圾分类”等举措对乡村居住环境进行改造,做好整体谋划和开展一体化改造乡村饮用水工程,保障水源清洁卫生。三是统筹好城乡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差距,积极建立城乡互融互通机制,发挥以县域为中心辐射周边乡镇的城乡一体化建设作用<sup>[12]</sup>,建立县域内人才流动机制和产业融合机制,促进城乡协调绿色可持续发展。

### 3.5 做好服务保障,提升组织建设

新质生产力能够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提高基层组织能力建设。现阶段乡村基层组织离国家关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还有一定差距,所以要不断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提升治理能力水平。一是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工作,通过党建引领和党员示范作用,开展党员先锋岗建设等,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号召力、组织力和引领力。二是选拔、培养和任用一批政治素质过硬的懂农业、愿意扎根农村和关心农民的基层好干部<sup>[13]</sup>,坚持从优秀党员中提拔农村基层干部,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引领作用。三是不断提升基层工作人员工作能力和水平,通过开展集中培训、对外交流、互访互学及自学等措施了解国家和上级单位关于惠农助农的政策措施、工作方法和工作经验,不断提升自身能力和水平。四是利用新质生产力统筹建立乡村工作一体化平台,包括教育、医疗、养老、保险、信贷及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工作事项,优化办事流程,让群众在家里就能了解最新政策,随时随地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各类事项,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 4 结论

“三农”问题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短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进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以新质生产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从“三农”工作的实际出发,通过改造和提升传统乡村产业,积极优化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绿色发展。要统筹乡村人才资源配置,优化乡村人才结构,不断提升乡村人才数量和质量。要积极挖掘、保

护和传承好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提升乡村文化自信。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乡村绿色发展道路,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局面。同时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坚持以党建引领乡村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构建美好乡村,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满足感和幸福感,推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 参考文献:

- [1] 张新宁.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论析[J]. 思想理论教育, 2024(4): 20-26.
- [2] 郭轶锋, 高珂. 新质生产力条件下技术技能人才能力培养的挑战与对策分析[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4(5): 1-7.
- [3] 韩飞, 郭广帅. 职业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 理论逻辑、实践堵点与创新路径[J]. 职教论坛, 2024, 40(3): 5-14.
- [4] 王静华, 刘人境. 乡村振兴的新质生产力驱动逻辑及路径[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 41(2): 16-24.
- [5]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 人民日报, 2022-10-26(1).
- [6] 王兴国, 吴梵. 科技创新驱动乡村产业振兴的机理及实践路径[J]. 广东社会科学, 2024(2): 54-61.
- [7] 盛来运. 攻坚克难回升向好夯基蓄能向新而行——《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评读[J]. 中国国情国力, 2024(3): 4-7, 2.
- [8] 吴连翠, 任欣, 范丹. 乡村振兴背景下小农户与新农人合作的利益联结模式选择研究[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24, 23(2): 142-150.
- [9] 陈健, 张颖, 王丹.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要素机制与实践路径[J]. 经济纵横, 2024(4): 29-38.
- [10] 胡钢, 杨蕙而. 数字化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功能定位与路径选择[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4(3): 21-29.
- [11] 刘儒, 何莉. 以绿色发展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目标任务、基本依循与路径优化[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4(3): 1-10.
- [12] 于亿亿, 冯淑怡. 中国县域城镇化研究: 演进脉络、研究热点与前沿趋势[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3): 107-117.
- [13] 文茂群. 做好乡村振兴人才需求侧锻造[J]. 人民论坛, 2019(33): 60-61.

责任编辑: 谢政伟

# 新质生产力促进出版业创新发展路径研究

许璘琳\*, 袁媛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安徽 合肥 230009)

**摘要:**分析了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出版业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如何积极拥抱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的科学技术,使之成为助力出版业快速发展的新质生产力,是出版人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分析了新质生产力在出版工作中的应用,并针对出版工作中选题策划等问题进行SWOT分析,提出了新质生产力助力传统出版业创新发展的思路和途径,为出版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相关参考。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出版业;编辑出版

中图分类号:G23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24)06-0007-05

## Research on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Promoting Innovative Developing Path of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XU Lin-lin\*, YUAN Yuan

(Press of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230009, Anhui)

**Abstract:** The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were analyzed for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under the backdrop of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ow to actively embrace new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presented by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make them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at help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is an question that publishers must seriously consider. It analyzed the applic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publishing work, and conducted a SWOT analysis on issues such as topic design in publishing work, and proposed ideas and ways for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o help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tional publishing industry, which is of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ublishing industry; editing and publishing

进入21世纪,科学技术特别是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得到了迅猛发展,有力地推动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深刻地影响了出版业的发展与变革。2021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了《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明确要求出版业要“实施数字化战略,强化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引领作用,引导出版单位深化认识、系统谋划,有效整合各种资源要素,创新出版业态、传播方式和运营模式,推进出版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大力提升行业数字化数据化智能化水平,系统推进出版融合发展,壮大出版发展新引擎”<sup>[1]</sup>。因此,出版业要

借助新质生产力构建“出版+”新业态,促进发展。通过新质生产力的引入,构建出版新发展路径的基本构想是“推动数字技术赋能出版全产业链条,补足补强出版业数字化薄弱环节,进一步催生传统出版与数字业务相融合的新型出版业态”<sup>[2]</sup>。

### 1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及现实必要性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提出:“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

能。”<sup>[3]</sup>目前,以数字化和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快速推进,出版界必须认识到以数字化和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技术的加持是出版业发展的重要抓手,是推动出版业跨越发展、产业升级和生产力跃升的重要支撑。因此,“出版业作为内容和思想产业,必须牢牢把握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把创新发展作为出版业的实践路径。”<sup>[4]</sup>出版业的新质生产力是指依靠先进科学技术的支撑,通过数字化出版、智能化编辑、个性化内容定制等方式,不断优化编辑出版手段和流程,不断培育和发展出版新业态,有效地推动编辑出版工作的开展,从而产生更加积极高效的新动力。

在出版业发展过程中,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是通过积极融入知识、数据、技术等新元素,创新发展模式提升生产效率,进而降低生产的成本、提高出版产品的质量和提升市场认可度,从而不断推动出版业良性和快速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出版业的具体应用主要体现在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等方面。在出版工作中,必须深刻地认识到“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必须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使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sup>[5]</sup>。

目前,出版业正经历着读者的消费习惯和阅读方式的不断变化,纸质出版物逐渐向电子书、在线平台和融媒体过渡以及面对以数字化和人工智能为主要动能的新质生产力的不断推动的新形势。因此,必须认真分析和高度关注出版业新质生产力的引入和应用,积极应对由新质生产力为推动力的技术进步对出版业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顺势而为,推动出版业的健康发展。

## 2 新质生产力在出版工作中的应用路径

新质生产力在编辑出版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有效地提高编辑出版工作的效率;可以有效地提高编辑出版工作的质量;可以优化传统的编辑出版生产方式;可以拓宽出版物的传播方式;可以对编辑出版行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新质生产力在编辑出版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是,可以使出版产品的形态更加丰富、编辑出版技术和手段更加先进、出版物编校与内容检查准确性不断提高、出版物的管理更加便利、对出版物市场趋势的把握更加准确、对读者阅读倾向及市场认可度的分析更加科学、对版权保护和信息反馈更加高效,先进技术在编辑出版工作中的应用不仅能显著提升工作

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同时还能增强读者的互动体验,扩大出版内容的社会影响力和传播范围。因此,编辑出版行业要直面挑战和抓住机遇,充分利用新质生产力推动编辑出版工作创新发展。

### 2.1 依靠新质生产力拓展出版业发展的新领域

面对新的形势,出版业要不断创新编辑出版工作的新模式,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增强现实、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建立获取所需内容资源的新渠道和新模式。在出版工作中,要以新技术为动能,更加有效地建设新平台,拓展出版形式与内容,从而将文字、图片等平面内容转化为立体、交互式的场景,让读者享受更加丰富的阅读体验,为编辑出版工作开创全新的视角和体验,为出版业带来更多的创新空间。同时,数字化技术还可以实现多媒体内容的整合和展示,使得出版物更加直观和生动。

因此,要不断探索多元化、多途径融合发展的新模式,不断优化和拓展产业链,不断探索和建立新的传播渠道和新的商业模式,以满足市场变化和读者需求的变化,实现跨界融合,“使得所生产的劳动产品(即融合出版产品)以更加生动、形象的方式呈现给读者。”<sup>[6]</sup>要通过创新发展模式,建立新的合作平台,推动编辑出版工作的转型升级。

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实现辅助优化选题策划、稿件精准编校、编排校审等软件功能的增强,可以对读者信息反馈、出版传播渠道加以重塑,以更好地保障出版版权和效益等新功能,从而提高出版物的综合品质和市场认可度。由此,新技术的介入不仅减轻了编辑的工作负担,也提高了出版物的质量和可读性。

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为出版业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编辑出版工作必须紧跟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积极引入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技术,并以此优化传统出版流程和手段。要根据市场和读者的需要,在提高出版效率、降低出版成本,在数字出版、自动化内容生成、出版物内容的快速传播和广泛覆盖等方面以新质生产力为主要动力,提升出版业整体品质。通过新质生产力的生产方式和技术手段的使用,使得编辑出版工作更加便捷高效。

### 2.2 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提升选题总体质量

选题是出版工作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选题的培育、遴选、论证是出版中的重要工作。在编辑出版工作中引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可以为出版选题和策划提供重要的支撑。通过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有利于编辑了解和把握选题的新颖性、创新性



和实用性,有利于提高选题的市场认可度,有利于提升选题与读者阅读的一致性,从而提升选题的认可度和前瞻性。因此,将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技术用于出版选题策划是有效提高出版生产力的重要路径之一。通过对大数据驱动的人工智能干预出版选题策划进行 SWOT 分析(见图 1),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在出版选题过程中的作用和潜在影响,不断优化选题过程和质量,提升出版物的市场表现,推动整个出版行业向更高效、更精准的方向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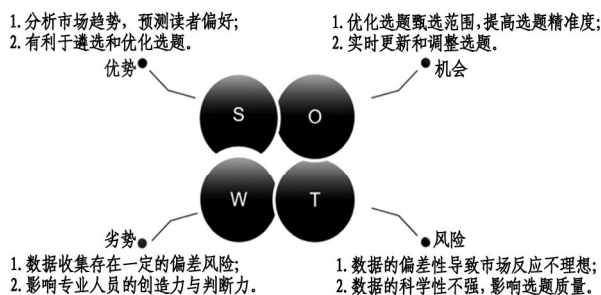


图 1 人工智能干预图书选题策划 SWOT 分析图

**优势(Strengths)分析。**首先,在选题策划中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可以对出版的市场需求、读者阅读倾向和趋势等进行深入分析,为编辑提供更为客观和系统的选题建议。这将有助于出版社准确把握市场需求,策划更具潜力和更符合市场需求的选题。例如,某出版社通过分析媒体上的读者反馈信息,发现科普类出版物在青少年读者中有较大影响,便及时调整了选题方向,策划了一批有价值的科普出版物,获得了良好的市场反响。其次,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可有效提升选题策划的效率。通过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算法,能够快速分析大量的文本数据,识别出潜在的热点和趋势,缩短了选题策划的周期。最后,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激发新的选题创意,提高出版社的创新能力。

**劣势(Weaknesses)分析。**在选题策划中,运用人工智能技术也存在一些劣势。首先是数据隐私与安全问题,收集和分析大量用户数据将涉及到个人隐私,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引发法律诉讼和公众信任危机。其次,人工智能技术的复杂性和高昂的实施成本也是出版社面临的问题。最后,数据质量问题可能会影响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因此,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谨慎考虑各种影响因素,以确保技术的有效整合和应用。

**机会(Opportunities)分析。**伴随着大数据和人

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出版社在选题策划上面临着多重机遇。这些机遇不仅能够提升选题策划的质量和效率,也为出版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首先,通过分析消费者的阅读习惯、社交媒体互动和在线评论,出版社能够更精准地把握读者的兴趣点,从而制定出更符合市场需求的选题。其次,传统的出版选题市场调研方法耗时耗力,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有效降低选题调研的成本。最后,全球化的趋势为出版社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借助大数据分析,出版社可以识别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差异和市场需求,从而策划出适合国际市场的选题。

**威胁(Threats)分析。**首先,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竞争环境不断发生变化,出版社需要不断更新和提升自身的技术能力,以避免被市场边缘化,从而失去竞争优势。其次,数据隐私和安全问题也是出版社在应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面临的重要威胁。随着数据收集和分析的深入,如何保护用户隐私和数据安全也是必须面对的挑战。最后,出版行业的竞争也在加剧,在这种环境中,出版社必须不断创新和优化选题策划策略,以保持市场竞争力。

出版选题策划的 SWOT 分析清楚地表明,“传统图书的选题策划与内容生产高度依赖编辑和作者,而‘AI+’图书选题策划与内容生产模式中,AI 算法可以替代编辑进行智能化数据筛选、信息识别、归纳整理等工作,AI 内容生产辅助功能可以实现内容的多样化呈现,从而使图书选题策划与内容生产降低对人力的依赖,实现人与 AI 的智能协作。”<sup>[7]</sup>因此,出版单位要通过大数据驱动的人工智能,深入分析并研判出版市场的趋势、读者偏好以及与选题相关的数据,准确把握与选题策划相关的各种信息,不断提高选题策划的效率和精准度。

### 2.3 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辅助编辑校对工作

编辑校对工作是出版行业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它直接关系到出版物的质量。然而,传统的编辑校对方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耗时长、工作量大、可能存在疏漏等。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可以实现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辅助编辑校对工作。可以“利用自动校对和编辑工具,自动检测拼写错误、语法错误、标点符号等问题”<sup>[8]</sup>,从而提高内容的准确性和编校质量。因此,运用人工智能辅助编辑校对工作是有效提高出版生产力的关键路径之一(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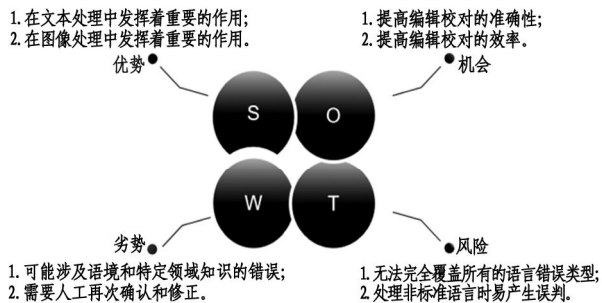


图2 人工智能辅助编校的SWOT分析图

**优势(Strengths)分析。**首先,传统的编辑校对工作往往需要编辑人员逐字逐句进行校阅,而利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快速查找和列出文本中的错误和疑似错误之处,有效提高编辑校对工作的效率和准确性,降低人力成本。其次,依靠人工智能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系统能够开展多种语言和多种文本的出版物校对工作。目前,市场上已有多种智能校对软件可以进行语法错误、拼写错误以及格式不规范等多种问题的检查。最后,人工智能系统能够通过机器学习不断优化校对功能,不断推出功能更加全面和强大的智能校对软件。

**劣势(Weaknesses)探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在出版物编辑校对工作中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首先,技术依赖性增强可能导致编辑人员的专业能力的降低。随着自动化工具的普及,一些传统的校对技巧和判断能力逐渐被边缘化,编辑人员可能会过于依赖机器的判断,而忽视了自身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积累所发挥的作用。其次,人工智能在处理复杂语境、文化差异和特定领域的专业术语时,往往无法做到尽善尽美。最后,数据隐私和安全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

**机会(Opportunities)评估。**首先,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进步,自动化校对工具的准确性和效率显著提升,它的介入大大减少了人工校对的工作量。这不仅提高了编辑的工作效率,还使得出版工作者能够将更多时间投入创意和内容开发上。其次,市场对高质量出版物的需求持续增长,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要以帮助出版工作者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及时调整工作策略以满足市场的期望。最后,全球化的发展为出版物编辑校对工作提供了新的机会,多语言处理功能的提升,使得对外文出版物的编辑和校对变得更加高效。

**威胁(Threats)识别。**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辅助出版物编辑校对工作的过程中,同样也存在多种潜在威胁。首先,编校人员过度依赖技术手段,一旦系统出现故障或技术问题,就可能导致工作进度延

误和质量下降。其次,出版物编辑校对工作中涉及各种信息,这些信息可能存在被盗窃或泄露的风险。最后,编校人员可能由于对新技术的抵触或缺乏相应的技能培训而无法适应快速变化的工作方式,进而影响整体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综上所述,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对出版物编辑校对工作有重要推进作用,但也存在一些威胁因素。这些都是应当引起高度关注和积极应对的,唯有如此,才能保障编辑校对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 2.4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图片处理新技能

首先,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图像识别和分析技术实现图片的自动化处理,包括自动识别图片中的文字、图形、版式结构等,从而提高编辑校对的效率和准确性。其次,人工智能在图像处理中可以自动编辑校对图片的清晰度、对比度、色彩等因素,从而提升图片质量和可视化效果。再次,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智能算法和模型实现对大规模图片数据的处理和管理,包括图片分类、标注和检索,为编辑校对工作提供支持和便利。最后,人工智能可以实现对图片内容的自动化解读和分析,包括情感分析、主题识别、内容分类等,为编辑校对工作提供更多的信息和素材支持。

## 2.5 利用社交媒体与自媒体重塑出版传播渠道

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社交媒体和自媒体的崛起,出版物的内容生产、市场宣传和销售方式已发生变化,出版单位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和自媒体平台,在更广阔的范围和更多的维度上与读者进行直接交流。因此,出版单位必须认真面对,积极探索通过新技术为出版业开拓发展新模式,积极探索内容生产与营销渠道的再造和重塑,积极构建符合现代企业经营规律的价值递增产业链,实现更加灵活、快速的出版和传播。“通过多样化的品牌信息传播途径,建立一种系统、动态和平衡的品牌传播生态,帮助出版企业创造和提升品牌价值。出版企业通过塑造品牌文化、加强精准传播、推动品牌联动等策略,实现内容资源多样化输出,实现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sup>[9]</sup>

## 3 融入新质生产力的风险应对策略

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在助力出版工作的同时,也对出版工作提出了一些挑战。例如,由于语言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自动编辑校对系统可能无法完全覆盖所有的语言错误类型,尤其是涉及语境和特定领域知识的错误。此外,自动编辑校对系统可能会产生误判,对于一些语言结构复杂、歧义性较大的句

子,人工智能的修正可能并不准确,需要人工加以确认和修正。另外,人工智能技术支持的自动编辑校对系统在处理非标准语言和口语化文本时也可能表现不佳,自动编辑校对系统可能需要额外的训练和优化才能够有效地进行编辑校对工作。因此,在一些特定领域和语言环境下,人工智能技术并不能完全替代人工编辑校对。

### 3.1 实施综合的技术策略

出版社需要制定与出版目标、预算限制和资源可用性相一致的数字化技术策略。具体来说,应根据该策略对工作流程的效率、内容质量和读者参与度等关键方面进行优化,确保数字技术与人工专业协同工作,相辅相成。在通过使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来简化流程的同时保持编辑工作的高质量和独特性,促进技术驱动的效率与人力投入的协作,以保证在内容创作中对自动化与编辑专业技能的平衡。

### 3.2 加强高素质的出版队伍建设

编辑出版单位应加强对编辑、校对、设计、营销以及管理等岗位人员的培训,要建立编辑出版队伍能力培养的长效机制,提高他们的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然而,这些能力往往需要通过长期的学习和积累才能达到一定水平,且受到个人天赋和经验的制约。因此,在努力提高编校人员能力的同时,要积极引进具有创新思维和跨界经验的人才,不断地为团队注入新的活力。此外,要建立健全激励机制,激发出版单位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这也是提升新质生产力的关键。

### 3.3 编辑校对人员要适应对编辑技能要求的转变

编校人员的传统能力包括语言功底、文字功底、专业知识和审美能力等,而引入新质生产力则需要编校人员能够掌握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编辑校对软件以及智能应用工具,这些新的能力的获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编校人员传统工作能力的不足。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使得编辑校对这一传统行业的技能要求发生了变化。首先,编校人员需要具备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工具和软件的使用技能,以便能够配合人工智能系统进行编辑校对工作。其次,编辑校对人员还需要具有数据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便能够更好地利用人工智能系统提供的大数据信息辅助编辑校对工作。

### 3.4 要处理好传统与新兴能力的平衡

编校人员传统能力的优势在于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掌握了广博的语言和文字知识,具有较强的审美能力和专业水平,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文本的质量和科学性,保持了出版行业的专业性和品质。而新

兴能力可以通过大数据和机器学习技术快速发现和纠正文本中的错误和问题,提高编辑校对的效率和准确度。平衡传统与新兴能力,可以让编辑校对人员实现传统与新兴能力的有机结合,推动出版行业编辑校对工作的转型升级。新质生产力在编辑出版工作中的应用和发展,为出版行业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面对未来,编辑出版工作应与时俱进,积极拥抱新技术、新模式、新途径,不断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同时,也要关注读者的需求变化,提供更加优质、个性化的内容产品和服务,以满足社会的多元化需求。

## 4 结论

编辑出版工作的新质生产力建设需要从技术、人才、发展模式、资源配置和品质管理等多个方面入手。只有不断创新、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品质管理水平,才能推动编辑出版工作的持续发展,为社会提供更多优质的精神食粮。在新形势下,我们也需要关注新技术带来的挑战和问题,如版权保护、信息安全等,为出版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出版从业者要分析和探索新质生产力在出版工作中的应用,分析新质生产力重塑出版业的逻辑和规律,以及适应和利用这些新技术赋能出版业,推动出版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 参考文献:

- [1] 国家新闻出版署. 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J]. 中国出版, 2022(3): 8-20.
- [2] 张佳虹. 基于线上知识服务的出版融合探索与实践[J]. 新闻研究导刊, 2022, 13(8): 4-6.
- [3] 习近平. 牢牢把握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 奋力开创黑龙江高质量发展新局面[N]. 人民日报, 2023-09-09(1).
- [4] 金鑫荣. 新质生产力赋能出版高质量[J]. 出版参考, 2024(3): 1-2.
- [5] 习近平.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 人民日报, 2024-02-02(1).
- [6] 陈少志, 白永星. 以新质生产力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视角[J]. 出版与印刷, 2024(2): 14-24.
- [7] 王羽佳. AI 与出版融合视角下图书选题策划与内容生产的优化路径[J]. 出版科学, 2023, 31(1): 44-49.
- [8] 邢璐. 科技类出版数字化转型与编辑业务流程再造的思考[J]. 采写编, 2024(2): 136-138.
- [9] 戚德祥, 孙红. 中国出版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基于人才、品牌、渠道维度的思考[J]. 中国编辑, 2022(11): 38-44.

## 清代江村江氏家族的词学取径与词风嬗变

卞嘉傲\*, 薛玉坤

(苏州大学 文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23)

**摘要:** 雍乾之际, 活跃于今浙江杭嘉湖地区、江苏扬州地区的皖籍词人为“浙派”词风的风靡推波助澜, 其中歙县江村江氏家族词人辈出, 以江昱、江恂、江昉、江炳炎、江立为代表, 从词学理念至词作、词籍疏证, 不仅身体力行地践行其好学姜、张的词学取径, 更是以家族词风之嬗变彰显“浙派”的发展轨迹、地域间的互通, 在“浙派”、广陵词坛乃至整个词学史都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关键词:** 雍乾之际; “浙派”词风; 江氏家族; 江昱; 江昉; 江炳炎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24)06-0012-06

## The Path of Ci and the Evolution of Ci Style of Jiang Family Living in Jiang Village in Qing Dynasty

BIAN Jia-ao\*, XUE Yu-kun

(School of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Jiangsu)

**Abstract:** During the dynasties of Yongzheng-Qianlong, poets of Anhui origin who were active in Hangjihu area of Zhejiang Province and Yangzhou area of Jiangsu Province contributed to the popularity of “Zhe School” Ci style. Among them, there appeared many poets of Jiang family in Shexian County, represented by Jiang Yu, Jiang Xun, Jiang Fang, Jiang Bingyan and Jiang Li. He did not only practice the Ci learning path of Jiang Kui and Zhang Yan, but also demonstrate the development track of “Zhe School” and the intercommunication between regions with the evolution of family ci style, leaving a strong mark in “Zhe School”, Guangling Ci circle and even the entire Ci learning history.

**Key words:** Dynasties of Yongzheng-Qianlong; “Zhe School” Ci style; Jiang Yu; Jiang Fang; Jiang Bingyan

歙县江村江氏家族, 自北宋初始祖江汝刚迁居歙县江村, 其峰、岌、岩三子各诞子息, 形成三派, 人丁兴旺。在世系推衍下又诞生若干门房支派, 至清代枝繁叶茂, 为当地望族且才人辈出, 即如《橙阳散志序》所云: “余家自宋天圣间始祖若毅府君以进士由三衢来侔歙, 家于橙阳, 及今七百六十余年, 代多名臣伟彦。国朝以来, 则掇巍科, 跻膺既仕者甚众, 而逸士贞媛, 幽光潜德, 尤未易更仆数。”<sup>[1]</sup> 其中部分支派迁居他地, 江苏扬州、浙江钱塘便是歙县江村

江氏家族在雍乾之际主要居住地, 诞生出不少词人, 江昱、江恂、江昉、江炳炎、江立为其中代表。

在“雍正、乾隆间, 词学奉樊榭为赤帜, 家白石而户梅溪矣”<sup>[2]</sup>的“浙派”席卷下, 寓居扬州、钱塘的江氏族人多与以厉鹗为首的浙派词人交游, 加之江浙两地的地域联系, 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共同作用下, 江氏词人崇尚“浙派”词风, 好学姜夔、张炎。

收稿日期: 2023-12-18 \* 通讯联系人

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科基金文脉专项一般项目(19WMB035)。

作者简介: 卞嘉傲(1999-), 女, 江苏扬州人, 硕士研究生; 薛玉坤(1971-), 男, 江苏泰州人, 副教授, 博士。E-mail: bianjiaao1999@163.com

## 1 江氏家族词人的词学取径

江氏词人取法姜夔、张炎,从他们的词学理论、词作、实践行为中都可发现蛛丝马迹。

于词学理论方面,如江昱(1706-1775)《论词绝句十八首》借评点词人来表达自身词学理念,如其十八:

暗香疏影静生春,绿意红情迥出尘。寂寂自开还自落,人间谁是别花人。<sup>[3]</sup>

“暗香”“疏影”为姜夔所创词调,“绿意”“红情”可见张炎《红情》(无边香色)词序“《疏影》《暗香》。姜白石为梅着语,因易之曰红情、绿意,以荷花、荷叶咏之”<sup>[4]</sup><sup>[316]</sup>所言。以此足见江昱对姜、张二人之词的推崇。

于词作,如江昉(1726-1793),“尤工填词,慕姜白石、张叔夏之风”<sup>[5]</sup>,得张炎词之“清空”精髓。张炎词之“空”,常以表“空”之义的字词、意象的有无对比、物象体积的大小对比来表现,如其《解连环·拜陈西麓墓》便将三种方式融合得浑然天成。词中多次出现“无”“未”“空”等字,营造氛围的空荡。在从时间层面,用意象的物是人非,如“向北来时,无处认、江南花落”<sup>[4]</sup><sup>[72]</sup>,花瓣飘零,无处寻认,以“有”衬“无”,显现心境的空寂。在空间层面,如“山中故人去却。但碑寒岫首”<sup>[4]</sup><sup>[72]</sup>,以碑之小衬山景之广阔,造就环境至词境的“空”感。此点江昉学得神妙。其一,善用表“空”义之词,如《摸鱼儿·月夜登金山》,不论是“禅外更无今古”<sup>[6]</sup><sup>[461]</sup>的“无”,亦或是“空翠洒衣屦”<sup>[6]</sup><sup>[461]</sup>的“空”,“说与霓裳莫舞”<sup>[6]</sup><sup>[461]</sup>的“莫”等,字字句句皆传递出“空”,即“没有”之义。其二,时间维度中意象的“有”“无”对比。如《御街行·寄怀陈春渠武林》,以“梦”联通现实与回忆,时光的追逝、历史的缥缈、盈亏得失的虚无皆在时间维度的“有”“无”间被放大,在存在与失去的巨大冲击下,词人的内心如“落叶与愁俱碎”<sup>[6]</sup><sup>[462]</sup>,愁绪堆积。当思绪逐渐放空,词人的心境慢慢缓和,滋生出“相逢懒问盈亏事”<sup>[6]</sup><sup>[462]</sup>的“懒”意与“一笑生涯如此”<sup>[6]</sup><sup>[462]</sup>的云淡风轻,这种由时间蔓生的“空”感,不仅有看透世事沧桑的洒脱,更有岁月蹉跎的悲慨寥落。其三,空间维度中物象体积的大小对比。如《高阳台·上巳虹桥迟素兰不至》,“花引春来,山邀云去,烟波自有闲人”<sup>[6]</sup><sup>[464]</sup>,以一花与一片春景、一云与一座山景、一人与一面烟雾笼罩的湖水进行小、大对比,在小体积事物的衬托下,似可见朦胧春景的繁盛,山色空蒙的壮阔、邈邈烟波的无垠。词以“黯销凝、南浦歌阑,箫鼓黄昏”<sup>[6]</sup><sup>[464]</sup>戛然而止,与张炎《解

连环·拜陈西麓墓》末句“料犹是、听风听雨,朗吟夜壑”<sup>[4]</sup><sup>[72]</sup>异曲同工,以声音破除黄昏晕染下的静谧,箫鼓歌阑之余音袅袅、漫至天际,使得词的空间被无限扩张,回味无穷。

于实践行为,如江昉集张炎词句作《集山中白云词》,亦与程名世、吴焘等辑《学宋斋词韵》,与张炎《词源》之“词以协音为先”观点相合,皆重词之音乐性。江昱作《山中白云词疏证》,其弟江恂为之参校。《山中白云词疏证》成于乾隆十八年(1753),从江昱自序可知,其疏证张炎《山中白云词》的缘起在于张炎词“用意之密”,“率尔读之,虽击节叹赏,而作者苦心或未出也”<sup>[7]</sup><sup>[1249]</sup>,为填补此憾,将词中“或实有所指而本题未能注明”之处加以注明。且以龚翔麟刻本为底本,考辩不同版本间的真伪、正讹,如其自序言:“至于‘元叟’之非‘允叟’,‘庆承’之为‘庆乐’,‘箴隐’之为‘戴隐’,‘太初’之即‘复初’,‘庚寅岁’之宜从‘辛卯岁’,子昂卷之可并溪山堂。一句之讹,一字之误,凡此之类,不可枚举。”<sup>[7]</sup><sup>[1249]</sup>以《山中白云词疏证》中考证之严谨、内容之详实,足可见江昱对张炎之推崇,即如清人陈撰所言:“遂使词之精蕴,挹之而逾以出,是岂特玉田数百年之桓谭,抑亦吾侪后来读之者之厚幸也。”<sup>[7]</sup><sup>[1249]</sup>

严羽《沧浪诗话》云:“入门须正,立志须高。”“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sup>[8]</sup>词学取径影响着词人的词学主张与词风,是词人在其个性气质、交游往来、时代底色笼罩下的选择,而雍乾之际寓居江苏扬州、浙江钱塘的歙县江村江氏词人,也是在诸般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追随“浙派”,取法姜、张的原因。

就个性气质而言,地域与家族风貌共同赋予了江氏词人以整体创作个性。寓居扬州、钱塘的江氏族人所处的江浙地区在古代原属吴越,其文化特质上溯楚风,附着了地理环境、历史境遇所赠予的“轻柔明艳”。另外,歙县江村江氏家族贾而好儒,家财雄厚,喜好风雅,多置园林雅集。在此影响下,江氏词人好“浙派”词之“清幽”,尚姜、张之婉曲蕴藉、清空醇雅。

就交游而言,寓居扬州、钱塘的江氏词人广交文人雅士,其中“浙派”词人占多数,如江昉与“浙派”后期嬗变先声吴锡麒常往来唱和,为其填词《念奴娇·题有正味斋词吴谷人太史著》。江昱与“浙派”中期领袖厉鹗交游甚多,如乾隆三年(1738)十月十七日,其与厉鹗等人红桥泛舟,分赋《湘月》。江立(1732-1780),“亲炙樊榭几席,偷声减字,得其弦外之响”<sup>[9]</sup><sup>[201]</sup>,为厉鹗弟子。因此,江氏词人追“浙

派”风尚也有交游的影响。

就时代底色而言,雍乾之际文字狱猖獗肆虐,如厉鹗受“查嗣庭案”牵连、胡期恒受“年羹尧案”牵连,双双流落扬州。文字狱滥兴下的拘文牵义、妄加罪过,且处理方式之极端,使得文士噤若寒蝉,回避历史、现实、政治,甚至不敢在作品中大胆倾吐内心,即如李祖陶《与杨蓉诸明府书》所言:“一涉笔惟恐触碍于天下国家。”<sup>[10]</sup>故“浙派”幽隽清雅的词风、重比兴寄托的词学主张广受词人仿学。因此,江氏词人尚“浙派”亦受时代环境的推动。

综上,江氏词人尚“浙派”词风、审美主张有据可依,从他们的词学理论、词作、实践行为也都可发现其取法姜、张。

## 2 江氏家族词人的词风嬗变

江氏词人的词风内含嬗变,足可见“浙派”的发展轨迹。

江昱之词,冯金伯《词苑粹编》卷八曾引赵秋谷所云:“宾谷《梅边琴汎》一卷,追情石帚,继响玉田。”<sup>[11]</sup>从江昱的词学理论、疏证《山中白云词》来看,其的确崇尚姜、张,但就具体词作而言,并不完全受浙风影响。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四曾评:“江宾谷词,亦得南宋人遗意,虽未臻深厚,却与浅俗者迥别。”<sup>[12]</sup><sup>1228</sup>江昱词虽不至南宋词之沉郁,但与同期词人相比已是“深厚”。“深厚”归根结底是情感的沉淀,尤其体现在江昱为元配妻子陈珮所作之词中,着笔处平淡,却足见情思深厚。如《金缕曲·内子归》,以妻子归家的平凡小事为由,低喃倾诉。“谁道天涯门外路,未别已如梦里”<sup>[13]</sup><sup>3229</sup>,词人以一种嗔怪的语气埋怨两人相隔两地。“窈窕纹窗相对处,便抽书、勘帖同清致”<sup>[13]</sup><sup>3229</sup>,思念太甚,便从记忆中拾取一二暂慰相思,故词人悬想:如若妻子还在家中,此时正当对着文窗,携书勘帖。此句不仅可见词人对妻子生活习惯的熟稔,更表达其对二人同好雅文、琴瑟和鸣的满意。“遥怜谢傅堂前意”<sup>[13]</sup><sup>3229</sup>,以陈珮比谢道韞,抒发对妻子才华的赞赏。全词未直言思念,却处处可见思念,看似侈侈不休的语词,却句句深情。

再如《好事近·客真州答内寄怀》与《蝶恋花·内子以予嗜词,旬锻日炼,致忘食饮,屡以月戒,占此答之》,前首借酒思妻,后首则记述词人嗜词常废寝忘食,妻子担忧,词人便自比刘伶来劝慰妻子的日常小事,皆从平凡细微之事着笔,选事微却足见深情,用语淡而情旨远,语言无藻饰却引人入胜,词以描写

为主,间以些许的叙事,以此抒情,遣词自然,委婉顺畅,以极淡之笔致极挚之情,故陈廷焯在《词坛丛话》感慨“《琢春》《梅鹤》两家,词骨最高”<sup>[14]</sup><sup>12</sup>,骨在情真。

江昱词之特色与绝大多数“浙派”词之“清空”并不相仿。而江恂(1719-?)之词,更是不符“浙派”主张,如厉鹗《群雅词集序》言“远而文,淡而秀,缠绵而不失其正”<sup>[15]</sup><sup>755</sup>,讲究词用语的秀美,以现高格;而江恂词,如《壶中天》,以俗字俚语入词,如“恁般生活”“老眼俄教豁”<sup>[16]</sup>,为词作增添了几分灵动生趣,却也不似“浙派”词之用语雅致。

江昱、江恂、江昉、江立皆居于扬州,且江昱、江恂较江昉、江立要年长不少,有近二十年的时间差,而这段时间恰与厉鹗逐步迈向词坛领袖的间隙有所重叠。自康熙六十一年(1722),徐逢吉、陈撰、吴焯、符曾等六家为《秋林琴雅》四卷作序,至雍正十一年(1733)九月吴焯去世,及乾隆四年(1739)厉鹗编定、刊行《樊榭山房集》,这近二十年的时间见证了厉鹗词坛地位的不断上升。而从江昱、江恂词风不完全浸染浙风,到江昉、江立词作已然十分典型的“浙派”模样,也正印证着“浙派”对广陵词坛的逐步浸染及“浙派”词坛地位的逐步稳固。

江昉对“浙派”所推崇的张炎词之“清空”全盘接纳,上文已述,而江立,即杭世骏《江玉屏词序》所言“樊榭有替人者也”<sup>[9]</sup><sup>201</sup>,作为“浙派”中期领袖厉鹗的学生,得其“弦外之响”<sup>[9]</sup><sup>201</sup>亦是顺理成章。观江立之词,确实具有厉鹗词之特色。

首先,学厉鹗词之“清幽”。厉鹗在姜夔尚“清”之风的基础上,去妍寻幽,通过题材的选择、字词与意象的选择、情感的内收上追求“幽”境,这是广为人知的,不必再赘述,而江立亦深得此法。

江立在题材上,不言男女情爱,而多咏物、送别、题画、纪游,唯有一首咏闺阁之作,即《琐窗寒·寒闺》,亦不同于南宋婉约词人借闺房写相思情爱。全词先交代寒闺陈设,有“熏炉”“象尺”“锦衾”等物,再况女主人公面容之“清腮融粉,细眉舒锁”<sup>[17]</sup><sup>5032-5033</sup>,最后借女子以红棉浅蘸翠罽油擦拭镜子、不敢开帘、玉手紧环衣袖等动作紧扣词题的“寒闺”二字,突出屋内的凉意。词中虽也有男主人公出现,但也只是作为闺房中的物象存在,以“单身怯最,喜道近人同坐”<sup>[17]</sup><sup>5032-5033</sup>之句,极委婉地一笔带过,不细言男女之间的感情。

其次,在字词与意象的选择上,江立亦遵从厉鹗主张,常以表清、寒、冷、凉词义的字词,含有孤寒意蕴的意象入词。如《琐窗寒·寒柳》,词中多出现如

“冷”“冻”“寒”“病”<sup>[17]5032</sup>等字词,“冷月”“昏鸦”“断桥”“寒浦”<sup>[17]5032</sup>等意象,以幽隽之笔,将词境归于清寂冷峭。再如《木兰花慢·赋冰灯》,词人以“冷光红”<sup>[17]5034</sup>形容灯在黑夜中散发的红光,一“冷”字使得灯光带来的温暖荡然无存,仿佛附上一层寒意。“太液池”“广寒宫”“云母屏”的接连出现,在“寂寥夜悄”<sup>[17]5034</sup>中,皆蒙着冷雾。梅花旁仅有“冻蝶僵蜂”<sup>[17]5034</sup>,如此“薄翳”,共守“残冬”。整首词虽意象丰富,但在凄清的词藻修饰下,都似结了冰霜,使得词境更为幽冷。

在抒发情感方面,江立习厉鹗之法,将情感掩藏在清雅之下,内敛地为“清空”雅格、清幽词境后退。若说其送别词还尚能品出一丝依依不舍之情,如《摸鱼儿·将之广陵,用送砚农叔韵留别汪比部》中借柳絮飞寄以留别,那江立的咏物词便已将词情隐藏得看不见了,如《疏影·赋黄梅花影》,咏黄梅花之“嫩容扶病”<sup>[17]5030</sup>,表现其枝干的纤细与横斜之姿。加之“寒”“病”“泪”“疏”“冷”等字入词,使得词的氛围顿入冰天雪地,凉意纵横。全词虽尽力塑造黄梅的形神,使其栩栩如生,但却不言情。

不同于身处扬州的江昉、江立得“浙派”词风等外在形式特点,寓居钱塘的江炳炎则得之内核,即如《白雨斋词话》卷四所言:“江研南词,取法南宋,颇有一二神解处。南芴所得在貌,研南所得在神。”<sup>[12]1227</sup>

以雅为尚是康熙中后期社会稳定之时,人们适应时代平稳趋势所提出的审美理想。而浙派词最是标榜“雅正”。朱彝尊标举“醇雅”和“骚雅”,如其《静惕堂词序》主张写情不流靡放荡,抒怨不违背封建礼教,言词不淫艳,此即“醇雅”。“骚雅”,可见朱彝尊《陈纬云红盐词序》之“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寄情焉耳”<sup>[18]662</sup>,即比兴寄托。再至厉鹗将词与《诗三百》相联,如其《群雅集序》言:

词源于乐府,乐府源于《诗》,四诗,大小雅之材合,百有五材之《雅》者,《风》之所由美,《颂》之所由成。由《诗》而乐府而词,必企夫“雅”之一言而可以卓然自命为作者。故曾端伯选词名《乐府雅词》,周公谨善为词,题其堂曰“志雅”。词之为体,委曲啾缓,非纬之以雅,鲜有不与波俱靡而失其正者矣。邗上江君研农,清修嗜古,翛然尘壒之表,酷喜词,学小阮。冷红词客久寓斯土,与之游处,而词益工。<sup>[15]755</sup>

厉鹗认为词由诗经乐府而来,也应循雅正,“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而有意思的是厉鹗在确立了

词与《诗三百》的关联,肯定了词应尚雅的正当性后,紧接着便言及江炳炎,前后话题的相联一定是因为两者之间有相关性或相似性,由此可见,在厉鹗心中,江炳炎应当是词之雅正的典范。“雅”需语言、情感贬黜浮艳,“格高韵胜”;“正”需词正宗之婉曲蕴藉。

为更好地理解江炳炎词之“雅正”,需了解一点,即:厉鹗与朱彝尊虽皆崇“雅正”,但因两人所尚词风不同,朱彝尊词缠绵情深,厉鹗词清幽冷峭,加之两人所处时代经历不同,故朱彝尊词多有身世故园之感,而厉鹗词情更为清寂、隐藏。而江氏词人虽都受“浙派”影响,但江昉、江立由于厉鹗寓居扬州且与之交往甚密的缘故,其词更似厉鹗所倡清幽,而江炳炎词却更似朱彝尊,即如陈廷焯《云韶集》卷十九所评“《琢春词》扫除靡曼,屏斥浮夸,独归雅正,合者不减竹垞也”<sup>[19]</sup>。故江炳炎词中情感更得南宋“神理”,即故园、故国身世之感。

因此,江炳炎之“雅正”,绝非仅于外在形式的格高婉曲,更有借比兴寄托抒发故园身世之感的沉郁。如《念奴娇·赋归雁同樊榭、菰江》,以归雁的视角作词。“唤起烟波,十年清梦,恼乱离乡怨”<sup>[20]2677</sup>,词人倾诉背井离乡十年的凄怨,词情斐然,溢满词章。再如《长亭怨·再赋归雁》,依旧咏归雁,此词的环境较前首更为凄寒,开首的“乍回忆、残寒时序”<sup>[20]2678</sup>为全词奠定了风刀霜剑的凄冷氛围。“故国情怀”<sup>[20]2678</sup>一词如惊天霹雳,在文字猗猗的时代令观者胆战心惊。紧接着“异乡滋味久延伫”<sup>[20]2678</sup>瞬间将焦灼惶恐的气息紧急拉扯回平静的哀伤,原是异乡人的故园之思。“暖风沙外,才拂动、青青娇。可惜此韶光,总让了、参差双羽”<sup>[20]2678</sup>,即使出现温感之“暖”、视觉之“青”、神韵之“娇”,从不同角度去建构舒缓、明媚的氛围,但一句“可惜”便打破种种假象,时光流逝的哀伤让词人在“点点飘零何处”<sup>[20]2678</sup>的悲伤洪流中快速沉沦。“莫再写相思,撩乱离愁飞去”<sup>[20]2678</sup>,每一字、每一句都在加深思念的厚度。

江炳炎以比兴寄托身世故园之感,语言宛雅幽怨,情感曲折深婉,极为“雅正”。其《齐天乐·蝉》与《梦横塘·菱》亦如此,借咏蝉、菱诉说“故园真好”<sup>[20]2688</sup>的情怀,含蓄蕴藉,味极隽永,词情隐于物象背后,不直白浅露、一览无余。

综上,从纵向的时间角度来看,从江昱、江恂之词至江昉、江立之词,浓烈的词情在逐步后退、隐藏,词风也逐渐趋向统一的“清空醇雅”,语言迈向尚雅去俗,写法技巧更是多有相似,例如皆喜以表清、寒、

冷等义之词,孤寒之韵的意象入词。以小见大,可从江氏词人的词风嬗变中窥得浙西词派逐渐占据雍乾词坛主流的风貌,但也暴露出“浙派”词逐渐走向困境的先兆。从横向空间地域角度来看,江氏词人分处江苏扬州与浙江钱塘,地域词坛间的互通与异同亦可借江氏家族词人词作以一窥之。

### 3 江氏家族对词史的贡献

于“浙派”发展中的贡献而言,歙县江村江氏支流所寓居的扬州地区,是雍乾之际“浙派”之重要阵地,尤其是以“扬州二马”,即马曰瑄、马曰璐昆仲,以小玲珑山馆为集结地,大庇文字狷狷獭下的众多浙人。如厉鹗寓居“二马”寓所,姚世钰、陈章亦馆于其内,此际正值雍正打击江南士绅,甚至以浙江风俗浇漓为由停止浙江乡试会试。继“二马”之后,寓居扬州的江氏族人——江春、江昉两兄弟接其重任,即如杭世骏《汪可舟·岷山人诗序》言:“马员外岷谷结清响于行庵,羁客寓公,以及智杖漉囊之僧、退闲养晦之士夫,莫不联翩入社,竞长敦槃。二公殂谢,事稍凌夷。……江藩伯鹤亭构净香之园,辟梓花之宅,食客徧于原、尝,酒人方之河朔。高唱则凝云不流,喝盏则湖波沸涌,淘艺圃之总持,而骚坛之盛轨也。”<sup>[9]159-160</sup>因此,在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之时,江氏族人庇护、交游诸多浙人,如陈章、陈撰、吴锡麒等;大兴雅集唱和,见江昉《意难忘·秋日同人登平山堂,偶话欧公传花宴客事》《一萼红·秋日招诸吟侣蜀冈野眺,薄暮放舟红桥,入北关,由小秦淮就岸,各赋一阙书事》等词,他们不仅为“浙派”的发展提供阵地、财力、物力,更是以自身词作助力其中,步入“浙派”代表词人行列,凭借江氏家族在整个雍乾之际扬州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号召力,沿袭、宣扬“浙派”清空蕴藉、幽远醇雅的词风、审美主张,为其繁荣推波助澜。

于雍乾之际的广陵词坛而言,虽是寓居扬州,但以江春、江昉昆仲为代表的江氏族人为扬州文化提供了全方位的扶持,使得扬州各艺术门类间互通,以此改变了词坛面貌。如戏曲,江春聘请名流纂戏,“凡有一技一艺之长者,莫不重值延致”<sup>[21]</sup>,厉鹗便于乾隆十六年(1751)二月受江春之邀为接驾乾隆献戏,作承应戏《百灵效瑞》。蒋士铨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秋,受江春提议,在江春家中秋声馆编撰取题白居易《琵琶行》的《四弦秋》杂剧,推动扬州戏曲繁华。兼具戏曲家身份的同时,这些名流亦是词人,如蒋士铨《贺新凉·南昌判官程十七北涯浮香精舍小饮,酒阑口占杂纪》,以戏曲之景入词。此

外,雍乾之际扬州雅集兴盛,观剧、对戏曲评点、正谱也是雅集的活动之一,如阮元《江鹤亭椋里二公合传》便载江春康山草堂文人雅集观剧之盛。在如此风气下,词人多在观剧后作词评点,如张世进《满江红·题〈桃花扇传奇〉后》等。在江氏族人的推波助澜下,扬州充斥着浓郁的曲学气息,赋予了词家更多的探索可能,郑板桥论词时甚至以戏曲角色来比词人气质:

婉丽为正格,以豪宕为变格。变窃以剧场论之:东坡为大净,稼轩外脚,永叔、邦卿正旦,秦淮海、柳七则小旦也;周美成为正生,南唐后主为小生,世人爱小生定过于爱正生矣。蒋竹山、刘改之是绝妙副末,草窗贴旦,白石贴生。<sup>[22]</sup>

于绘画,江氏词人多善画,如江恂,《墨香居画识》言其“复喜写藕花,笔意华湛可爱”<sup>[23]</sup>;江昉,《清画家诗史》言其“善绘事”<sup>[24]</sup>;江炳炎,“诗字画称三绝”<sup>[25]</sup>。画家词人的加入,为雍乾之际的广陵词坛增注几分画意,丰富词坛图景,如江立,善画山水,兼善兰、竹,加之老师厉鹗曾以画论词,讲求词与画之联通,如厉鹗《张今涪红螺词序》言:“尝以词譬之画,画家以南宗胜北宗。稼轩、后村诸人,词之北宗也;清真、白石诸人,词之南宗也。”<sup>[15]753-754</sup>且雍乾之际恰是南宗画独盛之时。多重因素使得身处扬州的江立之词作也添得几分南宗画的韵味。如董其昌《画旨》曾言:

画家之妙,全在烟云变灭中。……山水中当着意烟云,不可用粉染,当以墨渍出,令如蒸气,冉冉欲坠,乃可以称生动之韵。<sup>[26]</sup>

南宗画重水分、烟云之渲染,而江立词作竟与之共鸣,如其《百字令·旧时月色轩灵壁石砚山,玉几翁字之曰“苍隼”为赋此解》,词人不仅将“流”“雨”“水”“清”“泉”等具有水之特征的字眼入词,还细节渲染水汽、烟云。“平远皴云,穿空漏雨,中有光明水。”<sup>[17]5035</sup>皴染法画云有两种方式,一以干笔蘸少许焦墨反复皴擦,成云雾形态,再以淡墨穿插擦染;二在纸半干半湿时蘸墨反复皴擦,以此渲染。而词中言“穿空漏雨,中有光明水”,足见画面中的水分含量,可见江立以第二种皴染法画云入词,似可见其在水分适度的画卷上行笔迅疾,层层晕染,云雾润而朦胧,柔和流动。“松断泉腰,泉飞松顶,应自生奇秘。摩娑还抚,苍苍烟影虚坠”<sup>[17]5035</sup>,泉水自林顶劈空而来,卷起石岩飞沙,尘烟水雾弥漫林间,仿佛秘境;结尾一“坠”字,仿佛可见江立挥毫落笔,墨渍洒溅,即如董其昌《画旨》所尚“令如蒸气,冉冉欲



坠,乃可以称生动之韵”,烟影苍苍,墨染云气,足见烟云变化之神妙。

由此可见,歙县江村江氏族人不仅推动了其他艺术门类与词的联通,促进雍乾之际广陵词坛的繁荣,还建立起广陵词坛与“浙派”之间的沟通桥梁,进一步促进“浙派”影响范围的扩大与繁荣。

于词学史,江氏词人如江昱疏证《山中白云词》,以经学笺疏之法治词,不仅推动了考证成为词集笺注之重要内容的进程,对后世词集笺注的体例、内容影响巨大,而且以学人的视野审视词,以学者学养重新阐发词意,打破“词为小道”的传统观念,提高词之地位,拓宽词之边界,深化词之境界。

#### 4 结论

从对“浙派”发展的贡献、对雍乾之际的广陵词坛的繁荣、对词学史的影响来看,歙县江村江氏词人在清代词学演进中虽非重要非凡,但亦不可或缺。于当世,其不仅以自身的词学创作、理念、行为宣扬“浙派”风尚,还庇护、聚集了一批“浙派”词人,与之交游、雅集、唱和,推动了“浙派”的繁荣,从家族内部的词风嬗变也可窥得“浙派”逐渐占据雍乾词坛主流的风貌。此外,歙县江村江氏家族亦为雍乾之际的广陵词坛注入新活力,使得词与戏曲、绘画等其他艺术门类不断碰撞,绽放出奇异的火花。更重要的是,于后世,其对词体的尊重,以学人目光与修养助力词之尊体,影响词集笺注的体例、内容,亦成为了清词中兴的重要推动者。

#### 参考文献:

- [1] 江登云. 清代徽州乡土文献萃编. [M]//李琳琦,主编. 江绍莲,续编. 康健,校注. 橙阳散志.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
- [2] 谢章铤. 赌棋山庄词话校注[M]. 刘荣平,编.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223.
- [3] 江昱. 松泉诗集:卷一[M]. 清乾隆二十六年小东轩刻本. 北京图书馆藏.
- [4] 张炎. 山中白云词笺:外一种[M]. 黄畬,校笺.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
- [5]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第28册[M]. 济南:齐鲁书社,1996:663.
- [6] 江昉. 集山中白云词句[M]//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 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60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7] 江昱. 山中白云词疏证[M]//朱孝臧,辑校. 疆村丛书. 扬州:广陵书社,2005.
- [8] 严羽. 沧浪诗话校释[M]. 郭少虞,校释.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1.
- [9] 杭世骏. 杭世骏集:第1册[M]. 蔡锦芳,点校.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
- [10] 张培仁. 静娱亭笔记:卷八[M]. 清刻本.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 [11] 冯金伯. 词苑萃编:卷八[M]//唐圭璋,编. 词话丛编:第2册. 北京:中华书局,1986:1952-1953.
- [12] 陈廷焯. 白雨斋词话全编:下[M]. 孙克强,主编. 孙克强,辑校. 北京:中华书局,2013.
- [13] 南京大学文学院《全清词》编纂研究室. 全清词雍乾卷:第6册[M]. 张宏生,主编.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 [14] 陈廷焯. 白雨斋词话全编:上[M]. 孙克强,主编. 孙克强,辑校. 北京:中华书局,2013:12.
- [15] 厉鹗. 樊榭山房集[M]. 董兆熊,注. 陈九思,标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16] 南京大学文学院《全清词》编纂研究室. 全清词雍乾卷:第15册[M]. 张宏生,主编.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8647.
- [17] 南京大学文学院《全清词》编纂研究室. 全清词雍乾卷:第9册[M]. 张宏生,主编.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 [18] 朱彝尊. 曝书亭集:第7卷[M]. 王云五,主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662.
- [19] 陈廷焯. 白雨斋词话全编:中[M]. 孙克强,主编,辑校. 北京:中华书局,2013:471.
- [20] 南京大学文学院《全清词》编纂研究室. 全清词雍乾卷:第5册[M]. 张宏生,主编.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 [21] 徐珂. 清稗类钞[M]. 北京:中华书局,1984:341.
- [22] 郑燮. 郑板桥全集[M]. 卞孝萱,编. 济南:齐鲁书社,1985:264.
- [23] 冯金伯. 冯氏画识二种[M]陈旭东,点校. 李天纲,主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465.
- [24] 李潜之. 清画家诗史[M]. 北京:中国书店,1990:182.
- [25] 李斗. 扬州画舫录[M]. 陈文和,点校. 扬州:广陵书社,2010:146.
- [26] 董其昌. 画旨[M]. 毛建波,校注. 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17.

责任编辑:寇国庆

## 想象孝子：论南北朝王祥的符号化

范子依

(宝鸡文理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宝鸡 721013)

**摘要:** 通过对比魏晋和南北朝时期的典籍发现,魏晋时王祥的孝子形象乃是精心经营下的产物,政治气息浓厚;而南北朝的王祥却是众人想象中的孝子,具有理想孝子的特征。当王祥成为众人想象中的完美孝子,他就不可避免地符号化了。这种符号化表现在王祥之孝的典故化和王祥姓名含义的衍生上。其主要原因则在于记载王祥之孝的文献文体和叙事手法的改变,王祥从历史人物转向文学人物。又因王祥其人其事寓意美好、其身份特殊,故而能够成为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孝文化符号之一。

**关键词:** 王祥;孝子;想象;符号化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24)06-0018-05

## The Imagined Dutiful Son: Symbolization of Wang Xiang in the Northern-Southern Dynasties

FAN Zi-yi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Baoj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Baoji, 721013, Shaanxi)

**Abstract:** By comparing the classics of the Wei-Jin dynasties and the Northern-Southern Dynasties,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image of Wang Xiang's dutiful son in the Wei-Jin dynasties was the product of careful management, and the political atmosphere was strong. However, Wang Xiang of the Northern-Southern Dynasties is a dutiful son in everyone's imagination,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 ideal dutiful son. When Wang Xiang became the perfect dutiful son in everyone's imagination, he was inevitably symbolized. This symbolization is manifested in the allusion of Wang Xiang's filial piety and the derivation of the meaning of Wang Xiang's name. The main reason for this is the change in the literary form and narrative technique of the documents that record Wang Xiang's filial piety, and he has shifted from a historical figure to a literary figure. And because Wang Xiang and his deeds have a beautiful meaning and his special identity, he can become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symbol of filial piety culture.

**Key words:** Wang Xiang; dutiful son; imagine; symbolization

说到王祥,必然会提及王祥之孝,北周庾信《周大将军崔说神道碑》便云“爱亲有王祥之孝”<sup>[1]783</sup>。所谓王祥之孝,当指王祥的孝行与孝顺品格。其呈现方式,一方面依靠王祥个人,另一方面又依托他人的口述和文字记载。可以说,王祥孝子形象的生成,起点在王祥和他所生活的时代,终点却在他人和后世。西晋初,王祥去世。至南北朝,他人记载中的王祥表现出符号化的特征,实际上成为众人想象中的孝子。高玉国、王永顺在《王祥行孝故事神化过程

初探》中将王祥行孝故事对标神话,指出“王祥‘行孝’的故事越来越走样,越来越脱离原来的基本事实”<sup>[2]</sup>。此外,在文献材料的使用上,学界尚多依据唐代房玄龄等人编撰的《晋书》(以下简称“房玄龄《晋书》”)。张宁、耿纪平的《论王祥其人及其孝行》虽然已经提到房玄龄《晋书》应是综合《三国志》《晋阳秋》等书的记载而成<sup>[3]</sup>,但未对先唐文献作进一步钩稽。故本文拟广稽先唐文献典籍中王祥之孝的有关记载,并对比魏晋和南北朝时期的文献<sup>①</sup>,试

论南北朝时期王祥的符号化,以期就教于方家。

## 1 魏晋时期的王祥之孝

王祥,字休徵。关于其生卒年史书记载不一,余嘉锡认为当从成书于东晋的王隐《晋书》<sup>[4]21</sup>。裴松之注引王隐《晋书》曰:“祥始出仕,年过五十矣……泰始四年,年八十九薨。”<sup>[5]541</sup>赵静《王祥生平系年考证》亦从王隐说,并推论汉光和三年(180),王祥生;魏明帝青龙四年(236)左右,后母朱夫人去世,王祥始入仕途;晋泰始四年(268),王祥薨<sup>[6]</sup>。尽管具体年份尚待考证,但已经可以大致勾勒出王祥的人生轨迹,即王祥生活于汉末至西晋初,入魏不久后正式入仕。

《周礼·地官》云:“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sup>[7]1200</sup>可知孝以事亲为主。今见魏晋典籍多载王祥孝后母朱夫人事,如孙盛《杂语》载王祥供养朱夫人三十余年,又《晋阳秋》载王祥为母求鱼事:“母患,方盛寒冰冻,母欲生鱼,祥解衣将剖冰求之,会有处冰小解,鱼出。”<sup>[4]19</sup>还有虞预《晋书》谓王祥“以后母故,陵迟不仕”<sup>[4]19</sup>，“陵迟”为衰败义,指王祥为朱夫人守孝,悲痛至极而身心俱颓。无论是在朱夫人的生前还是身后,王祥都尽到了为人子的孝心,故孙盛称他“以淳诚贞粹见重于时”<sup>[5]541</sup>。

王祥入仕后,未有丁忧去职的情况发生。故严格地说,朱夫人去世后,王祥失去了行孝的直接对象,此后都无法再行“亲父母”之事。然而,君王具有类似父母的性质。敦煌写本《孝经》云:“父子之道天性,君臣之义。”郑玄注曰:“君臣非有骨肉之亲,但义合耳。”<sup>[8]</sup>因此可以说,魏至西晋初,王祥仍在行孝,只不过从“亲父母”转向“亲君主”。

这一时期,王祥以孝名为君主所用,故而往往能从他们的口中听到对王祥孝顺品格的称赞。《魏志·三少帝纪》载甘露三年(256),高贵乡公诏曰:“关内侯王祥,履仁秉义,雅志淳固;关内侯郑小同,温恭孝友,帅礼不忒。其以祥为三老,小同为五更。”<sup>[5]142</sup>三老、五更皆官名,郑玄谓:“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之,示天下之孝悌也。”<sup>[9]3053</sup>可知王祥因“履仁秉义,雅志淳固”,而被高贵乡公树立为天下人的孝子榜样。又王隐《晋书》:“(王祥)拜太保,制曰:‘耆艾元老,高行清粹。朕所毗倚,以崇道宏化’。”<sup>[10]253</sup>太保为三公之一,三公始设于西周,是协助帝王掌管军政大权的最高官员,但魏晋以后只表示荣宠而无实职。王祥以魏之三老而位列晋之三公,所受的荣宠可想而知。晋武帝称毗倚王祥之“高行”,即毗倚王祥之孝行,给予

了王祥孝顺品德极高的褒奖。

汉末到西晋初,王祥之孝带有相当浓厚的政治色彩,这背后有着深刻的时代和社会根源。汉代开始,“以孝治天下”成为治国之策,由此发展出了举孝廉的选官制度。这使得入仕与孝挂钩,官府以孝名征召、选举人才。王祥在汉末行孝之初,动机或许并不单纯。如王大良认为:“祥、览二人出身于儒学世家,观其所为,乃是典型的儒家士大夫。他们的孝悌或出于本性,但如果说他们是在故意地矫揉造作,以沽名钓誉,也并非没有可能。”<sup>[11]44</sup>王祥其实深谙如何利用孝的规则以利己。朱夫人去世后,他婉拒州郡征召。高玉国、王永顺指出,王祥并不是不想出山做官,因为他“行孝”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官位,他需要把“孝子”的文章做足,若这时贸然出山,违礼逆制,白白地授人以把柄<sup>[2]</sup>。

而魏晋较汉,更需要“以孝治天下”,发挥孝“中于事君”的作用。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对此有生动通俗的解说:“因为天位从禅位,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sup>[12]93</sup>这样也就解释了为何王祥能够平稳度过魏晋政权的交替,他的孝行、孝名作为一种有利于统治的工具,可以为司马氏装点门面,改善司马氏由于杀戮而造成的腥风血雨的气氛<sup>[2]</sup>。

唐长孺称王祥“除掉孝行以外毫无事业可称”<sup>[13]239</sup>,恰恰说明“孝行”就是王祥的“事业”。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别人,都在有意突出他的孝子标签。贾宇在《玄儒思想影响下的两晋孝观念演变》中认为,魏正始年间,王祥是作为玄学名士的身份出现在时人视野之中的<sup>[14]</sup>。《世说新语·品藻》载“正始中,人士比论”,以“八裴方八王”<sup>[4]599</sup>,其中将王祥与玄学名士裴徽相比,“八王”中所举王衍、王澄等人都精通玄学。不过,《世说新语·德行》第十九条王戎云:“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与之言,理中清远。将无以德掩其言!”<sup>[4]26</sup>“不在能言之流”的王祥或许并非“玄学名士”,但也应具备玄学家的社会身份。而“德掩其言”四字揭露了王祥对自己完全被孝名所覆盖的放任态度。无论是玄学家抑或是其他称谓,都被他置于孝子之下。

总而言之,魏晋时期,王祥之孝名闻达天下。其孝子形象乃是精心经营下的产物,政治气息强烈。因选官制度与孝密切关联,他极可能为入仕而行孝顺之事、博孝顺之名。又因帝王统治需要,王祥被树为孝子楷模。在多年和多方的维系、赞美中,王祥成为魏晋时期著名的孝子代言人。

## 2 南北朝时期的孝子王祥

东晋元熙二年(420),刘裕即帝位,国号宋,拉开了中国历史上南北朝的帷幕。此时距离晋泰始四

年(268),已过去一百多年。综观南北朝现存文献中王祥之孝的相关记载可以发现,王祥孝行的再现不仅仅是一种复原,而是撰写者对其的二次书写(见表1)。

表1 南北朝典籍中王祥之孝的相关记载

时代	作品	作者	内容	体裁
南朝	《世说新语》	刘义庆	王祥事后母朱夫人甚谨。家有一李树,结子殊好,母恒使守之。时风雨忽至,祥抱树而泣。祥尝在别床卧,母自往暗斫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既还,知母憾之不已,因跪请死。母于是感悟,爱之如己子。	小说
南朝	《孝子传》	师觉授	王祥少有德行,失母。后母憎而潜之,祥孝弥谨。盛寒河冰,网罟不施。母欲得生鱼,祥解褐叩冰求之。忽冰少开,有双鲤出游,祥垂纶而获之。于时人谓至孝所致也。	杂传
南朝	《晋书》	臧荣绪	王祥,字休徵。后母朱氏思生鱼,于时河水冰坚,祥朝朝冒厉风,于河涯伺鱼。一朝忽冰开,小穴有双鲤跳出。	史书
南朝	《孝子传》	萧广济	祥后母忽欲黄雀炙,祥念难卒致。须臾,有数十黄雀飞入其幕。母之所须,必自奔走,无不得焉。其诚至如此。祥后母庭中有李,始结子,使祥昼视鸟雀,夜则趁鼠。一夜,风雨大至,祥抱泣至晚,母见之惻然。	杂传
北朝	《王祥叩冰鱼跃赞》	庾信	王祥之母,鲜鳞是求。冰连钓浦,冻塞寒流。精诚有感,无假沉钩。二老同膳,双鱼共浮。	赞文

在东晋孙盛和虞预的笔下,尚只有王祥供养后母朱夫人的简单记载。唯一具体详写的,只见孙盛《晋阳秋》里的王祥为母求鱼一事。南北朝典籍中对此也有详细描写,但文本不尽相同。尤其是在对王祥如何取到鱼的叙述上差异更多,如孙盛《晋阳秋》最早作“剖冰”,而师觉授《孝子传》作“解褐叩冰求之”,臧荣绪《晋书》作“于河涯伺鱼”等。

同时,《世说新语》和萧广济《孝子传》中新出现了王祥为母守树、黄雀入幕和朱夫人斫祥三事。它们与为母求鱼故事相似,皆是在后母朱夫人无理取闹的需求下发生的,可以一并归入继母虐待继子类型故事的范畴。其中,王祥为母守树、黄雀入幕还与他人孝行故事共用一套情节模式。萧广济《孝子传》载隗通孝母:“母好饮江水,(隗通)常乘舟楫置之,深浚艰辛。忽有横石特起,直趋江脊,后取水无复劳剧。”<sup>[15][2162]</sup>此与王祥后母欲食鱼和黄雀,王祥难得其物,最终却能冰解鱼跃、黄雀入幕的情节模式无二。熊明将之称为心想事成的孝感情节模式,即孝子父母欲获某物,而此时此地,按事物常理是不可能有此物的,在孝子的真诚渴求下,此物违事理而出现<sup>[16]</sup>。此外,《东观汉记》载冯豹事:“冯豹,字仲文,后母恶之,尝因豹夜卧,引刀斫之,正值其起,中被获免。”<sup>[17][558]</sup>《世说新语》所载朱夫人夜斫王祥事,与此雷同。

以上的差异和相似共同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南

北朝时期,撰写者所写的乃是他们想象中的孝子王祥。想象,心理学上指人类凭借记忆材料进行加工,从而产生新形象的心理过程。另外根据康德的说法,想象是一种认知的来源,它既是“复制性的”,又是“创造性”的。其复制性在于,通过想象,人们将过去的感官印象反映到意识之中;其创造性在于,想象力把很多不同的印象综合在一起,并借助理性概括来拓展它们<sup>[18][50]</sup>。由此可以看到,同样是在记述王祥为母求鱼,不同撰写者之间的文本差异却如此之大。甚至,撰写者笔下的“因跪请死”“数十黄雀飞入其幕”等未必真实发生在王祥身上。这种情节模式不符合自然规律,却符合孝义的“心理”,符合“至孝”的必然事理逻辑,是心理与事理的“真实”<sup>[16]</sup>。它反映出南北朝撰写者在书写王祥之孝时的普遍心态,即他们不在乎王祥本身,只是借用“王祥”的壳子去塑造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孝子。这种理想孝子往往内涵单一,基本只是为孝顺父母而存在,难免显得愚孝而不可信。

当王祥成为众人想象中的完美孝子,他就不可避免地符号化了。这种符号化首先体现在王祥之孝的典故化上,模糊了王祥原初事迹,而注重强化其背后的孝之意义。庾信所撰神道碑谓“爱亲有王祥之孝”,高度浓缩了王祥孝母之事和他的孝顺品格,从而达到赞扬墓主的目的。文赋方面,梁武帝《孝思赋》中的“至如王祥黄雀入帐”句,便是化用黄雀

入王祥之幕一事而来,以表罔极之情。其次则体现在王祥姓名含义的衍生上,赋予了“王祥”新的特殊意义。表面上“王祥”仍指王祥其人,实际上偏指孝的品格。《陈书·蔡徵传》:“徵本名览,景历以为有王祥之性,更名徵,字希祥。”<sup>[19]391</sup>蔡览因有王祥孝顺之性,便取王祥字之“徵”而更名“蔡徵”。其取“希祥”为字,不单单是希望成为王祥那般的人,更是希望成为一个完美无瑕的孝子。撰写者主导了“王祥之孝”的呈现,套用“王祥”来书写自己心目中至真至纯的孝子,这使得王祥具有了想象中孝子的特征,并促成了王祥个人的符号化。

### 3 王祥与符号化

“王祥”孝子符号在南北朝的产生,反映出时人所记忆和理解的王祥有别于魏晋历史时期的王祥。从东晋正史王隐《晋书》到南朝志人小说《世说新语》,王祥由一开始的历史人物逐渐失真成为一个文学人物,继而成为具有完美孝子含义的符号。《世说新语》不曾按照正史写作的态度去塑造人物,反而是以对历史真实的冲淡与对艺术真实的强化为原则进行总体的编撰或曰叙事行为<sup>[20]</sup>。《世说新语》所载的朱夫人斫祥一事,极有可能是从后母斫冯豹一事移花接木而来。而对比《东观汉记》和《世说新语》可以看到,后者在描述中有更多的修饰语,如“暗斫”“私起”等,还安排了王祥跪地请死这一极具冲突的情节和朱夫人之为之恻隐的圆满结局。以朱夫人的恶毒突出王祥的纯孝,又以她的感悟使整个事件进展符合人们对真善美的心理期待。可见《世说新语》不仅仅是为还原历史上的王祥,而是在进行以“孝子王祥”为主题的创作。在文学意味更浓重的《王祥叩冰鱼跃赞》中,作者庾信的创作意图更加突出,不再具有正史记载的准确性,只剩下对孝子与孝行的美化和歌颂。

收录王祥孝行的《孝子传》虽在目录书中被归入史部,但其杂传的性质也不同于正史,间杂虚妄之说。自刘向编撰《孝子传》以来,这一类书大量编纂和流行,一定程度上加快了王祥之孝的典故化。梁武帝《孝思赋》便云:“每读《孝子传》,未尝不终轴辍书悲恨,拊心呜咽。”<sup>[21]2948a</sup>说明梁武帝作此赋受到《孝子传》的影响,赋中所举王祥、隗通、邢渠等典故,也皆出自萧广济《孝子传》。另外,《孝子传》本身有一套成型的撰写模式。除前文所提到的孝感模式,熊明还指出,诸《孝子传》呈现出强烈的虚构性特征,突出表现为多是相同或相类的故事,其原因在于诸《孝子传》作者对这些故事的因袭沿用<sup>[16]</sup>。在

因袭沿用其他孝子孝行、叙事模式的情况下,王祥无法独立于其他孝子而存在,他们共同形成一个孝子集合体。

众多孝子行迹之间的共性,是王祥成为孝子符号的前提条件;而王祥身上所具有的鲜明个性,又决定了他能代表该孝子集合体,成为最独特的符号。首先,王祥本人及其孝行故事寓意美好。王祥之名“祥”和字“休徵”,均有吉利、美善义。他为母求鱼孝行故事中的鲤鱼,与“礼”“利”“余”谐音,代表吉祥与富足<sup>[22]73</sup>。“双鲤”的形容,还具有福寿双全之意。此外,黄雀入王祥幕的孝行故事中,黄雀也是瑞鸟。东晋袁山松《后汉书》载:“陈奩学《尚书》,躬自耕种,常有黄雀飞来,随奩翱翔。”<sup>[23]1595</sup>梁元帝《金楼子·著书篇》即有言:“陈奩黄雀之祥,禽兼赤石之瑞。”<sup>[24]1033</sup>足见王祥其人其事都具有为人喜爱的特质。

其次,王祥身份很特殊。曹魏和西晋初,王祥身居高位,是朝廷推出的孝子榜样,具有同一时期其他孝子不具备的官方优势。君王评价他为“履仁秉义,雅志淳固”“高行清粹”,为他奠定了十分正面的形象基础。琅琊王氏有着良好的孝悌家风,焦循谓:“《景定建康志》言:金陵有太保王祥墓,当是导南渡时奉之以来。”<sup>[25]491</sup>金陵本无王祥墓,而琅琊王氏的后人王导南渡时奉之,其对长辈王祥的敬重可见一斑。琅琊王氏作为东晋盛极一时的世家大族,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谣,王导又是东晋时琅琊王氏的第一流人物,他们对王祥的尊奉,自然会影响到他人对王祥的态度。从魏晋时期王祥的形象中不难看出,当时的王祥形象主要是由世家大族等上层阶级书写的。而随着东晋的消亡,这一时期极为特殊的门阀政治一并结束。琅琊王氏于南朝衰落,王祥之孝随之褪去政治色彩,渐渐进入民间。得益于魏晋时期留下的好形象,南北朝时期,撰写者对王祥是宽容的,很少提及他事二君之行,颇多溢美之词。

从南北朝时将王祥符号化的趋势可以直观地看到,当时人们偏好以“孝”来理解王祥、以“完美孝子”来诠释王祥。这种倾向首先是与汉末以来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息息相关。高华平认为,人格美是汉魏之际一个时代的哲学主题,魏晋玄学也就是以重建理想的人格、美的人格为目标应运而生的<sup>[26]9</sup>。南北朝时对王祥不忠品行的忽视和孝心孝行的放大,正是对人格美的时代主题的响应。这一时期的撰写者通过文学活动,选择性地阐释王祥身上具有理想和美的部分,同时反过来增强了对“王祥”这一符号中孝之寓意的认同。二是与魏晋以来儒家学派

的发展密切相关。楼劲指出魏晋以来儒学发展最为基本和影响深远的趋势是“儒学常识化”,即指其从特定学说不断社会化为公共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普及成为常识的进程<sup>[27]</sup>。“孝”作为儒学的核心观念之一,王祥又作为“孝”的典范和象征,进而使得符号化的“王祥”在“儒学常识化”中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最后定型为无法与孝分割的符号。

从正史到杂传、小说,王祥在南北朝完成了从历史人物向文学人物的转变,能够在魏晋南北朝的诸多孝子中脱颖而出,成为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孝文化符号,这也与人格美的时代主题、儒学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4 结论

王祥生活于汉末至西晋初,但王祥之孝在南北朝,甚至在今天仍然焕发着勃勃生机。正如谢幼伟在《孝与中国文化》中说道:“中国社会是彻始彻终为孝这一概念所支配的社会。”<sup>[28]509</sup>孝文化深深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诚然,王祥之孝具有虚构的性质,王祥是众人想象中的孝子,但南恺时也指出,对于中国传统孝子故事,应该看故事的真意,不是看故事的字义,要用比喻的办法来读<sup>[29]</sup>。归根到底,王祥成为孝子形象,并被符号化,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对亲子关系的天然情感的诉求。

#### 注释:

- ① 晋代干宝的《搜神记》载有王祥行孝之事,然而今本干宝《搜神记》为明人辑本,内容上与房玄龄《晋书·王祥传》相似,疑似从之辑补而来。唐代类书所引王祥孝行故事亦不见出自干宝《搜神记》,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辨证》中曾怀疑南宋时干宝《搜神记》已佚。故本文不对干宝《搜神记》作讨论。另外,萧广济生卒年不详,《隋书·经籍志》作“晋辅国将军萧广济”,但《太平御览》有引萧广济《孝子传》所载何子平事,已是刘宋末时;又有《职官分纪》引该书所载何炯迁治书御史事,对照《梁书》,此事发生于萧梁初,故而本文将萧广济《孝子传》归入南朝文献。

#### 参考文献:

- [1] 庾信. 庾子山集注[M]. 倪璠,注. 许逸民,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0:783.
- [2] 高玉国,王永顺. 王祥行孝故事神化过程初探[J]. 德州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71-75.
- [3] 张宁,耿纪平. 论王祥其人及其孝行[J]. 哈尔滨学院学报,2014,35(12):39-42.
- [4] 刘义庆. 世说新语笺疏[M]. 刘孝标,注. 余嘉锡,笺疏.

北京:中华书局,2007.

- [5] 陈寿. 三国志[M]. 裴松之,注. 陈乃干,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2.
- [6] 赵静. 王祥生平系年考证[J]. 临沂大学学报,2011,33(1):55-58.
- [7] 孙诒让. 周礼正义[M]. 北京:中华书局,2015:1200.
- [8] 乔秀岩. 郑注孝经学解[J]. 文史,2023(3):5-16.
- [9] 礼记正义[M]//清嘉靖刊本. 十三经注疏. 北京:中华书局,2009:3053.
- [10] 徐坚. 初学记[M]. 北京:中华书局,2004:253.
- [11] 王大良. 中国古代家族与国家形态:以汉唐时期琅邪王氏为主的研究[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44.
- [12] 鲁迅. 而已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93.
- [13] 唐长孺.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M]. 北京:中华书局,1983:239.
- [14] 贾宇. 玄儒思想影响下的两晋孝观念演变[D]. 北京:清华大学,2007.
- [15] 熊明辑校. 汉魏六朝杂传集[M]. 北京:中华书局,2017:2162.
- [16] 熊明. 魏晋南北朝诸《孝子传》考论[J]. 古籍研究,2013(2):209-218.
- [17] 刘珍. 东观汉记校注[M]. 吴树平,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2008:558.
- [18] 托马斯·瓦斯克. 101个重要的哲学问题[M]. 包向飞,姚璇,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22:50.
- [19] 姚思廉. 陈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2:391.
- [20] 刘强. 对历史真实的冲淡与对艺术真实的强化——论《世说新语》的叙事原则[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2):23-33.
- [21] 严可均. 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M]. 北京:中华书局,1958:2948a.
- [22] 彭佳作,陆正兰,胡易容,主编. 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民族符号学研究[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21:73.
- [23] 欧阳询. 艺文类聚[M]. 汪绍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65:1595.
- [24] 萧绎. 金楼子校笺[M]. 许逸民,校笺. 北京:中华书局,2011:1033.
- [25] 焦竑. 焦氏笔乘[M]. 李剑雄,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08:491.
- [26] 高华平. 魏晋玄学人格美研究[M]. 成都:巴蜀书社,2000:9.
- [27] 楼劲. 魏晋南北朝儒学的发展[J]. 历史研究,2022(3):71-93,221.
- [28] 谢幼伟. 孝与中国社会[M]//理性与生命——古代新儒学文革. 上海:上海书店,1994:509.
- [29] 南恺时. 中国传统孝子故事的价值分析[J]. 铜仁学院学报,2015,17(6):4-8. 责任编辑:朱家席

# 系统观念下的寿州窑陶瓷手工艺传承人保护研究

周光云

(蚌埠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摘要:**传承人保护是非遗保护的核心和关键,也是一个涉及多主体协作、多领域合作的系统工程。以系统观念为指引,阐释了非遗传承人保护的概念及内涵,进而分析了寿州窑陶瓷手工艺传承人保护在理念、要素和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从服务传承人、依托学校教育、促进文旅融合、运用数字技术等方面施策,试图构建寿州窑陶瓷手工艺传承人保护系统,从整体意义上维护传承人的生命力以及寿州窑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寿州窑;陶瓷手工艺;传承人保护;系统观念

中图分类号:J5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24)06-0023-05

## Protection of Inheritors of Shouzhou Kiln Ceramic Handicraft under the System Concept

ZHOU Guang-yun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Bengbu University, Bengbu, 233030, Anhui)

**Abstract:** Inheritor protection is the core and key to the protection of non-heritage, and it is also a systematic project involving the collabor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and cooperation in multiple fields. Guided by the concept of system,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the protection of non-heritage inheritors were explained, an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ncept, elements and mechanism of the protection of Shouzhou kiln ceramic handicrafts inheritors were all analyzed in this paper. It is proposed that measures are taken from the aspects of serving the inheritors, relying on the education of the school,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and applying the digital technology, etc., in order to try to build a protection system of the Shouzhou kiln ceramic handicrafts inheritors, and to maintain the vitality of the inheritors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e of the Shouzhou kiln from an overall point of view.

**Key words:** Shouzhou kiln; ceramic handicrafts; inheritor protection; system concept

中国政府与社会践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二十余年,系统性保护成为我国非遗科学保护工作的引领性课题和主流观念<sup>[1]</sup>,这一理念频繁出现在我国政府非遗保护的各类政策、规划文件中,被确立为新时代非遗保护践行和遵循的新规范<sup>[2-3]</sup>。学界已经意识到对非遗实施系统性保护的重要性<sup>[4]</sup>,开始了理论的、实践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多维度探索,但相关的成果还不是很多见。在此背景下,思考如何将系统观念运用于寿州窑陶瓷手工艺传承人保护这一个案,有益于助推这类非遗保护走上科

学化和可持续发展道路。

### 1 系统观念下的非遗传承人保护审视

非遗传承人的生存和发展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交织在历史、现实、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之中,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动态性和复杂性。只有将其置于系统观念下去洞察和审视,才能更为全面、深刻理解和把握非遗传承人的传承规律以及运行机制,为其保护提供科学、理性的认知和方法论。

#### 1.1 系统观念概述

收稿日期:2024-04-21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Y2020D105)。

作者简介:周光云(1976-),男,湖南衡阳人,副教授,硕士。E-mail:zhgy76@163.com

系统是指由许多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构成并与周围环境发生关系的具有稳定结构和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sup>[5]</sup>。所谓系统观念,是指以“系统论”的视角去认识和理解事物并寻求最佳解决方案的一种思维模式<sup>[6]</sup>。中国自古就有系统的思想因子和价值元素<sup>[7]</sup>,把宇宙万物和世界看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在西方,20世纪40年代美籍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贝塔朗菲提出了一般系统论,把研究和处理的对象看做一个整体<sup>[8]</sup>。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重视和运用系统科学,并明确指出“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sup>[9]</sup>。也就是说,系统观念作为科学的思想和方法,在认识论和实践论方面都具有基础性意义<sup>[7]</sup>。这就要求我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要把系统观念贯穿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全过程各层面,不断强化“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sup>[10]</sup>,最终促成现实世界复杂问题的有效解决。

## 1.2 系统观念下非遗传承人保护的内涵

目前主流的非遗保护观念,即系统性保护,就是系统性思维与复杂性科学在非遗保护领域的创新应用<sup>[1]</sup>。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深入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切实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水平,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精神力量”<sup>[11]</sup>。系统性保护已正式成为现阶段国家非遗保护的基本原则和发展方向<sup>[3]</sup>。非遗传承人的系统性保护就是把传承人保护视为一个复杂整体,结合传承人所处环境、各构成要素以及结构、功能进行动态审视和整体关照。其中涉及传承人、政府、学校、企业、博物馆、媒体等多主体参与、多领域合作,需要通过不断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强化要素耦合协同,建立并维持系统秩序(动态的生态平衡)。因此,在保护实践中要坚持整体、系统、动态的认知,把非遗传承人保护当作一个自足完整生命整体,不能只关注传承人本体,而是要对传承人及其得以生存发展的自然、社会生态环境和文化空间进行整体性保护。

## 2 寿州窑陶瓷手工艺传承人保护困境

寿州窑陶瓷手工艺传承人保护工作已经开展了14年,取得了积极进展和成效。但是面对非遗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寿州窑陶瓷手工艺传承人保护工作依然面临诸多挑战。

### 2.1 保护理念有待进一步更新,存在单一化、碎片化、片面化等认知问题

十余年的寿州窑非遗保护实践,是中国非遗保护工作的缩影,经历了一个由不成熟到成熟的探索过程,期间不同程度地受益于“抢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等理念。然而面对新时代提出的系统性保护理念,目前还没引起寿州窑保护主体足够的关注和重视。从管理者角度来看,地方政府虽然高度重视寿州窑陶瓷手工艺传承人保护工作,但在保护理念、体制机制建设、顶层规划设计及实施方面仍有巨大进步空间。从学术研究角度来看,学者多从生产性保护角度探讨寿州窑非遗的保护,传承人只是作为当中的一小部分内容或附属,少有涉及传承人保护中遇到的现实挑战。从传承人本体来看,还需要进一步提升非遗传承人自身的文化自觉,处理好与政府、市场、责任与义务、传承与创新等方面的关系,更好地激发保护的内生动力。

### 2.2 保护要素有待进一步完善,存在遗漏、忽视,不能全面被审视等问题

从管理者角度来看,他们在思想上也一直非常重视寿州窑非遗及其传承人保护工作,在传承人的认定、管理、监督、保障等方面发挥着职能部门的主导作用。但非遗传承人保护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加之资源有限等主客观原因,导致当地政府对传承人以及与传承人密切相关的外在环境要素关注不够、不全,比如市场培育、产业发展、遗址保护利用等。然而,这些要素都与传承人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关系,是传承人保护系统功能整体发挥、维持其内在秩序并保持动态生态平衡的重要力量。物质和精神任一要素的缺失或不足,都会影响非遗传承人保护环境的构建及运行。

### 2.3 保护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存在分散、独立,难以形成体系合力等问题

从参与主体来看,非遗传承人保护是传承人、政府、高校、博物馆、媒体、社区、民众等不同参与主体力量之间相互作用、共同博弈的社会实践。目前寿州窑陶瓷手工艺传承人保护的参与各方,在实践中需要建立并强化共同体意识,提升社会凝聚力,畅通这种社会实践正向价值作用发挥的条件和环境。从协同性来看,在不同参与主体的各自努力下,寿州窑陶瓷手工艺传承人的保护实践取得了积极进展,非遗传承人的生存境遇得到了改善,“造血”功能得到了增强。但是由于各个参与主体,大都按照自己的认知、诉求及情况进行相应的计划和行动,这样既会有自发的协作与配合,也容易形成主体间的竞争和冲突,造成寿州窑陶瓷手工艺传承人保护资源的内耗,而且在消耗大量资源和精力的同时,收效甚微,



由此还会带来诸多的问题与困难。

### 3 系统观念下寿州窑陶瓷手工艺传承人保护的路径选择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任何一种发展实践,背后都有某种或显性或隐形理念的指导。发展观念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实践发展的效果和成败<sup>[6]</sup>。系统观念指导下的寿州窑陶瓷手工艺传承人保护本身就是一个多主体、多领域合作的系统性保护实践,它是从非遗保护理念、主体到行动的一体化实践;应当通过多主体、全要素参与的协作机制,进而形成强大的非遗保护合力,使非遗传承人保护生态得到整体意义上的维护,助力寿州窑陶瓷手工艺传承人保护取得实效。

#### 3.1 以服务传承人为本,构建全生命周期保护管理体系,为传承人发展提供系统保障

传承人是非遗文化的创造者和持有者,也是非遗活态传承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为此,国家和各级政府陆续出台了各种保护文件和政策措施,对非遗的保护传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寿州窑陶瓷手工艺传承人的保护理念及措施,既要贯彻国家和各级政府文件精神,也要匹配自身资源禀赋,才能产生保护的实效,持续推进非遗的活态传承。全生命周期是指一个从业者从成长为传承人到退出传承人序列这一时间段,这一个过程中的每个阶段都应建有相应的保护制度及措施,包括传承人的培育、认定、培养、评估、保障、激励、退出等方面的制度,渗透着传承人的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需求,也涉及政府、学界、商界、新闻媒体、行业协会、相关机构等社会力量。一是要进一步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寿州窑保护的工作格局。政府应整合统筹寿州窑文化遗产资源,强化顶层设计和相关资源配置,做好寿州窑保护中长期规划以及执行、监督、保障等工作,为寿州窑及传承人保护发展创造良好的保障体系、社会环境和便利条件。二是要进一步发挥学者的参谋作用,凝聚学界非遗的研究力量,形成以寿州窑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主题的多方参与的研究共同体,为政府决策、传承人发展及保护提供学理支持。《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将“完善理论研究体系”作为健全非遗保护传承体系当中的重要内容<sup>[11]</sup>。三是要进一步发挥传承人的主体作用,通过制度的优化和正向的引导,不断增强传承人对寿州窑文化的自知、自审、自觉以及文化认同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将保护、弘扬非遗文化内化为传承

人群的自决选择和行为动力。除了政府、学者、传承人之外,相关的传承保护主体也要树立正确的非遗保护观念,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寿州窑陶瓷手工艺传承人发展提供便利和帮助,营造创新发展的良好氛围。只有各保护主体做好角色转型,成为传承人发展幕后的支持者和服務者,充当构建非遗保护的坚强后盾,才能真正落地传承人全生命周期保护管理体系,从而激发传承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 3.2 以学校教育为依托,推进寿州窑非遗文化认同培根,为传承人辈出提供丰厚土壤

根据学者调研可知,2019年寿州窑非遗的固定从业人员不到50人,其中传承人5人,平均年龄在60周岁以上<sup>[12]</sup>,五年过去了,现状并没有得到明显改观,这与寿州窑本身的受众面窄、影响力小、关注度低的状态密切相关。只有让更多的年轻人主动参与到寿州窑传承保护之中,发自内心地喜欢、认同这项传统技艺,才能增强非遗保护的文化自觉和使命感。而将非遗传承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学校美育工程是目前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校园传承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当下吸引年轻人投入非遗传承、解决非遗传承人老年化问题的有效路径。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具体实施非遗进校园时,要针对不同学生群体的身心特点,采用不同的方法手段。

对于学龄前儿童来说,陶瓷艺术教育活动具有趣味性、感知性、综合性和阶段性等特点,是培养其动手能力、空间感知能力和观察能力的极佳载体<sup>[13]</sup>。根据他们的美术认知水平和动手能力水平,可以运用寿州窑泥料和实物图片,设计以拓印游戏和观察活动为主的课程和实践,让他们在玩泥巴的过程中,通过触觉、视觉去感知寿州窑泥料的特点以及器物的外在特征,形成寿州窑初步的印象和概念。

对于中小学生来说,我们要遵循由易到难、由技入道的思路,一方面要继续让学生体验到陶瓷制作的快乐感、趣味性,另一方面要让学生结合自己的创意进行造型、装饰,让学生感受到发现美、创造美的愉悦,逐步进入到对寿州窑文化的欣赏和理解,增强学生的自豪感和文化自信。

对于高校而言,人才培养和文化遗产是题中应有之义。多年来,当地高校借助自身独具的地理及教科研优势,通过多种形式和方法积极传承保护寿州窑非遗文化。针对大学生的认知和能力水平、专业、以及大学学习的特点,高校可以把寿州窑文化融入课程教学、科学研究、校园文化等之中,贯穿于人才培养全过程。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寿州窑陶瓷技艺及文化的学习和体验,并不是为了将来从事寿

州窑的具体工作,只是在青年人的内心播下一颗传承的“种子”,生发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自豪感,形成根植于灵魂深处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对于艺术设计类专业学生来说,学校可以把寿州窑的内容嵌入相关专业课程或专题设计之中,学生能在掌握寿州窑基础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上,深入遗址、博物馆、企业、传承人、消费者、市场,综合思考寿州窑在当代实现文化传承与产品创新设计的路径。这样,大学生不但可以了解到寿州窑的历史文化、工艺特征以及寿州窑面临的现实挑战,还能激发大学生传承保护寿州窑文化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为其传承保护培养众多潜在的后备力量。

### 3.3 以文旅融合为引擎,促进寿州窑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为传承人增收提供更多机会

文旅融合的提出,不仅为寿州窑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而且为其创新发展提供了更多机遇。寿州窑作为历史名窑,在漫长的发展实践中熔铸了当地自然、社会、历史和人文,也凝聚了当地劳动人民的集体智慧和创造,已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陶瓷文化中的组成部分,具有历史、艺术、人文和教育等多重价值。通过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促进寿州窑非遗文化传承与旅游开发良性互动,打造淮南地方特色陶瓷文创品牌,从而为非遗传承创造更多的实践和应用场景,让传承人获得更多经济收益。近年来,淮南市政府高度重视寿州窑文化资源的发掘保护和开发利用,也取得了一定进展及成果。要想充分发挥寿州窑文化资源的多重价值,促进文旅融合深度发展是现实要求,也是必然选择。

一是要树立系统性保护观念,统筹整体推进寿州窑非遗文化全面融入当地旅游空间,实现寿州窑文旅相关资源的整合,最大程度发挥寿州窑文化资源强有力的作用。为此,要充分挖掘和利用淮南当地丰富而独特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民俗文化资源等,以多元化的文化旅游新形式延长陶瓷文化产业链条<sup>[14]</sup>,进而培育“陶瓷+旅游+研学”新业态。二是落实寿州窑博物馆建设,并借助数字化技术创新文化资源的利用。《淮南市“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sup>[15]</sup>和《淮南市“十四五”文化旅游及数字创意产业发展规划》<sup>[16]</sup>都明确提出要建设“寿州窑博物馆”,提升完善文化艺术基础设施布局。建成后的博物馆与古瓷遗址、上窑国家森林公园等自然、人文景观可以构建成区域性的文化景区,这种旅游发展模式不但可以创新性地传承和保护陶瓷文化资源,而且可以进一步丰富文化旅游产品的形式和内涵。此外,也可以通过博物馆数字化资源库建设,开

发动态化的陶瓷文化资源,提升文化资源的吸引力,为观众及游客提供沉浸式体验,在不断拓展旅游空间的过程中强化博物馆的文化吸引力。三是紧紧围绕寿州窑主题打造特色陶瓷文创品牌,充分发挥陶瓷文化支撑特色旅游的作用。文旅融合背景下,借助文化资源的深入挖掘和多元展现打造文创品牌已成为开展特色旅游、提升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的重要途径<sup>[14]</sup>。在深入理解寿州窑本身多重价值的基础上,结合淮南豆腐文化、淮南子文化、二十四节气、成语等地域文化,为游客提供极具地方韵味的文创产品。同时,还可以此开发多元特色旅游线路、打造文旅融合产业带,实践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 3.4 以数字技术为支撑,推动寿州窑传播传承破壁出圈,为传承人提供良好人文环境

在非遗语境中,寿州窑非遗传承人生产陶瓷产品服务百姓生活、获得个人收益的行为,不仅仅是面向市场的一种纯商业活动,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同时也是一种被赋予了基本公共服务属性的非遗传承与保护的公益活动,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sup>[17]</sup>。寿州窑的保护传承显然离不开其原生态的土壤,但是在当下“脱域”与“流动”的后工业化现代语境下,依附于传统意义上的即时、在场的寿州窑非遗存在方式和形态都发生了巨大改变<sup>[18]</sup>。倘若想实现寿州窑的活态传承与可持续发展,就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突破现有时空和场域的限制,助推寿州窑非遗传播与传承破壁出圈。一是要借助数字技术及其优势,强化寿州窑文化资源数据库的建设和整合,增强非遗产品的虚拟体验和应用场景,为其数字化保护、开发、利用提供基础数据。这是一项基础而重要的工作,数字化内容包括传承人口述史、遗址遗迹、文献资料以及技艺和文化空间等,需要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博物馆、传承人以及相关科技公司的通力协作才能顺利完成。二是要善于运用抖音、快手、小红书等短视频和直播平台,发挥它们在非遗传播中的覆盖面广、在场感、直接导致渗入式消费等优势<sup>[19]</sup>,为传播非遗和扩大受众打开新的大门。据《2023 非遗数据报告》<sup>[20]</sup>显示,“截至 2023 年 5 月,抖音上平均每天有 1.9 万场非遗直播,平均每分钟就有 13 场非遗内容开播”,“年轻人正在成为抖音非遗传承主力”,“短视频与直播正在成为古老非遗与现代生活的连接。”寿州窑陶瓷手工艺传承人要进一步提升自身数字意识和能力,依托自身条件和资源禀赋,选择 UGC、PGC 或是两者结合的方式,最大程度地赋能寿州窑活态传承与保护。三是整合完善相关 APP 以及微信公众号的运营与管理,打造好寿州窑传播

线上线下日常化服务平台。基于数字技术和媒介融合的 APP 以及微信公众号,已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整合寿州窑各方力量,推进寿州窑数字化进程,丰富、创新数字化内容,建立规范化、制度化的公众沟通交流机制和平台,这对塑造寿州窑良好非遗品牌具有重要意义。在重视新媒体传播的能效时,也不能忽视传统媒体的价值,要优势互补、形成合力助推寿州窑跨界传播。需要注意的是,在上述进程中,寿州窑文化的跨界传播无论借助何种数字技术,我们都应该非常明确技术是手段,而绝非目的,传播是为传承服务的。因此,技术赋能下的传播,依然要尊重寿州窑非遗的传承规律,注意把握好技术使用的方式和尺度,要揭示文化而非消解文化,防止泛娱乐化现象损伤非遗本体。

#### 4 结论

非遗系统性保护理念的提出,是中国二十多年来非遗保护实践探索和理论总结的重要成果,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它要求我们在面对复杂的非遗保护事项时,要有系统观念和系统思维,强化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实现从非遗本体到非遗生存和发展有关的保护体系的转变。事实上,非遗系统性保护也是一个不同要素嵌入的共在与协调问题<sup>[3]</sup>。各要素资源配置合理与否,成为非遗保护成败的关键。越是合理的配置,越是能促进系统作用的发挥。就寿州窑陶瓷手工艺传承人保护而言,我们就不能只关注和重视传承人本体,而要将其置于寿州窑文化及其生态系统中去探讨与之相关的人、环境、文化等要素,找寻到最佳的要素资源配置方案,最终形成系统合力,助推非遗传承人保护。只有实施系统性保护,寿州窑非遗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寿州窑陶瓷手工艺传承人才能具有持续的生命力和活力。在各保护主体的共同努力下,通过系统性的制度建设,寿州窑陶瓷手工艺传承人保护事业将会更上一层楼。

#### 参考文献:

[1] 闵晓蕾,季铁. 面向系统性保护:非遗手工艺文化生态的要素探析[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 2023(6):70-76.

[2] 林继富,闫静. 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内涵建设与实践模式研究[J]. 文化遗产,2023(1):1-9.

[3] 宋俊华. 可持续发展理念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

护[J]. 文化遗产,2023(3):1-8.

[4] 全小国,苑利. 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研究[J]. 东南文化,2023(4):6-13.

[5]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52-53.

[6] 马丽,张小军. 习近平关于“系统观念”重要论述的理论阐释[J]. 系统科学学报,2024(1):54-58,77.

[7] 吴永刚,李小艳. 习近平关于系统观念的重要论述及其时代价值[J]. 系统科学学报,2023(12):1-6.

[8] 魏宏森,曾国屏. 系统论:系统科学哲学[M].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84-85.

[9]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EB/OL]. (2020-11-13)[2024-3-10]. [https://www.gov.cn/zhengce/2020-11/03/content\\_5556991.htm](https://www.gov.cn/zhengce/2020-11/03/content_5556991.htm).

[10] 习近平.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J].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22,47(5):4-14.

[11]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EB/OL]. (2021-08-13)[2024-02-13]. [https://www.ihchina.cn/zhengce\\_details/23400](https://www.ihchina.cn/zhengce_details/23400).

[12] 张亚军,余雪莲,张永茜. 活态传承视野下寿州窑的发展与思考[J]. 辽宁科技学院学报,2019,21(2):49-52,72.

[13] 陈林林. 3-6岁幼儿陶艺学习活动研究[D].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7.

[14] 张静静. 文旅融合视域下景德镇陶瓷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N]. 中国文化报,2023-02-02(7).

[15] 淮南市“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EB/OL]. (2020-11-13)[2024-03-02]. <http://www.tja.gov.cn/grassroots/content/1259593017>.

[16] 关于印发《淮南市“十四五”文化旅游及数字创意产业发展规划》的通知[EB/OL]. (2020-11-13)[2024-03-10]. <https://wlj.huainan.gov.cn/public/118319856/1259836507.html>.

[17] 丁元竹. “十四五”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相关政策措施研究[J]. 管理世界,2020,36(11):22-35.

[18] 于涓. “脱域”的“再嵌入”:短视频平台赋权非遗传播——以抖音为例[J]. 电视研究,2022(5):74-76.

[19] 吉琳玄,马知遥,刘益曦. 新媒体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与传承[J]. 民族艺术研究,2020,33(4):137-143.

[20] 2023 非遗数据报告[EB/OL]. (2023-06-10)[2024-04-11]. <https://www.douyin.com/hashtag/1781087957372931>.

# 安徽大别山民歌活态传承现状、意义与路径

## ——基于场域理论的研究

李姗姗

(淮南师范学院 音乐学院, 安徽 淮南 232007)

**摘要:**安徽大别山民歌植根于皖西独特的文化土壤中,它的传承具有民俗文化学、民族音乐学意义,也有利于激发大别山民歌的内在活力。在时代变迁中,安徽大别山民歌的传承场域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实现其活态传承,需要依托多元场域发挥多元主体的作用。基于场域理论,提出安徽大别山民歌活态传承的几大路径:固本守源,激发自然场域中的传承活力;教化弘声,发挥学校场域的系统传承力量;网联四方,释放网络社群的传承潜力。

**关键词:**安徽大别山民歌;活态传承;自然场域;学校场域;网络社群场域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24)06-0028-05

## Current Status, Significance and Path of the Living Heritage of the Dabieshan Mountain Folk Songs in Anhui Province Based on Field Theory

LI Shan-shan

(School of Music, Hu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uainan, 232007, Anhui)

**Abstract:** The folk songs of Dabieshan Mountain in Anhui province are rooted in the unique cultural soil of West Anhui Province. Its inheritance has the significance of folk culture and ethnomusicology, and is also conducive to stimulating the inner vitality of Dabieshan Mountain folk songs. In the change of times, the inheritance field of Dabieshan Mountain folk songs in Anhui has also undergone great changes. To realize its living inheritance, it is necessary to rely on multiple fields to play the role of multiple subjects. Based on the field theory, it put forward several ways in this paper to inherit the living state of the Dabieshan Mountain folk songs in Anhui: Consolidating the source and stimulate the inheritance vitality in the natural field; Giving play to the system inheritance power of the school field; Connecting many parties to release the inheritance potential of online communities.

**Key words:** Anhui Dabieshan Mountain folk songs; living inheritance; natural field; school field; network community field

民歌的概念在《音乐百科词典》中被解释为:“由人民群众通过听觉记忆和口头流传而集体创作的歌曲。作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民族都有自己的民间歌曲并各以多样化的体裁、歌唱形式和内容,反映本民族特有的历史、民俗、性格、情趣和文化传统。”这里的民歌概念既阐明了民歌的创

作主体、创作形式、内容及特征,也反映了民歌的民族性、传统性。民歌的产生与时代的发展、人类的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是这三者共同造就的。民歌有其特殊的生成条件,一般认为,原始的生产物劳动和社会生活是其生成的最初土壤。正因如此,随着世界范围内工业革命的兴起,人类的

收稿日期:2024-06-09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重点项目(2023AH051505)。

作者简介:李姗姗(1980-),女,山东泰安人,讲师,硕士。E-mail:mastaoran\_1984@163.com

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变迁,工业化和城市化代替了传统社会形态,民歌的生存条件也在这种变迁中被颠覆,许多民歌逐渐消亡。如今,音乐创作已进入个性化、网络化时代,像民歌这种靠人民群众集体创作,通过听觉记忆、口头流传进行传播,反映本民族生产生活特色的歌曲,已经较为少见。安徽大别山民歌是皖西地区广为流传的汉族民歌,主要有山歌、茶歌、秧歌、排歌、小调、号子等类别,在音乐和演唱技法上均有独到之处,但在时代变迁中,大别山民歌的生存处境岌岌可危。加大对诸如安徽大别山民歌之类的艺术形式的传承保护,寻找活态传承的路径已经迫在眉睫。场域理论从事物存在与发生的社会空间入手,对这一空间内行动者的实践逻辑进行分析,以解释社会问题,对于探寻安徽大别山民歌的活态传承路径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 1 安徽大别山民歌传承的现状与意义

民歌作为一种传统文化遗产,保护方式多样,常见的有口口相传、数字档案、影像记录等,但仅靠保护是不够的,只有通过传承,才能使民歌得以延续和发展。而用活态传承的方式可以促进民歌在新时期的发展,使其更好地走向未来。

### 1.1 安徽大别山民歌活态传承现状

活态传承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传承方式?段宝林在他的著作中提到:“民间文化的保护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静态的,一种是动态的。静态的保护,主要是对民间文化成果加以记录、收集与保存。第二种保护方法是动态地保护,使之适应当代生活的需要,成为新民俗的一个组成部分。”<sup>[2]</sup>由此可见,活态传承是一种相对于静态保护而言的传承方式。静态保护主要是对民间文化成果进行记录、收集与保存,而活态传承则侧重于使民间文化与当代生活、民俗结合,以激发其新的、更持久的生命力。民歌属于民族音乐,它是人民群众以自身的生产生活为主题创作的音乐形式。当前,对民歌的静态保护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以安徽大别山民歌为例,已经出版了大量与之相关的选集、学术论文,比如由安徽六安市牵头历时两年编撰出版的《大别山民歌精选》,共收录了458首大别山民歌。与此同时,还修复了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大别山民歌音乐磁带,利用数字技术将其刻录成光盘,建立起可以永久保存的数字档案。然而,记录、保存大别山民歌,并不是保护的最终目的,如果只是让它躺在记录中,它的历史与现实价值、民俗文化价值等都无法得到真正地体现,只有通过不同传承主体、文化主体之间的传承活动,才能使

其在新的时空土壤中实现生存和发展,成为经久不息的活态文化。

### 1.2 安徽大别山民歌活态传承的意义

民俗文化学意义。大别山民歌常常以农民的劳动、生活和爱情为主题,表达了农民对土地的深厚情感和对生活的热爱。每一类型的民歌都蕴含丰富多彩的内容。例如其中的情歌,几乎涵盖了爱情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最初的爱慕、相识,到小心翼翼地试探,从初恋的甜蜜、相思的忧愁,到热恋的炽烈、离别的痛苦,甚至失恋、逃婚,几乎所有的爱情情节都在大别山民歌中有踪迹。这些情歌反映了大别山人民质朴的恋爱观,以及他们在一定时期内的伦理观念;既有浓郁的感性色彩,又闪耀着理性的光芒,是大别山人民人性美和人情美的艺术体现。还有一些民歌涉及婚嫁、丧葬礼仪、节日习俗等,具有重要的民俗文化学价值,是研究安徽大别山地区一定时期民俗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有利于凝聚当地人们的共识,加强社会团结。

民族音乐学意义。当前,我国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很多音乐学院都开设了民族声乐专业。但是,我国民族音乐学还有很大的发展和成长空间,既应当在时代的洪流中寻求创新,也应当回望历史,在经典艺术中探寻养分。“民歌是民族音乐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也是民族传统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sup>[3]</sup>民歌艺术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民歌往往凝聚了经典的传统文化,其曲调、经典唱段都具有典型性。对当代民族音乐而言,民歌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借鉴意义,它是当代民族音乐的根。加强民歌的活态传承,可以为民族音乐提供更多的养分,对于促进当代民族音乐的创新发展也有重要意义。

彰显大别山民歌的多元价值。安徽大别山民歌具有审美、文化等多重价值。首先,审美价值。大别山民歌的结构形式多样,包括五言、七言、十言和长短句交杂等,这种多样化的结构来源于该地区多元文化的交汇。无处不在的土语、衬词,与多变的句式交织,使得大别山民歌更显别样风韵,美不胜收。同时,流畅自如的平仄韵的运用,又使得大别山民歌的语言灵动活泼,充满情趣。这些因素将大别山民歌的原生态美感显露无遗,让人听之入迷。其次,文化价值。大别山民歌是皖西文化的一部分,记录了皖西儿女的精神文化生活,体现了当地的宗教信仰、祭祀习惯等内容,蕴含着丰厚而又特别的文化价值。此外,大别山民歌还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其他价值,将大别山民歌作为重要的旅游资源进行文旅开发,

可以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因此,加强大别山民歌的活态传承,既可以让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被更多人关注,又能使其多元价值得到彰显,使其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 2 安徽大别山民歌活态传承的多元场域和多元主体

在文化研究中,场域是一个常常被提及和应用的 概念。什么是场?库尔特·卢因(Kurt Lewin)在对心理学中“场”的研究中运用了物理学中“场”的概念,指出“场”一旦形成就是一个整体性的存在。场的整体特征将会对处于其中的各部分的性质和变化起决定性作用,但场内各部分特征或它们的简单相加并不能代表场的特征<sup>[4]</sup>。卢因关于场的概念的阐释对我们理解场域这一概念具有引导作用,通过他的解释可知场具有整体性。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对“场域”的概念进行了详细阐释,他认为,场域就是各种社会空间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网络,或者一个构型<sup>[5]</sup>。布迪厄是把场域看作一个由客观关系或者由各元素之间的关系构成的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并非实体系统,而是关系系统,它是对传统“空间”概念的超越。按照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我们可以将社会看作一个个的小空间,这些小空间既相互独立又存在一定联系,每一个空间都有其内在的运行逻辑,遵循一定的运行规则,与此同时,这些小小的空间又共同构成具有整体关联性的场域。

民歌的传承属于文化传承,研究文化传承的空间变迁时,不仅要关注空间的变迁,还要关注时间在空间变迁中的作用,以及空间中各种关系的构型。场域理论更适合用来解释文化传承空间的变迁,因此,可以运用场域理论来认识民歌传承空间的变迁,构建民歌活态传承的场域。安徽大别山民歌的多元场域包括自然场域、社会场域和文化场域。自然场域指的是大别山民歌形成的自然环境。大别山位于我国南北分界线上,山峰叠嶂,植被茂密,河流纵横,独特的地理位置与环境影响着当地人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也孕育了丰富多样的民歌形式,比如各种劳动号子。特殊的自然景观为大别山民歌的传承提供了天然的场域。社会场域指的是以社区、家庭、教育机构等场所为主的民歌传承场域。随着时代的发展,安徽大别山民歌渐渐走出乡寨,走向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在社区节日庆典、婚丧嫁娶场合中,大别山民歌被广泛传唱;在家庭内部,老一辈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以潜移默化的形式将大别山民歌传承给下一

代;学校等教育机构也通过开设民歌课程、举办丰富多彩的民歌演出活动,对大别山民歌进行传承和弘扬。文化场域指的是随着大别山民歌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开始出台相应的保护政策,为大别山民歌的传承提供资金和资源支持,为其传承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同时,随着各种数字技术的普及,大别山民歌的传承和保护也有了新手段,开始进入社交媒体、视频网站等更多虚拟空间。安徽大别山民歌的多元主体有两层含义,一层指的是随着大别山民歌传承和保护力度的加大,大别山民歌的传承主体队伍也不断壮大,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传承队伍中;另一层指的是不同的传承场域有不同的传承主体,他们共同构成了传承大别山民歌的多元力量。具体而言,这些多元主体包括:正式认定的传承人,他们通过表演、教学等多种形式传授民歌技艺;民间艺人,他们通过自发的演唱和创作活动,为大别山民歌的保护和传承贡献自己的力量;政府与文化机构,通过制定政策、投入资金、组织活动、收集民歌资料、举办演出等多种方式支持民歌的传承和保护;学者、作家等文化精英,通过研究民歌的生存土壤、文化内涵及艺术特色等,为大别山民歌传承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媒体人,通过报道民歌演出活动、民间艺人演出、传播民歌相关信息等扩大民歌知名度和影响力;公众,通过积极参与民歌传承和保护活动,贡献自己的力量。多元场域和多元主体相互交织、共同作用,建立起了大别山民歌良性循环的整体性系统,并使其具备造血功能,获得持续发展与创新。

## 3 场域理论下安徽大别山民歌活态传承的路径

“传承场”是从民族文化遗产实践空间角度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sup>[6]</sup>,从最初的农村舞台,到民族产业场域,再到学校教育场域、在线社交场域,安徽大别山民歌的传承场域已经从传统的族群性、封闭性、排他性向社会性、开放性、公共性转变。不同场域有各自优势,应当充分挖掘不同场域的优势,重构理想的大别山民歌演出空间,使其可以得到更好的传承和保护。

### 3.1 固本守源,激发自然场域中的传承活力

任何一种文化总在特定的空间场域里通过人的“在场”而获得延续和发展<sup>[7]</sup>。虽然这种文化场域会伴随时代的发展不断发生变化,但其原生场域通常具有更大的意义。因为原生场域是文化产生的根源和土壤,承载了文化的历史记忆、传统习俗和民族

精神。对安徽大别山民歌来说,皖西大别山乡寨不仅是其发展的起点,也是其传承的起点。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传承场域如何多变,都不应忽略皖西乡寨场域这一核心基点,否则,大别山民歌就失去了根。可喜的是,随着人们对精神家园重要性认识的加深,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关注度也在逐渐增加<sup>[8]</sup>。安徽大别山地区应当充分认识到这里的传统乡寨场域在民歌传承中的重要作用,做好自然场域的保护和活力的激发。第一,应加强对大别山地区独特自然风貌的保护。大别山民歌是在当地独特的自然环境中形成的,凝结了人们对自然的认识、欣赏和艺术表达,应当加强对这里古村落、古建筑的保护和修复,保护它们,就是在保护大别山民歌的根。这需要发挥建筑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等的力量,通过其协同工作对当地的古民居、古建筑、传统街道和街区等进行科学修复<sup>[9]</sup>,尽可能还原大别山地区文化的传统风貌。第二,加强对现有民歌演唱活动的保护。大别山民歌的很多演唱者都是普普通通的劳动生产者,他们是实现民歌一代又一代传承的重要力量,应当鼓励他们继续歌唱。可以通过媒体报道和给他们提供参与文化汇演活动的机会,提升演唱者的社会认可度;也可设立各项奖项,表彰优秀的民歌演唱者,激发他们继续参与民歌演唱活动的热情;还可定期组织民歌交流活动,让民歌爱好者和演唱者齐聚一堂;再如搭建民歌演出平台,鼓励爱好演唱大别山民歌的普通劳动者通过线上直播、参与文化节等途径展示其才华。通过多种多样的活动,可以让当地群众重新认识民歌的重要价值,形成尊重普通民歌演唱者的良好氛围,从而增强演唱者的自豪感和使命感。第三,强化当地习俗、劳动实践活动等与民歌的联系。在大别山民歌中,有些是与放风筝等习俗相关的,有些是与具体的劳动活动相关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些传统习俗活动已经不复存在,人们在劳动活动中也很少演唱民歌。当地政府、村委会等,应牵头定期举办重现传统习俗的活动,并在春节、元宵节等重大节日庆典中,设置民歌演唱环节,邀请民歌传承人或当地民歌爱好者演唱与各种节日、习俗相关的民歌,既能增强节日庆典的氛围,又能激发民歌活力,让民歌重新成为各种节日庆典和习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 3.2 教化弘声,发挥学校场域的系统传承力量

青少年是大别山民歌文化传承的后继者,大别山民歌要传承下去,离不开这些后继者。过去,这些后继者主要通过家庭内部进行传承。家庭内部的长辈们在日常生活中口耳相传,年轻一辈耳濡目染,自

觉成为传承者,但现代生活方式的变迁使得这种传统方式难以为继。随着青年男女外出务工,安徽大别山民歌所在的皖西乡镇的社会组织结构悄然变化,家庭传承的链条逐渐断裂。与此同时,很多家庭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他们认为孩子应当学习学校教授的主流文化知识,大别山民歌只是一种娱乐消遣性的存在,没有学习价值。受这样的观念影响,安徽大别山民歌很难在家庭内部场域实现持续传承。而青少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学校度过的,这就使得学校传承变得不可或缺<sup>[10]</sup>。学校作为传承场域有其自身优势:一方面,学校采用的现代教育方式,可以帮助青少年形成概念化、逻辑化的认知方式,在这种教化引导下,学生可以更理性地看待和评价大别山民歌文化;另一方面,学校的教育教学模式具有系统化、制度化优势,可以确保学生学习大别山民歌文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因此,应当充分发挥学校这一场域在大别山民歌传承中的教化弘扬作用。第一,做好校园环境设置。在校园环境中增加大别山民歌文化的展示,例如,可以在教学楼长廊中展示民歌历史、民歌乐谱、民歌表演等的图片,或在这些地方创作民歌主题壁画,展现民歌所描述的场景或故事情节,让学生直观感受民歌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或在学院设立民歌音乐角,定期在课余时间为学生播放大别山民歌音乐,鼓励学生到音乐角尝试演唱民歌;或利用学校的电子屏幕定期播放民歌视频、民歌纪录片等,增强学生对大别山民歌文化的了解。第二,开设大别山民歌选修课程,搜集大别山民歌资源,对其进行整合,融入学校音乐课程中。课程是一种极具价值的文化资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与创新的重要载体和基本立足点<sup>[11]</sup>。在大别山民歌音乐课程的开发中应当做好课程内容的完善设计,既要包含基础知识,包括大别山民歌诞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代表性曲目、基本特征等知识,又要包含民歌技巧知识,让学生掌握其音韵特点、乐器技巧等。第三,在校园内举办各种形式的大别山民歌演唱比赛或知识竞赛。大别山民歌演唱主要目的在于激发学生传唱大别山民歌的热情,可在五一、六一、国庆等节日庆典活动或校庆活动中增设大别山民歌演唱环节,设置相应的奖项,鼓励学生自觉传唱大别山民歌。也可在学校各种知识竞赛活动中增加大别山民歌知识竞答环节,使大别山民歌渗透到学校的各种活动中,成为校园文化的一部分。第四,学校可以与社区合作建立大别山民歌传承基地。将历史课、劳动课、音乐课等课堂从校内迁移到校外,增加大别山民歌文化体验

环节,让学生在劳动体验、历史寻脉等感性体验活动中,积累直接经验,从而更加深刻地体会大别山民歌的意蕴及在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中发挥的作用。通过校本课程的开发和校外课堂活动,让学生通过学校教育这一正规权威渠道了解本地的民间文化精髓,更加认可大别山民歌的价值,提高他们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自觉加入学习和传承大别山民歌文化的队伍中。

### 3.3 网联四方,释放网络社群的传承潜力

网络社群是伴随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发展而诞生的,BBS社区、微信群、朋友圈、QQ群、抖音、快手等则是网络社群用于分享的不同承载工具<sup>[12]</sup>。当前,使用网络社群已经成为人们的习惯,在安徽大别山民歌的活态传承中,也要充分利用网络社群的重要作用。网络社群的最大优势之一是可以将散落于不同地区的人们通过网络连接起来,让他们以虚拟在场的方式参与到各种网络社区当中。这样的社区为文化传承实践提供了绝佳场所,通过网络社区中展示和分享民歌文化,可以实现大别山民歌的传播交流。第一,建立大别山民歌网站或开发大别山民歌小程序,在这些平台上汇集大别山民歌相关的音视频、文字资料等信息。既可以为想要了解大别山民歌的受众提供在线学习和交流平台,又可以作为收集大别山民歌的资料库、文献库。第二,依托微信、微博、抖音、小红书、哔哩哔哩等社交平台开展大别山民歌传承活动。比如可以开设大别山民歌传承公众号,定期发布大别山民歌的图片、视频信息;开通大别山民歌网络直播,让大别山民歌传承人、当地文化名人等参与到直播活动中,对大别山民歌进行推广,分享大别山民歌演唱的技法、情感表达等专业知识,吸引更多人关注民歌,参与到相关的传承活动中。第三,经常利用在线社区组织线上民歌比赛或爱好者交流活动;鼓励民歌爱好者参与比赛,分享自己日常的演唱作品,交流演唱心得,型塑大别山民歌的网络文化社区。第四,搭建大别山民歌文化研究论坛。可以鼓励人类学、音乐学、民俗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分享他们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定期邀请专家学者举办相关座谈会、讲座,鼓励他们联合开展研究项目,推动大别山民歌的深度研究,为在更大范围内传播积蓄能量。通过以上举措可以有效释放网络社群空间内不同主体的力量,有效拓展大别山民歌的传承时空。

## 4 结论

安徽大别山民歌是皖西地区独特的精神标识,

是当地社会发展的文化沃土,可以为当地经济、文化等的振兴提供丰厚滋养,它的活态传承意义非凡。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其活态传承,依托不同场域中的不同主体,发挥他们各自优势形成传承合力。还应当考虑对不同场域的活态传承活动进行评估,通过统计参与人数、参与频率、参与意愿等来评估不同场域传承活动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为各个场域内民歌活态传承活动的优化和改进提供指导,使大别山民歌可以得到更高质量的传播。

### 参考文献:

- [1] 缪天瑞. 音乐百科词典[M]. 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8:422.
- [2] 段宝林. 非物质文化遗产精要[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1.
- [3] 陈景娥. 社会转型中的民歌传承与变迁——江山“村歌”的观察与思考[J]. 民俗研究,2019(3):118-123, 159.
- [4] 卢因. 社会科学中的场论[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30-42.
- [5] 布迪厄,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45.
- [6] 王丽清. 拉祜族史诗《牡帕密帕》传承场域探究[J].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23,43(5):38-45.
- [7] 李益长. 乡村振兴语境下民族文化遗产场域的续构与生成——以畲族小说歌为例[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7(5):109-115.
- [8] 汪全先,商汝松,李乃琼.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分析[J]. 体育学刊,2013,20(3):112-116.
- [9] 段超,洪毅,孙炜. 少数民族古村镇保护与发展的文化场域建构[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36(6):73-77.
- [10] 董云川,曾金燕. 红河哈尼梯田文化传承的危机与生机——以学校场域为视角[J].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25-32.
- [11] 戴妍,陈佳薇. “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场域的教育重构[J]. 教育理论与实践,2020,40(10):45-50.
- [12] 范小青. 从传统社区到网络社群:少数民族非遗传承场域变迁[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49(2):49-61.

责任编辑:朱家席



## 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以安徽工业企业为例

王艳<sup>1,2\*</sup>, 白蒙<sup>1</sup>

(1. 安徽理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安徽 淮南 232001; 2. 淮南师范学院 科研处, 安徽 淮南 232038)

**摘要:**为探讨安徽地区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通过安徽地区41家上市工业企业面板数据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研究发现:安徽工业企业的当期研发投入对当期企业绩效没有显著影响,但表现出滞后效应,在经过两年的时间后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据此提出相关建议,以期为安徽省工业上市公司提升研发投入效果提供决策参考。

**关键词:**研发投入;安徽地区;工业企业;滞后效应

中图分类号:F324.6;F2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24)06-0033-06

## The Impact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vestment on Firm Performance Basing on Anhui's Industrial Enterprises

WANG Yan<sup>1,2\*</sup>, BAI Meng<sup>1</sup>

(1. School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inan, 232001, Anhui;

2. Department of Science Research, Hu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uainan, 232038, Anhui)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investment on corporate performance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in Anhui region, it conducted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in this paper through panel data of 41 liste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in Anhui region, and found that the current R&D investment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in Anhui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corporate performance in the current period. However, it showed a lag effect and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after two years. Based on this, some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to provide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 for industrial listed companies in Anhui province to improve the effect of R&D investment.

**Key word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investment; Anhui region; industrial enterprises; hysteresis effect

工业作为实体经济的核心,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战场,也构成了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工业的高质量发展成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内容,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等重大战略目标密切相关,从根本上塑造了中国未来的整体国力和国际地位。

2024年1月3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应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步伐,稳健推进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sup>[1]</sup>。科技创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促进了新模式、新动能的形成,是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驱动力,同时也是支撑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柱,有助于企业在市场上建立核心竞争力。然而,研发活动

收稿日期:2024-05-07 \* 通讯联系人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SK2021A0546)。

作者简介:王艳(1974-),女,安徽淮南人,编审,博士;白蒙(1998-),安徽淮北人,男,硕士研究生。E-mail:375116186@qq.com

在实施过程中需要耗费大量成本,并需要长期持续的投入;同时,此类投资存在较高的风险,创新行为所带来的收益周期较长,这些因素使得企业在进行研发活动时面临着两难的抉择。因此,深入研究研发投入与工业企业绩效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机制显得尤为紧迫和必要。

## 1 文献综述

近年来,许多学者对企业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展开了深入研究,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没有显著相关性。郑宝云等在研究电子信息业上市公司时发现,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之间不存在正向关系<sup>[2]</sup>。游春在深入研究深圳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在研发投入和绩效之间的关系中没有检验到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产生显著性相关和滞后作用<sup>[3]</sup>。杨朝艳在对物流上市公司进行研究时发现,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相关性并不显著<sup>[4]</sup>。

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有促进作用。何宜庆等对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财务数据进行探究时发现:研发投入对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财务绩效能够产生积极的促进效应<sup>[5]</sup>。王佳分析了沪深A股公司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得出:在企业的成长和成熟阶段,研发投入对提高企业价值具有显著的有效性<sup>[6]</sup>。

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具有滞后性。侯旭华通过分析我国工业企业的财务数据,发现企业当年的研发投入与其当年盈利能力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性,而与其后一年和后两年的盈利状况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sup>[7]</sup>。王利军等对湖北省制造业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发现,研发费用投入与企业当期财务绩效呈负相关,但对企业滞后一期的财务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sup>[8]</sup>。岳宇君等对我国大数据企业进行分析发现,当期研发人员投入与当期、滞后期企业经营绩效均呈正相关,且在滞后期影响更为显著;当期研发经费投入与当期企业经营绩效呈负相关,与滞后期企业经营绩效呈正相关<sup>[9]</sup>。

对上述文献归纳发现,研究结论的不一致可能源于所选行业、数据、指标及计量模型等方面的差异。有学者认为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正相关,但也有相反观点,认为二者无直接联系。同时,部分学者指出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存在滞后效应。

此外,回顾我国关于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的研究,其中大多数选择以全国为研究对象,而以区域经济为研究对象的研究相对较少。与全国研究相比,

区域经济研究的样本量相对较小,限制了研究成果的普遍性和适用性。但区域经济研究在实践中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政策各异,因此有必要对特定地区进行深入研究,以提供切实的建议和指导。本文以安徽省2018-2022年上市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在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实证性检验,对研发投入强度影响企业绩效的机制进行了分析,同时考虑了滞后效应,以期对安徽省上市工业企业重视研发投入、促进创新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研发投入强度是指企业在特定时间段内所耗费用于研究与开发活动的资金与其实际实现的营业收入之比,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对研发的重视程度和创新能力。研发投入强度较高的企业,通常具有较强的技术实力和创新能力,能够更好地开发新产品、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绩效。根据现行企业会计准则,必须对企业当年的研发支出进行明确区分。研究阶段的支出被视为当期费用计入当期成本,当年的研发支出计入当期费用将导致企业当期成本的增加,由于研发活动本身并不会立即产生相应的利润,这将对企业当期的盈利产生不利影响。

根据研发结果的生命周期来分析,产品通常经历从研发阶段到引入期和发展期的逐步过渡,这期间产品的利润会逐步增长,可以对企业的绩效产生积极影响。荣凤芝等在针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研究中发现,政府补助和研发投入显著推动了企业绩效,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推动效应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sup>[10]</sup>。张广胜等在对制造业的研究中发现研发投入显著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呈现出滞后效应且该作用在时间推移过程中逐渐减弱<sup>[11]</sup>。在吴佳莲的研究中,探讨了中国制造业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在当年期对绩效产生负面影响,然而在滞后期,这一影响显著呈现为正向<sup>[12]</sup>。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企业当期研发投入强度与当期企业绩效呈负相关。

假设2:企业当期研发投入强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

## 3 研究设计

### 3.1 数据来源

研究对象是安徽地区2018-2022年间A股上

市工业企业。在样本筛选中排除了 ST 股和退市股,以及在年报中出现数据缺失和研发投入突然中断的企业。最终选定了 41 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研究过程中,主要采用 Excel 和 SPSS27.0 软件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和分析。所使用的财务信息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以及各公司的年报和财务报表。

### 3.2 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企业研发投入产生的影响最终会在产品质量提升、产品销售量变化等方面得到体现,因此,本文选择将样本公司的营业利润率(OPR)作为反映企业绩效的被解释变量。营业利润率(OPR)用于评估一家公司的运营效能和盈利能力,它反映了公司净利润与总营业收入的比例,以揭示企业在经营活动中的盈利水平。

解释变量。研发投入强度(RD)是衡量企业在研发方面投入的资金在企业营业收入中所占比例的指标,可以反映企业对研发的重视程度。企业的营业利润率(OPR)是营业利润与营业收入的比值,为了保持一致性,选择研发投入强度(RD)而不是研发投入金额作为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现金比率(CASH)是用于衡量一家公司的流动性和支付能力的财务指标。它显示了现金和现金等价物(通常是高度流动的资产)在总资

$$OPR_t = c + \beta_1 RD_t + \beta_2 CASH_t + \beta_3 SIZE_t + \beta_4 ROA_t + \varepsilon_t \quad (1)$$

$$OPR_{t+n} = c + \beta_1 RD_{t+n} + \beta_2 CASH_{t+n} + \beta_3 SIZE_{t+n} + \beta_4 ROA_{t+n} + \varepsilon_{t+n}, (n = 1, 2, 3, 4) \quad (2)$$

模型 1 表明企业当期研发投入对企业当期绩效的影响, $c$  为常数, $\beta$  是回归系数, $OPR_t$  表示企业在  $t$  年的盈利能力, $RD_t$  表示企业在  $t$  年的研发投入, $CASH_t$  表示企业在  $t$  年的现金比率, $SIZE_t$  表示企业在  $t$  年的规模, $ROA_t$  表示企业在  $t$  年的资产报酬率, $\varepsilon_t$  是随机干扰项。

模型 2 表明企业当期研发投入对后期企业绩效的影响, $OPR_{t+n}$  表示企业在  $t+n$  年的盈利能力, $RD_t$  表示企业在  $t$  年的研发投入,由于模型是为了研究对后期企业绩效的影响,所以始终以  $t$  (2018) 年的研发投入作为解释变量, $c$  为常数, $\beta$  是回归系数, $\varepsilon_{t+n}$  是随机干扰项。同时, $CASH_{t+n}$ 、 $SIZE_{t+n}$ 、 $ROA_{t+n}$  也被引入模型作为控制变量,其中  $CASH_{t+n}$  表示企业在  $t+n$  年的现金比率, $SIZE_{t+n}$  表示企业在  $t+n$  年的规模(总资产取对数), $ROA_{t+n}$  表示企业在  $t+n$  年的资产报酬率。

$n$  的取值为 1、2、3 或 4,分别表示滞后一年、滞后两年、滞后三年和滞后四年的盈利能力,由于研究选取的是 2018 - 2022 年安徽省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所以模型中  $OPR_{t+n}$ 、 $CASH_{t+n}$ 、 $SIZE_{t+n}$ 、 $ROA_{t+n}$

产中的比例,现金充裕的企业通常更容易获取外部资金和支持,从而对企业的研发投资决策产生影响。

企业规模(SIZE)是影响企业研发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大型企业通常拥有丰富资源和资本,具备更强的研发能力和承受风险的能力,因此更有可能进行大规模的研发投资。资产报酬率(ROA)是评估企业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标,用以反映企业的经营绩效和投资潜力,较高的资产报酬率意味着企业具备更多的盈利机会和更好的投资前景,进而更有可能进行高强度的研发投资。上述变量的符号和定义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名称、符号及定义

变量	名称	符号	定义
解释变量	营业利润率	OPR	营业利润/营业收入
被解释变量	研发投入强度	RD	研发费用/营业收入
控制变量	现金比率	CASH	现金货币/总资产
	企业规模	SIZE	取总资产的对数
	资产报酬率	ROA	净利润/总资产余额

### 3.3 模型的构建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构建以下模型:

## 4 实证分析

###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描述性统计分析具体结果见表 2。国际相关研究表明,在企业的研发费用强度保持在 3% 至 5% 之间时,通常能够保持正常运营。然而,如果一个企业的研发费用强度低于 1%,那么它将面临巨大的生存挑战,只有当企业的研发费用强度达到 2% 时,才能勉强维持生存。这些结论是基于国外研究成果得出的,说明研发费用强度对企业的经营状况和竞争地位有着重要影响<sup>[13]</sup>。基于描述性统计分析的信息(见表 2),可以明确以下观察结果:安徽省工业企业研发投入最小值为 0.3%,最大值为 19%,研发投入差距较大,整体平均值为 5%,说明安徽省工业企业整体在行业中具有竞争优势,但优势较小。从理论角度来看,企业的研发活动通常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效应。这意味着研发活动不仅会给企业自身带来好处,还会对整个社会产生积极影响。然而,

由于研发成果难以为私人企业独享,企业往往难以充分享受其研发努力所带来的全部社会收益。通常情况下,企业从研发活动中所获得的私人收益远远不及其为社会创造的总收益,这会降低企业主动从事研发投入的意愿<sup>[14]</sup>。

工业企业营业利润率通常在7%-15%左右,所选取的样本中最小值为负值,最大值达到54.4%,整体均值达到9%,说明安徽省整体工业企业发展水平较为合理。资产报酬率最小值为-41.7%,最大值为20.1%,平均值为4.2%,当企业的资产报酬率和营业利润率都为负值时,表明一些企业的经营绩效正经历下滑阶段,其资金投入超过了实际产出,部分企业可能是由于市场需求量下降影响了其经营绩效。现金比率是公司财务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最小值为3.3%,最大值为46.9%,样本公司现金储备差异较大,平均值为18.3%,说明样本中的公司平均现金储备较高。公司规模是衡量公司规模大小的重要指标,最小值20.380,最大值为25.010,样本公司企业规模平均较大,差距较小。

表2 描述性统计分析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OPR	-0.441	0.544	0.090	0.128
RD	0.003	0.190	0.050	0.031
ROA	-0.417	0.201	0.042	0.064
CASH	0.033	0.469	0.183	0.099
SIZE	20.380	25.010	22.310	1.073

## 4.2 相关性分析

通过2018年企业绩效对当期解释变量和控制

表4 企业当期研发投入强度与当期盈利能力的回归结果

$R^2$	调整后的 $R^2$	标准估计的误差	更改统计量				D-W	
			$R^2$ 变化量	$F^2$ 变化量	df1	df2		Sig. F 更改
0.819	0.799	0.0458	0.819	40.722	4	36	0.000	2.427

注:预测变量包括  $c, RD_{2018}, SIZE_{2018}, ROA_{2018}, CASH_{2018}$ , 因变量为  $OPR_{2018}$ 。

表5 企业当期研发投入强度与当期盈利能力的回归系数

变量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sig.	共线性统计	
	Beta	标准误差	Beta				容差	VIF
$c$	0.02	0.159			0.125	0.901		
$RD_{2018}$	0.396	0.232	0.124		1.705	0.097	0.958	1.043
$ROA_{2018}$	1.303	0.107	0.873		12.19	0.01	0.981	1.02
$CASH_{2018}$	0.081	0.085	0.07		0.954	0.346	0.924	1.082
$SIZE_{2018}$	-0.001	0.007	-0.011		-0.148	0.883	0.961	1.04

注:因变量为  $OPR_{2018}$ 。

变量的相关性分析(见表3),可以看出,当期的营业利润率对研发强度、现金比率、企业规模、资产报酬率均没有产生显著的相关性,资产报酬率对营业利润率产生了显著的相关性,相关性系数为0.892,相关性较强。一般来说,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对当期企业的盈利能力产生负向的显著性,但在笔者研究中并未发现显著的相关性。

首先,研发投入的成果通常不会立即在当期显现出来。研发活动需要时间来完成,而其产生的创新也需要时间才能转化为商业价值。其次,研发投入与绩效之间的关系受市场需求、竞争环境、宏观经济等多种外部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即使企业大幅增加研发投入,如果市场需求疲软或竞争激烈,企业绩效仍可能受到制约。这些外部因素的存在可能模糊了研发投入与绩效之间的潜在联系。

表3 变量相关性分析

	RD	OPR	CASH	SIZE
OPR	0.208			
CASH	0.174	0.202		
SIZE	0.054	-0.039	-0.176	
ROA	0.083	0.892**	0.124	-0.025

注:\*\*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表示在5%的水平上显著相关。

## 4.3 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多元回归分析

表4和表5是研发投入对当期的企业绩效通过模型1进行的回归分析。 $R^2$ 是用来度量回归方程对样本数据拟合程度的一个拟合优度指标。当 $R^2$ 越接近1时,说明回归方程的拟合度越高,样本数据与回归直线之间的差异越小。

由表 4 可知,  $R^2$  系数为 0.819, 表示模型中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程度达到 81.9%, 说明该模型拟合效果较为显著。

从表 5 中的结果来看, 2018 年研发投入强度与当期营业利润率之间未标准化系数为 0.396,  $t$  值为 1.705, 显著性为 0.097, 说明研发投入强度对当期盈利能力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因此假设 1 不成立。

企业需要通过创新产品提高市场竞争力。首先, 必须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资源进行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以期实现技术突破和创新。其次, 需要对研究结果进行开发和实验, 以确定技术的可行性和商业化价值。根据模型对此进行了回归分析, 结果分别呈现在表 6 和表 7 中。

从表 6 可以看出 2019 年的  $R^2$  为 0.758, 2020 年的  $R^2$  为 0.852, 2021 年和 2022 年的  $R^2$  为 0.922 和 0.935, 可以看出模型 2 的拟合效果较好。在表 7 中可以看到, RD 在 2019 年至 2022 年的 Sig. 值为 0.752、0.012、0.01、0.01, 回归系数为 0.108、0.39、0.33、0.563, 由此可见 2020 年以后, 研发投入强度开始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相关性, 并且有正向的相关性。因此, 假设 2 成立。总体来说, 经过滞后两年的时间, 研发投入强度与企业绩效之间出现了显著

的正相关性。在 2018 年至 2021 年期间, 可以观察到研发投入强度与企业盈利能力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初始时, 二者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从 2020 年开始研发投入强度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先增大后减小。然而, 在 2022 年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 即研发投入强度与企业盈利能力之间的关联再次显著增长, 这一趋势的出现可能与我国新冠疫情此时解封有关, 但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以确认这种关联并解释其背后的原因。

研发投入对工业企业的影晌通常有较长的滞后期, 与规模企业平均较大有关。由于工业企业的规模通常较大, 大型企业决策流程复杂, 有更为复杂的组织结构和决策流程。在大型企业中, 决策往往需要经过多个层级的批准和评估, 导致决策的执行速度较慢。这种决策的滞后性可能会延迟对研发投入的决策, 使得大型企业在投入研发方面需要更长的时间。大型企业通常有多个业务领域和项目, 需要合理分配资金。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 研发投入需要与其他业务项目竞争资金, 导致研发项目的资金安排较为复杂和滞后。因此, 规模企业平均体量较大的工业企业, 其研发投入对绩效的影响可能存在较长的滞后期。

表 6 企业当期研发投入强度与后期盈利能力的回归结果

年份	$R^2$	调整后的 $R^2$	标准估计的误差	更改统计量			
				$R^2$ 变化量	$F^2$ 变化量	df1	df2
2019	0.758	0.731	0.0682	0.758	28.175	4	36
2020	0.852	0.835	0.029277484	0.852	51.722	4	36
2021	0.922	0.914	0.02855835	0.922	106.785	4	36
2022	0.935	0.928	0.036542808	0.935	129.33	4	36

注: 因变量为 OPR, 解释变量包括 RD、SIZE、CASH、ROA。

表 7 企业当期研发投入强度与后期盈利能力的回归模型

变量		c	RD	ROA	CASH	SIZE
2019	Beta	-0.010	0.108	1.287	0.136	0.010
	Sig.	0.965	0.752	0.010	0.271	0.973
2020	Beta	0.126	0.39	1.898	0.048	-0.006
	Sig.	0.217	0.012	0.01	0.287	0.157
2021	Beta	0.065	0.33	2.091	0.093	-0.004
	Sig.	0.491	0.01	0.01	0.045	0.287
2022	Beta	-0.013	0.563	2.087	0.068	-0.002
	Sig.	0.908	0.004	0.01	0.25	0.752

注: 因变量为 OPR, Beta 表示的是回归系数, Sig. 表示的是显著性。

## 5 研究结论与建议

基于对研发投入与工业企业绩效之间滞后性的分析,得出结论:研发投入强度是衡量企业研发投入规模的重要指标,如果相对较低,会影响到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未来竞争力。安徽省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最小值为 0.3%,最大值为 19%,整体平均值为 5%,这说明安徽省上市的工业企业研发投入不均衡,且工业企业总体上研究投入的规模相对较小,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研发力度只能满足企业正常运营的需求,无法达到较高水平的创新能力与竞争优势。在 2018 年至 2022 年的多元回归模型中,企业绩效与研发投入的 Sig. 值分别为 0.752、0.012、0.01 和 0.01,这表明在 2018 年和 2019 年,研发投入强度与企业绩效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而从 2020 年起,两者之间才开始显现出显著的相关性,回归系数分别为 0.39、0.33 和 0.563,在两年后才看到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带来的正向的显著影响,较长的滞后期是安徽省研发投入对工业企业绩效的主要影响特征。这种滞后性的现象需要引起企业的注意,因为可能会导致企业在投入研发之后不能带来收益甚至产生负收益。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来加强研发投入对工业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

首先,各地政府部门应当加大对安徽省中小工业企业技术研发工作的扶持力度,重视对安徽省工业企业技术和产品研发的资金补助,发挥激励企业提升创新研发投入强度的杠杆作用。此外,应建立中小工业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制度,以减轻中小企业的税负问题。安徽省中小工业企业在进行研发投入时普遍面临资金周转困难等问题,因此所得税政策能够有效缓解安徽省中小工业企业研发投入的资金压力,以推动企业研发技术和产品的进程。

其次,精准定位研发产品的市场。安徽省各工业企业应确立研发目标和发展方向,将研发纳入企业战略规划,保持长期投入。在研发投入之初,精准定位研发产品在市场的位置,从而能够采取适当的研发规划与竞争策略增加企业竞争优势,获得长期的产品研发收益,为研发新产品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资金的流入反过来增强企业的研发能力,从而再次优化产品研发战略的实施,提供更多的研发资金收益,以此形成产品研发的良性循环,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最后,为适应市场变化设立弹性研发预算。建立弹性研发预算机制,以便根据市场状况和需求调

整投资。对周期较长的项目可以采用一次性立项、按阶段分解、分阶段授予的管控模式。在项目的立项审批阶段,建议以整体生命周期为依据编制综合预算,并将其分解至各个阶段。一旦项目获得审批通过,随着研制进展,可以逐步划拨特定阶段所需的经费,确保企业能够在不确定性环境中作出迅速反应,以最大程度地利用有限资源。

## 参考文献:

- [1]任保平.以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全方位推进新型工业化[J].人文杂志,2024(3):1-7.
- [2]郑宝云,陆玉梅.电子信息业上市公司 R&D 绩效的实证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0,30(24):195-198.
- [3]游春.我国中小企业研发投入与财务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J].南方金融,2010(1):52-55,59.
- [4]杨朝艳.物流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23(15):132-134
- [5]何宜庆,李娜,颜明杰,等.研发投入对制造业上市公司财务绩效的影响分析——基于价值创造的视角[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48(6):64-71.
- [6]王佳.高管团队稳定性、研发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研究——基于会计稳健性视角[J].预测,2020,39(5):30-36.
- [7]侯旭华,谢冬青.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基于 A 股上市工业企业的实证研究[J].保险职业学院学报,2019,33(3):19-27.
- [8]王利军,陈梦冬.湖北省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来自 53 个上市公司的数据[J].湖北社会科学,2021(5):75-82.
- [9]岳宇君,孟渺.研发投入、资源特征与大数据企业经营绩效[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5(2):74-85.
- [10]荣凤芝,钟旭娟.政府补助、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相关性的实证检验[J].统计与决策,2020,36(5):161-165.
- [11]张广胜,孟茂源.研发投入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41(11):115-124.
- [12]吴佳莲.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对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23(11):66-69.
- [13]张俭,张玲红.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来自 2009-2011 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证据[J].科学决策,2014(1):54-72.
- [14]张辉,刘佳颖,何宗辉.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门槛分析[J].经济学动态,2016(12):28-38.

责任编辑:费瑞波

# 数字经济对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程芬芬, 黄纪元\*

(安徽建筑大学 经济与管理管理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09)

**摘要:**通过收集2012年至2021年间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就数字经济对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首先,构建指标体系,运用熵权综合评价方法,对全国各地的数字经济和建筑业的高质量发展程度进行测算。其次,通过建立一个空间计量模型,研究数字经济对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建筑业的高质量发展受数字经济的影响是积极的空间溢出效应,意味着数字经济在某一区域的进展不仅会推动该区域建筑业的高质量发展,还会激励相邻地区建筑业的高质量发展;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可以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来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欠发达地区,数字经济能更好地促进建筑业的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数字经济;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空间计量;空间溢出效应

中图分类号:F426.92;TU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24)06-0039-08

##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ffect of Construction Industry from Digital Economy by Empirical Analysis of Spatial Durbin Model

CHENG Fen-fen, HUANG Ji-yu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nhui Jianzhu University, Hefei, 230009, Anhui)

**Abstract:** Using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s, it examined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n this paper, basing on panel data from all 31 provin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between 2012 and 2021. Firstly, two index systems were constructed for digital economy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respectively. The entropy weighting method was used for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Furthermore, multiple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s have been constructed in order to examine the influenc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the high-quality advance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ccording to the empirical findings, it is evident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the ability to greatly enhanc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e posi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s significant, that is,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in a region will improve its own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nstruction industry. Additionally, it will facilitate the advance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n the surrounding regions by promoting high-quality growth. The examination of moderating influences suggest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s to enabling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industrial sector. The digital economy contributes significantly to advanc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n less developed re-

收稿日期:2024-05-07 \* 通讯联系人

基金项目:全国统计科学研究重大项目(2019LD05)。

作者简介:程芬芬(1978-),女,安徽安庆人,副教授,博士;黄纪元(2000-),男,安徽六安人,硕士研究生。E-mail: 19315279652@163.com

gions.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construction industr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patial econometric;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不断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成为国家的重要战略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数字经济为新兴产业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和升级提供了契机,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作用发挥将为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持。在2022年1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了《“十四五”建筑业发展规划》,指出建筑行业与先进制造业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拥有巨大的潜力和发展空间,因此需要加快建筑业的转型升级。数字化技术发展为建筑业带来了发展机遇,数字经济能否以及如何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这成为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

关于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研究,已有文献主要聚焦于内涵界定与水平测度两个方面。孙继德等指出,建筑业的增长和质量提升是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方向,认为建筑业发展需要满足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需求<sup>[1]</sup>。项勇等经过研究发现,政府的管理水平、行业的发展情况、企业的成长状况以及市场的规范程度,是影响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sup>[2]</sup>。高华建等从整体表现、建筑产品、社会效益、国际化以及建造过程等五个方面,构建了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sup>[3]</sup>。有学者在碳排放约束下通过建筑业高质量发展评价的区域差异特征及驱动机制的研究发现城镇化水平、碳排放约束、政府监管、科技研发投入和产业结构升级是影响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时空分异和演进的主要驱动因素<sup>[4]</sup>。傅为忠等采用熵值法和聚类分析法对建筑业高质量发展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影响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发展规模、创新发展和发展潜力等因素<sup>[5]</sup>。

目前已有多项研究关注数字经济与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但很少有研究探讨数字经济对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影响机制。孙洁等提出了数字化科技创新驱动中国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路径<sup>[6]</sup>,Jemal等与学者在数字化建筑业以及数字建设工具方面也有研究<sup>[7,8]</sup>,卢嘉润等利用效率值综合得出数字化转型与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复合系统的协同程度<sup>[9]</sup>。仅有少数学者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与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性,例如:张爱国等以31个省级行政区为研究区域,对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在2011年至2020年期间的数字经济与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了测算,揭示了数字经济与

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状态<sup>[10]</sup>。以上学者从耦合的角度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但对数字经济是否直接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仍然不多,这种影响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很少有文献加以证实。

本研究利用2012-2021年间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分析,通过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建筑业高质量发展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以期为促进数字经济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建议。

##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1.1 数字经济对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数字经济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创新,通过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建筑企业可以实现工程全过程的智能化管理,提高工程的质量和效率。杜小武等研究发现,中国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水平逐年上升,创新驱动水平与创新投入的关联性最大<sup>[11]</sup>。研究者在探索数字化建筑行业创新路径研究中发现数字化建筑行业创新网络规模不断扩大,数字化载体日益多样化<sup>[12]</sup>。因此,数字经济的技术创新能够促进建筑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推动了建筑业数据的共享和协同。通过数字化技术,建筑企业可以实现建筑工程各个环节的数据共享、实现信息的共享和协同管理。这种数据共享和协同将促进设计、施工和监理等相关方之间的紧密合作,提高建筑工程的质量和效率。韩长根等根据研究发现,互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新兴科技为经济市场中的配对问题提供了改善方法<sup>[13,14]</sup>。因此,数字经济的数据共享与协同能够推动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基于以上两个方面分析,提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1: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 1.2 数字经济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

在数字经济的影响下,建筑业集聚的效应日益凸显。建筑业集聚可以形成产业链的完整性和协同效应,形成规模经济和技术外溢效应。这种集聚效应会吸引更多的企业和人才涌入,形成建筑业的核心区域,进而促进附近地区的建筑业高质量发展。钟文,郑明贵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有效抑制



区域发展差距,空间溢出在数字经济影响区域发展差距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传导作用<sup>[15]</sup>。可见数字经济对区域间经济活动的联系有很大的影响。刘明、范丹雪研究显示,数字经济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不仅仅是在该区域内,还可以推动周边区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即具有空间溢出效应<sup>[16]</sup>。研究者在探讨数字经济与绿色农业发展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和区域异质性中表明数字经济对周边绿色农业的发展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数字经济对绿色农业发展的影响在不同维度和区域上表现出显著差异<sup>[17]</sup>。

数字平台信息流动可以使建筑业的发展趋势和应用成果传播到其他地区,从而吸引更多企业探索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道路。通过与邻近地区的信息交流和资源整合,可以促进各地区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综上所述,数字经济对于区域发展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因此,提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 2:数字经济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 1.3 数字经济影响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

数字化经济可以通过推动数字产品创新改善企业的创新氛围,增强创新活力,从而有助于促进企业升级、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许春等在中国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中,提到数字经济能够通过突破性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sup>[18]</sup>,产业结构升级能够进一步改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模

式,驱动建筑业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李豫新等提出数字经济能够引导实体经济和新兴产业的发展,通过推进市场化进程促进产业结构优化<sup>[19]</sup>。赵克飞等在研究中发现第二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是影响绿色建筑发展水平的最显著因素,调整产业结构能明显提高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水平<sup>[20]</sup>。

数字经济的技术创新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带来了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变,这种改变将驱动建筑业创新和绿色发展。此外,数字经济引导新兴产业的发展也会带动产业的转型升级,而这种转型升级将有助于优化要素禀赋结构,推动建筑业经济的开放发展。因此,提出第三个假设:

假设 3:数字经济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 2 研究设计

### 2.1 变量测度

被解释变量。本文被解释变量为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按照新发展理念,从创新、协调、绿色、规模效益、共享五个方面,建立建筑业高质量发展评估指标体系,包含 5 个一级指标、13 个二级指标,如表 1 所示。其中建筑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和每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建筑面积这两个指标可以从收入分配和公共服务两个方面反映建筑业的共享性。参考徐晔和赵金凤的研究<sup>[21]</sup>,采用熵权法测算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水平(Hqd)。

表 1 建筑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单位	指标性质	权重
规模效益	建筑业总产值	亿元	正向	0.1309
	建筑业企业资产	亿元	正向	0.1228
	建筑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	万人	正向	0.1359
	建筑业企业产值利税率	%	正向	0.0390
协调性	国有企业建筑产值占比	%	正向	0.0684
	建筑业增加值	亿元	正向	0.1147
创新性	勘察设计机构高级职称职工人数	人	正向	0.0970
	建筑业企业技术装备率	元/人	正向	0.0680
	建筑业企业动力装备率	kW/人	正向	0.0835
共享性	建筑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元	正向	0.0439
	每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建筑面积	m <sup>2</sup> /万人	正向	0.0673
绿色性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正向	0.0053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m <sup>2</sup>	正向	0.0233

解释变量。以数字经济(Dige)为解释变量。王彦杰等对数字经济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划分,包括数字产品制造、数字产品服务、数字技术应用、数字基础保障和数字化效率五个方面<sup>[22]</sup>。万晓瑜和罗焱卿设计了一套衡量数字经济水平的指标体

系,包括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和数字融合三个方面<sup>[23]</sup>。本文着眼于数字化基础、数字产业化和数字创新三个方面来构建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3个主要指标和8个次要指标,如表2所示。研究采用熵权法测算数字经济水平(Dige)。

表2 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单位	指标性质	权重
数字化基础设施	光缆长度	km	正向	0.1105
	移动电话普及率	部数/百人	正向	0.0447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	万个	正向	0.1039
数字产业化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	万人	正向	0.1929
	每百人使用计算机数	台	正向	0.0655
	每百家企业拥有网站数	个	正向	0.0158
数字创新	国内发明专利申请授权量	项	正向	0.2536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 经费	万元	正向	0.2131

中介变量。参考赵爽、刘文亮的研究<sup>[24]</sup>,本文以第二产业的产值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表示产业结构(IS)。

控制变量。参考陈海龙、李阳的研究<sup>[25]</sup>,为了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在本研究中选择人力资本水平

$$\text{Hqd}_{i,t} = \alpha_0 + \alpha_1 \text{Dige}_{i,t} + \alpha_c Z_{i,t} + \mu_i + \delta_i + \varepsilon_{i,t} \quad (1)$$

在(1)式中,Hqd<sub>i,t</sub>为省份*i*在*t*时期的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水平,Dige<sub>i,t</sub>为省份*i*在*t*时期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Z<sub>i,t</sub>表示各类控制变量;μ<sub>i</sub>代表个体固定效应,δ<sub>i</sub>则代表时间固定效应;ε<sub>i,t</sub>为随机扰动项。如果回归系数α<sub>1</sub>显著为正,则表明数字经济能够促

(LHC)、对外开放程度(DO)和外商直接投资(FDI)作为控制变量。

## 2.2 模型构建

为验证数字经济对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构建固定效应模型:

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为了更好地研究数字经济对建筑业高质量发展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引入了空间交互项,构造空间计量模型:

$$\text{Hqd}_{i,t} = \alpha_0 + \rho \text{WHqd}_{i,t} + \phi \text{WDige}_{i,t} + \alpha_1 \text{Dige}_{i,t} + \phi \text{WZ}_{i,t} + \alpha_c Z_{i,t} + \mu_i + \delta_i + \varepsilon_{i,t} \quad (2)$$

在(2)式中,ρ代表空间自回归系数;W为空间权重矩阵;α<sub>1</sub>和α<sub>c</sub>为空间交互项的回归系数。通过观察空间自回归系数ρ以及空间交互效应系数,可以判断是否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发展中,是否起到中介作用,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本文为研究数字经济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对建筑业高质量发展产生空间溢出效应,参考了邵帅等的研究成果<sup>[26]</sup>,将中介效应引入到空间杜宾模型(SPDM)中进行扩展,具体如下:

$$\text{IS}_{i,t} = \beta_0 + \rho \text{WIS}_{i,t} + \phi_1 \text{WDige}_{i,t} + \beta_1 \text{Dige}_{i,t} + \phi_c \text{WZ}_{i,t} + \beta_c Z_{i,t} + \mu_i + \delta_i + \varepsilon_{i,t} \quad (3)$$

$$\text{Hqd}_{i,t} = \gamma_0 + \rho \text{WHqd}_{i,t} + \phi_1 \text{WDige}_{i,t} + \gamma_1 \text{Dige}_{i,t} + \phi_2 \text{WIS}_{i,t} + \gamma_2 \text{IS}_{i,t} + \phi_c \text{WZ}_{i,t} + \gamma_c Z_{i,t} + \mu_i + \delta_i + \varepsilon_{i,t} \quad (4)$$

为检验产业结构在数字经济对于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检验过程如下:在数字经济发展指数Dige对于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指数Hqd的空间面板计量模型(2)的系数α<sub>1</sub>为显著后,构建Dige对于IS的线性回归方程(3)和Dige与IS对于Hqd的回归方程(4)。β<sub>1</sub>若显著,则表明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变化有显著影响。在γ<sub>2</sub>显著的前提下,γ<sub>1</sub>若也显著,则表明数字经济对于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显示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效果;γ<sub>1</sub>若不

显著,则表明产业结构调整在数字经济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中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

## 2.3 样本数据

本文以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为研究对象,时间跨度为2012-2021年,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网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公布的统计年鉴。表3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结果显示: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指数(Hqd)的均值为0.2042,最

大值为 0.5751, 最小值为 0.0597, 标准差为 0.0975, 表明不同地区间建筑业发展质量差异较大; 数字经济发展指数(Dige) 同样呈现“均值小、标准误差大”的特点, 这与赵涛等<sup>[27]</sup> 和吕明元等<sup>[28]</sup> 的研究结论相符。此外, 产业结构(IS) 的均值为 0.4407,

最大值为 0.8406, 最小值为 0.1590, 标准差为 0.1188, 表明不同地区间产业结构差异较大; 在控制变量方面, 不同地级市在地区人力资本水平(LHC)、对外开放程度(DO)、外商直接投资(FDI) 等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表 3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Hqd	310	0.2042	0.0975	0.0597	0.5751
解释变量	Dige	310	0.1634	0.1324	0.0179	0.8805
中介变量	IS	310	0.4407	0.1188	0.1590	0.8406
控制变量	LHC	310	0.0204	0.0057	0.0085	0.0424
	DO	310	0.2537	0.2748	0.0075	1.408
	FDI	310	0.0176	0.0145	0.0001	0.0795

### 3 实证研究

#### 3.1 基准回归

对方程(1) 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如表 4 所示。在没有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 得到了第(1) 列回归结果; 在加入控制变量之后, 得到了第(2) 列回归结果。根据这些结果显示, 两个模型的调整  $R^2$  较高, 分别为 0.7013 与 0.7165, 表明基准回归模型取得了好的表现。在没有控制变量的条件下, 数字经济水平(Dige) 对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被证实为显著正向(0.4196, 显著性水平为 1%); 在添加控制变量后, 数字经济水平(Dige) 对其影响仍然被证实为显著正向(0.3865, 显著性水平为 1%)。这些结果表明, 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建筑业的高质量发展, 支持了假设 1。

表 4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Dige	0.4196*** (0.0925)	0.3865*** (0.0989)
控制变量	否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个体固定	是	是
N	310	310
调整 $R^2$	0.7013	0.7165

注:(1) 括号中为回归标准误;(2) \*\*\*、\*\*、\* 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 3.2 空间溢出效应

与地理邻接矩阵和反距离权重矩阵相比, 利用经济距离权重矩阵能更好地反映各地区之间的空间效应。本文使用经济距离权重矩阵来构建空间计量模型, 研究数字经济是否对建筑业高质量发展产生空间溢出效应。表 5 呈现了使用经济距离权重矩阵计算的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全局莫兰指数。在 2012-2021 年期间, 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在经济距离权重下的 Moran' I 指数都大于 0 且显著(在 5% 水平上), 意味着我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在该时期内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

参考 Elhorst 的研究结论<sup>[29]</sup>, 为了确定使用何种模型, 本研究采用 LM 检验、LR 检验以及 Hausman 检验来进行模型选择, 并最终确定使用空间杜宾模型(SDM), 估计结果如表 6 所示。首先, 高质量发展的空间自回归系数( $\rho$ ) 呈现出显著的负向趋势, 而数字经济的空间交互效应系数却呈现出正向趋势。这表明, 数字经济对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外生空间交互效应。但是, 空间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不能直接用于评估数字经济对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 因为简单的点回归结果容易产生错误估计。因此, 将文中的总效应分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通过分析数字经济对本地区及周边地区的建筑业高质量发展产生的影响来加以解释, 结果如表 6 所示。从中可以明显观察到, 数字经济对建筑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非常明显和积极的直接影响, 同时也具备明显且积极的间接影响。这些结果表明, 本地区数字经济将促进本地区及周边区域的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即存在空间正溢出效应,

支持了假设 2。

表 5 莫兰指数

年份	<i>I</i>	<i>z</i>	p-value
2012	0.172	2.912	0.002
2013	0.15	2.770	0.003
2014	0.146	2.660	0.004
2015	0.101	2.003	0.023
2016	0.121	2.285	0.011
2017	0.134	2.468	0.007
2018	0.108	2.072	0.019
2019	0.127	2.314	0.010
2020	0.112	2.105	0.018
2021	0.119	2.203	0.014

表 6 空间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1)	(2)
Dige	0.4245*** (0.0282)	0.3688*** (0.0300)
W * Dige	0.6442*** (0.1268)	0.5099*** (0.1388)
$\rho$	-0.6311*** (0.1429)	-0.7178*** (0.143)
控制变量	否	是
直接效应	0.4034*** (0.0313)	0.3529*** (0.0318)
间接效应	0.2559*** (0.0685)	0.1642** (0.078)
总效应	0.6592*** (0.0615)	0.5171*** (0.0773)
<i>N</i>	310	310
调整 $R^2$	0.7362	0.6077

注:(1)括号中为回归标准误;(2)\*\*\*、\*\*、\*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 3.3 稳健性检验

更换指标体系。本文更换解释变量(数字经济)指标体系中的部分指标,将移动电话普及率更换为移动电话基站数、每百家企业拥有网站数更换为电信业务量,重新测度数字经济水平(Dige)。进而,使用重测后的 Dige 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7 第(1)列所示。可以看出,数字经济水平(Dige)的

回归系数仍在 1% 水平上显著且为正值(0.2785)。由此,数字经济的潜力进一步得到了验证,它能够推动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因而,之前提出的结论可以被进一步证实。

更换权重矩阵。更换经济距离矩阵为邻接矩阵,得到回归结果,如表 7 第(2)列所示。从数据可以得出结论,数字经济水平(Dige)的回归系数仍然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且为 0.3573,位于 1% 水平上显著。因此,更换权重矩阵的回归结果仍显著,表明数字经济能促进建筑业的高质量发展,本文先前结论具有稳健性。

表 7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Dige	0.2785*** (0.0258)	0.3573*** (0.0304)
W * Dige	0.3225*** (0.1204)	0.0791* (0.0448)
$\rho$	-0.6453*** (0.1443)	0.0813 (0.0788)
控制变量	YES	YES
直接效应	0.2705*** (0.0276)	0.3607*** (0.031)
间接效应	0.0978 (0.0718)	0.1183*** (0.042)
总效应	0.3684*** (0.0704)	0.4790*** (0.0521)
<i>N</i>	310	310
调整 $R^2$	0.2069	0.4839

注:(1)括号中为回归标准误;(2)\*\*\*、\*\*、\*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 3.4 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如表 8 所示。在其中的第(1)列证实数字经济对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影响的基础上,第(2)列验证数字经济是否影响产业结构(IS)。在这两列数据中,数字经济水平(Dige)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并且在 1% 的显著水平下具有显著影响。本研究在回归方程中添加了产业结构调整作为中介变量,以探讨数字经济对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相比第(1)列,第(3)列中的数字经济水平(Dige)对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系数有所下降,但仍然显著。这些结果表明,产业结构调整在数字经济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中起到了

部分中介作用,支持了假设 3。

表 8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Hqd (1)	IS (2)	Hqd (3)
Dige	0.3688*** (0.0300)	0.1864*** (0.0687)	0.3439*** (0.0305)
IS			0.0550** (0.024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间接效应	0.1642** (0.0780)	-0.6026** (0.2443)	0.1979** (0.0832)
N	310	310	310
调整 R <sup>2</sup>	0.6077	0.0086	0.4928

注:(1)括号中为回归标准误;(2)\*\*\*、\*\*、\*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 3.5 异质性分析

进一步考虑地区差异,探讨其对数字经济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带来的异质性影响。为此,参考李光亮<sup>[30]</sup>的研究,以全国 2012 - 2021 年人均 GDP 的均值作为标准,根据人均 GDP 的水平,将各省划分为两组,一组是发达地区,即人均 GDP 高于标准值的地区;另一组是欠发达地区,即人均 GDP 低于标准值的地区。对这两类地区,分别进行分组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9 所示。

表 9 分组回归结果

变量	经济发达地区 (1)	经济欠发达地区 (2)
Dige	0.0922* (0.047)	0.6202*** (0.0449)
W * Dige	-0.2413 (0.1500)	0.8029*** (0.1540)
$\rho$	-0.9344*** (0.1257)	-0.4196*** (0.1608)
控制变量	YES	YES
直接效应	0.1775*** (0.0564)	0.5973*** (0.0453)
间接效应	-0.2521** (0.1046)	0.4201*** (0.1074)

总效应	-0.0746 (0.0934)	1.0173*** (0.1103)
N	110	200
调整 R <sup>2</sup>	0.1901	0.4194

注:(1)括号中为回归标准误;(2)\*\*\*、\*\*、\*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由表 9 可知,在经济发达地区,数字经济水平(Dige)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 10% 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在 1% 水平上)。进一步对比第(1)列与第(2)列回归系数,数字经济水平(Dige)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0922、0.6202,这意味着数字经济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对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更大。可能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经济欠发达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程度相对较低,数字技术的应用和发挥空间也比较大,对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更大;第二,经济欠发达地区为了加快经济发展,更倾向于加大数字经济的支持力度,这有利于数字经济在建筑业中的应用和发展,进而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 4 结论

通过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本研究构建了空间计量模型,并就数字经济对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明显促进了建筑业的高质量发展,这种促进效应存在着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结论在更换指标体系与更换权重矩阵后依然稳健。进一步探索了产业结构调整中介作用与地区差异的异质性影响,揭示了数字经济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基于上述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建筑企业可以在数字化转型中把握机遇,加强数字技术应用和创新能力建设,不断推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尤其在欠发达地区,数字经济能更好地促进建筑业的高质量发展,应加强数字技术的应用,例如可以在建筑设计、施工管理、智能监测等方面提高数字化水平,进而提高建筑品质和质量。

第二,数字经济对建筑业的高质量发展起到了积极的空间溢出作用。这意味着数字经济在促进本地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还会带动周边地区建筑业的高质量发展。所以数字经济水平高的地区应该加强周边地区数字经济及建筑业的扶持,带动周

边地区的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另外数字经济与建筑业的深度融合需要具备相关技术和专业知识的人才,因此应该加强人才培养和交流,吸引其他地区的人才,以提高数字经济和建筑业的空間效应,进一步实现建筑业整体的高质量发展。

第三,数字经济主要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来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应该鼓励建筑企业进行数字化改造,加强数字技术与建筑业的深度融合,推动数字技术在建筑业中的应用普及,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建筑业向绿色化、可持续化方向发展。

## 参考文献:

- [1] 孙继德,郑冕,傅家雯. 新时代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政策建议[J]. 建筑经济,2019,40(5):5-9.
- [2] 项勇,郑茂,代天卉. 我国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动力因素及影响机理研究[J]. 建筑经济,2019,40(12):15-20.
- [3] 高华建,李小冬,高晓江. 建筑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 工程管理学报,2021,35(1):1-6.
- [4] WANG Y, WU X. Research 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valuation, space-time 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factors of China's construction industry under carbon emission constraints[J]. Sustainability, 2022, 14(17):10729.
- [5] 傅为忠,黄帅. 基于熵值法和聚类分析法的建筑业高质量发展评价研究——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J]. 工程管理学报,2021,35(1):7-12.
- [6] 孙洁,龚晓南,张宏,等. 数字化驱动的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战略路径研究[J]. 中国工程科学,2021,23(4):56-63.
- [7] JEMAL K M, KABZHASSAROVA M, SHAIMKHANOV R, et al. Facilitating circular economy strategies using digital construction tools: Framework development[J]. Sustainability, 2023, 15(1):877.
- [8] XUE X, TAN X, HUANG Q, et al. Exploring the innovation path of the digital construction industry using mixed methods [J]. Buildings, 2022, 12(11):1840.
- [9] 卢嘉润,李永飞,耶佳罕. 建筑业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性研究[J]. 工程管理学报,2022,36(2):6-11.
- [10] 张爱国,刘荣桂,马颖莉. 数字经济与建筑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性——基于31个省级行政区样本实证分析[J]. 科技和产业,2023,23(2):60-67.
- [11] 杜小武,尚旭珊,董仲慧. 基于创新驱动的中国建筑业高质量发展评价[J]. 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1(6):39-47.
- [12] XUE X L, TAN X Y, HUANG Q Y, et al. Exploring the innovation path of the digital construction industry using mixed methods[J]. Buildings, 2022, 12(11):1840.
- [13] 韩长根,张力. 互联网是否改善了中国的资源错配——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与门槛模型的检验[J]. 经济问题探索,2019(12):43-55.
- [14] 荆文君,孙宝文. 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一个理论分析框架[J]. 经济学家,2019(2):66-73.
- [15] 钟文,郑明贵,钟昌标. 数字经济、空间溢出与区域发展差距:理论与实证[J]. 阅江学刊,2022,14(6):159-66,72.
- [16] 刘明,范丹雪,施子杨. 空间溢出视角下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J]. 统计与决策,2023,39(13):22-7.
- [17] HONG M Y, TIAN M J, WANG J.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green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its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J].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2023:.
- [18] 许春,林美淳. 我国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模型[J]. 河南科学, 2023,41(4):586-95.
- [19] 李豫新,李枝轩,欧国刚. 数字经济背景下平台经济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J]. 调研世界,2023(9):3-14.
- [20] 赵克飞,傅泽昕,林丽洁. 基于DPSIR模型的中国东部省份绿色建筑发展水平研究[J]. 建筑经济,2024,45(5):93-9.
- [21] 徐晔,赵金凤. 中国创新要素配置与经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测度[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1,38(10):46-64.
- [22] 王彦杰,高启杰,杨瑞.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障碍因子诊断研究[J]. 现代管理科学,2022(3):135-44.
- [23] 万晓榆,罗焱卿.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J]. 改革,2022(1):101-18.
- [24] 赵爽,刘文亮. 河北省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研究[J]. 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2(6):21-8.
- [25] 陈海龙,李阳. 数字经济发展对创业活跃度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J]. 统计与信息论坛,2023,38(5):41-52.
- [26] 邵帅,张可,豆建民. 经济集聚的节能减排效应:理论与中国经验[J]. 管理世界,2019,35(1):36-60,226.
- [27] 赵涛,张智,梁上坤. 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2020,36(10):65-76.
- [28] 吕明元,张旭东,苗效东.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分布动态、区域差异及收敛性研究[J]. 技术经济,2021,40(11):46-61.
- [29] ELHORST J P. Matlab software for spatial panels[J].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2014, 37(3):389-405.
- [30] 李光亮,谭春兰,石珊珊. 公众参与的减污降碳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J]. 调研世界,2023(1):22-32.

#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与企业创新成效的分析

## ——兼议管理层持股的治理效应

安玉侠\*, 王利君

(蚌埠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

**摘要:**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0-2020年数据,分析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创新成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加计扣除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显著促进企业致力于发明专利而非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的产出;加计扣除优惠力度的大幅提高并未达到政策预期的效果;比较而言,加计扣除优惠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要优于企业所得税税率优惠,但对研发绩效的促进作用并不一定优于前者;管理层持股对加计扣除与研发投入的关系具有正向作用,对加计扣除与发明专利产出的关系虽然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在企业享受了加计扣除的情况下,管理层持股本身能显著提高发明专利的产出。因此,创造条件使加计扣除政策落实、落地,扩大政策受益面,充分释放加计扣除政策的普惠性功能而非进一步提高优惠力度是当务之急。推动更多企业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提高管理者的持股水平,将有利于政策效应的发挥。

**关键词:**加计扣除;研发投入;高质量研发绩效;管理层持股

中图分类号:F3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24)06-0047-11

## Deduction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xpense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Discussing the Governance Effect of Management's Shareholding

AN Yu-xia\*, WANG Li-ju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ngbu University, Bengbu, 233303, Anhui)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Shanghai and Shenzhen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0 to 2020, it studied the impact of the policy on the super deduction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expenses on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 in this paper.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uper deduction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R&D investment of enterprises, and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output of enterprises to focus on invention patents instead of utility model patents and design patents; Expected effect,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super deduction preference on corporate R&D investment is better than that of corporate income tax rate preference, but the promotion effect on R&D performance is not necessarily better than i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duction and R&D investment has a positive governance effect. Although it has a certain negative impa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per deduction and the output of invention patents, when the enterprise enjoys the super deduction, the management's shareholding itself can significantly further increase the output of invention patents. Therefore, it is imperative to create condition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super-deduction policy, expand the benefits of the policy, and fully release the inclusive function of the super-deduction policy, rather than further enhancing the preferential treatment. Promoting more companies to implement equity incentive plans and increasing managers' shareholding levels will be conducive to the exertion of policy effects.

收稿日期:2024-06-14 \* 通讯联系人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科研重点项目(SK2020A0546;SK2020A0547)。

作者简介:安玉侠(1980-),女,安徽蚌埠人,讲师。E-mail:commonan@163.com

**Key words:** super deduction; R&D investment; high-quality R&D results; management shareholding

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在国家发展全局中居于核心地位。企业研发投入的增长得益于国家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的各项政策支持,其中优惠力度大、普惠性强、旨在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以下简称“加计扣除”)政策,近年来格外受到重视。“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要实施更大力度的加计扣除等普惠性政策,增强企业的创新动力。在加计扣除政策门槛不断降低、优惠力度不断加大的情况下,2020年的中国创新指数显示,享受政策的企业所占比重相比上年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说明加计扣除政策激发了更多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积极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各项创新投入指数比上年均有增长的情况下,标志着高质量创新产出成果的发明专利授权数占专利授权数的比重却比上年大幅下降了13.8%,因此要思考,在加计扣除政策力度不断加大的情况下,政策效应是否真正符合政策制定的初衷?政策激励效应的实现通常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与回答,将为我国政府精准施策,合理配置税收优惠资源,实现国家创新发展战略提供理论支撑和参考。

## 1 文献回顾

加计扣除对研发投入或(和)研发绩效直接效应研究。现有研究大多认为加计扣除对企业研发费用支出规模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sup>[1-2]</sup>,提高了企业的研发费用强度<sup>[2-5]</sup>,多认为它能促进企业研发人员的增加<sup>[6-9]</sup>。但个别研究认为虽然加计扣除能够促进反映企业潜在投入能力的研发费用强度的提高,但并不能促进反映当下投入水平的研发费用规模的提高<sup>[10]</sup>,并且加计扣除比例大幅提高后,虽然能够显著提高研发费用强度,但投入增长率会放缓<sup>[11-12]</sup>。加计扣除对研发绩效的影响比较复杂。在不区别专利类型时,大多研究认为加计扣除能够显著促进专利申请量或专利授权量的增加<sup>[13-14]</sup>,但对能否提高专利产出强度持不同看法,包括可以提高<sup>[5]</sup>和不存在显著影响两种意见<sup>[2,15]</sup>。在区别了专利类型后,加计扣除对于发明专利产出的影响则出现了正向影响<sup>[16]</sup>、负向影响<sup>[8]</sup>和没有显著影响<sup>[14]</sup>三种意见。而以“新产品销售收入”为创新绩效衡量指标的研究中,均认为加计扣除可以显著促进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的提高<sup>[2,8]</sup>。

政策效应的影响因素研究。部分研究也关注并

验证了企业税负<sup>[1]</sup>、国家审计<sup>[12]</sup>、地区发展<sup>[1,13]</sup>、企业类型<sup>[13]</sup>、企业规模<sup>[13,16]</sup>、政府干预<sup>[16]</sup>和产权性质<sup>[17-18]</sup>等异质性因素对加计扣除政策效应的影响。尤其是考虑到研发费用的列支可能存在较大的可操纵空间,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关注费用操纵行为对政策效应的影响,认为出于创新迎合<sup>[19]</sup>或避税的动机,企业可能会利用研发费用的会计操纵<sup>[12,15,18]</sup>,进行策略性<sup>[12]</sup>或虚假性创新投入<sup>[18]</sup>,抑制了政策的激励效果,显著降低了企业创新效率和创新产出水平<sup>[12,16]</sup>。

与其他财政支持政策效应的比较研究。此类研究主要是对加计扣除、税率优惠、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税收优惠政策效应以及政府补助政策效应的优劣进行不同的组合式比较研究。在对研发投入的激励效果方面,多数研究认为加计扣除的效果更好<sup>[3,4,7]</sup>,也有研究认为税率优惠的效果更佳<sup>[9]</sup>;在研发产出的激励效果方面,只考虑税收政策,同样有研究认为加计扣除的效果更好<sup>[16]</sup>,或者税率优惠的效果更好<sup>[17]</sup>;加入政府补助进行比较后,则认为研发补贴的效果更佳<sup>[19]</sup>。一些研究讨论了政策间的替代或互补效应。多数研究认为不同税收政策的激励存在替代效应<sup>[4,7,9]</sup>,若同时还享受研发补助,不同政策间同样存在替代效应。当然也有研究认为税收优惠政策间存在互补效应<sup>[16]</sup>。

从上述研究结果来看,理论界对我国加计扣除政策效应的认识尚未达成一致。由于获取加计扣除额或者获取企业是否享受加计扣除政策等关键数据存在一定的难度,因此在具体研究中,可能存在样本选择缺乏科学性、关键变量计量存在偏差和研究方法存在局限性等问题,导致研究结论与现实不符。基于此,本文采用新的研究样本和关键变量计量方法,尽力克服样本选择偏差和关键变量计量偏差,从多种角度对加计扣除的政策效应作进一步检验,以期对加计扣除政策效应研究提供更多的经验证据。另一方面,目前尚缺乏管理层持股对税收优惠激励企业创新效果方面的研究。

## 2 政策沿革、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企业管理者作为企业创新战略的决策者,是否有意愿将税收优惠资源配置于高风险的创新活动,并努力推动高质量创新成果的产出,直接决定了税收优惠资源的使用效率,因此有必要对此加以关注,同时对此影响进行检验。



## 2.1 我国加计扣除政策的沿革

首先,政策起步探索阶段(1996 - 2007)。1996 年,我国开始在盈利的、研发费用年增长幅度 10% 以上的国有、集体工业企业中,实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50% 的优惠政策,拉开了政策探索的大幕。这个时期虽然享受主体范围逐渐扩大,但可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范围和优惠力度都较小。其次,初步形成政策体系阶段(2008 - 2014)。2008 年开始实施的《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首次明确了加计扣除政策的法律地位。此时享受主体范围与优惠力度进一步扩大,政策初步系统化、体系化,对激励我国企业创新的意义进一步凸显,但也暴露出研发领域受限、研发费用归集难、研发项目认定管理不完善、企业受益面小、区域落实不平衡等问题<sup>[20]</sup>,政策效果远未达到预期。最后,政策体系逐步完善阶段(2015 年至今)。2015 年财税 119 号文件出台,是享受主体范围的一次较大扩容。2017 年以来,相关政策出台更为密集,政策门槛进一步降低,优惠力度不断加大,操作规程更为明确与细化,涉税风险明显降低,因此,享受政策的企业增长迅速。

## 2.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利用税收优惠政策激励企业创新,有着深厚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及发展经济学都强调研发活动对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性<sup>[10]</sup>。开展研发活动的企业需要长期承受大量资源消耗,并承担研发活动很可能失败的风险,尤其对于虽有内在创新需求,但盈利能力不强,现金紧张融资又比较困难的企业而言,往往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企业创新成果具有公共物品性质,易引起其他企业的模仿或抄袭,创新成功却又无法独享创新收益,必然挫伤创新企业的积极性。显然,仅依靠市场力量就能引导企业的科技创新水平达到社会期望的水平是不现实的<sup>[21-22]</sup>,这正是创新活动市场失灵的表现。凯恩斯经济学认为,政府此时应当利用“有形之手”对市场进行适当干预,以弥补市场失灵和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sup>[23]</sup>。政府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实质上是对这种市场失灵现象的纠正,扮演着企业创新“合伙人”的角色<sup>[1]</sup>。国家通过税收优惠让渡一部分经济利益于创新企业,直接减少了企业各期现金流出,使企业等同于获得了国家持续不断的研发资金投入,既降低了研发成本,也一定程度上分担了企业创新失败的风险,增强了风险承担能力<sup>[24]</sup>,缓解了创新成果的溢出效应,弥补了企业对创新回报不足的担忧,能够有力激发企业开展研发活动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税收优惠也可以缓解企业创新活动的融资约束,尤其是对于技术和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或中小企业,因缺少可充作贷款抵押品的资产,难以获得风险投资和金融机构的融资支持。根据信号理论,作为政府行为,因积极研发才能够获得税收优惠的事实可以向资金提供者传递出积极的信号,缓解资金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增加资金拥有方对企业创新的信心,缓解外部融资的障碍<sup>[25]</sup>,增强企业进行创新的意愿与实力。因增加研发投入而产生的新技术、新工艺和新产品,将使企业能够更好地提高市场占有率,获取更多的利润,反过来,又会有效刺激企业进一步加大创新投入,从而产出更多的创新成果<sup>[13]</sup>。加计扣除政策作为一种普惠性的税收优惠政策,只要企业从事合格研发活动,其合格研发费用均可以按照一定比例在所得税前扣除,研发费用越多,受益程度越高。这也是我国为何不断扩大加计扣除政策享受主体范围和提高优惠力度的原因。综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能够有效促使企业增加研发投入。

假设 2: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能够有效促进企业研发成果的产出。

财税[2015]119 号文件以负面清单的方式,将加计扣除政策的享受主体扩大到除烟草制造、住宿和餐饮、批发和零售、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娱乐等六大行业以外的所有行业,合格研发活动和合格研发费用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大;财税[2017]34 号文件和财税[2018]99 号文件分别阶段性地将科技型中小企业和所有企业的加计扣除比例分别提高到 75% 和 175%。上述规定大幅提高了加计扣除政策的优惠力度,将能够进一步激发企业的创新动力,为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3: 加计扣除优惠力度的提高,将能够显著促进研发投入的进一步提高。

假设 4: 加计扣除优惠力度的提高,将能够显著促进研发成果产出的进一步提高。

加计扣除政策的监管制度和监管主体表明,它还是比较适应我国当前体制环境的税收优惠政策<sup>[9]</sup>。由于该政策监管力度比较大,企业只有在进行了研发投入后才能享受政策,而为享受政策弄虚作假的难度和成本又都比较大,因此加计扣除政策研发投入的挤入效应相对比较突出<sup>[9]</sup>。另一方面,企业欲享受 15% 的低企业所得税率,须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资格。为满足认定条件,有些企业存在虚报、操纵甚至非必要增加研发投入的动机。无论属于哪种

情况,这些企业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获得税收优惠后,开展创新的积极性势必大打折扣。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5: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积极影响要显著大于税率优惠政策。

假设6: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研发成果产出的积极影响要显著大于税率优惠政策。

### 3 研究设计

#### 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考虑到2008年实施《企业所得税法》后,加计扣除政策享受主体是开展《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规定项目研发活动的企业,而自2016年起政策变更为只要不在负面清单内的行业企业或研发活动均可享受政策,且加计扣除涉及的研发费用的会计核算与管理要求一直比较规范、严格,故本文选择

$$R\&D_{i,t} = \alpha_0 + \alpha_1 Ded_{i,t} + \sum Controls_{i,t} + \lambda_t + u_i + \varepsilon_{i,t} \quad (1)$$

$$Pat\_a (Pat\_b, Pat\_c)_{i,t} = \alpha_0 + \alpha_1 Ded_{i,t} - 1 + \sum Controls_{i,t} - 1 + \lambda_{t-1} + u_i + \varepsilon_{i,t-1} \quad (2)$$

其中,被解释变量R&D为企业的研发投入;被解释变量Pat\_a为企业发明专利持有量,衡量企业较高质量的创新绩效,Pat\_b和Pat\_c分别为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持有量,衡量企业较低质量的创新绩效。Ded为加计扣除优惠额,按“计入当期费用的研发费用\*50%+研发费用形成无形资产的当期摊销额\*150%”进行测算。2018年起,50%和150%分别变更为75%和175%,根据税法规定的摊销期下限,摊销期按10年计。Controls为一组控制变量。一般而言,企业的创新决策应该与企业内在的研发需求、研发意愿、研发能力与研发环境等因素有关。借鉴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以管理层持股

A股上市公司中规范披露了“开发支出”的企业为研究对象,其中2016年以前的研究对象限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创新型企业、火炬计划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骨干企业、软件企业等获得了与技术相关的资质认证的企业,2016年以后的研究对象限定为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企业,以保证样本企业为真正享受加计扣除政策的企业。除专利数据来自于IFIND数据库外,其他数据来自于CSMAR数据库。样本期间为2010-2020年。其中剔除金融类公司、已退市公司、ST公司。为消除异常值影响,对连续变量的1%和99%分位数进行了缩尾处理。

#### 3.2 模型建立

为了考察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绩效的影响,根据豪斯曼检验等检验结果,采用个体、时间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分别建立如下模型:

衡量企业的研发意愿,以市场竞争、企业年龄、企业成长性和资本密集度衡量企业的研发需求,以毛利率、现金流、企业规模和资产负债率衡量企业的研发能力,以市场化程度、政府补助和企业性质衡量企业的研发环境。 $\lambda$ 为时间效应, $u$ 为个体效应。具体变量说明详见表1(注:市场化指数来自樊纲、王小鲁等编制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其中2017-2020年指数系根据之前年度平均增长率推算形成)。考虑到研发绩效的实现相对于税收优惠、研发投入等存在一定滞后性,故本文在模型(2)中对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分别进行滞后一期处理。

表1 变量定义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	研发投入	R&D	研发支出的自然对数
	发明专利	Pat_a	(下一年 Pat_a 累计持有量 + 1) 的自然对数
	实用新型专利	Pat_b	(下一年 Pat_b 累计持有量 + 1) 的自然对数
	外观设计专利	Pat_c	(下一年 Pat_c 累计持有量 + 1) 的自然对数
解释变量	加计扣除额	Ded_	加计扣除额的自然对数
控制变量	管理层持股	Os	管理层持股数量/总股本
	毛利率	Mlg	毛利/营业收入
	资本密集度	Capi	固定资产/总资产
	资产负债率	Lev	负债/总资产
	企业规模	Size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续表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说明
	现金流	Cash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营业收入
	市场竞争	Hhi	行业内样本企业市场份额的平方和
	企业年龄	Age	自企业成立日起算
	市场化程度	Mar	市场化指数
	企业成长性	Grow	营业收入年增长率
	政府补助	Gov	政府补助/营业收入
	企业性质	Prop	国企为 1,非国企为 0

## 4 实证分析

###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样本企业年平均享受加计扣除优惠的自然对数为 15.5(约 540 万元),且变异程度较大;从加计扣除优惠最大值 21.53(约 22 亿元)和最小值近乎为 0 来看,企业间享受加计扣除优惠政策的差距巨大。研发投入的自然对数平均为 18.44,说明样本企业研发投入规模平均在 1 亿元左右,但变异程度较大;中位数为 18.34,说明有一半左右企业的研发投入规模约为

9200 万元左右;另外从研发投入最大值 23.81(约 219 亿元)和最小值 15.61(约 8.8 万元)来看,上市公司研发投入规模差距巨大。研发绩效方面,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拥有量的自然对数分别平均为 4.56(约 95 件)、3.135(约 22 件)和 1.727(约 5 件),说明样本企业创新产出中,以发明专利为主,创新质量较高;但从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拥有量的最大值 11.04(约 62317 件)、8.98(约 7942 件)、8.13(约 3395 件)和最小值 0 来看,上市公司创新产出差距巨大。

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N	Mean	SD	Median	Min	Max
R&D	3846	18.440	1.346	18.340	11.380	23.810
Pat_a	3846	4.560	1.582	4.600	0.000	11.040
Pat_b	3846	3.135	2.179	3.400	0.000	8.980
Pat_c	3846	1.727	1.812	1.390	0.000	8.130
Ded_	3846	15.500	1.681	15.530	0.830	21.530
Os	3846	0.088	0.146	0.008	0.000	0.791
Mlg	3846	0.357	0.186	0.324	-0.257	0.973
Capi	3846	0.176	0.125	0.149	0.000	0.758
Lev	3846	0.370	0.180	0.362	0.015	0.990
Size	3846	22.200	1.215	22.040	19.240	27.900
Cash	3846	0.050	0.061	0.048	-0.219	0.375
Hhi	3846	0.082	0.114	0.046	0.014	1.000
Age	3846	2.824	0.369	2.878	1.277	4.805
Mar	3846	8.600	1.810	9.120	-1.420	12.000
Grow	3846	0.395	7.135	0.159	-0.862	429.000
Gov	3846	16.810	1.870	16.860	0.000	22.270
Prop	3846	0.318	0.466	0.000	0.000	1.000

## 4.2 主要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表3 各变量的 Pearson 相关系数分析显示,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均与被解释变量存在不同显著水平

的相关性,且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彼此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

表3 主要变量的 Pearson 相关性分析

变量	R&D	Pat_a	Pat_b	Pat_c	Ded_	Os	Mlg	Capi
R&D	1							
Pat_a	0.61***	1						
Pat_b	0.45***	0.45***	1					
Pat_c	0.42***	0.40***	0.65***	1				
Ded	0.88***	0.56***	0.38***	0.36***	1			
Oss	-0.15***	-0.09***	-0.23***	-0.13***	-0.13***	1		
Mlg	-0.08***	-0.19***	-0.36***	-0.10***	-0.06***	0.24***	1	
Capi	-0.07***	-0.02	0.07***	-0.10***	-0.08***	-0.13***	-0.16***	1
Lev	0.39***	0.36***	0.37***	0.21***	0.31***	-0.24***	-0.48***	0.19***
Size	0.76***	0.52***	0.52***	0.40***	0.62***	-0.29***	-0.26***	0.11***
Cash	0.12***	0.02	-0.01	0.06***	0.12***	0.01	0.26***	0.19***
Hhi	-0.01	-0.01	0.08***	0.03***	-0.02	-0.06***	-0.16***	0.05***
Age	0.22***	0.16***	0.18***	0.18***	0.24***	-0.25***	-0.06***	0.06***
Mar	0.22***	0.16***	0.07***	0.09***	0.25***	0.07***	0.01	-0.16***
Grow	0.02	-0.03*	-0.02	-0.04**	-0.01	0.08***	0.02	-0.05***
Gov	0.68***	0.52***	0.41***	0.38***	0.61***	-0.18***	-0.09***	0.01
	Lev	Size	Cash	Hhi	Age	mar	Grow	Gov
Lev	1							
Size	0.54***	1						
Cash	-0.13***	0.06***	1					
Hhi	0.06***	0.12***	0.03*	1				
Age	0.21***	0.28***	0.07***	0.01	1			
mar	0.04**	0.13***	0.07***	-0.01	0.11***	1		
Grow	0.06***	0.01	-0.02	-0.01	-0.08***	-0.03	1	
Gov	0.35***	0.66***	0.10***	0.06***	0.20***	0.13***	-0.03**	1

注: \*、\*\*、\*\*\* 分别代表在 10%、5% 和 1% 水平上显著,下同。

## 4.3 回归分析

本文采用聚类稳健标准误进行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第1列加计扣除变量的系数为0.22,并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加计扣除与企业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支持了本文的假设1。第2列加计扣除变量的系数为0.043,并在1%水平上显著,而第3、第4列加计扣除变量的系数均不显著,说明上年享受了加计扣除优惠后,不会显著增加代表低质量创新绩效的实用新型专利和外

观设计专利的持有量,但能显著增加代表高质量创新绩效的发明专利持有量,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结果,支持了本文以发明专利来衡量研发成果的假设2。第1列其它控制变量中,企业毛利率水平越高,企业规模越大,享受的政府补助越多,企业的研发投入也越多,说明企业的研发投入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自身实力和外部的支持力度,侧面证明政府“真金白银”的支持对企业创新的重要性。第2列中,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发明专利持有量显著正相关,但

第 3、第 4 列中的管理层持股比例系数均不显著,意味着随着管理者持有企业股份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能意识到其个人利益与企业的未来发展深刻关联,于是更愿意承担创新失败的风险,会尽力支持开发能真正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技术,而不是将开发重点放在较低质量的创新方面。

表 4 加计扣除与研发投入、研发绩效的回归结果

变量	R&D	Pat_a	Pat_b	Pat_c
Ded	0.220*** (10.41)	0.043*** (2.75)	0.016 (0.75)	0.027 (1.39)
Os	0.186 (1.31)	0.326** (2.06)	-0.316 (-1.14)	0.353 (1.52)
Mlg	0.738*** (4.18)	-0.250 (-1.11)	0.237 (0.73)	-0.208 (-0.78)
Capi	0.224 (1.19)	0.174 (0.75)	-0.477 (-1.46)	-0.775*** (-2.60)
Lev	0.083 (0.69)	0.129 (0.91)	0.155 (0.68)	0.283 (1.34)
Size	0.588*** (12.78)	0.264*** (4.61)	0.347*** (4.97)	0.346*** (4.58)
Cash	0.196 (1.24)	-0.186 (-0.93)	0.483 (1.52)	-0.213 (-0.85)

Hhi	-0.023 (-0.16)	0.149 (0.54)	0.053 (0.15)	0.435* (1.78)
Age	-0.346 (-1.53)	-0.002 (-0.01)	0.001 (0.00)	0.220 (0.55)
Mar	-0.026 (-0.81)	0.000 (0.01)	0.065 (1.05)	0.109* (1.88)
Grow	-0.018 (-0.82)	-0.110*** (-3.33)	-0.065 (-1.53)	-0.095** (-2.38)
Gov	0.027*** (2.94)	0.009 (0.74)	0.033* (1.72)	0.006 (0.36)
Prop	-0.002 (-0.04)	0.076 (0.67)	-0.034 (-0.29)	-0.193 (-1.21)
常数项	1.824* (1.80)	-3.198** (-2.48)	-7.130*** (-3.85)	-8.371*** (-4.62)
个体	yes	yes	yes	yes
年度	yes	yes	yes	yes
F	143.23	63.5	48.58	23.09
Prob>F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N	3846	3846	3846	3846
Adj_R2	0.774	0.592	0.506	0.370

注:括号中为 t 值。

表 5 加计扣除优惠力度提高前后组间主要变量均值差异的 t 检验

变量	before Mean	after Mean	Difference Means	Difference t-statistic	Difference p-value
R&D	17.929	18.730	0.801	19.232	0.0000
Pat_a	4.004	4.844	0.840	16.724	0.0000
Pat_b	2.584	3.417	0.833	11.655	0.0000
Pat_c	1.367	1.894	0.527	8.891	0.0000
Ded	14.778	15.913	1.135	22.519	0.0000
N	1359	2587			

财税[2015]119号文件于2016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此后加计扣除优惠力度逐步提高。本文将数据分为2016年以前和2016年(含)以后两组样本,对加计扣除优惠力度提高后的激励效应进行检验。表5表明,2016年以后,加计扣除的均值显著高于2016年以前的水平,表明提高优惠力度的政策实施后,企业确实享受了更多的税收优惠。同时2016年以后的研发投入均值和三种专利持有量的均值也均高于2016年以前的水平。

然而,无论采用 Chow Test 还是 Fisher's Permutation Test 进行检验,表6的回归结果均显示,除了采用 Fisher's Permutation Test 时加计扣除对外观设计专利持有量的影响在2016年后显著降低以外,加计扣除对研发投入和研发绩效的影响均与优惠力度提高前没有显著差别。这意味着在享受了更多的税收优惠后,相应的研发投入均值和研发绩效均值虽然也有所增加,但增加幅度并没有达到政策预期的效果,假设3与假设4均没有得到验证,说明加计扣

除的优惠力度并非越大越好。发生在印度的政策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2010年,印度政府开始给予企业 200%、175% 和 125% 三档加计扣除优惠,被认

为是世界上最慷慨的税收优惠,最终均未能达到政策预期,7年以后,印度大幅下调了优惠幅度。

表6 政策力度提高前后加计扣除额与研发投入、研发绩效的回归结果

变量	R&D		Pat_a		Pat_b		Pat_c	
	before	after	before	after	before	after	before	after
Ded	0.224*** (6.02)	0.163*** (7.59)	0.049* (1.67)	0.041*** (3.47)	0.022 (0.69)	0.016 (0.80)	0.090** (2.41)	0.007 (0.4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个体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度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F	55.02	94.23	24.49	44.47	20.82	28.8	9.92	13.44
Prob > F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N	1331	2515	1331	2515	1331	2515	1331	2515
Adj_R2	0.678	0.674	0.459	0.403	0.432	0.333	0.292	0.203
经验 p 值 1	0.157		0.340		0.455		0.385	
经验 p 值 2	0.111		0.260		0.442		0.031**	

注:经验 p 值 1、2 用于检验组间 Ded 系数差异的显著性,系分别采用 Chow Test 和 Fisher's Permutation Test 进行检验。

表 7 反映的是享受税率优惠后的企业税收优惠额 Tax(即所得税优惠税率 \* 利润总额)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表 7 税率优惠与研发投入、研发绩效的回归结果

变量	R&D	Pat_a	Pat_b	Pat_c
Tax	0.054*** (4.58)	0.016 (1.07)	-0.010 (-0.54)	-0.003 (-0.17)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个体	yes	yes	yes	yes
年度	yes	yes	yes	yes
F	110.22	63.15	48.64	23.23
Prob > F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N	3846	3846	3846	3846
Adj_R2	0.717	0.590	0.506	0.369

相比表 5 加计扣除额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可以发现,对于研发投入的影响,Tax 的系数为 0.054, Ded 的系数为 0.22,均在 1% 水平上显著,两者的置信区间分别为(0.031,0.077)和(0.178,0.261),说明加计扣除政策对增加企业研发投入的效果要远优于税率优惠政策,假设 5 得到证实。对于发明专利产出的影响,Tax 的系数为 0.016,但并不显著,Ded

的系数为 0.43,在 1% 水平上显著,两者的置信区间分别为(-0.013,0.044)和(0.012,0.073),说明虽然加计扣除政策能有效促进发明专利的产出,但税率优惠政策的效果不确定,不过,由于两种政策效果的置信区间存在交叉,因此并不能认定加计扣除政策对发明专利产出的激励效果一定优于税率优惠政策。至于对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产出的影响,由于两种政策的效果系数均不显著,且置信区间存在交叉,因此两种政策的激励效果不存在显著差异。假设 6 没有得到证实。

#### 4.4 对结果进一步讨论:管理层持股对税收优惠效应的调节作用

由于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引发了企业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股东的目标是企业利益最大化,创新投资有助于股东目标的实现。管理者的目标则是个人财富增长、职业稳定、职位晋升、声名远播。由于创新活动需要长期投入大量资源,在一定的资源约束状态下,势必挤占其他项目的投资,而且创新投资具有回报周期长、失败风险高的特点,一旦创新失败,在创新投资决策中起关键主导作用的管理者可能要承担决策失败的风险,损害个人声誉,为职业生涯发展投下阴影。这与管理者通常更倾向于追求短期效益和规避风险的心理存在一定冲突。实施股权激励政策使管理者持有企业股份,令

其与企业的长远发展进行利益捆绑,愿意去承担创新失败的风险,被认为是一个能协调股东与管理者利益的有效工具。研究表明,基于股权的激励确实能够促使管理者增加创新投入<sup>[26]</sup>,管理者股权的下降会显著降低企业的创新投入<sup>[27]</sup>。也有研究认为,管理层持股比例较低时具有利益趋同效应,随着持股比例增加,则产生防御效应,与企业技术创新呈显著的倒 U 型关系<sup>[28]</sup>。平均来看,由于我国企业管理层持股比例相对还不是太高,可能尚未达到触发防御效应的门槛。理论上,当管理层主要是出于避税动机而非创新动机获得税收优惠后,在没有持有股份的情况下,可能会从私人利益出发,改变这部分资源的用途,导致税收激励政策的失效。管理层持有股份后,与股东利益趋于一致,将有动力将税收优惠资源充分配置到创新活动中,并大力推动高质量创新成果的产出,从而有助于税收优惠效应的进一步提升。实际情况是否如此呢?

表 8 第 1 列显示,在加入了加计扣除额和管理层持股的交互项之后,交互项的系数为正,并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管理层持股比例显著正向调节加计扣除额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上述有关管理层持股对税收优惠与研发投入之间关系影响的分析得到证实,第 2 列中,交互项系数在 10% 水平上显著,虽然为负,但相比表 5 第 2 列未加入交互项的情形,加计扣除变量的系数有所提高,管理层持股变量的系数则由 0.326 提高到 2.738,说明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越有助于企业发明专利的产出,同样的影响也反映在第 4 列对外观设计专利的影响中,对实用新型专利的影响则不显著。

#### 4.5 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以上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使用“加计扣除额/营业收入”来替换解释变量,使用“研发支出/营业收入”来替换被解释变量之一的研发投入,代入模型中重新进行回归,以消除规模差异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受篇幅所限,只列出解释变量和调节变量的回归结果,其中样本量均与上述回归结果一致。从表 9 - 表 12 的回归结果来看,

除了表 11 加计扣除优惠力度提高后,提高后组的研发投入显著小于提高前组外(这反而更进一步证明政策优惠力度并非越大越好的结论),其他变化对研究结论没有影响。除此以外,也使用营业利润率、总现金流等替换原模型中的毛利率、经营现金流等变量,回归结果同样不影响研究结论。因此本文的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表 8 管理层持股的调节作用

变量	R&d	Pat_a	Pat_b	Pat_c
Ded	0.207*** (9.18)	0.056*** (3.29)	0.019 (0.84)	0.046** (2.15)
Os	-2.066 (-1.62)	2.738** (2.18)	0.241 (0.15)	3.769*** (2.90)
Os_Ded	0.156* (1.79)	-0.167* (-1.96)	-0.039 (-0.34)	-0.237** (-2.5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个体	yes	yes	yes	yes
年度	yes	yes	yes	yes
F	139.41	61.57	46.48	22.78
Prob > F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N	3846	3846	3846	3846
Adj_R2	0.775	0.593	0.506	0.372

表 9 加计扣除强度与研发投入强度、研发绩效的回归结果

变量	R&D	Pat_a	Pat_b	Pat_c
Ded	3.390*** (11.15)	12.648*** (3.29)	-6.645 (-1.08)	5.051 (1.03)

表 10 税收优惠与研发投入强度、研发绩效的回归结果

变量	R&D	Pat_a	Pat_b	Pat_c
Tax	-0.070 (-0.57)	0.322 (0.25)	-2.180 (-1.12)	-2.164 (-1.15)

表 11 政策优惠力度提高前后加计扣除强度与研发投入强度、研发绩效的回归结果

变量	R&D		Pat_a		Pat_b		Pat_c	
	before	after	before	after	before	after	before	after
Ded	3.574*** (5.61)	2.682*** (7.97)	4.762 (0.64)	10.594*** (2.60)	-9.491 (-1.00)	0.373 (0.05)	14.548* (1.77)	5.177 (0.85)
经验 p 值 1	0.157***		0.193		1.000		0.247	
经验 p 值 2	0.091*		0.125		0.224		0.213	

表 12 管理层持股的调节作用

变量	R&D	Pat_a	Pat_b	Pat_c
Ded	2.946*** (7.85)	18.111*** (3.67)	5.967 (-0.79)	6.038 (1.04)
Os	-0.003 (-0.34)	0.533*** (3.08)	-0.292 (-0.99)	0.394 (1.57)
Os_Ded	4.410** (2.52)	-54.299** (-2.42)	-6.735 (-0.24)	-9.809 (-0.39)

## 5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企业研发投入与研发绩效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1)加计扣除能够显著促进企业进行研发投入,并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发明专利的产出;(2)加计扣除优惠力度的大幅提高,并没有达到大幅提高研发投入和研发绩效的政策预期效果;(3)比较而言,加计扣除优惠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要优于企业所得税税率优惠,但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并不一定优于税率优惠;(4)管理层持股对加计扣除与研发投入的关系具有正面治理作用,对加计扣除与发明专利产出的关系虽然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在企业享受了加计扣除政策的情况下,管理层持股能显著提高发明专利的产出。上述结果从政策效用角度验证了加计扣除政策的必要性,丰富了税费优惠政策实施的经济学内涵。

加计扣除政策体系历经多年建设与完善,政策门槛已越降越低,政策优惠力度也比较大,但目前来看,依然有相当大比例已开展研发活动的企业从未享受过政策优惠。究其原因,企业会计核算不健全、政策本身不确定因素较多,研发费用归集困难、为规避风险而放弃申报的情况应是主因。因不了解具体操作细则和会计日常工作繁忙而懈于申报、出于技术保密考虑不便申报、研发费用少、申报复杂、性价比不高而弃报、地方财力不济被“隐性”劝退申报的企业均各占一定比例<sup>[29-30]</sup>。因此,当前进一步提高税收优惠力度并不一定可取,创造条件将政策落实、落细、落地,使更多企业受益才是当务之急。依据本研究结论和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首先,切实扩大政策受益面,充分释放加计扣除政策的普惠性功能。要建立工作协调机制。科技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应联合对政策进行更权威、细化、易操作的解读,统一政策判断标准,使合格研发活动与

合格研发费用的认定更具确定性,解决因各种原因导致的各地执行标准不一、部分地区标准过严导致企业“知难而退”的现象。允许企业在申报前向科技部门申请鉴定,并允许以科技部门鉴定结果、合格中介机构的专项审计或鉴定报告为依据进行申报,尽可能消除企业的涉税风险顾虑,积极申报享受政策优惠。在国家税务总局设置专业部门,负责与科技等主管部门联合工作的协调,负责税收优惠政策的宣讲、指导工作,负责各种税收优惠信息库平台的建设与日常运行工作,负责对信息库数据的分析工作,并据之提出政策完善、试点等建议。

其次,向需要重点支持的企业倾斜,发挥税收优惠政策特惠性功能。对于从事基础研究、“卡脖子”技术研究的企业,可以参考其他国家的做法,在财力允许的前提下,采取诸如提高加计扣除比例、当年不足抵扣的优惠向后延长结转期、对研发贷款可依据享受的税收优惠额进行贴息、允许企业提取研发准备金并给予加计扣除、对投资于国家重点支持企业的创业投资企业实行更大力度的税收优惠等办法,全力支持此类企业开展研发活动,早日摆脱被有关国家“卡脖子”的境地,维护国家安全,确保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于世界各国都予以特别政策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除了同样采用上述支持政策以外,还可以考虑采用当期或定期税收返还的方式,对这类企业的帮助可能更具靶向性。

第三,激发真实性研发动机,优化税收资源配置效果。考虑到部分企业出于创新迎合或避税动机而进行策略性或虚假性创新投入,抑制了税收优惠政策的激励效果,导致创新产出水平不高的状况,应大力实施激励创新产出的税收优惠政策。可以参考日本、西班牙等国的做法,选择适于操作的标准,如依据新产品销售收入、营业收入或高科技产品出口收入的增长率,给予一定幅度的增量加计扣除,一方面激励企业产生高质量的创新成果,并提高创新成果的商业化应用水平;另一方面,也反向激励企业进一步增加投入,努力实现创新突破。

最后,推动企业实施管理层股权激励计划。除了不适合实施股权激励的国有企业以外,其他未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实施力度比较低的企业,应尽早实施或进一步实施,以提高管理者的持股水平,促进税收优惠效应的发挥。股权激励计划应采用更有利于提高创新水平的激励方式,考虑容错纠错的要求,设置较长的激励期和有利于技术创新的绩效考核条件,包括研发强度、新产品销售收入、专利产出等创新绩效考核条件。尤其是要积极推进主业处于充分



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和对科技进步要求高的国有企业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改善国有企业管理者持股比例偏低的情况,确保顺利实现“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为国有企业设立的创新目标。

## 参考文献:

- [1] 李新,汤恒运,陶东杰,等.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J]. 宏观经济研究,2019(8):81-93,169.
- [2] 冯泽,陈凯华,戴小勇.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是否提升了企业创新能力?——创新链全视角[J]. 科研管理,2019,40(10):73-86.
- [3] 李华,孙茂竹,宋常,等.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中国制造业成本动因拓展研究——基于研发投入的视角[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21,36(1):118-127.
- [4] 曲晓辉,王俊,张瑞丽. 税收优惠方式对研发投入激励效应研究[J]. 税务与经济,2022(1):7-16.
- [5] 靳卫东,任西振,何丽.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创新激励效应[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22,24(2):108-121.
- [6] 寇明婷,魏建武,马伟楠. 国家研发财税政策是否促进了企业的 R&D 活动[J]. 科学学研究,2019,37(8):1394-1404.
- [7] 姚维保,张翼飞,李淑一.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传统能源企业 R&D 的激励效应——来自我国传统能源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J]. 科技管理研究,2020,40(1):25-31.
- [8] 柳卸林,朱浪梅,杨博旭. 政府研发激励有利于提升区域创新效率? [J]. 科研管理,2021,42(7):50-59.
- [9] 张杰. 中国政府创新政策的混合激励效应研究[J]. 经济研究,2021,56(8):160-173.
- [10] 梁富山. 加计扣除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异质性效应研究[J]. 税务研究,2021(3):134-143.
- [11] 杨瑞平,李喆赟,刘文蓉. 加计扣除政策改革与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J]. 经济问题,2021(8):110-120.
- [12] 吴秋生,王婉婷. 加计扣除、国家审计与创新效率[J]. 审计研究,2020(5):30-40.
- [13] 贺康,王运陈,张立光,等. 税收优惠、创新产出与创新效率——基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实证检验[J]. 华东经济管理,2020,34(1):37-48.
- [14] 陈强远,林思彤,张醒. 中国技术创新激励政策:激励了数量还是质量[J]. 中国工业经济,2020(4):79-96.
- [15] 陈海声,连敏超. 盈余管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执行效率[J]. 科研管理,2020,41(4):54-63.
- [16] 孙自愿,梁晨,卫慧芳. 什么样的税收优惠能够激励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来自优惠强度与具体优惠政策经验证据[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5(5):95-106.
- [17] 李子彪,孙可远,吕鲲鹏. 三类政府财政激励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绩效的激励机制——基于企业所有权性质的调节效应[J]. 技术经济,2018,37(12):14-25,75.
- [18] 贺亚楠,杨紫琼,郝盼盼. 加计扣除对上市公司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基于 R&D 操纵的视角[J]. 中国科技论坛,2021(9):52-61.
- [19] 孙自愿,周翼强,章砚. 竞争还是普惠?——政府激励政策选择与企业创新迎合倾向政策约束[J]. 会计研究,2021(7):99-112.
- [20] 王再进,方衍. 企业研发费加计扣除政策实施问题及对策研究[J]. 科研管理,2013,34(1):94-98.
- [21] DASGUPTA P, STIGLITZ J.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nature of innovation activity[J]. Economic Journal, 1980, 90(3):266-293.
- [22] SPENCE M. Cost reduction, competition and industry performance[J]. Econometrica, 1984, 52(1):101-121.
- [23] 凯恩斯.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 高鸿业,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89-91.
- [24] 李香菊,杨欢. 财税激励政策、外部环境与企业研发投入——基于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 A 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 当代财经,2019(3):25-36.
- [25] 陈东,邢霖. 税收优惠与企业研发投入:内部控制的视角[J]. 现代经济探讨,2020(12):80-90.
- [26] XUE Y F. Make or buy new technology: The role of CEO compensation contract in a firm's route to innovation[J].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007, 12(4):659-690.
- [27] FONG E A. Relative CEO underpayment and CEO behavior towards spending[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0, 47(6):1095-1022.
- [28] 范海峰,周小春. 管理层持股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研究——基于融资约束的中介作用[J]. 科研管理,2020,41(3):52-60.
- [29] 郭健. 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执行的障碍性因素研究——基于对山东省 1521 家企业的问卷调查[J]. 宏观经济研究,2017(11):69-78.
- [30] 王军. 激励研发的企业所得税政策的优化原则与方法——基于行为经济学的分析[J]. 国际税收,2019(8):65-70.

责任编辑:李云

# 旅游业视域下的乡村振兴策略创新与实施路径研究

## ——以霍山县“旅游兴县”为例

韩瑞\*, 刘仁金

(安徽工业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教务处, 安徽 合肥 230051)

**摘要:**结合霍山县“旅游兴县”实践案例,从旅游业视角分析旅游与乡村振兴的关系以及旅游服务乡村振兴面临的挑战。研究发现,旅游在经济、文化、生态和人才方面助力乡村振兴成效明显,然而在旅游服务乡村振兴过程中,在发展不均衡导致的产业协同、文化资源利用、旅游发展与生态保护、旅游人才供给等方面面临挑战。因此,建议采用全域旅游策略、沉浸式体验策略、生态优先发展策略和人才支撑体系策略,通过政府主导、科技赋能、优先发展和多元共建的路径构建旅游服务乡村振兴的新局面。

**关键词:**旅游业;乡村振兴;策略创新;实施路径;“旅游兴县”

中图分类号:F592;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24)06-0058-06

## Innovative Strategie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of Tourism by “Tourism-driven County Development” in Huoshan County

HAN Rui\*, LIU Ren-jin

(Office of Academic Affairs, Anhui Technical College of Industry and Economy, Hefei, 230051, Anhui)

**Abstract:** Based on the practical case of “Tourism-driven County Development” in Huoshan county, it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a tourism industry perspective and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ourism services in revitalizing rural areas. It found that tourism supports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areas of economy, culture, ecology and talent development. However, several challenges were unsolved: uneven development leads to difficulties in industry collaboration, insufficient utilization of cultural resources, challenges in balancing tourism development with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issues with the supply of tourism talent. By addressing these challenges, it was adopted the following strategies: overnment-led all-tourism strategy, technology-empowered immersive experience strategy, ecology-prioritized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diversified co-construction talent support system strategy. It will help to build a sustainable and vibrant tourism industry that contributes positively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tourism industry;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novation; implementation pathway; “Tourism-driven County Development”

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充分发挥旅游优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引发旅游业界热议<sup>[1]</sup>。“旅游赋能乡村振兴”,新时代乡村振兴要求搞好乡村旅游,实施乡村文旅深度融合工程<sup>[2]</sup>。

### 1 旅游与乡村振兴的相关研究

首先是旅游与乡村振兴的关系。旅游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生态旅游示范村镇和精品线路的创建,“实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工

收稿日期:2024-07-09 \* 通讯联系人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哲学社科重大项目(2022AH040334);安徽省高校哲学社科重点项目(2023AH052671)。

作者简介:韩瑞(1982-),女,安徽亳州人,讲师,硕士。E-mail:ahhr@ahiec.edu.cn

程”,打造乡村生态旅游产业链,推动乡村振兴<sup>[3]</sup>。旅游“助力乡村产业兴旺,夯实振兴基础”,促进农业结构的转变,减少对传统农业的依赖,增加当地居民的收入,推动乡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sup>[4]</sup>。乡村旅游业与乡村振兴战略融合发展已成为趋势,乡村旅游推动“乡村系统功能的全面提升”,助力美丽乡村建设<sup>[5]</sup>。旅游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和农民富裕等方面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增强乡村的全面发展实力,助力乡村发展<sup>[6]</sup>。

其次是旅游在乡村振兴中面临的困境。旅游在乡村振兴中面临的困境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不足、文化遗产保护与商业化冲突、环境影响和人才短缺等方面。旅游在助推乡村振兴过程中,存在缺乏良好的道路和公共交通系统、住宿、餐饮、卫生等服务设施的现象,基础设施有待提升,否则影响游客体验<sup>[7]</sup>。发展旅游过程中不当开发会损害或破坏历史遗迹和传统文化,商业化可能导致地方特色的丧失,使得乡村失去独特性,“导致文化衰落”<sup>[8]</sup>。乡村旅游活动可能对当地生态系统造成负面影响,水资源、土地资源等存在因旅游开发而被过度利用的问题,导致“生态环保任务艰巨”<sup>[9]</sup>。另外,乡村旅游专业性人才缺乏,既缺乏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才来管理和运营旅游项目,当地居民的旅游服务意识也存在不足,缺乏必要的服务培训,无法提供高水平的旅游服务<sup>[10]</sup>。

最后是旅游服务乡村振兴的对策建议。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建议加大道路建设、医疗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力度,强化“乡村振兴的重要前提基础”<sup>[11]</sup>。从理念的角度,用全域旅游的理念,将旅游业置于优势地位,对经济社会资源进行全面系统的优化升级,处理好旅游业发展中的各种关系,达成资源的有机整合、产业的融合共进、社会的共建共享,特别是“与原居民的共益共享”<sup>[12]</sup>。在乡风文明方面,通过文旅融合,深入开发乡村文旅资源,促进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满足“更加多元、更高层次的精神享受”需求,增强乡村的知名度和吸引力<sup>[13]</sup>。乡村人才培养方面,通过加大乡村人力资源开发力度,发现并培养本土人才,并引进外部人才,同时加大教育培训投入,来“加强专业旅游人才培养”,提升乡村人才综合能力<sup>[14]</sup>。

通过梳理发现,现有研究对旅游与乡村振兴的关系、旅游在乡村振兴中面临的困境及对策展开探讨,形成的成果较多,丰富了旅游与乡村振兴的相关理论,对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现有研究也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现有研

究多从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不同视角探讨旅游与乡村振兴的关系,对于旅游如何服务乡村振兴、融入乡村振兴的策略、参与乡村振兴的路径以及与乡村社会深度融合等问题,缺乏系统性的回应。其次,现有研究对旅游与乡村振兴中面临的困境及对策的导向性不强,案例说服力不足,旅游服务乡村振兴的策略与实践仍需要深入探讨。因此,为深入研究旅游与乡村振兴,总结霍山县“旅游兴县”实践案例,分析旅游服务乡村振兴中面临的困境,拟构建旅游服务乡村振兴策略创新与实践路径,丰富相关研究成果,为旅游高质量服务乡村振兴提供借鉴。

## 2 旅游服务乡村振兴背景下的霍山县“旅游兴县”实践

在乡村振兴研究中,旅游业因其产业的综合性、业务范围广泛、传播文化和保护生态等特征备受关注。在乡村振兴实践中,发展旅游常用来破解乡村振兴中的难题。作为战略支柱性产业的旅游业在农业现代化、农民增收、就业机会增加、农村生活环境改善等方面优势明显,旅游业被视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通过乡村旅游、文化旅游等多元化业态,不仅能够吸引外部投资,扩大对外交流,还能够激发乡村内部活力,留住人才,因此被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布局。霍山县在旅游服务乡村振兴实践中坚持“旅游兴县”战略,紧扣乡村经济、乡村文化、乡村生态和乡村人才,探索出了旅游服务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可复制的模式,成效明显。

### 2.1 旅游促进乡村经济发展

旅游是综合性产业,具有“一业兴、百业旺”的独特作用,能显著地促进乡村经济发展<sup>[15]</sup>。旅游供给上,促进旅游目的地基础设施建设、旅游资源开发、文化旅游创意产品等方面;旅游需求上,促进旅游服务业、旅游交通业、旅游餐饮业和旅游住宿业的发展。霍山县于1986年被列入首批国定贫困县名单,是集革命老区、水库移民集中区、大别山主峰核心区为一体的山区县。2014年,霍山县结合区域自然和人文资源优势提出《关于大力实施“旅游兴县”战略的建议》;2017年,“旅游兴县”战略已经成为霍山县发展的主战略;2019年,霍山县荣获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称号;2020年,堆谷山村、陡沙河村入选世界旅游联盟旅游减贫案例;作为安徽省健康脱贫工作表现突出县,霍山县43个贫困村在“十三五”期间整体出列,“10699户30682人全部脱贫。”<sup>[16]</sup>霍山县政府牵头组建大别山文化旅游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引入华强大别山集团公司等龙头企

业,通过“旅游+”和“+旅游”的方式,多产业联动,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创新旅游业态、产品和服务的方式,已形成“旅游+文化”“旅游+康养”“农业+旅游”“林业+旅游”等多产业融合发展的局面。2021年以来,霍山县旅游人次和旅游综合收入均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2023年旅游人次突破1200万,旅游综合收入71.5亿元,占该县地区生产总值的32.5%。

## 2.2 旅游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文化重塑,“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文旅共生<sup>[17]</sup>。在文旅共生过程中,文化与旅游之间形成一体化发展状态,文化资源被有效挖掘、保护和传承,并通过旅游产品的创新设计和服务升级得以活化利用。文旅共生强调文化与旅游通过相互渗透、交叉融合,打破传统的行业界限,创造出既富含文化底蕴又具有吸引力的旅游产品和项目。霍山县深入挖掘和整合地方特色文化,利用茶乡、药乡、竹乡资源打造抱儿钟秀黄茶园、石斛小镇、大别山第一竹海等集茶文化、养生文化于一体的旅游消费体验基地;将农业与宋窑陶瓷文化相结合,建设下符桥镇符桥景区智趣田园项目,既为游客提供更为丰富、立体、高质量的旅游体验,又实现了文化传承与旅游价值增值的双重目标,为社会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助力文化振兴。“乡村文化具有社会内聚的功用”,凝聚乡村力量<sup>[18]</sup>。霍山县依托红色资源打造红色皖西旅游精品线路,通过举办茶文化节、竹艺展示会、红色文化旅游节等活动,传承茶文化、竹编技艺和红色历史文化,增强了村民对本土文化的自豪感和归属感;同时,霍山县鼓励和支持乡村匠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通过设立工作室、开展技艺培训班等形式,传承和创新传统技艺,并吸引年轻人回乡创业,将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结合,开发文化创意产品,为乡村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促进乡村内部的自我更新和活力激发。

## 2.3 旅游与生态双向互动

旅游与生态紧密相连、相互影响。一方面,优质的自然环境和独特的人文景观是吸引游客的关键资源,因此生态保护是旅游业长远发展的基石;另一方面,旅游开发与经营活动如果管理不当,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潜在威胁,包括自然资源消耗、污染增加、生物多样性减少及景观破坏等。为了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在旅游规划和管理时要充分考虑生态保护,采用绿色、低碳的旅游发展模式,确保旅游活动在不损害自然环境的前提下开展,并积极引导游客参与环保行动,通过合理的旅游收益反哺生态保护

工作,形成旅游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良性循环,从而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标,助力生态发展。霍山县将“生态立县”放在首位,把生态保护纳入乡村旅游规划与发展之中,强化生态环境保护。通过推进绿色可持续的旅游开发方式,推行绿色旅游、低碳旅游,实施严格的环境监管措施。霍山县积极开展生态修复工程,保护生物多样性,确保乡村旅游的可持续性。依托霍山黄芽、霍山石斛中药材等特色农业资源,发展绿色有机种植,推动农产品深加工,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提升产业链附加值,带动农民增收。充分发挥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优势,如山水景观、森林氧吧等,发展生态旅游、休闲农业、森林康养等绿色产业,构建生态友好型旅游产品体系,吸引城市居民体验自然,享受绿色生活。

## 2.4 旅游汇聚乡村人才

旅游属劳动密集型行业,发展旅游吸引和培养人才,为乡村人才振兴提供支撑。旅游业的发展能够为乡村引入现代服务业理念和技术,催生出多样化的就业岗位和创业机会,从而为乡村人才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提升通道。乡村旅游的兴起需要各类专业人才,如市场营销、文化创意、农业技术、手工艺传承、民俗表演等,应促使乡村重视并加大本土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力度,同时也鼓励在外务工或求学人员及乡贤回流,参与家乡建设。实施“人才强县”战略,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经济,采用“人才+项目”“外引+招商”等方式吸引各类专业人才,在推动旅游经济发展、壮大民宿品牌、新型职业农民转变、带领周边群众致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霍山县持续提升现有农民的职业技能,使之转型为家庭农场主或乡村旅游合作社成员;积极开展旅游民宿发展专题培训、“全景霍山、全域旅游”等专项培训。经过系统培训,培育了一批懂经营、善管理、能创新的乡村旅游领军人物和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培养了具有前瞻视角、熟悉地方特色与市场需求的管理人才。另外,通过旅游项目的策划、运营与推广,乡村旅游人才得以不断积累经验、提高素质,实现个人价值,进一步助力乡村人才振兴。

## 3 旅游服务乡村振兴中面临的挑战

推进旅游赋能乡村振兴以来,国家在乡村经济发展、乡村文化振兴、乡村环境改善和乡村人才培养方面成效明显。但因产业基础不同、产业链不完整和资源禀赋不同等因素,旅游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产业协同、文化资源利用、旅游开发与生态保护、旅游人才供给方面依旧面临挑战。

### 3.1 旅游业发展不均衡,产业协同不够

因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历史因素等多方原因,旅游业发展不均衡,产业协同不够等现象普遍存在。如我国东部地区依托于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等因素,旅游业发展迅速,而中西部地区和广大农村地区由于基础设施落后、旅游资源开发不足等原因,旅游业发展相对滞后,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差异明显,且城乡之间因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习惯的不同,也存在差异。霍山县作为山区县因区位、交通和资源禀赋等因素,旅游业发展不均衡。在大别山国家风景道、佛子岭坝下休闲区和大别山主峰等核心景区及县城周边区域,产业基础较好,旅游项目数量多,已经形成“一环、两核、三组团”的乡村旅游发展格局,产生规模效益成为优势产业;其他区域以特色农业资源为依托,重点发展石斛、茶叶、毛竹等产业,而旅游业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如交通、餐饮住宿条件等不足,旅游业与农业、教育、医疗等其他产业融合不够深入,横向融合度较低,休闲农业游、研学旅游、健康养生游发展不充分;另外旅游产业链短小,旅游形态以观光游为主,上下游产业融合较差,纵向延伸不够,产业链内部各支撑要素发展不平衡。

### 3.2 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不足,文化资源缺乏利用

旅游作为推动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其核心在于满足游客的精神需求和文化感受。一些地区在开发乡村旅游项目过程中,关注景点打造、环境改善和基础设施建设过多,但对当地丰富的文化资源和独特的乡村文化进行深入挖掘和有效利用不足,对传统美德弘扬和历史文化的挖掘不够,导致旅游产品的文化特色不足,活动缺乏参与性,游客体验感差。随着城市化的加速推进,越来越多的乡村人口转入城市,一些乡村的本土文化失去载体后逐渐落幕,传统美德受到现代文化的冲击,正在逐渐消失,导致乡村旅游产品无法充分体现地方特色,同地域的乡村旅游项目同质化严重,无法给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旅游体验。霍山县在“霍山弧”区域内的西山文化的挖掘不够深入,以霍山竹编、剪纸为代表的民间传统艺术面临传承难题,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受失传威胁;基于抗战背景创作的红色实景剧《大别山传奇》,在内容创新与高科技手段的融合应用上也亟待改进;与黄山、黄梅戏并称“安徽三黄”的霍山黄芽,其知名度和影响力也无法与前者相提并论,茶文化资源开发和利用不足。

### 3.3 旅游开发与生态保护难以平衡,环境面临威胁

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旅游开发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平衡点难以精准把握,生态环境面临威胁。

一方面,为了吸引游客,需要对旅游资源进行开发和建设,自然会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乡村旅游项目的开发者往往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而忽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过度开发可能会导致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等问题,而未经妥善处理的生活垃圾和废水排放则会对当地的水源造成污染。另一方面,过于强调生态保护,则可能导致旅游设施不足,影响游客体验和旅游业的发展。例如,一些乡村地区为了保护生态环境,限制了旅游设施建设,导致游客的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从而影响了旅游业的吸引力;有些项目名为“生态旅游”,但实际上缺乏有效的环境保护措施,缺乏对游客行为的引导和管理,导致游客随意丢弃垃圾、破坏自然资源等问题。此外,一些旅游项目的开发者和地方政府过于追求短期经济效益,忽视了长期生态可持续性。2021年6月,霍山县佛子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因擅自调整功能区划图,违规建设旅游项目等问题被安徽省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

### 3.4 乡村人口外流,旅游人才短缺

乡村地区在经济发展、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方面与城市相比存在明显差距,这使得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更倾向于到城市发展,以寻求更好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条件。农村青壮年人口大量外出,甚至出现“空心村”,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对于旅游业的发展也是一个挑战。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村青壮年人口向城市迁移,削弱农村经济发展活力,加剧城乡发展不平衡,拉大贫富差距,阻碍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霍山县近三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户籍总户数和户籍人口均呈下降趋势。霍山县所在的六安市统计局对全市乡村人口发展变化数据统计分析表明,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持续下降,并且“在全省同类市中降幅最大”,乡村人口外流成为制约乡村振兴的重要因素<sup>[19]</sup>。近年来,我国在乡村振兴工作中积极采取了一些措施,但人才短缺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乡村人才的培养被视为系统工程,涉及面较广,加上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普遍不足,更是限制了外来人才流入。此外,特别是乡村旅游从业队伍中许多都是村民,素质参差不齐,乡土熟人社会中人情关系过重,也不利于留住人才;同时薪资待遇普遍偏低,加剧了乡村人才短缺。

## 4 策略创新与实施路径

### 4.1 政府主导的全域旅游策略与实施路径

针对旅游业发展不均衡,产业协同不够,采用政

府主导的全域旅游策略,充分发挥旅游业优势产业的作用,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系统化的优化整合区域资源,深化产业融合,带动并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政府主导要充分发挥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关键作用。首先,在组织结构方面,通过成立合作社,由村民共同参与项目的开发和运营,实现资源和利益共享;或者采用“企业+农户”模式,通过企业与农户合作,企业负责市场开拓和品牌建设,农户提供服务和产品,双方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霍山县积极探索“党组织+合作社+贫困户”的发展模式,由政府提供发展项目和技术,村民自主选择,促进了村民的参与和自治,更提高了村民的经济收入,打造了多个乡村旅游示范点,如鹿吐石铺茶谷小镇、磨子潭镇堆谷山村等。其次,政策协同方面,政府通过政策体系,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提供发展规划、政策扶持、资金补助和技术指导等,帮助企业、合作社和村民等更好地发展乡村旅游。自 2021 年以来,霍山县印发整体规划及康养旅游、乡村旅游等一系列专项发展规划及多项资金奖励办法等相关文件,确保政策的有效实施,为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协同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最后,采用社区参与机制,鼓励村民自治,积极参与乡村旅游决策过程,通过村民大会等形式讨论、决定乡村旅游的发展方向 and 具体项目。同时也可以依托社区组织,发动当地居民参与旅游服务和产品开发,提升社区凝聚力和归属感。

#### 4.2 科技赋能的沉浸式体验策略与实施路径

针对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不足、文化资源缺乏利用的问题,科技赋能的沉浸式体验策略让游客更直观、更深刻地感受和理解当地的文化遗产,并为观众提供全方位、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科技赋能的沉浸式体验策略充分利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混合现实等现代技术手段和表现方式创新产品形态,将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下流行元素和趣味性有机融合,激发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影响力和感召力。沉浸式体验覆盖领域较多,有沉浸式演艺、沉浸式展览、沉浸式影视等。首先,虚拟现实能够提供身临其境的旅游体验,同时能够解决旅游中存在的安全及文物保护问题。例如,全球首个运用游戏科技打造的“数字藏经洞”,再现了敦煌藏经洞及其室藏 6 万余卷珍贵文物的历史场景,“寻境敦煌——数字敦煌沉浸展”则 1:1 高精度立体还原了莫高窟第 285 窟,为大众普及敦煌文化探索出新路径。其次,增强现实能够显著提升旅游体验的质量,通过将虚拟信息融合到现实场景中,为游客提供更加生动、全面的互动体验。例如,“又见”“印象”系列,巧妙地利用

当地特有的山水实景、地质风貌,融合地域风格强烈的人文传说、民俗风情等,创造了集合光、影、舞、美和乐的极具冲击力和震撼力的艺术视听盛宴。另外,混合现实技术可以让游客在虚拟世界里畅游,既保留现实景区的优势,又规避景区劣势,产生新的可视化环境。例如,西江千户苗寨的“西江幻地”项目,游客通过混合现实眼镜或手机端 APP 进入景区,体验丰富多彩的苗族文化。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沉浸式体验项目也推陈出新,如《唐宫夜宴》XR 大空间沉浸展等。霍山县沉浸式体验项目的科技性明显不足,大别山溪降、霍山大峡谷“漂流 NPC 挑战赛”、六万情峡景区以及《大别山传奇》等科技赋能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 4.3 生态优先发展策略与实施路径

生态优先发展策略强调在旅游服务乡村振兴过程中坚持生态保护的原则,平衡旅游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确保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霍山县坚持“生态立县”战略,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推动生态优先发展。首先,优先发展绿色产业。依托水资源、森林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发展绿色农业、生态文旅产业,如石斛、茶叶、毛竹等特色农业,深挖茶产业资源,推动茶文化与旅游业的结合,打造了一系列以茶文化体验、交流、研学为一体的休闲养生观光旅游项目,如凡冲茶海研学营地、宋家河古村茶栈等。其次,加大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力度,制定工作方案、开展村庄清洁行动、加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等措施,效果明显,获多项国家级荣誉称号,有效促进生态宜居环境构建。另外,霍山县依托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走红绿融合发展之路。作为安徽红色区域中心、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霍山县将革命历史遗迹、纪念地等为主要内容的红色旅游与注重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绿色旅游相结合,既通过红色旅游弘扬革命精神和历史文化,同时借助绿色旅游的理念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实现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打造“红色文化体验+绿色生态休闲”的复合型旅游产品,提升旅游品牌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形成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模式。

#### 4.4 多元共建的人才支撑体系策略与实施路径

针对乡村人口外流,旅游人才短缺的问题,采用多元共建的人才支撑体系策略,通过政府引导、校企合作、社会参与等多种途径和方式,构建涵盖政府、企业、高校、社会团体等多方面的合作机制。在人才培养上达成共识,共同培养和吸引各类专业人才,为旅游服务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首先,

政府层面实施更加积极、开放、有效的人才政策,全面推进机制健全、运行规范、服务优质、层次多元的人才市场体系建设,发挥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以提升劳动者能力素质为核心,加快培养大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霍山县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支持等方式,引导和激励人才向乡村流动;通过整合教育资源、企业力量、社会组织及乡贤等多方资源,形成多层次、多渠道的人才培养和引进机制。其次,探索企业和院校联合培养人才,实现校企资源的有机结合和优化配置,精准培养和输送产业发展急需紧缺人才。霍山县积极与安徽农业大学开展合作,就茶树种植、茶产品开发等开展专题培训,促进茶产业发展。同时霍山县充分利用教育资源优势深入推进“百校联百县兴千村”行动,将地方高校人才技术优势与乡村人才需求相结合,通过乡村人才培养、农民辅导等方式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

## 5 结论

近年来,旅游业充分发挥了自身综合性、经济性和带动性等优势,在经济、文化、生态和人才方面积极推动乡村振兴,作用愈加明显。基于霍山县“旅游兴县”实践,分析其发展经验和面临的挑战,建议采用全域旅游策略、沉浸式体验策略、生态优先发展策略和人才支撑体系策略,通过政府主导、科技赋能、优先发展和多元共建的路径,解决因发展不均衡导致产业难以协同、文化资源利用不足、旅游发展与生态保护难以平衡和旅游人才供给不足方面的问题,不断创新旅游服务乡村振兴的策略和路径,提高农民收入,改善乡村风貌,促进乡风文明,从而带动乡村经济整体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总要求的实现,进而开创旅游服务乡村振兴的新局面。

## 参考文献:

[1] 赵腾泽,李志刚. 充分发挥旅游优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N]. 中国旅游报,2021-02-25(1).

[2] 新华每日电讯. 旅游赋能乡村振兴,共同富裕跑出加速度[EB/OL]. (2023-09-05)[2024-03-02]. [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23-09/05/c\\_1310740027.htm](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23-09/05/c_1310740027.htm).

[3]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EB/OL]. (2018-02-04)[2024-03-02]. [https://www.gov.cn/zhengce/2018-02/04/content\\_5263807.htm](https://www.gov.cn/zhengce/2018-02/04/content_5263807.htm).

[4] 李鸿凯. 乡村旅游服务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与发展策略[J]. 农业经济,2023(7):138-140.

[5] 陈劭绮,陆林. 乡村旅游创新的理论框架与研究展望[J]. 地理学报,2024,79(4):1027-1044.

[6] 曾迎霄. 旅游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内在逻辑及政策选择[J]. 农业经济,2022(3):62-64.

[7] 张南. 文旅融合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共生、现实困境及优化策略[J]. 安徽乡村振兴研究,2024(4):105-112.

[8] 张朝枝,朱敏敏. 文化和旅游融合:多层次关系内涵、挑战与践行路径[J]. 旅游学刊,2020,35(3):62-71.

[9] 陈海彬.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乡村旅游产业发展问题及对策建议[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6,37(12):220-225.

[10] 韩博然. 乡村旅游经济产业优化升级策略[J]. 社会科学家,2021(4):52-57.

[11] 黄禹,霍建军,刘杨,等.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现实意义和实现路径[J]. 农业经济,2023(4):30-32.

[12] 张士闪. 全域旅游统筹下的经济共益与文化共享[J]. 旅游学刊,2019,34(6):11-13.

[13] 戴斌. 文旅融合新动能与旅游经济未来方向[J]. 人民论坛,2024(11):62-67.

[14] 牛振楠. 高质量发展需求下乡村旅游融合发展研究[J]. 农业经济,2024(7):78-80.

[15] 王洋. “一业兴、百业旺”乘数效应持续释放[N]. 中国旅游报,2021-09-28(1).

[16] 霍山县融媒体中心. 我县“十三五”期间脱贫攻坚成效显著[EB/OL]. (2021-01-19)[2024-03-02]. <https://www.ahhuoshan.gov.cn/ztl/ztl/tpgjzmxk/33744171.html>.

[17] 宋子千,宋潇玉.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科学内涵、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J]. 发展研究,2022,39(11):16-20.

[18] 赵旭东,孙笑非. 中国乡村文化的再生产——基于一种文化转型观念的再思考[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7(1):119-127,148.

[19] 六安市统计局. 从我市乡村人口发展变化看乡村振兴面临的挑战[EB/OL]. (2022-05-20)[2024-03-02]. <https://tjj.luan.gov.cn/sjla/tjfx/5005926.html>.

责任编辑:汤庆国

# 财政透明度对预决算支出偏离的影响研究

## ——基于268个地级市财政预决算数据的分析

欧阳世晨

(安徽财经大学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

**摘要:**利用2013-2021年中国市级层面公共预算的预算和决算数据,从预算支出视角分析财政透明度对预决算支出偏离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财政透明度的提升对预决算支出偏离有显著的抑制作用,通过稳健性检验,证明结论成立,且财政透明度对预决算支出偏离存在地区异质性,低财政透明度地区、经济发达地区、低财政自给能力地区和低政府支出规模地区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地方政府财政透明度的提升可以通过提高政府财政自给能力、控制政府支出规模两个途径抑制预决算支出偏离。

**关键词:**预决算支出偏离;财政透明度;政府支出规模;财政自给能力;转移支付

中图分类号:F8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24)06-0064-08

## Impact of Fiscal Transparency and Deviation of Budget and Final Accounting Expenditure by Fiscal Budget and Final Data from 268 Prefecture-level Cities

OU-YANG Shi-chen

(School of Fina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233030, Anhui)

**Abstract:** Using the budget and final accounting data from public budget at the municipal level in China from 2013 to 2021, it analyzed the impact of fiscal transparency on deviations in budgeted and actual expenditures in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udget expenditures. It found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local government fiscal transparency has a significant inhibitory effect on the deviation of budget and final expenditures. Through robustness testing, the conclusion was supported, and fiscal transparency has regional heterogeneity on the deviation of budget and final expenditures. The inhibitory effect is more significant in areas with low fiscal transparency, developed economies, low fiscal self-sufficiency, and low government expenditure scale. The results of mechanism testing indicated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local government fiscal transparency can suppress the deviation of budget and final expenditure by improving government fiscal self-sufficiency and controlling government expenditure scale.

**Key words:** deviation of budget and final accounting expenditures; fiscal transparency; government expenditure scale; fiscal self-sufficiency; transfer payment

政府预算能力代表着国家汲取和使用财政资源的能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现代预算制度”,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健全现代预算制

度。但在预算实际执行过程中,在经立法机关审查批准的政府预算收支同作为其实际执行结果的政府决算收支之间往往会出现差异,这种差异可称之为“预决算差异度”<sup>[1]</sup>,即预决算偏离。自2015年以

收稿日期:2024-04-24

基金项目:安徽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ACYC2023104)。

作者简介:欧阳世晨(2000-),男,安徽淮南人,硕士研究生。E-mail:2438533221@qq.com



来,财政部每年对各地预决算公开情况进行评价,以强化社会监督,提高财政透明度,保障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与监督权。

## 1 文献回顾

预决算偏离在全球范围内是一个普遍现象,一般认为合理的预决算偏离度不超过5%<sup>[2-3]</sup>。然而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的预决算偏离度大部分年份都超出了合理标准<sup>[4]</sup>。一些学者的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地市级层面的预决算支出偏离长期处于“超支”的状态<sup>[5-6]</sup>。预决算长期的偏差过大会降低预算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利于财政资金的统筹安排和监督管理<sup>[7]</sup>。因此,如何有效抑制地方政府的预决算偏离就成为当前亟需思考和解决的问题,而加强政府财政信息公开透明是构建和完善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举措。

一些学者认为在预算的编制和预算执行过程中缺乏财政透明度<sup>[3,8]</sup>,导致上级政府和社会无法了解地方政府真实的财政状况,无法进行有效的外部监督,最终造成预决算的偏离。针对财政透明度对预决算偏离的影响,国内外有不少文献指出,提升地方政府财政的透明度,对预决算偏离有着显著的抑制作用<sup>[9-11]</sup>。更加透明、更加规范科学的预算制度不仅能够提高政府的资金管理水平和资金的使用效率,保障预算计划的科学性,完善支出计划的执行<sup>[12]</sup>,还能降低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抑制过度的财政支出<sup>[13]</sup>;同时财政透明度的提升可以减弱转移支付的“粘蝇纸”效应<sup>[14-15]</sup>,使政府支出规模和结构更加科学,从而有效抑制预决算支出的偏离。

本文以2013-2021年中国内地268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分析财政透明对预决算支出偏离的作用机理。

##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2.1 财政透明度对预决算支出偏离的直接影响

财政透明度的提升会促进上级政府和社会公众对地方政府的预算编制和支出行为行使更有利的监管,规范政府财政资金的使用和分配。同时,财政透明度的提高也会削弱政府预算编制时的信息垄断优势。财政信息的公开透明加强了预算约束,降低财政支出的预决算偏离度。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财政透明度可以抑制预决算支出偏离。

### 2.2 财政透明度对预决算支出偏离的间接影响

#### 2.2.1 财政透明度与地方政府支出规模

地方政府出于政绩考量往往会突破原有预算安

排,利用自身“垄断”的信息优势,过度追求开支消耗<sup>[16]</sup>;同时转移支付制度规模的不确定性容易导致政府出现年底“突击花钱”的状况,造成政府支出规模增长。支出规模膨胀和低效率的支出均会导致预决算支出偏离度的扩张<sup>[17-18]</sup>。财政透明度的提升缓解了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督促政府依法受托履行支出职责、科学编制预算、约束低效率支出行为。另一方面,财政信息的公开可以使上级政府更好了解地方政府实际的财政收支状况,及时对地方政府进行监管和问责,并矫正其违规的支出行为。同时上级政府也可以根据地方政府具体的财政状况科学地设计转移支付制度,抑制地方政府由于转移支付的不确定性和时滞性造成支出规模膨胀,降低预决算支出偏离的可能性。因此提出假设2:

H2:财政透明度可以通过控制地方政府支出规模抑制预决算支出偏离。

#### 2.2.2 财政透明度与地方政府财政自给能力

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长期面对较大的财政压力,财政自给能力较低。此时政府往往会更加依赖转移支付,软化预算约束<sup>[19]</sup>,诱导地方政府财政违规支出,地方政府会更加偏好于风险型决策或超额支出计划<sup>[20]</sup>,扩大财政支出决算与预算的偏离程度。财政透明度的提升会在一定程度上为政府在社会公民面前树立良好的形象,增加纳税遵从度<sup>[21]</sup>,提高政府的财政收入,使政府财政自给能力得到提升。这不仅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压力,也可以阻断地方政府对上级政府“救济预期”的路径依赖<sup>[22]</sup>,提高了地方政府自主安排财政支出的灵活性和有效配置资源的责任感,提升预算编制的准确性<sup>[5]102</sup>,预决算支出偏离得到控制。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

H3:财政透明度可通过提升地方政府财政自给能力抑制预决算支出偏离。

综上,财政透明度对预决算支出偏离的直接影响会对间接影响因素产生促进作用。首先它可加强外部监管力度,避免政府出现低效率的支出和投资,控制政府支出规模膨胀;同时缓解了信息不对称,提升了政府公信力,有助于提升公民的纳税遵从度,促进财政自给能力的增强,进而抑制预决算支出偏离。

## 3 研究设计

### 3.1 模型设定

#### 3.1.1 基准回归模型

本文构建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来探究财政透明度与预决算支出偏离度之间的关系:

$$\text{Budgetdev}_{i,t} = \beta_0 + \beta_1 \text{Trans}_{i,t} + \alpha \text{Control}_{i,t} + \delta_t + \mu_i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下标  $i$  代表城市,  $t$  代表年份。Budgetdev 为被解释变量,  $t$  为预决算支出偏离度; 解释变量 Trans <sub>$i,t$</sub>  为财政透明度; Control <sub>$i,t$</sub>  为控制变量;  $\delta_t$  为年份固定效应;  $\mu_i$  为城市固定效应;  $\varepsilon_{i,t}$  为随机干扰项。

### 3.1.2 中介效应模型

$$M_{i,t} = \alpha_0 + \alpha_1 \text{Trans}_{i,t} + \gamma \text{Control}_{i,t} + \delta_t + \mu_i + \lambda_{i,t} \quad (2)$$

其中,  $M_{i,t}$  为中介变量, 分别表示财政自给能力和政府支出规模, 其他符号含义与(1)式一致。

## 3.2 变量选取和计算

### 3.2.1 被解释变量: 预决算支出偏离度

需要注意的是, 预决算支出偏离(Budgetdev) 既可能是“超支”也可能是“少支”, 但二者均为预决算偏离。本文借鉴刘子怡<sup>[24]</sup> 和李建军<sup>[25]</sup> 的做法, 将预决算支出偏离度做绝对值处理。计算公式为:

预决算支出偏离度 = (财政决算支出 - 财政预算支出) / 财政预算支出

### 3.2.2 核心解释变量: 财政透明度(Trans)

采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发布的 2013 - 2021 年《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中各市级政府的百分制全口径财政透明度得分来反映各地政府的财政透明度, 财政透明度得分越高表明地方政府财政透明度越高。

### 3.2.3 中介变量

财政自给能力(Fiss)。借鉴陈硕和高琳<sup>[26]</sup> 以及吕冰洋<sup>[5][10]</sup> 的做法, 使用地方财政收入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类衡量。

政府支出规模(Gov)。借鉴范子英<sup>[27]</sup> 以及毛捷和吕冰洋<sup>[28]</sup> 的做法, 使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地方 GDP 的比重类衡量。

参考江艇<sup>[23]</sup> 的研究, 利用传统的中介效应模型对中间机制进行分析可能存在偏误, 因此, 本文主要通过检验解释变量财政透明度对中介变量财政自给能力和政府支出规模的影响, 判断财政透明度对预决算支出偏离度的作用机制。构建模型如下:

### 3.2.4 控制变量

本文采用以下几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人口密度(Dens)用地区总人口数与地区土地面积的比值取对数后衡量; 经济发展水平(Pgdp)用人均 GDP 取对数衡量; 外商投资水平(Fdi)用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与地区 GDP 的比值衡量; 城镇化水平(Urb)用城镇常住人口与地区常住总人口的比值衡量; 教育支出水平(Edu)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的教育支出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值衡量; 资源依赖程度(Res)用地方采矿就业人数与总就业人数之比衡量。以上货币类变量均进行平减以排除价格因素干扰。

## 3.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由于一些地级市财政预决算报告缺乏完整性或缺失, 本文最终收集了 2013 - 2021 年全国 268 个地级市的财政支出预算和决算数据, 数据来源于地级市公布的各年度财政预决算报告, 通过手动整理收集。解释变量财政透明度的数据来源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发布的 2013 - 2021 年《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中的市级全口径财政透明度得分。所使用的地级市数据均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国研网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本文对主要变量进行前后 1% 的缩尾处理。表 1 为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1 描述性统计类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预决算支出偏离度	Budgetdev	2412	0.2153	0.2612	0.0000	1.7634
财政透明度	Trans	2412	0.4507	0.2014	0.0000	0.9215
经济发展水平	$P_{\text{GDP}}$	2412	10.8317	0.5419	9.0843	13.0557
教育支出水平	Exp	2412	0.1733	0.0382	0.0001	0.3042
外商投资水平	Fdi	2412	0.0184	0.0342	0.0002	0.9277
城镇化水平	Urb	2412	0.5797	0.1400	0.1815	1.0000
人口密度	Dens	2412	5.7823	0.9316	1.5173	7.8816
资源依赖程度	Res	2412	0.0415	0.0755	0.0000	0.4745
政府支出规模	Gov	2412	0.2062	0.1113	0.0439	2.0603
财政自给能力	Fiss	2412	0.4633	0.2072	0.0347	0.9946

## 4 实证结果分析

### 4.1 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选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在回归中同时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并采用稳健标准差。基准回归结果见表2,其中列1和列2分别为仅加入核心解释变量回归和加入核心解释变量、各控制变量回归的结果。从表2列1可以看出,财政透明度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从表2列2结果可以看出,加入控制变量后,财政透明度的系数为-0.1146且在1%水平上依然显著,表明财政透明度对预决算支出偏离度有着较强的抑制作用。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1) Budgetdev	(2) Budgetdev
Trans	-0.1173*** (0.0377)	-0.1146*** (0.0374)
$P_{GDP}$		-0.0498 (0.0422)
Fdi		-0.2106 (0.2256)
Exp		-1.0008*** (0.3503)
Urb		0.1070 (0.1565)
Res		0.0078 (0.2596)
Dens		-0.0358 (0.0308)
常数项	0.3312*** (0.0518)	1.2000** (0.5451)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N	2412	2412
Adj-R <sup>2</sup>	0.088	0.095

注:括号内是聚类到城市的稳健标准差。\*\*\*、\*\*、\*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以下各表同此注释。

财政透明度的提升能够促使地方政府对财政支出决策更加履行职责,由此抑制预决算支出偏离。并且随着财政透明度的提升,上级政府、公民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水平降低,政府的真实财政情况就会得到外界更多的关注,促使地方政府主动接受各方监督,提升预算编制能力和预算执行力,因此政府的财政支出行为会得到进一步的约束。基准回归结果验证了假说H1的观点。

### 4.2 稳健性检验

#### 4.2.1 剔除疫情干扰

为排除新冠疫情的干扰,剔除2020年的样本,结果见表3中的列1。回归结果显示,财政透明度对预决算支出偏离的系数仍为负数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此结果增强了结论的稳健性。

#### 4.2.2 更换被解释变量衡量方式

以往文献中对预决算偏离的衡量方式有多种,借鉴冯辉和沈肇章<sup>[29]</sup>的做法,使用支出决算和支出预算的比重作为预决算偏离的衡量方式。同时借鉴Williams<sup>[30]</sup>的做法,排除预算与决算离群点的影响,使用(支出决算数-支出预算数)/[(支出决算数+支出预算数)/2]来衡量预决算支出偏离。结果如表3的列2、列3所示,财政透明度对预决算支出偏离的抑制效果依然显著,证明了结论的稳健性。

#### 4.2.3 更换解释变量口径

本文使用的财政透明度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发布的《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报告》中的全口径财政透明度百分制得分,该报告中的财政透明度评分标准体系由机构设置公开、市级政府预算与预算执行、其他重要的财政信息、财政透明原则得分四个部分组成。本文选择缩小解释变量口径,使用市级政府预算与预算执行部分的单项得分取百分制作为解释变量回归,该单项得分为衡量政府对“四本账”公开程度的评分,对于解释变量有很好的替代性。回归结果如表3列4所示,更换解释变量后,财政透明度对预决算支出偏离的抑制效果依然显著,结果依旧稳健。

#### 4.2.4 子样本回归

由于直辖市相较于其他地级市有着不相同的城市规模等级和特殊的行政特征,本文将北京、上海、重庆、天津等城市样本剔除后重新进行回归,表3列5的结果依然在1%的水平上负向显著,足以证明结论的稳健性。

表3 稳健性检验

变量名称	(1)	(2)	(3)	(4)	(5)
	剔除疫情干扰	更换被解释变量 衡量方式1	更换被解释变量	更换解释变量 衡量方式2	剔除直辖市样本
Trans	-0.0820** (0.0406)	-0.1026** (0.0457)	-0.0838*** (0.0266)	-0.0769*** (0.0250)	-0.1142*** (0.0377)
常数项	1.5037* (0.8413)	1.4351** (0.7279)	0.9616*** (0.3729)	1.1752** (0.5450)	1.1423** (0.550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876	2412	2412	2412	2376
Adj-R <sup>2</sup>	0.086	0.076	0.103	0.096	0.096

### 4.3 内生性问题

为缓解相关内生性问题,借鉴郭月梅和欧阳洁<sup>[31]</sup>的做法,将地区的高等教育状况(Edu)作为财政透明度的工具变量,以每万人中接受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数占比衡量。一个地区居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较高,不仅可以使居民从政府公开的财政信息中获取关键信息并做出正确判断,进而为该地区营造更为严格的预算约束环境;同时该地区较其他地区也会有更多的预算管理人才,使得其预算编制和预算管理更为科学。因此,国民教育程度水平的提高是财政透明度提升的重要基础<sup>[32]</sup>。

表4展示了工具变量的两阶段回归结果。

表4 两阶段工具变量法结果

变量名称	(1)	(2)
	Trans	Budgetdev
Edu	1.4417*** (0.1511)	
Trans		-0.7207*** (0.1481)
常数项	0.2864** (0.2668)	1.7695*** (0.187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Cragg-Donald Wald F statistic		87.258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statistic		90.979
N	2412	2412
Adj-R <sup>2</sup>	0.119	0.033

表4列1显示工具变量与财政透明度显著正相关,此外,Cragg-Donald Wald F和Kleibergen-Paap rk

Wald F的值均远高于10%临界值16.38,通过弱工具变量检验。表4列2表明在控制模型的内生性后,财政透明度能够有效抑制预决算支出偏离的结论仍然成立。

### 4.4 异质性分析

#### 4.4.1 分地区异质性检验

异质性分析检验了不同地区之间财政透明度对预决算支出偏离影响的地区差异和地区特征。本文首先按照财政透明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中位数,将样本分为低财政透明度地区和高财政透明度地区、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表5展示了异质性分析结果。

表5列1、列2说明,不论是低财政透明度地区还是高财政透明度地区,财政透明度的提升对预决算支出偏离的抑制作用均在5%水平上显著,但低财政透明度地区每提升一单位的抑制效果更加明显,这是因为高财政透明度地区本身的财政信息公开较为完整,财政透明度的抑制作用较为饱和,而低财政透明度地区提升财政透明度对预决算支出偏离的抑制作用则会有更大的上升空间。表5列3、列4说明,财政透明度在经济发达地区对预决算支出偏离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分析其原因,发达地区因其拥有更雄厚的经济基础、更严苛的外部监督环境、更先进的支出预测技术和更完善的预算编制程序,不仅使当地政府能够更科学地编制预算,还能通过外部监督约束其支出行为。而处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政府往往没有优质的预算编制水平和良好的外部监管环境,加之因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而对转移支付产生依赖,导致预决算执行力度偏弱,预算资金的不确定性较大,更容易造成预决算支出偏离。

表 5 异质性结果 1

变量名称	(1)	(2)	(3)	(4)
	高财政透明度地区	低财政透明度地区	经济发达地区	经济欠发达地区
Trans	-0.1374 ** (0.0645)	-0.1861 ** (0.0790)	-0.0987 ** (0.0417)	-0.1111 * (0.0574)
常数项	2.1551 *** (0.7251)	1.3653 (1.3080)	1.0035 (0.6515)	-0.9065 (2.251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206	1206	1206	1206
Adj-R <sup>2</sup>	0.070	0.075	0.048	0.115

4.4.2 按中介变量高低程度分地区异质性检验

进一步依照中介变量财政自给能力和政府支出规模的中位数将样本数据分为高财政自给能力地区和低财政自给能力地区、高政府支出规模地区和低政府支出规模地区,异质性分析如表 6 所示。

表 6 列 1、列 2 显示,财政透明度的抑制作用在低财政自给能力地区和高财政自给能力地区均在 5% 水平上显著,但低财政自给能力地区的抑制效果更突出。其原因在于,低财政自给能力地区往往面临较大的财政压力,而财政透明度的提升一方面可以提升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强地方政府对税收违法行为的震慑效应<sup>[21][37]</sup>,使公民纳税遵从度提高。财政收入的增加使地方政府财政自给能力增强,较少地依赖转移支付,进而能更加自主精确地进行预算编制。因此,财政透明度的提升对低财政自给能力地区预决算支出偏离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

表 6 列 3、列 4 显示,低政府支出规模地区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其原因在于低政府支出规模地区

往往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当地政府更加注重地区全面发展以及公民的财政透明诉求,在受到监督后更愿意规范预算支出行为<sup>[33]</sup>,因此财政透明度的提升对预决算支出偏离的抑制效果更加显著。而高政府支出规模地区往往处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会通过扩张财政支出来发展经济<sup>[34]</sup>,容易导致支出规模膨胀。同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使得当地政府主要财政支出依赖于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sup>[35]</sup>。转移支付具有的粘纸效应会使得行政管理支出增加<sup>[19]</sup>,这可能会伴随寻租现象的发生。为了成功实施寻租行为,地方政府往往会故意造成部分财政资金信息的缺失或降低财政预算信息的规范性、公开的内容不易理解等,使得地方财政透明度难以得到真正提升<sup>[36]</sup>。同时由于对转移支付的过度依赖以及当地预算管理理念较落后等因素制约,使得高政府支出规模地区的预算编制缺乏自主性和科学性,更容易出现预决算支出偏离。因此,财政透明度的抑制作用并不显著。

表 6 异质性分析 2

变量名称	(1)	(2)	(3)	(4)
	高财政自给能力地区	低财政自给能力地区	高政府支出规模地区	低政府支出规模地区
Trans	-0.1186 ** (0.0544)	-0.1217 ** (0.0524)	-0.0939 (0.0602)	-0.1321 *** (0.0417)
常数项	0.8280 (1.0250)	1.0194 (0.7734)	-1.3751 (1.5415)	1.6525 (0.682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206	1206	1206	1206
Adj-R <sup>2</sup>	0.078	0.118	0.103	0.115

5 机制检验与分析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财政透明度可以通过提

高政府财政自给能力、控制政府支出规模来影响预决算支出偏离。本文借鉴贺晓宇<sup>[37]</sup>的做法,实证检验上述机制变量的作用路径。

表 7 中间机制分析结果

变量名称	(1) Gov	(2) Fiss
Trans	-0.0095 * * * (0.0047)	0.0086 * * * (0.0034)
常数项	1.6202 * * * (0.1186)	0.4150 * * * (0.063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N	2412	2412
Adj-R <sup>2</sup>	0.511	0.056

表 7 列 1 显示,财政透明度的系数在 5% 水平上显著且为负,说明财政透明度能够通过控制政府支出规模,降低预决算支出偏离度。财政透明度的提升缓解了公民与地方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公民可以提供更好的外部监督以约束地方政府的利己支出行为,抑制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张,降低预决算支出偏离度。同时财政透明度的提升使上级政府掌握了地方政府更完整的财政信息,不仅可以更好地纠正地方政府不当的支出行为和支出结构,还为上级政府制定更为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提供更为详实的事实依据,避免了地方政府年底面临“突击花钱”任务的窘境,进而降低预决算支出偏离的可能性。假说 H2 的观点得以验证。

从表 7 列 2 可知,财政透明度的系数为正且在 5% 水平上显著,说明财政透明度能够通过提高地方政府的财政自给能力,降低预决算支出偏离度。财政透明度的提高可以促进公民纳税遵从意愿的提升,进而提升了财政自给能力。财政自给能力的增强不仅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还缓解了地方政府对转移支付的依赖,政府将更多的自有财力用来履行支出责任,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时,财政透明度和财政自给能力的提升也强化了预算约束,使政府能够更加精确地编制预算,进而降低预决算支出偏离度。这也验证了假说 H3 的观点。

## 6 结论

基于 2013 - 2021 年全国 268 个地级市的财政预决算支出数据,通过实证分析了财政透明度与预决算支出偏离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财政透明度的提升对预决算支出偏离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证实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且异质性检验表明,财政透明度在低财政透明度地区、经济发达地区、低财政自给能力地区和低政府支出规模地区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机制检验表明,财政透明度可以通过提升地方政府财政自给能力、控制政府支出规模两个途径,抑制地方政府预决算支出偏离。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推进预算透明,保障公开质量。政府应着力提高财政透明度,尽可能将财政信息及时、全面、准确地公开并对专业性内容进行详细解释说明,以便公众更好地理解并进行有效监督,信息公开也有助于公民更好地履行纳税义务。同时要进一步健全财政信息公开系统,遵循“事前严防、事中约束、事后监督”的步骤,追评超支资金的使用效果,客观地进行预算绩效评价。

注重区域差异,规避“一刀切”式做法。一方面,各级政府要基于对本地经济形势和当年增减收入政策的合理判断,制定适合本地实情的预算计划。另一方面,要着眼于中长期发展,各区域要取长补短,共享财政信息,经济发达地区发挥带头作用,向经济欠发达地区传授先进的预算管理经验和编制技术。同时国家也应针对性地对地方政府提供帮助,合理分配财政资源,竭力向均衡发展迈进。

完善政府预算制度建设。一是完善我国财政分权体制,厘清中央与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同时加快地方税体系的构建和健全,以拓宽地方财源,提升地方财政自给能力。二是优化转移支付制度,以避免当地政府支出规模出现过度膨胀的现象。

## 参考文献:

- [1] 高培勇. 关注预决算偏离度[J]. 涉外税务, 2008(1): 5 - 6.
- [2] 肖鹏, 樊蓉. 地方财政透明度对财政预决算偏离度的影响分析[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21(3): 3 - 14.
- [3] 陈志刚, 吕冰洋. 中国政府预算偏离: 一个典型的财政现象[J]. 财政研究, 2019(1): 24 - 42.
- [4] 王秀芝. 1994 - 2007: 关于我国财政收支预决算偏差的考察[J]. 经济问题探索, 2009(9): 164 - 167.
- [5] 吕冰洋, 李岩. 中国省市财政预算偏离的规律与成因[J]. 经济与管理评论, 2020, 36(4): 92 - 105.
- [6] 魏彧, 梁蓝心, 罗志鹏. 数字化治理与政府预算偏离——基于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J]. 财经论丛, 2023(6): 25 - 35.
- [7] 马海涛, 白彦锋, 旷星星. 政治激励、财力缺失与地方非税收入预决算偏离度——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J]. 地方财政研究, 2017(1): 21 - 29.

- [ 8 ] 王华春,刘栓虎.政府财政预决算偏差治理研究[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6,18(4):7-12.
- [ 9 ] RIOS A M, GUILLAMON M D, BENITO B, et al. The influence of transparency on budget forecast budget deviations in municipal governments[J]. Journal of Forecasting, 2018(37):457-474
- [10] 李建军,刘媛.新《预算法》能够降低地方政府预决算偏离度吗?——来自四川省州市的证据[J].财政研究,2020(7):39-52.
- [11] 郭玲,汪洋.财政透明、预决算收入偏离与预算环境——基于2015年《预算法》的双重差分和合成控制分析[J].当代财经,2021(2):27-37.
- [12] 赵春晓,周波,管智超.财政透明、支出进度与预算执行紧缩[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4(1):72-87.
- [13] 龚锋,邓龙真.财政透明的治理效应研究[J].财政研究,2023(2):53-67.
- [14] 刘生旺,陈鑫.财政透明能约束政府行为吗?——基于政府行政管理支出视角的研究[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9,34(4):116-127.
- [15] 刘佳.地方政府财政透明对支出结构的影响——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5(1):21-27,158.
- [16] 梅冬州,王子健,雷文妮.党代会召开、监察力度变化与中国经济波动[J].经济研究,2014,49(3):47-61.
- [17] 杨志安,胡博,邱国庆.政府预算偏离的典型特征、现实症结及约束路径[J].经济研究参考,2021(12):21-34.
- [18] 王华春,刘清杰.地区财政预决算偏差与政府效率、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J].财经论丛,2015(11):34-42.
- [19] 储德银,费冒盛,李悦.均衡性转移支付、公共支出结构与经济高质量发展[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0(9):20-35.
- [20] 储德银,邵娇,迟淑娴.财政体制失衡抑制了地方政府税收努力吗?[J].经济研究,2019,54(10):41-56.
- [21] 储德银,姜春娜.财政透明、公共服务供给与企业纳税遵从[J].经济管理,2023,45(2):135-150.
- [22] 储德银,迟淑娴.转移支付降低了中国式财政纵向失衡吗?[J].财贸经济,2018,39(9):23-38.
- [23] 江艇.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J].中国工业经济,2022(5):100-120.
- [24] 刘子怡,王朵铎,汪依唯.政府预算的环境污染治理效应研究——基于预决算偏离的视角[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3,33(11):103-116.
- [25] 李建军,刘媛.新《预算法》能够降低地方政府预决算偏离度吗?——来自四川省州市的证据[J].财政研究,2020(7):39-52.
- [26] 陈硕,高琳.央地关系:财政分权度量及作用机制再评估[J].管理世界,2012(6):43-59.
- [27] 范子英,张军.粘纸效应:对地方政府规模膨胀的一种解释[J].中国工业经济,2010(12):5-15.
- [28] 毛捷,吕冰洋,马光荣.转移支付与政府扩张:基于“价格效应”的研究[J].管理世界,2015(7):29-41,187.
- [29] 冯辉,沈肇章.地方财政收入预决算偏离:晋升激励与税收任务[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5,30(5):58-68.
- [30] WILLIAMS D W. The politics of forecast bias: Forecaster effect and other effects in New York city revenue forecasting[J]. Public Budgeting & Finance, 2012, 32(4):1-18.
- [31] 郭月梅,欧阳洁.地方政府财政透明、预算软约束与非税收入增长[J].财政研究,2017(7):73-88.
- [32] 肖鹏,李燕.预算透明:环境基础、动力机制与提升路径[J].财贸经济,2011(1):21-25+85.
- [33] 朱颖,赵颖博,邓淑莲,等.公民诉求与地方财政透明度——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财经研究,2018,44(11):90-105,124.
- [34] LAMARTINA S, ZAGHINI A. Increasing public expenditure: Wagner's law in OECD countries[J]. German Economic Review, 2011, 12(2):149-164.
- [35] 李森.试论公共产品受益范围多样性与政府级次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及协调——对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再思考[J].财政研究,2017(8):2-17.
- [36] 王银梅,罗建,郑铿城.网络媒体监督、反寻租与地方财政透明度[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3(5):57-66.
- [37] 贺晓宇,储德银.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与城市创业活跃度提升[J].上海经济研究,2023(9):41-53.

责任编辑:费瑞波

## 新时代徽商文化国际传播的困境与出路

吴宜涛

(安徽工程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在新时代背景下,安徽省政府响应“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的文化国际传播政策,积极推动徽商文化的对外传播,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面临着译介资料匮乏、对外传播方式单一、语言表达有待改进、人才储备不够、传播效果不好等困境。基于文化翻译理论和传播学理论,徽商文化的国际传播可以从宏观对策和微观翻译策略两方面改进,借助多模态翻译和文创产业平台,打造文化翻译智才库,实现互动性传播、共情传播,多维度地译介徽商文化,为进一步提高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提供参考。

**关键词:**文化翻译;对外传播;多维度;策略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24)06-0072-04

### Dilemmas and Solution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Huizhou Merchant Culture in the New Era

WU Yi-tao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Anhu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Wuhu, 241000, Anhui)

**Abstract:** In the new era, in response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policy of “sharing Chinese culture with other countries” and “telling China’s stories well”, the government of Anhui province actively promote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Huizhou merchant culture, which has made some achievements. However, it still faces difficulties such as inadequate translated materials, single communication method, unidiomatic expressions, shortage of qualified talents, and unsatisfactory communicative effect. Based on cultural translation theory and communication theor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Huizhou merchant culture can be improved from measures at macro level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t micro level. By utilizing multimodal translation and the platform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a cultural translation talent pool can be established to achieve interactive and empathetic communication and achieve multi-dimensional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Huizhou merchant culture. By explor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Huizhou merchant culture, it provided reference in this paper for further enhancing the international capacity and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cultural translation; overseas publicity; multi-dimensional; strategies

徽州包括歙、休宁、婺源、祁门、黟、绩溪六县,以古徽州区域为核心发展起来的徽文化,涉及茶、酒、饮食、医学、建筑、戏曲、文学等方面,内容广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徽商即徽州商人,又称新安商人,萌生于东晋,唐宋时期壮大,足迹远至

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家及地区,与晋商、潮商并称中国古代三大商帮。历史上,徽文化的形成、发展和传播与徽商密切相关。徽商“贾而好儒”“崇文重教”,具有“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的商业道德和坚韧不拔、奋发进取的“徽骆驼”精神。安徽文化

收稿日期:2024-05-27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项目(SK2019A0111);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Q2019D120)。

作者简介:吴宜涛(1986-),女,安徽安庆人,讲师,硕士。E-mail:879196239@qq.com



资源丰富,在新时代背景下,安徽省政府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积极实施文化走出去发展战略,推动安徽文化产业成为重要的支柱性产业,基本实现现代化文化强省目标。在跨文化交际中,对徽商的良好品质以及发展历程的译介是一种无形的商品,会起到资本难以替代的作用。

## 1 徽商文化国际传播的现状与困境

徽商文化主要包括徽商历史典故、徽商名人故事和徽商精神内涵,内容丰富,是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徽文化符号之一。自2011年以来,在学术界,徽文化的译介与国际传播引起了詹全旺<sup>[1]</sup>、唐军<sup>[2]</sup>、丁立福<sup>[3]</sup>、牛津<sup>[4]</sup>等学者们的关注。但是聚焦徽商文化的译介,诸如期刊文章、著作、电视网络宣传材料都较少,无论是纸质文本还是电子文本都比较缺失,仅有几份翻译专业硕士的翻译实践报告,如《〈徽商与芜湖〉(节选)英译实践报告》<sup>[5]</sup>《纽马克翻译理论在英译徽文化及徽商期刊文章中的应用》<sup>[6]</sup>等。徽商文化在海外的接受度和影响力直接体现了外国友人对徽商文化的了解程度,也间接反映了目前徽商文化的翻译状况。通过调研外国友人对徽商文化的了解渠道、了解程度,发现充满魅力和浓郁文化底蕴的徽商文化鲜为人知。同时对徽商文化的译介和国际传播的研究也十分有限,只有零星的相关研究成果。例如,朱琳<sup>[7]</sup>在翻译实践报告《汉语历史文本中文化专有项英译策略研究——以〈徽商〉英译为例》中将文化专有项分类,通过量化分析总结出该书文化专有项翻译策略的使用频率和特征;亓恬<sup>[8]</sup>在翻译日本著名史学家中岛乐章著作《徽州商人和明清中国》的实践报告中,运用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从语义、结构、文化三个层面探讨了学术专著的翻译策略;吴秋红<sup>[9]</sup>在《〈尘劫记〉——徽州文化海外传播的硕果》一文中,介绍了徽州商人程大位及其呕心创作的珠算专著《算法统宗》,并考察了日本商人以其为蓝本创作的《尘劫记》大受欢迎的史实,认为《算法统宗》堪称徽文化对外传播的成功典范。相较于徽州文学(如桐城派等)、徽州艺术(如黄梅戏等),徽商文化的国际传播意识不强,与徽商文化的历史地位及影响力极不匹配。

究其原因,由于中国特色话语的特殊性和中文表达的模糊性,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及实践与西方主导的全球传播话语体系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文化对外传播极易陷入“事倍功半”“事与愿违”的话语困境<sup>[10]</sup>。徽商文化走出去需要一批既懂得文化

翻译、具备一定商务知识又深谙传播学理论的复合型外语人才,然而这方面的人才储备较为紧缺。另外,目前徽商文化的传播媒介比较单一,仍以传统的单模态文字转换为主,没有充分借助新媒体的优势。图画、视频、超文本等多模态媒介成为大众阅读世界、与世界互动的主要途径,其意义的建构与传播具有纸质媒介无法比拟的快捷性、直观性和愉悦性<sup>[11]</sup>。徽商文化的对外传播没有充分考虑到受众的接受性和阅读习惯,传播效果的欠缺与其陈旧的传播模式及途径不无关系。基于此,本文拟从优化徽商文化国际传播的宏观对策和徽商文化翻译的微观策略两方面来探讨新时代下徽商文化翻译及国际传播的出路。

## 2 优化徽商文化国际传播的对策

### 2.1 做好顶层规划,加大政策、资金支持

自“一带一路”国家倡议提出以来,安徽采取多方面措施加快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践行“发出安徽声音、讲好安徽故事”,旨在将安徽打造为文化强省。政府作为文化译介的策划者、赞助者、监督者,需发挥统筹、指导和宣传作用。徽商文化的挖掘及国际传播,需要政府统一规划,建议政府成立专门机构和学术平台,积极组织专业人员搜集、整理、完善并出版或发布徽商文化译介资料,组织专家和学者对徽商文化的译介进行质量评估,开展徽商文化对外传播研究,整合文化翻译项目资源,设立专项资助基金,利用“安徽外事”微信公众号展示徽商文化,与国际出版社探索徽商文化的译介及学术研究著作的海外市场。

### 2.2 转变文化单向传播为互动性传播

在未来传播中,社交媒体可能成为主要媒体,朋友圈、个人公众号可以成为传播主渠道。传播者与受众可以通过新技术场景式、适时性的相互交流,受众可以更积极地参与传播过程,例如通过点赞、评论、分享、创作内容等形式,社交媒体平台成为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和合作的便捷途径。民间团体是推动徽商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可以充分发挥社会资源的积极作用,鼓励民众尤其是粉丝数量大、受关注高的个人通过微信、微博、抖音等网络平台宣传和传播徽商文化,以短视频或短剧的形式,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和了解徽商文化。以多样化的表达形式,将文化元素融入日常生活,通过与其他国家的民间团体建立合作,将徽商文化向国外推广。另外,地方企业是徽商文化对外传播的关键力量,可以将徽商文化元素融入产品设计、生产、销售和企业文化中,在

海外经营的过程中,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让世界各国人民更好地了解和感受徽商文化。例如,2024 年 4 月 30 日,安徽知名汽车品牌奇瑞公司以“新能源、新生态、新时代”为主题在芜湖召开全球合作伙伴共创大会,当晚与会的 3000 余名海外伙伴共同参加 2024 年芜湖湖山音乐节,大会既有《女驸马》《梨园盛世耀中华》等经典民族音乐,又有来自澳大利亚、土耳其、西班牙等国的精彩表演,除了享受音乐外,还能品尝安徽特色美食,大大加深了外国友人对徽商文化及徽州文化的了解。

### 2.3 利用文创产业传播平台

文创产业范围主要覆盖信息服务、动漫游戏、设计服务、现代传媒、教育培训、文旅、艺术品、文化会展等领域<sup>[12]</sup>。如今文创产品已成为中国与其他国家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之一,是打通与其他国家人文交流与合作的桥梁,带动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教育、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充分利用安徽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深度融合文化和旅游,定期开展宣传徽商文化交流会,制作和传播以徽商文化为载体的徽商文创产品,并借助新媒体和各个网络媒体进行传播,打造别具一格的文旅产品,让文旅产业为徽商文化国际传播赋能。

### 2.4 打造徽商文化翻译人才智库

未来的文化翻译人才将是复合型人才,横跨文、理、工科,既要懂传播学理论,有一定的文字表达能力,还要会音视频制作和编辑技术,能熟练运用 ChatGPT、科大讯飞星火等人工智能工具。这要求我们在培养文化翻译人才时,重视培养学生跨学科视野,涉猎广泛的领域,学好并用好新技术。翻译协会、企业和高校可以进行产学研合作,共同助力徽商文化的国际传播。高校可以从教师队伍建设和专业人才培养两方面着手,打造一支政治立场坚定、跨文化交际能力突出、翻译实践经验丰富的专职教师队伍,由他们带领或指导青年学生熟悉徽商文化、开展徽商文化的译介活动。可以将徽商文化译介纳入翻译专业课程体系,也可以将其作为选修课纳入其他专业课程体系,让更多的学生关注并投入到徽商文化的国际传播中,从而培养了青年一代的文化自信。青年群体是推动文化对外传播的中坚力量,他们通过参与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与世界各国的年轻人建立联系和友谊,在共同学习中了解不同国家文化,当代中国青年应肩负起文明传承和文化传播的重任。另外,利用“他者”视角也是推广徽商文化、讲好徽州故事的重要策略。目前世界部分国家对中国的负面刻板印象,导致外国受众对中国存在

认知偏差,阻碍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可以充分利用各高校国际合作办学这一平台,让来华留学生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亲身感受来传播徽商文化,去发挥影响力带动更多的国际友人。这种借助他人传播的国际传播方式更具说服力,可以减轻受众的抵触情绪,引起情绪共鸣和文化认同,能够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

## 3 徽商文化翻译的具体策略

### 3.1 增强文化差异的敏感性

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英国学者 Susan Bassnet<sup>[13]</sup>认为,翻译作为一种文化交流活动,包括文化内部与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不是一种“纯语言”的行为,而是涉及语言所处的文化系统。徽商文化的翻译旨在达到原文和译文“文化功能等值”,具体策略包括增译文化负载词、略译或意译汉语含义相近的四字结构及复杂的修辞手法,增强目标读者的可接受性,尊重受众阅读习惯。比如,集中体现徽商精神的“徽骆驼”这一形象表述,通常被直译为“Hui Camel”或“Huizhou Camel”,对于多数不了解徽商文化的外国人来说,单纯的直译无法帮助他们理解短语蕴含的深厚文化历史背景知识,甚至会造成困惑,更不能激发他们对徽商文化魅力的兴趣。徽州不产骆驼,据史料记载,明末清初,金声抗清被俘于绩溪从山关,四面重山叠嶂,密命部下“要做徽骆驼,不降异族”。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胡适曾为江苏溧阳新安同乡会题写“我们是徽骆驼”的条幅,1953 年胡适又为台湾绩溪同乡会题写“努力做徽骆驼”的条幅,此后,“徽骆驼”之名不胫而走,意为徽州人无畏艰难,不怕牺牲,任劳任怨,跋涉不止的精神。如果在英译的过程中,能对“徽骆驼”涵义稍加解释,就能让外国受众加深对徽商精神内涵的认知,故可以增译“*It refers to Huizhou merchants' spirit of enduring hardships and bearing hard work, just like full-loaded camels in the desert.*”还可以利用新媒体平台,配上短视频,介绍徽商在创业过程中不畏艰苦、在经营过程中敢于面对失败以及失败后锲而不舍的进取精神,例如明代歙县商人江遂志终成著名大盐商的小故事。这样不仅能避免仅凭文字这种单一符号转换带来的文化精髓的丢失,还能增加传统文化的吸引力,容易引起受众的共鸣,提高徽商文化的传播效能,增强徽商文化的亲和力和感染力。

### 3.2 结合本土情况和受众语境

文化译介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必然涉及两种及以上文化,译者在立足本土文化的基础上,需要

充分考虑国外受众的心理需求、偏好和所属地的风俗文化,从接受者的角度来进行文化内容和表现形式的重构,让走出去的文化能够被接纳、被认可<sup>[14]</sup>。徽商是中国古代“儒商”的典型代表,“贾而好儒”是徽商的特点,受儒家思想文化及儒教的影响,古徽商具有极强的宗族宗法观念,加上当时强大的经济能力,修建了大量的祠堂。祠堂见证了明清时期徽商的辉煌与繁荣,与牌坊、民居并称“徽州三绝”。“祠堂”常被译为“ancestral hall”或“memorial temple”,可以稍加解释“The ancestral hall / memorial temple is not only used to worship ancestors or sages, but also an important place to deal with family affairs. Its purpose is to carry forward the thought of venerating ancestors, advocating filial piety as the first character, and maintaining and developing clan rule.”通过直译“祠堂”加上解释其功能,既向外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又考虑了外国受众的语境。“走贩”即长途贩运,是万历《歙书》归纳的徽商五种经营方式之一。徽商把本地的木材、土特产贩运到江浙等地,把太湖流域的丝绸,南方的茶叶、棉布运到全国各地,把皖南、闽、浙山区的木材从杭州转运到北方。这种经营方式对于缺乏中国文化背景知识的外国人是陌生的,故翻译时宜舍弃直译,意译为“long-distance trade”,既简洁明了又不会产生歧义。

### 3.3 适时改编或改写

安徽籍作家潘小平撰写的散文著作《徽商》中有一节描写徽商经营茶叶的史实,提到张志和“竹里煎茶”的小故事和白居易“浮梁买茶”的诗句来源,译成英语时,如果展开详细解释,篇幅必然大幅加长,受众不易理解,考虑到这两个典故与此部分篇章主旨的关系不是特别紧密,可以略去不译。或者可以采取直译加书后注释形式,既不影响可读性,又便于对该文化知识点感兴趣的读者了解学习。除了内容上的增删等,也可以对表达形式进行改编、改写。例如,BBC对很多经典英文名著进行改编,拍摄成迷你电视剧,如6集的《傲慢与偏见》、3集的《远大前程》、4集的《简爱》等等,甚至对文本进行改写,如迷你剧《神探夏洛克》,将原著的故事背景从19世纪大英帝国鼎盛时期搬到21世纪繁华热闹的大都市,该英剧从2010年第一季开始,一共推出了四季,深受当代年轻人喜爱和追捧。再比如以清末晋商女首富周莹为原型的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自开播以来收视率一路上升,使观众增加了对晋商的了解,助力了商帮文化的传播。学习借鉴晋商文化等其他商帮文化的传播方式,整合安徽文化

资源,提高对外文化交流平台的质量,更新传播模式和途径,运用日趋成熟的新媒体技术,助力有效地译介和传播徽商文化。

### 3.4 借助多模态翻译

在徽商文化传播实践方面,安徽各界做出了一些有益的尝试,比如自2005年开始举办的每年一届的国际徽商论坛,吸引了众多海内外宾客,投资拍摄了介绍徽商历史故事的影视剧如《大清徽商》《新安家族》《胡雪岩》等,但均没有外语版本,唯一一部英语版本的影视作品是2006年探索频道推出的纪录片《徽州商人今昔》,时长约45分钟。徽商文化的对外传播媒介方式亟待丰富。仅仅停留在文本层面的语言翻译难以真正克服意识形态差异,难以引起共情体验。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传播形式和平台日益多元,包括文字、图片、音频、视频、游戏、虚拟现实乃至元宇宙。以徽州文化符号之一“马头墙”为例,“马头墙”又称风火墙、防火墙、封火墙,是指高于两山墙屋面的墙垣,即山墙的墙顶部分,因形状酷似马头而得名。马头墙是标志性的徽派建筑特征。历史上,随着徽商经营活动范围的扩大,马头墙造型流布江苏、浙江、福建等地,也就是说,徽州马头墙的传播者是徽商。当今马头墙的防火功能早已弱化,更多的是装饰美化功能,同时也被赋予了徽商好儒、尚仕的文化内涵。甚至在海外,在波士顿、纽约唐人街的高层建筑上,也出现了像这样两面高出屋顶阶梯状递落的墙体<sup>[15]</sup>。马头墙不仅是一种徽州文化符号,也成为了中华文化在建筑领域的文化符号。目前,多数介绍徽文化或徽商文化的译本里,通常将“马头墙”译为“Ma Tao Wall”或“horsehead wall”,即采取音译或直译。虽然各国的语言和文字不同,给人们的交流造成了障碍,但视觉符号能跨越障碍,而且比语言、文字更直观。如果仅用音译或直译,“马头墙”这一造型优美、内涵丰富的文化精髓就丢失了,译者可以诉诸非语言符号途径,而图像正是非语言符号的典型代表。“同一文本,是否配有图像会带来完全不同的阅读体验。”<sup>[16]</sup>在翻译“马头墙”时,可以将单一的文字模态转化为文字和图像双模态,加入图片便于受众理解,让受众能领略徽派建筑的审美志趣。目前,视频音频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和娱乐的主要方式之一,随着VR、AR技术的发展,在未来的翻译及对外传播中,可以利用科技公司研发的空间计算设备及智能可穿戴设备,在虚拟空间里观察触摸并感受到色彩、形状和质地,为受众带来身临其境的体验。

## 叙事学视角下林语堂编译《促织》探析

范海遐

(福建商学院 外国语学院,福建 福州 350016)

**摘要:**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怎样让目标读者接受中国故事成为传播的关键。从叙事学的角度出发,通过译本细读,结合原文分析得出林语堂编译的《促织》在叙事结构、叙事内容和叙事主题三个方面发生了变化。通过这些变化减少有碍于目标读者理解的文化隔阂,增加故事情节,使故事更加生动和人物关系更加真切,使译本中包含的中国文化元素在目标读者群中具有更强的可读性和吸引力,从而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

**关键词:**叙事学;林语堂;《促织》编译

中图分类号:H315.9;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24)06-0076-05

### Lin Yutang's Compilation of *Cricke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rratology

FAN Hai-xi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Fujian Business University, Fuzhou, 350016, Fujian)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elling Chinese stories well and spreading Chinese culture”, it becomes the key to communication how to make the target readers accep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rratology, through the close reading of the translation, combined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original, it concluded that there are changes in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narrative content and theme of the *Cricket* compiled by Lin Yutang. Through these changes, the cultural barriers hinder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target readers were reduced, and the vividness of the story plot and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racters were increased. It makes the Chinese culture contained in the translation more readable and attractive to the target readership, so as to better spread the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Narratology; Lin Yutang; *Cricket* compilation

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大背景下,怎样更好地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成了一个关键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讲故事是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通过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讲故事,最重要的是解决好讲什么、怎么讲的问题<sup>[1]</sup>。由于讲故事的接受对象是外国受众,讲故事的内容和讲故事的方式要按照外国受众可以接受的方式进行,才有利于文化的传播,要做到“中国故事、国际话语、本地讲述”,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用好国际化传播平台,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sup>[2]</sup>。翻译对传播中国文化和讲好中国故事起着重要作用。

### 1 《聊斋志异》译介

《聊斋志异》为清代小说家蒲松龄创作的文言文短篇小说集。该书不仅在国内家喻户晓,也是最早走出去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之一,1842年至今一百八十多年的英语译介与传播史中诞生了近二十个译本<sup>[3]</sup>。陈吉荣以《聊斋志异》英译本为例进行了神话文学的翻译形象解读<sup>[4]</sup>。杨青青等以《聊斋志异》杨宪益英译本为例,发现意识形态对译者在翻译文本选择、原文内容的改写以及翻译策略选择等方面有所影响<sup>[5]</sup>。王树槐等对闵福德翻译的《聊斋志异》副文本进行了研究,对中国文学和典籍外译

提出建议<sup>[6]</sup>。周畅从三个层面分析了闵福德译本和翟理斯译本重合选择的31篇故事,认为闵福德译本准确、晓畅易懂,并认为原因在于闵福德沟通中西的文化立场与重构两个层面的“异”的翻译观<sup>[7]</sup>。

目前,从叙事学角度分析《聊斋志异》翻译的研究较少。本文应用案例分析法,以林语堂编译的《英译重编传奇小说》中《促织》为例,以叙事学理论为基础,比较林语堂编译本与原文在叙事结构、叙事内容和叙事主题等方面的不同。希望通过本研究能够发现怎样以目标读者容易接受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以期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提供借鉴。

## 2 叙事理论介绍

在中西叙事理论中,叙事结构都是研究重点<sup>[8]</sup>。在传统叙事学中,亚里士多德从生物学概念“头”“身”“尾”强调了情节结构必须完整,强调了所有事件序列在起因、发展和结构过程中必须有因果关系和有机联系<sup>[9]</sup>。叙事结构是故事的基本框架,按照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来组织故事情节发展,引入角色。典型的线性叙事结构包括五个方面:起始部分、冲突发展、高潮、结果及结局。当然有一些作品可能采用非线性结构,通过回溯、倒叙等手法重新排列情节,为读者呈现更富有层次感的故事。总体而言,叙事结构是故事的框架,它为情节的发展提供了有序的架构,使读者更容易理解和沉浸在故事中。

叙事内容指故事中的各种要素和关系,以及各个要素如何共同构建一个叙事体验。角色发展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力量。读者通过角色的行为、决策和变化理解故事中发生的事情,通过文字体会角色情感体验。角色之间的关系对角色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它可以推动故事的发展。角色之间的冲突、合作或变化都可以成为情节发展的动力,从而推动故事向前发展。通过角色之间的互动,角色的性格和动机都可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角色的变化不仅能增加故事的复杂性,还使角色更有深度和真实性。通过构建生动的人物形象,叙事内容表现道德伦理关系,为读者搭建起与角色进行交流的一个渠道<sup>[10]</sup>。当读者与角色之间的关系产生共鸣时,读者才能感受角色之间的情感。

叙事主题是作者想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或核心信息。主题的挖掘不仅要关注故事本身,更要分析情节以及文字本身。通过文本细读,读者才能更好地感悟出作者想要传达的观点。有的主题表达比较直接,在故事中通过对话、作者的陈述或其他明确的方式被表达出来。有些主题并不直接表达,而是要通

过隐喻、象征等修辞才能呈现,读者需要通过深层次的解读和思考才能揭示这些隐含的主题。主题通过角色在故事中的行为和选择反映出来。主题与角色的经历和发展,以及角色之间的冲突紧密相关。这些冲突可以是内在的,也可以是外在因素引起的,都有助于突显主题的重要性。当然同一个故事选用不同的视角来描述时,表达的主题也有可能不同。

## 3 《促织》原文和林语堂译文叙事对比

《聊斋志异》有多个译本,名人名家译本的差异很多时候不是体现译者的水平高低,“而是翻译标准之别。”<sup>[11]</sup>通过文本细读,发现林语堂的编译利于读者理解和接受,对《促织》原文进行了创造性改编。下文将详细分析林语堂编译和原著在叙事结构、叙事内容和叙事主题方面的异同。

### 3.1 叙事结构不一致

林语堂编译的《促织》打破了原作典型的线性叙事结构,采用了非线性叙事结构。原文《促织》叙事结构单一,属于按时间顺序单线叙事。开篇即:“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此物故非西产。”介绍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和背景。一名叫成名的男子被县令任命担任里正的差事,成名千方百计抗拒都无法推脱这一差事,“百计营谋不能脱。”因为捉不到优良促织而家产赔净,忧闷欲死。在妻子的劝说下早出晚归,尝试各种方法都捉不到促织。县令规定的期限到了,因为没有捉到优良的促织,成名被打上百板子。村里来了一位驼背巫婆,成名妻子准备好钱以求巫婆,从而得到一幅画,画中有促织。成名尽管被打了一百杖,行动不便,然而他强起扶杖,按照巫婆所给图的指示到寺庙后山捉促织。终于捉到一只优良促织,举家庆贺,用蟹白栗黄喂这只促织。然而成名的儿子看父母不在时,打开盒子,促织迅速逃出盒子,成名的儿子在捉捕的过程中,促织“股落腹裂,斯须就毙”。成名妻子发现促织死后大骂儿子,于是成名儿子离家,到半夜也没回家。找到时发现成名儿子已经沉在水井里,父母化怒为悲。所幸的是成名的孩子半夜复苏。在成名夫妻一筹莫展时,忽然听到门外有促织的叫声,一只促织突然跳到成名的衣袖里,成名见促织形态,花色和神情,觉得应该是一只优良的促织,就开心地把促织留下来。促织被进贡后,在宫廷里促织大胜,“宰悦,免成役。”过了一年后,成名子精神复旧,说他自己变成了促织,身轻敏捷,善于搏斗。此后,成名家不再贫困,而是“田百顷,楼阁万椽……一出门,裘马过世家焉。”从以上对促织故事的叙述,可以看出原著是

按时间顺序单线叙事结构展开的。

林语堂编译的《促织》中题目变为 *The Cricket Boy*，其叙事结构与原著有比较大的区别，既扩展故事空间和时间，又增加情节。林译的故事开头描写孩子吉弟，即成名儿子。开篇写到“*When Kiti, a boy of eleven, came home with his father after a day's fruitless search for crickets, he had a most wonderful feeling—the discovery of his father as a play companion.*”（吉弟是个十一岁的孩子，一天和父亲出去捉促织，空跑了一天回来，但是他觉得很高兴，因为今天父亲和他玩耍，成了他一个玩耍的好伴侣。）林译故事开头吉弟和父亲出去捉促织，细致描写了吉弟的性格，兴趣爱好。而在原文中是在成名终于捉到一只上等的促织后才交代有个儿子。即“成有子九岁，窥父不在，窃发盆，虫跃掷径出，迅不可捉”。林语堂的编译还以倒叙的方式穿插了吉弟六岁那年发生的一件令人难忘的事：吉弟把一个促织带到私塾，被老师发现了，老师把促织用脚踩烂。吉弟大怒，从椅子跳骑到老师背上，使劲往老师身上捶。这个小插曲也为后续故事展开做了铺垫，因为后文写到小促织（成名儿子化身）与另一只促织相斗时，小促织用力一跳，大牙咬进对方的脖子。至于为什么成名要和他儿子吉弟一起去捉促织，林译在故事中设置悬念让读者好奇，后来吉弟询问母亲才得知原因，是因为要给皇上进贡。吉弟了解原因后为父分忧，继续和父亲一起上山捉促织。终于捉到一只优良的促织，真是欢天喜地，心花怒放。然而回家后吉弟听到装促织的罐子没有声音，没有动静，他就慢慢地把罐子打开，促织却冷不防地跳了出来。在捉促织的过程中吉弟把促织弄死了。吉弟因为惧怕父母责备而跑出家门，半夜都没有踪迹，等父母找到时，发现已经沉落在井底。后来父母在悲痛中发现吉弟还活着。随后吉弟一直昏迷不醒，其魂魄化身为一只勇猛善斗的促织，连公鸡都能打败，这只促织被送进皇宫。从此吉弟都是半死不活的，但是睡梦中总是说着和促织有关的话。到此，林译版双向叙述：一是继续写吉弟的心理变化和身体变化；二是促织从成名家被送进皇宫，百战百胜。随后，吉弟家的运气好转，吉弟进了太学，“*a hanlin, and was able to support his parents in ease and comfort in their old age*”，后来还做了翰林，父母老年也跟着享福。

### 3.2 叙事内容有变化

林语堂编译的《促织》家庭成员之间关系与原文不同。第一，家庭成员不同。在原文中只写到成名，成名子和成名妻。成名“操童子业，久不售。为

人迂讷”。成名是个读书人，长期没有考中秀才，为人又比较拘谨，不善于说话。这是对成名的介绍。而对成名妻没有过多的介绍，只是对其行为有所描述，即成名自寻促织，无果后，妻求驼背巫得画，终得促织。以及孩子弄死这只好不容易得来的促织后，大骂孩子，孩子害怕跑出家门，最后在水井里被找到。夫妻只能回到家里哭泣，觉得生活没了依靠，直到儿子复苏后心稍宽慰。在原著中对成名儿子也没有太多的描述，只写把促织弄死后，害怕父母责备而掉进水井里，半夜复苏，魂魄变为促织，因为勇敢善斗而被选入皇宫，并最终取得胜利。林语堂编译的《促织》主要人物也是成名，成名妻和成名子，但是文章是以成名儿子吉弟的视角出发，故事开头就是介绍成名子吉弟，第二段写到“*When his brother was Kiti's age, he was already a great help to his mother, but not Kiti.*”（哥哥当年像吉弟这么大的年岁时，已然成了母亲的一个大帮手。）“*...his only sister was married into a family in another town.*”（姐姐嫁给一个远处的人家。）提到吉弟死去的哥哥和远嫁的姐姐，是为了突出吉弟被父母宠爱，特别是母亲对他的娇惯，对孩子的宠溺，慈母形象跃然纸上。

第二，家庭人员关系不同。原文比较少写成名子和父母之间的互动，成名夫妻之间也比较少有直接的对话，只是客观地描写发生的事件。比如在成名与妻子的互动中，两次写到妻子帮助成名从忧闷中走出来，用实际行动去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困难，和成名共同面对孩子掉到水井。原文中父子之间的关系也没有过多的描写。而林译本对人物的描写比较细腻，人物关系描写也比较真切。林语堂编译文中写到“*Kiti was an extremely impressionable child.*”（吉弟是个生性敏感的孩子。）“*He had always had a great fear of his father.*”（他一直很怕父亲。）而母亲对吉弟却是娇惯（*pampered by his mother*）。当父子俩去捉促织时，父亲也不好意思明说是去捉促织，这样的描写既表现出成名的性格，也体现出父子关系比较冷淡。吉弟后来还是通过母亲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去捉促织。吉弟通过和母亲的对话明白了父亲去捉促织不是因为喜欢促织，是因为要给皇上进贡而不得不去捉。父子去捉促织的过程中有不少对话，与原文相比表现出比较正常的父子关系。父子合作抓到了一只“黑脖子”促织，多日辛苦终于如愿以偿。总之，林译本中，家庭关系写得比较多，父子以及母子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以对话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这样更容易让读者接受。通过人物之间的对话描写，能够更好地塑造人物的性格。

第三,林语堂编译本对原文内容做了一些删减。林语堂编译增加了叙事内容,比如增加成名和儿子吉弟一起捉促织情节,描写父子关系,解释了为什么吉弟害怕父亲。林语堂编译特别详细地描写了吉弟非常喜爱促织,其中写道“他(吉弟)从小就迷促织……他躺在床上听促织的叫声,觉得是天下最美音乐……从那种音乐的声音里,他感觉出来有善良、有美丽、有健康。”西方读者对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习俗了解有限,删除了原文中古代官职和年号,成名妻子求助巫婆的情节也删除了。

### 3.3 叙事主题有出入

《促织》原文中当政者强迫老百姓上交促织,成名儿子无意中弄死刚捉来的促织,而后投井,魂魄化身促织被献到宫中,全家才幸免于难。原文深刻揭示当政者的贪婪、凶残和自私,同时也批判了封建官僚制度腐朽和横征暴敛的罪行。蒲松龄通过《促织》寄托了对受尽欺压和迫害的下层百姓的深切同情。原文也表达了作者的一种希望:“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林译本的主题与原文主题有非常大的不同,原文结尾:“闻之:‘一人升天,仙及鸡犬。信夫!’”而林译本去掉了“成仙升天,鸡狗上天”这样的概念,结尾处点题写道“*There are many ways of showing filial piety. When one's heart is good, the spirits of heaven and earth will show mercy to them that love their parents.*”(尽孝之道很多,人必须心肠好。天地间的神灵总是保佑孝顺父母的人)林译本在故事结尾投射温情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光影,林语堂在异质力量的交汇或交锋中顽强地寻找可行的文化合作或合成之道<sup>[12]</sup>。

此外,原文中几乎不涉及父子之间关系的描述。在林译本中增添了父母和吉弟的对话,通过人物之间的对话和互动体现家庭伦理关系,比如父亲对吉弟说,“*Kiti, bring that bamboo box. We will go to the southern hills.*”(吉弟,带着那个竹匣子,咱们到南山去。)父亲的这句话使得吉弟高兴得像过新年一样。译本描述父子一起捉促织:“*The father and child, net in hand, ran all over the foothill slopes.*”(他同父亲二人,拿着网,满山坡上跑。)*“He had seen his father's eyes shine when they heard a clear, sharp note.”*(一听见清脆的鸣声,他就看见父亲的眼睛闪亮。)通过细腻的描写将亲子关系体现得淋漓尽致,使情节发展更加合情合理。

## 4 《促织》原文和林语堂译文叙事差异讨论

中国文化走出去并不是一帆风顺,甚至有学者

认为,中国文化要走出去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sup>[13]</sup>。但在1989年,美国前总统布什访问东亚时曾说林语堂讲的是数十年前中国的情景,但他的话今天对我们每个美国人都受用<sup>[14]</sup>。正如陈平原所说,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大概没有人比林语堂更西洋化,也没有人比林语堂更东方化。正是林语堂既西洋化又东方化,才能创造出一种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新文学<sup>[15]</sup>。通过分析《促织》原文和林语堂的编译《促织》差异,发现林语堂编译标准是译文要具备“可读性和吸引力”<sup>[16]</sup>。林语堂为了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在编译时以目标读者为导向,采取灵活的方式,减少文化差异,吸引目标读者,从而有利于中国文化传播。

首先,通过叙事结构变化来制造悬念,使故事引人入胜。原作《促织》采用了传统的按时间顺序单线叙事结构,原作开篇写老百姓需要捉促织的原因,接着写主人公成名捉促织,失去促织,后成名子化身为促织并被送进皇宫参加斗促织。故事基本是平铺直叙,没有人物之间的对话,没有制造悬念,这样的叙事不容易引起读者好奇。而林语堂编译的《促织》则采用了更为复杂的双向叙事结构:一是写皇宫因为斗促织盛行而每年向老百姓征收促织税,而成名家因为捉不到促织而发生的故事;二是描写吉弟的成长经历,描写吉弟从小爱促织和喜欢捉促织,从一开始吉弟不明白父亲为什么和他一起去捉促织,到后来心里只明白捉促织是一桩极其重要的事,以及最后吉弟魂魄化为促织为并被送进皇宫参加斗促织。由此可见林语堂编译的《促织》叙事方式更符合西方读者的审美趣味,通过先写捉促织再写为什么平时不爱促织的成名也和儿子吉弟一起去捉促织,为故事后续发展制造悬念,使故事引人入胜,从而使译本更具备可读性和吸引力,进而激发西方读者的好奇心。

其次,通过叙事内容变化,凸显人物性格和人物关系。林语堂编译的《促织》故事核心内容和原文一样,都是围绕成名儿子魂魄化为促织而展开。但是具体叙事内容不一样,原著主要通过人物行动来展现人物性格和内心世界,很少写人物之间的互动,这样的叙事方式在西方读者心目中可能显得过于简洁和缺乏情感表达,难以引起共鸣。林语堂的编译描写人物之间互动,增加父子一起捉促织以及吉弟喜欢促织等内容,使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物个性和人物关系,增强了故事的可读性。增加父子互动情节更符合西方读者对家庭关系的理解,增加吉弟对促织的喜爱和了解这一内容更容易引起西方读者

对吉弟魂魄化为促织产生共鸣。

最后,叙事主题变化彰显家庭伦理道德。《促织》原文揭示了封建制度下当政者的贪婪、凶残和自私,寄托原作者对受尽压迫的下层群众的深切同情,同时呼吁对权力的审视和反思。如果把原文直译为英语故事,这样叙事主题过于政治化。林语堂的编译调整了故事情节,避免了过多涉及中国古代特定的政治和社会背景,更注重家庭伦理关系和孝道,通过吉弟与父母之间的情感交流和对话,强调了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和关怀,故事结尾强调“父母老年很享福”彰显家庭伦理道德。以家庭伦理关系为中心的叙述主题更贴近人性,与西方文化对家庭价值观念的重视相契合,这样的主题叙述更容易引起西方读者的情感共鸣。林的编译通过弱化政治色彩,突出家庭情感和人性关怀,更容易让西方读者接受和理解。

总之,林语堂的编译保留了原故事主要情节。穆永寿通过对比发现,较之于原文叙述,译文显得更加真实可靠<sup>[17]</sup>。林的编译更加有利于目标读者接受,所以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大背景下,为减少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使中国文化在目标读者群中具有更强的可读性和吸引力,林语堂的编译策略仍然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 5 结论

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怎样让国外了解中国故事和接受中国文化成为传播的关键。从叙事结构、内容和主题三个方面比较《促织》原著和林语堂的编译文本,发现译文在这三个方面做出了调整,减少不利于目标读者理解的文化差异,以目标读者容易接受的方式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当然,本文仅从《促织》的原文和林语堂的编译进行比较,希望以小见大,为讲好中国故事和传播中国文化提供参考。期待未来从叙事学角度有更多更全面和深入的文学翻译研究,从而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和传播中国文化。

## 参考文献:

[1] 学习强国平台,中国记协网. 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

中国声音? [EB/OL]. (2020-04-15)[2023-12-22]. [https://article.xuexi.cn/articles/index.html?art\\_id=8729248219042684830&item\\_id=8729248219042684830&part\\_id=8729248219042684830&study\\_style\\_id=feeds\\_default&id=1586965464132&showmenu=false&ref\\_read\\_id=cdbcaff2-d124-49a7-9d1d-930f804022f7\\_1716815216602&pid=&ptype=-1&source=share&share\\_to=copylink](https://article.xuexi.cn/articles/index.html?art_id=8729248219042684830&item_id=8729248219042684830&part_id=8729248219042684830&study_style_id=feeds_default&id=1586965464132&showmenu=false&ref_read_id=cdbcaff2-d124-49a7-9d1d-930f804022f7_1716815216602&pid=&ptype=-1&source=share&share_to=copylink)

- [2] 杜尚泽. 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N]. 人民日报,2016-02-20(1).
- [3] 李海军. 从跨文化操纵到文化和合——《聊斋志异》英译研究[D]. 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1:12.
- [4] 陈吉荣. 神话文学的翻译形象解读——以《聊斋志异》英译本为例[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2(4):41-46.
- [5] 杨青青,严苡丹. 意识形态对杨宪益翻译的操控——以《聊斋志异》英译本为例[J]. 外语教育研究,2015(4):45-49.
- [6] 王树槐,韦雅琪. 闵福德译《聊斋志异》副文本:功能、成因及启示[J]. 外语研究,2022(1):85-90.
- [7] 周畅. 闵福德《聊斋志异》译本显化翻译研究[J]. 蒲松龄研究,2023(2):75-88.
- [8] 方志红. 中西叙事结构理论中的三对概念比较[J]. 中华文化论坛,2016(7):97-102.
- [9] 申丹,王丽亚. 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6.
- [10] HARVEY W J. Character and the Novel[M]. London: Chatto & Windus,1965:31.
- [11] 外宣微记. 笔尖上的文化碰撞 对外话语与翻译[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146.
- [12] 谈凤霞. 论美国华裔唐人街童年叙事的文化身份建构[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16-27.
- [13] SUN W. Mission impossible: SoftPower, communication capacity,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medi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0(4):54-72.
- [14] 施建伟. 林语堂在海外[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2.
- [15] 陈平原. 在东西文化碰撞中[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2.
- [16] 王小静. 林语堂文化传播体系对中国文化外译的启示[J]. 名作欣赏,2020(9):34-35.
- [17] 穆永寿. 林语堂《中国传奇》叙事主体研究[J]. 汉字文化,2023(8):158-160.

责任编辑:寇国庆



# “找译法”与“创译法”在食品安全专业术语翻译中的应用探究

刘雪莹\*, 陈娜, 唐静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通识教育与外国语学院, 安徽 芜湖 241100)

**摘要:**将“找译法”和“创译法”应用于食品安全领域专业术语翻译,有助于解决该领域术语翻译中概念不准确、译名不统一等问题。分析了“找译法”和“创译法”的主要内涵及研究现状,并结合食品安全领域科技文献与译文及翻译实践,总结食品安全领域文献翻译中食品专业术语的特点,探究“找译法”和“创译法”在专业术语翻译中的具体应用,并针对其中的问题进行分析,以期为相关翻译研究提供一定借鉴。

**关键词:**专业术语翻译;找译法;创译法;食品安全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24)06-0081-05

## Application of “Equivalent-seeking Translation” and “Initiative Translation” in the Translation of Food Safety Terminology

LIU Xue-ying\*, CHEN Na, TANG Jing

(School of General Education and Foreign Languages, Anhui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uhu, 241100, Anhui)

**Abstract:** Applying the “equivalent-seeking translation” and “initiative translation” to the translation of food safety terminology can help solving problems such as inaccurate concepts and inconsistent translations in this field. It first analyzed the main connotations and research status of the two translation methods in this paper, and combined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s in the field of food safety and the translation practice to summari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ood terminology in this field, explored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and analyzed the problems of the two translation methods in terminology translation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translation research.

**Key words:** terminology translation; equivalent-seeking translation; initiative translation; food safety

食品是比较特殊的商品,与人的健康直接相关。因此,食品安全是当今行业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近年来,食品科学和技术快速发展,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与日俱增。而国内外关于食品安全领域文献的翻译质量影响着研究成果的有效传播。由于食品安全专业知识和术语构成的复杂性,该领域专业术语的翻译一直存在概念不准确、译名不统一等问题,对科技文献的翻译与传播造成很大障碍。而将“找译法”和“创译法”应用于食品安全领域专业术语翻译有助于解决该领域翻译相关问题。

## 1 “找译法”与“创译法”辨析

### 1.1 主要内涵

在术语学视角下,术语的形成首先要概括物质或非物质物体的属性,从属性中抽象出特征,根据特征确定概念的内涵,最后确定概念的语言指称。但世界上存在多种语言,同一个概念可以有多种语言指称。如果我们要把一个专业术语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就需要在两种语言中找到概念的“对等”。因此,术语翻译本质上就是匹配概念的不同语言指称。匹配分为两种情况:当某个概念的等价指称在译入

收稿日期:2024-06-05 \* 通讯联系人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项目(SK2021A0827);2024年校级教学改革课程:英语教学实训。

作者简介:刘雪莹(1991-),女,安徽芜湖人,助教,硕士。E-mail:lxyl029ab@163.com

语中存在时,译者应找到该指称与原语术语指称进行匹配,完成语言转换;如果在译入语中找不到等价指称时,译者需要借助已有信息创造出新的译语指称,并将其引入目标语中<sup>[1]</sup>。前者可概括为“找译法”,后者可概括为“创译法”。

“找译法”是一种依据原语术语的含义,通过适当的方法,直接从译语专业文献中“找出”与原语术语相对应的译语术语的翻译方法<sup>[2]</sup>。该方法可以实现概念意义和语用效果上的最大等值转换。“创译法”是指在译语中不存在原语术语的等价指称时,译者按照自己对原语术语内涵和本质的理解,采用直译、意译、形译等方法为原语术语概念创造一个译语新指称的翻译方法,很多学者又将其称为“现有译法”。“创译法”的关键在于译者可以依据具体情况选取不同的术语翻译方法对源语术语概念进行再命名。

然而在诸多术语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中,鲜少有人提及术语翻译时应首先甄别原语术语有无译语对应词这一前提条件。很多译者在翻译术语时直接采用直译、意译、音译、形译等“现有译法”,这造成术语误译现象普遍存在。

## 1.2 研究概况

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只有使用“找译法”才能得到与原语术语相对应的正确的译语术语。纵观术语翻译文献,虽未有学者明确提出“找译法”这一概念,但找译译法思想由来已久,中国清末民初著名翻译家严复、傅兰雅都曾在其著作中提及找译译法思想<sup>[3]</sup>。黄建华等<sup>[4]</sup>提出:“进行术语翻译时,应尽可能从译入语中找出等价的术语,而不只是对术语进行‘翻译’。”魏向清等<sup>[5]</sup>认为:“在术语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尽可能在目的语中找到与源语术语对等或接近对等的专门术语。”

2016年,李亚舒和徐树德结合多年术语翻译经验和术语命名规律,首次提出一种新的专业术语翻译方法,并正式将其命名为“找译法”。他们将直译、意译等翻译方法统称为“现有译法”或“创译法”。此后的几年中,陆续有学者对“找译法”和“创译法”进行研究。沈群英<sup>[6]</sup>认为采用“找译”路径可以翻译目的语文献中已有对应词的原语术语,采用“创译”路径可以译出目的语文献中无对应词的固有术语,从而达成准确的术语译名。李亚舒和等<sup>[7]</sup>继续对两种翻译方法进行探索,他们认为:索绪尔语言符号任意性论断和不变性论断分别是“创译法”(现有译法)和“找译法”的理论基础。“创译法”适用于无译语对应词的原语术语翻译。而“找译法”

适用于有译语对应词的原语术语翻译。也有部分学者将“找译法”和“创译法”应用于科技翻译的各个领域。李成明等<sup>[8]</sup>认为“现有译法”(创译法)和“找译法”可以作为计算机领域英语文献的根本翻译方法。曾姝<sup>[9]</sup>表示在术语翻译过程中,译者应把“现有译法”和“找译法”结合起来对术语进行检索及验证,以追求术语翻译的准确性与规范性。颜静等<sup>[10]</sup>采用“找译法”和“创译法”优化和规范中医产后病名,为中医病名翻译提供了思路和方法。卢华国等<sup>[1]</sup>对术语“找译法”做了详细解释,并对“创译法”做了迄今为止最全面的论述(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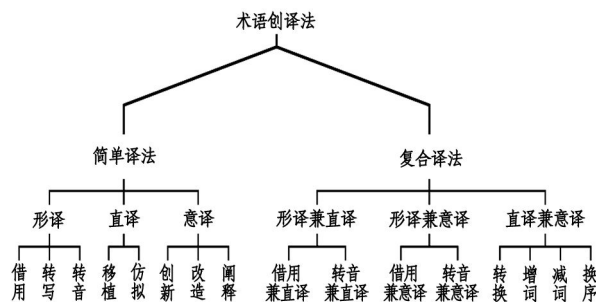


图1 术语创译法

## 2 食品安全领域专业术语的特点

### 2.1 专业词汇丰富

食品安全涉及的专业领域较为广泛,包括食品生产、食品包装、食品保存和食品运输等。因此该领域包含了大量专业知识和术语,其中很多术语属于纯技术词汇,专业性强、涉及范围广,如:staphylococcus aureus(金黄色葡萄球菌)、macrophages(巨噬细胞)、polysaccharide(多糖)等。此外,食品安全行业往往涉及许多长而复杂的术语,这些术语使相关人员在表达与交流方面遭遇阻碍,因此常使用缩略词来代替,例如:ATP(Adenosine Triphosphate,三磷酸腺苷)、EDTA(ethylenediaminetetraacetic acid,乙二胺四乙酸)、STEC(Shiga toxin-producing E. coli,产志贺毒素大肠杆菌)等。这些术语在传达特定概念和信息时至关重要。通常这类术语已经有了统一译名,译者在翻译时可以借助于权威工具书或网络搜索采用“找译法”进行翻译。

### 2.2 一词多义情况较多

此外,食品安全领域存在大量由半技术词汇构成的专业术语。半技术词汇是科技文本中使用最广泛的词汇,科学思想传播和技术内容扩展主要依靠半技术词汇<sup>[11]</sup>。该类词汇的特点是一词多义,即在不同的专业领域具有不同的含义。如:食品包装领域的术语 active packaging(活性包装),是指为了延

长食品保鲜期而采用的一种新型包装技术。“active”一词属于半技术词汇,其基本词义为“积极的,主动的”等意思,但在食品安全领域译为“活性的”。译者如果不仔细甄别这类术语,就会造成术语误译。因此,针对这类术语的翻译,如果在译入语文献中已有译名,应该采用“找译法”解决问题;若无对应译名,则需要根据语境,准确了解术语涵义,采用直译、意译、形译等“创译法”或者两种方法相结合进行翻译,避免造成术语误译。

### 2.3 涉及多个学科领域

食品安全是当今行业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在其生产、加工、保存、包装、运输各个环节都涉及不同的学科知识,包括医学、工程、航天、物流、电商等。此外,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使得新的食品成分、加工、包装及食品安全技术不断涌现,导致食品安全领域出现大量新术语。例如:术语“environmental audit”就是在随着环保意识的逐步加强,食品环保方面的审核更加严格的情况下出现的。由此可知,食品英语是一种特殊性的科技英语<sup>[12]</sup>。在翻译食品安全领域专业术语时,译者需要综合考虑以上特点,打好牢固的专业基础,并对翻译文本涉及到的其他学科领域专业知识有一定的了解,以确保翻译内容精确,并符合文化和专业要求。

## 3 “找译法”与“创译法”在食品安全领域专业术语翻译中的应用

从语言角度看,对于一些孤立存在的词、短语或句子,我们很难判断其完整意义。只有在特定语境中,我们才能确定特定单词或句子的确切含义<sup>[13]</sup>,专业术语的翻译也是如此。因此,下文中关于专业术语的翻译皆是基于特定的语境。笔者结合食品安全领域科技文献与译文,以及笔者自身翻译实践,探索在食品安全专业术语翻译过程中如何具体运用“找译法”与“创译法”。翻译过程如下:确定术语概念内涵;判定有无对应译语;区分情况,确定译名;若译语中存在等价术语,采用“找译法”确定译名;若不存在等价术语,则采用“创译法”确定译名。

### 3.1 “找译法”在食品安全专业术语翻译中的应用

由上述食品安全领域专业术语的特点可知,该领域专业词汇丰富,且存在大量纯技术性词汇。根据术语命名基本原则,一个术语只表述一个概念,同一个概念只用同一个术语来表达<sup>[14]</sup>。这类术语通常已有对应译语。译者应首先了解原语术语的含义,然后查找各类已整理资源,包括纸质、在线词典及术语库、语料库等。从这些官方资源里找到的对

应语,属于已规范术语,译者通常可以直接使用。需要注意的是,有些术语由于译名不统一或应用领域不同等原因可能找到多个译名,译者还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选择 and 甄别。在翻译术语时通过“找译法”查找、借用译语国家已有的对应术语或约定俗成的表达,可有效避免术语误译现象。

例 1 ...the fullerens showed good antimicrobial activity against *P. acnes*, *S. epidermidis*, *C. albicans*, and *M. furfur*.

……富勒醇对痤疮丙酸杆菌、表皮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和糠秕马拉色菌表现出良好的抗菌活性。

由上述例子可知,原句中有 4 个以大写字母开头的专业术语。从上下文可以推断出它们指的是 4 种真菌。考虑到不同国家、民族之间食品安全知识有着相通性,因此可以使用“找译法”进行术语翻译。文章以“*M. furfur*”为例,阐述“找译法”的翻译过程。在纸质词典和一般在线词典中均未找到该术语的对应译法,使用“google”搜索引擎,查出“*M. furfur*”一词有两种译法:“秕糠马拉癣菌”和“糠秕马拉色菌”。为了确保术语译名统一,以“秕糠马拉癣菌”为主题在 CNKI 进行搜索时,没有找到相关的中文文献。以“糠秕马拉色菌”为主题进行检索,共检索到 337 篇中文文献。因此,采用“找译法”,结合 CNKI 平台,最终确定该词译为“糠秕马拉色菌”。

此外,一些术语在专业词典中尚未收录其译语对应术语,译者常常需要通过查找搜索引擎、检索软件等一系列工具,掌握相关搜索技能,花费很多精力才能找到对应的术语译名。

例 2 The extraneous maximum residue limit for some pesticides have been prescribed.

对一些药物的再残留限量做出了具体规定。

经查找专业资料得知,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对术语“extraneous maximum residue limit”作出的官方解释是:Maximum concentration of a pesticide residue, arising from environmental sources (including former agricultural uses), other than from the use of a pesticid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on the commodity, that is recommended to be permitted in or on a feed or food commodity. 该术语在纸质和在线词典中均未找到对应术语译名。但查询“maximum residue limit”得知该术语译为“农药残留限量”。因此使用“google”搜索引擎,采用诱导词查询法,输入“‘extraneous maximum residue limit’ 农药残留限量”,得出该术语的官方译法为“再残留限量”,意为“一些持久性农药虽已禁用,但还长期存在环境中,从而再次在食

品中形成残留,为控制这类农药残留物对食品的污染而制定其在食品中的残留限量”与其英文说法相吻合。由此得出了“extraneous maximum residue limit”的正确译名。

除诱导词查询法之外,译者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推敲词义、推理论证、对比定义、逐项排除等多种方法来寻找原语术语对应词<sup>[2]</sup>。这些都是“找译法”的具体运用。

### 3.2 “创译法”在食品安全专业术语翻译中的应用

术语翻译历来是科技翻译的重点和难点,食品安全领域存在大量由半技术词汇构成的专业术语,在不同的领域术语含义不同,即一词多义。这种现象加大了术语翻译的难度。而食品安全英语创生新词的能力又很强,导致新的词汇和术语不断涌现。对于该类术语,在译入语中已有译名的采用“找译法”进行翻译。如果译入语文献中无法找到固有术语的对应词,使用“找译法”已无法满足译者需求,这时就需要使用“创译法”来解决问题。

例3 Chelating agents such as ethylenediaminetetraacetic acid (EDTA) are well known to act as preservative boosters.

众所周知,乙二胺四乙酸(EDTA)等螯合剂可作为防腐增效剂。

该句的主干是“Chelating agents are well known to act as preservative boosters”。“chelating agents”译为“螯合剂”,螯合剂的作用是螯合细菌细胞膜上的钙离子,从而使防腐剂更易渗透到菌的内部,达到更好的防腐效果。但“preservative boosters”在纸质、在线词典以及使用网络引擎后均未找到对应译语,因此采取“创译法”,将“preservative”直译为“防腐”,“boosters”汉语意思为“加强剂量”“起推动作用的事物”“助推火箭”“拥护者”等,因此将其意译为“增效”,并添加中心词“剂”,明示类属特征。该词译法采用“创译法”中的直译兼意译,并通过增词,增加了源语字面上没有的内容。

例4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the two essential oil components to preserve hummus spread was well demonstrated.

这两种精油成分对鹰嘴豆酱的协同保鲜作用已经得到充分证实。

通过语境得知术语“hummus spread”为一种食品,在现有译语文献中尚未找到对应术语译名。“hummus”译为“鹰嘴豆泥、鹰嘴豆沙”,是一种中东食品,该食品是将鹰嘴豆、油和大蒜捣碎而成。“spread”在纸质词典中作为名词的解释是“涂面包

的酱”。词典中给出了一些例子。例如:“cheese spread”译为“奶酪酱”,“chocolate spread”译为“巧克力酱”。因此该术语可以采用“创译法”中的直译法进行翻译。采用仿拟,将构成该术语的单词按顺序逐项翻译形成新的译语指称。因此“hummus spread”最终译为“鹰嘴豆酱”。

### 3.3 两种译法相结合进行专业术语翻译

有时对于新出现的专业术语,我们在现有目的语文献中无法找到对应术语,也难以理解其概念内涵,单纯采用“找译法”或“创译法”无法满足实际需求。此时需要先采用“找译法”找到该术语的确切含义,然后采用“创译法”进行翻译,使两者相结合以找到源语术语的确切译法。

例5 These nano-composites can be applied for the preparation of eco-friendly “fruit switches”.

这些纳米复合材料可用于制备环保型“水果包装纸”。

原文中的“fruit switches”为食品安全领域新出现的专业术语,在汉语文献中无法找到对应的译语术语。其中“fruit”作为日常用词可以直接译出,“switch”一词作为日常用语时意思是“开关”,但在法律领域指“转换”,在交通运输工程领域指“道岔”,在医学领域指“替代”。但在现有文献中找不到与该词相对应的翻译,也无法弄清该术语所表达的概念内涵。正确理解原语术语的概念内涵,是“找译法”的第一步。因此首先采用“找译法”,通过查找专业资料,得出该术语的官方解释:“Eco-friendly fruit switch” is a kind of graphene oxide-based wrapper for programmed fruit preservative delivery to extend shelf life。(“Eco-friendly fruit switches”是一种基于氧化石墨烯的包装材料,用于水果的程序化保鲜递送,以延长保质期)。此外,从该术语所在的上下文可以推测出,这种包装材料的成分是“纸”,因此译者采用“创译法”将该术语的前半部分直译为“水果”,将后半部分“switch”意译为“包装纸”。添加中心词“纸”,明示类属特征,使读者更易于理解和接受。

例6 In specific cases, vulnerable groups of the population, e. g. institutional feeding, may have to be considered.

在特殊情况下,应该把弱势群体的问题考虑在内,比如集体供餐。

该句中“institutional feeding”在纸质、在线资源中均未找到对应译语。如果直接采用“创译法”中的直译进行翻译,则译为“机构供餐”,但显然该译

法不易被读者所理解。因此译者首先采取“找译法”,经过查找资料,得出该术语所在句子出自《食品法典——食品进出口检验与认证体系》,根据法典中陈述的食品质量管理准则,产品的安全性信息包括公共餐饮业加工等过程中的人群风险控制,因此推测出原文是以“institutional feeding”为例来说明企业内部集中性供应餐食。根据术语所传达的含义,采用“创译法”中的意译将该术语译为“集体供餐”。该译法可使译者更容易理解整句的含义。

## 4 “找译法”与“创译法”用于专业术语翻译时要解决的问题

### 4.1 “找译法”对译员搜索信息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信息量激增的大数据时代,科技翻译的需求也在增长,对翻译质量和速度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科技新词的出现使得纸质词典根本无法满足需求,译者想在短时间内正确翻译专业术语,提高翻译效率和产能,必须具有较强的搜商(搜索能力)。但目前翻译领域的现状是很多译员不能很好地利用搜索引擎查阅译语专业文献资料,也未掌握高级搜索语法、诱导词查询法等相关搜索技巧。译者定向搜索能力不强也成为了导致术语译名难以统一的原因之一。因此,如何提升译者的搜索能力,在短时间内快速获取所需要的信息知识,是当代翻译教育工作者必须解决的问题。

### 4.2 “找译法”要求译者必须具备相应的甄别能力

不管是纸质词典、专业文献,还是网络搜索得来的术语,结果都会存在译名不统一现象。如何对术语译名进行甄别,去伪存真,使术语译名达到规范、统一,也是译者翻译能力的体现。搜索引擎有助于处理专业术语翻译问题,但借助网络翻译术语也存在明显的不足,译者必须具备一定的甄别、判断能力。此外,有必要对各领域的专业术语误译进行纠错,避免因译者造词而产生的术语泛滥,尽量做到术语译名的规范和统一。

### 4.3 多数情况下,“创译法”需要借助“找译法”才能实现

在上述关于运用“创译法”的例子中,翻译“hummus spread”时虽然使用了直译法,但译者首先运用“找译法”在纸质词典中分别找到了“hummus”和“spread”的含义,再运用直译法译出该术语。因此在翻译专业术语时,译者应首先运用“找译法”,通过查阅各种双语词典或者网络搜索获得与原术语对应的译语术语。通过“找译法”找不到对应的译

语术语时,则应考虑使用“创译法”解决问题。

## 5 结论

食品安全专业术语的翻译对于食品安全科技信息的传播至关重要,统一、准确的译名也是衡量翻译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找译法”的提出和“创译法”的完善为专业术语的规范和统一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在食品安全领域专业术语翻译中,对于在译入语中有固定译名的术语,译者首先应查找权威文献找到对应的源语译名。对于暂时没有译名的术语,译者可以直接采用“创译法”或者在“找译法”的基础上进行创译,从而使得食品科技的翻译更准确化、规范化和专业化。

## 参考文献:

- [1] 卢华国,张雅.普通术语学视角下的术语翻译方法再梳理[J].中国科技术语,2022,24(2):12-20.
- [2] 李亚舒,徐树德.术语“找译译法”初探[J].中国科技术语,2016(3):35-38.
- [3] 李亚舒,徐树德.剖析术语误译,兼论“找译译法”[J].中国科技术语,2018,20(6):67-72.
- [4] 黄建华,陈楚祥.双语词典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05.
- [5] 魏向清,赵连振.术语翻译研究导引[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323.
- [6] 沈群英.“找译”与“创译”达成术语译名[J].中国科技翻译,2018,31(4):20-22,54.
- [7] 李亚舒,徐树德.语言符号任意性和不变性视角下的术语翻译方法研究[J].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0(3):213-218.
- [8] 李成明,康雁雁,聂国庆.计算机领域英语文献翻译方法研究[J].海外英语,2021(16):19-21.
- [9] 曾姝.基于语料库的“hardcore”和“硬核”对比研究及互译策略[J].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3(1):16-20.
- [10] 颜静,储晓娟,都立澜.中医产后病病名术语英译探讨[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23,29(7):1170-1175.
- [11] 方梦之.英语科技文体范式与翻译[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1:52.
- [12] 王芳芳.食品化工英语翻译的理论与实践探索[J].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2023,14(20):324.
- [13] 蔡力坚.基于语境的翻译决策[J].中国翻译,2021(3):186-188.
- [14] 冯志伟.现代术语学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35.

## 唐诗及其英译中的感知路径虚拟位移探析

赵茹梦\*,冯传振

(广州理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540)

**摘要:**以 Talmy 位移事件框架理论和虚拟位移理论为研究视角,以许渊冲译《唐诗三百首》(中英文对照)为语料来源,分析了英汉感知路径虚拟位移表达在位移主体和位移路径概念编码上的异同。研究表明:唐诗中感知路径位移主体主要为转喻型体验对象,呈缺位状态,许版译本主要采用增主语的翻译技巧;唐诗及许版译本感知类虚拟位移路径概念表达均以零路径构式为主;唐诗及许版译本中视觉路径卫星结构编码不同;唐诗听觉路径表达无卫星结构编码,英文译本无路径动词编码。

**关键词:**感知路径虚拟位移;唐诗;英译;位移主体;位移路径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24)06-0086-07

### Sensory Paths Fictive Motion in Tang Poetry and Its English Translation

ZHAO Ru-meng\*, FENG Chuan-zhe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zhou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540, Guangdong)

**Abstract:** Based on Talmy's Motion-Event Framework and Fictive Motion Theory, it adopted 300 Tang Poems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Prof. Xu Yuanchong in this paper as research object and analyz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conceptual encoding of the "figure" and "path" elements in sensory paths fictive motion between the Tang poems and their English transl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etonymic experienter as the most dominant form of figure element of sensory paths cannot be founded in Tang poetry, and Xu's English translation is done majorly by adding subjects to supplement the figure element; Both Tang poetry and Xu's English translation have the tendency of using zero paths; Different satellites structures are encoded in visual paths in Tang poetry and Xu's English translation; Auditory paths in Tang poetry employ no satellites structures for the path element, while auditory paths in Xu's English translation have no auditory verbs code.

**Key words:** sensory paths fictive motion; Tang poetry; English translation; figure; path

20世纪80年代,认知语言学家 Talmy 提出虚拟位移(Fictive motion)这一概念<sup>[1-4]</sup>。根据 Talmy 的研究,虚拟位移指静态场景的动态识解,即通过心理模拟对静态场景进行动态加工。以诗句“牧童遥指杏花村”为例,在实际物理空间中,“牧童的手”与“杏花村”的位置关系呈静态,但却能够激发人们在潜意识中进行动态心理模拟:有一个无形的箭头从

牧童手指尾端发出,并沿指向运动,直至作用到终点(杏花村)。Talmy<sup>[1-2]</sup>将虚拟位移分为六大类,其中散射型路径是一个重要类别,其特征是位移主体的运动轨迹成散射状,含四个子范畴:方向路径(Orientation Paths)、辐射路径(Radiation Paths)、影子路径(Shadow Paths)和感知路径(Sensory Paths)。本文聚焦于感知路径范畴,感知路径虚拟位移包括对

收稿日期:2024-04-23 \* 通讯联系人

基金项目:广东省本科高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建设项目(2023SZL02);广州理工学院科研启动经费项目(2023KYQ137)。

作者简介:赵茹梦(1998-),女,河南新乡人,助教,硕士。E-mail:zrm1999010@163.com

两个实体的概念化,即体验者(Experiencer)和体验对象(Experienced),以及在两个实体间朝某个方向沿笔直路径运动的不可触知事物的概念化<sup>[5]</sup>。感知路径主要包括视觉路径(Visual Paths)、听觉路径(Auditory Paths)和嗅觉路径(Olfactory Paths)。

自 Talmy 的虚拟位移理论问世以来,国内外语言学家对虚拟位移事件表达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究。Slobin 着重分析了卫星框架语言(英语与俄语)及动词框架语言(西班牙语与土耳其语)视觉路径位移构式的异同,探究了运动路径和视觉路径的异同<sup>[6]</sup>;Matsumoto 对十种不同语言视觉运动的表达进行了对比分析,得出不同语言在编码视觉路径信息时具有多样性<sup>[7]</sup>。Matlock 通过心理实验以及眼动实验验证了虚拟位移表达具有心理现实性<sup>[8]</sup>;Cacciari et al. 分别对 9 名受试进行 TMS(经颅磁刺激)研究,证明运动动词成分对运动系统的兴奋度有影响<sup>[9]</sup>;Bruhn 尝试将虚拟位移构式运用到文学作品分析中,认为虚拟位移构式能激活读者诗歌中的美好体验<sup>[10]</sup>。相关研究理论阐释较多,目前逐步转向实证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国内学界对虚拟位移现象研究起步较晚,郑国锋<sup>[11]</sup>、舒丽敏<sup>[12]</sup>、黄妮<sup>[13]</sup>等学者对感知虚拟位移事件(主要为视觉路径)的路径表达、路径语义、路径词汇化模式进行了分析、研究和探讨;近几年的研究热点主要从隐转喻、概念整合以及识解等理论出发阐释虚拟位移构式的认知机制(杨京鹏等<sup>[14]</sup>;周文芳等<sup>[15]</sup>)。但总体而言,关于感知类虚拟位移事件的研究较少,且以唐诗及其英译本作为对象的研究更是寥寥可数。

《唐诗三百首》作为广泛流传的唐代诗歌选集,其英文译本众多,对中国文学的国际传播产生了显著影响。许渊冲(1921—2021)在中华典籍英译中成绩斐然,他运用自己独具匠心的翻译理念,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与西方文学语言相融通的对外文学话语体系<sup>[16]</sup>。其《唐诗三百首》(中英文对照)<sup>[17]</sup>为汉英对照版本,既保留了古诗的原汁原味,又以国外读者易懂的表达展示了中国古代典籍的原貌。因此,本文选取许渊冲译《唐诗三百首》中英文对照文本为研究语料(见表 1),以 Talmy 位移事件框架理论和虚拟位移理论为研究框架,系统分析其中英汉感知路径位移主体及位移路径概念在语言表达上的异同,以期丰富英汉虚拟位移语言对比分析研究。

## 1 语料界定标准及研究方法

Talmy<sup>[2]</sup>提到了感知路径的两种分支类型:“体验者为始源”型(experiencer as source)和“被体验对

象为始源”型(experienced as source)。前者指体验者发射从本身移动到被体验对象的探测物(probe),于相遇时对被体验对象进行探测,如(1)a、(2)a;后者指被体验对象发射从本身到体验者的刺激(stimulus),于相遇时在感知上刺激体验者,如(1)b、(2)b。在这两类分支中,实际体验对象与被体验对象均处于静止状态。

(1)a. The enemy can see us from where they're positioned. (敌人可以从他们的驻扎地看见我们。)<sup>[2,6]</sup>

(1)b. We can be seen by the enemy from where they're positioned. (我们可以从敌人的驻扎地被他们看见。)<sup>[2,6]</sup>

(2)a. 我闻琵琶已叹息(白居易《琵琶行》)(Listening to her sad music, I sighed with pain.)<sup>[17]</sup>

(2)b. 雄鸡一声天下白(李贺《致酒行》)(When the cock crows, all the world will see daylight.)<sup>[17]</sup>

视觉路径是典型的散射型路径,其中视力可以被视作从观察者发出的探测系统,该系统在触及远端物体时会使人产生一种视觉体验如(1)a、(1)b<sup>[13]</sup>;听觉路径从感知者耳朵前端发出无形的射线,直至到达远端的声源物体(2)a,或反之(2)b。借鉴郑国锋等<sup>[11]</sup>在基于语料库分析英汉视觉虚拟位移路径表达研究中的语料界定标准,本文主要依托三条标准:首先,视觉(Sight)、听觉(Hearing)和嗅觉(Smell)体验路径既可以由体验者到被体验者,也可以由被体验者发出刺激作用到体验者;其次,移动主体仅限于视线、听觉和嗅觉路线或者被观察实体,但结果代表行为的转喻<sup>[13]</sup>;最后,感知虚拟位移至少经过一次视线、听觉和嗅觉路线的移动,包括发出、中间移动过程及投射。基于上述标准,本文通过人工筛选许译版《唐诗三百首》感知路径虚拟位移句,手动标注诗句中认知要素(见下文)的编码形式;为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实施了双重交叉检查机制。对比分析许渊冲译《唐诗三百首》的汉英文本中感知路径虚拟位移句在句法层面的构式异同。基于上述,本研究对许渊冲译《唐诗三百首》的汉英平行语料进行了整理分析(见表 1—表 3)。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研究的语料为唐诗及其英文译本,中英文虚拟位移事件表达数量相差甚微,因此表 1 和表 2 不分别对中英文本加以分类,且一首唐诗中可能会包含多种不同类型的虚拟位移事件表达,因此表 1 和表 2 中总计数量不等于子范畴之和。

表1 《唐诗三百首》(中英文对照)中虚拟位移六大路径表达统计

	散射路径	模式路径	相对框架路径	显现路径	接近路径	共同延展路径	总计
频数/首	165	0	5	14	35	26	210
频率/%	78	0	2	7	17	12	100

表2 唐诗三百首中散射路径虚拟位移表达统计

	辐射 路径	影子 路径	方向 路径	感知 路径	总计
频数/首	58	20	30	116	165
频率/%	35	12	18	70	100

表3 唐诗三百首中感知路径虚拟位移表达统计 句

	视觉路径	听觉路径	嗅觉路径	总计
汉语/句	83	51	1	135
占比/%	61	38	1	100
英语/句	94	63	1	158
占比/%	59	40	1	100
总计/句	177	114	2	293

由表1可知三百首唐诗中有210首含有不同类型的虚拟位移表达,结合上述统计,聚焦于唐诗中较多的感知路径虚拟位移表达,并基于Talmy提出的“Figure-Motion-Path-Ground”位移事件框架——该事件框架包含了动体(即位移主体)(figure)、运动方式(motion)、运动路径(path)、移动背景(ground)四个主要概念要素<sup>[3]</sup>,以177句视觉路径表达和114句听觉路径表达作为研究语料,探析唐诗及许版译文中感知路径虚拟位移主要要素编码(位移主体和位移路径要素)的异同。

## 2 位移主体的编码分析

真实位移中位移主体指的是发生位置移动的物体,比如在例3的唐诗及许版译本中:

(3) a. 汗 (figure) 滴 (motion&path) 禾下土 (ground)<sup>[17]</sup>

(3) b. Their sweat (figure) drops on (motion&path) the soil (ground).<sup>[17]</sup>

此句中“汗”作为位移主体,位置发生移动;“滴”作为方式动词,既表明了运动进行的方式,又暗藏了运动路径(由上至下);位移终点是“土(the soil)”。但虚拟位移事件的位移主体比较特殊,已有研究表明虚拟位移主体通常具有无生命性、不可位移性、空间延展性等语义特征<sup>[18]</sup>。基于Talmy<sup>[2]</sup>

提出的感知路径的两种分支类型,感知虚拟位移事件表达通常以体验对象或被体验对象为主语。英文表达体验对象做主语时句式为主动语态,而被体验对象做主语时句式常用被动语态。研究发现因唐诗结构的特殊性,其感知路径表达皆为主动语态,英译本则视情况选择主动或被动语态,但受源文构式影响,许版译本中主动语态占绝大部分。

(4) a. (体验对象缺位) 听 (Auditory verb) 雨 (声: Experienced) 寒更彻 (无可《秋寄从兄贾岛》)<sup>[17]</sup>

(4) b. I (experiencer) hear (Auditory verb) a shower (Experienced) cold which grieves.

(5) a. 笛中 (Experienced) 闻 (Auditory verb) 折柳 (李白《塞下曲》)<sup>[17]</sup>

(5) b. Songs on the flute (Experienced) are heard of (Auditory verb) willows green.

例(4)a、(4)b听觉路径表达中体验对象作为位移主体出现,由人耳发出触线抵达被体验对象“雨声(shower)”,体验对象型位移主体在唐诗中呈缺位状态。白雪飞<sup>[19]</sup>将虚拟位移主体分为真实型和假想型、隐喻型和转喻型。静态物体具备位移特征主要动因是观察者的主观介入。转喻要求在同一认知域内通过凸显度较高的、容易可及的、具象的事物指代凸显度较低的、不易可及的、抽象的事物。体验对象“人”与“视线”“人耳的触线”在概念上邻近,但前者比后者凸显度更高,抽象度更低,因此触发以“体验对象”指代“位移主体”这一转喻,所以许版译本用人称代词或名词对体验对象型位移主体进行占位。

如例(4)a省略体验对象,但其暗含的体验对象是诗人自己,“诗人”指代由人耳发出的触线。许版译本则采用增添主语的翻译技巧对位移主体“1”进行占位。被体验对象“雨”做听觉动词“听”和“hear”的宾语,为主动语态,此类表达在唐诗及许版译本中俯拾皆是。而例(5)a、(5)b中被体验对象“笛声”作为位移主体编码成主语,许版译本则为被动语态,中英文中都隐去了体验对象。唐诗听觉路径中被体验对象作位移主体也会引发“发音实体”指代“声音(被体验对象)”的转喻,后接发音动词,



如下文中提到的“向晚猩猩啼 (At dusk the monkeys cry); “灯下草虫鸣 (By lamplight the insects chirp in my hall.)”等,同样无体验对象编码,英译本对照翻译。但唐诗听觉路径虚拟位移被体验对象作位移主体的表达相对较少,且许版译本基本对照原文翻译,因此在此不做细究。

视觉路径虚拟位移进行位移的主体是视线或被体验对象发出的刺激。与听觉路径相同,唐诗原文视觉路径位移主体主要以体验对象为主,也呈现出体验对象缺位现象。视觉路径体验对象多为“人”,即在唐诗视觉路径构式中主语缺失,许版译文借助使用增主语的翻译技巧,为感知虚拟位移体验对象型位移主体进行增位。

(6)a. (位移对象缺位) 举头 (manner + path) 望 (Visual verb) 君门 (Experienced /ground) (高适《别韦参军》)<sup>[17]</sup>

(6)b. I (Experiencer) gazed at (Visual verbs + Satellites) your mansion (Experienced/ground) with longing looks.

(6)a 中唐诗为中文典型的无主句,体验对象缺位,此处的体验对象为“诗人”,用来指代“视线”这一位移主体;“举头”指的是视线发生移动的路径和过程;“望”是典型的视觉动词;“君门”是视线移动的终点;许版译本(6)b 中增添了体验对象“I”,结合视觉动词 gaze,卫星词 at (见下文),以及呈视觉实现方式的 with longing looks,才完整表达了整个视线

的移动过程。此外,《唐诗三百首》原文视觉路径中以被体验对象作位移主体的情况很少,样本数量太少无法纳入研究。综上,唐诗中感知路径位移主体主要为体验对象,且呈现缺失状态,即在唐诗中无编码形式;而许版译本中通过增添主语的翻译技巧对体验对象型位移主体进行占位,主要编码为人称代词或名词。

### 3 路径概念编码分析

Talmy<sup>[3]</sup> 将世界上的语言大致分为两类:动词框架语言 (Verb-framed Language) 和卫星框架语言 (Satellite-framed Language), 其分类标准是:空间移动的路径 (path) 在这个语言中是通过主要动词词干部分词汇化,还是通过动词以外的部分词汇化,简而言之,前者的路径主要由动词来表征,后者则由附加语 (卫星词) 来表征。卫星结构 (Satellite) 多为动词小品词 (verb particles), 比如:“look into” 中的“into” 表示“往……看一眼”的“往”,主要传递路径信息。英语是典型的卫星框架语言,但目前学界对于汉语的分类尚无定论<sup>[11]</sup>。

#### 3.1 英汉语视觉路径表达对比分析

视觉虚拟位移的路径主要由卫星结构,视觉路径动词以及零路径方式表征<sup>[12]</sup>。语料分析研究发现《唐诗三百首》及其许渊冲译本中视觉路径虚拟位移皆存在此三类表征 (见表4)。

表4 《唐诗三百首》(中英文对照) 中视觉虚拟位移路径概念表征

	汉语	总计/个	频率/%	英语	总计/个	频率/%
零路径视觉动词 (Visual Verbs for Zero Paths)	望(21)、见(22)、看(18)、窥(3)、目(2)、览(1)	67	80	See(35); watch(5); behold(1); look(1)	42	45
卫星结构表征 (Visual Verbs + Satellite)	西望(3)、远看(1)、东望(1)、远望(1)、前望(1)、相顾(1)、相望(1)、相看(2)	11	13	Look(14); view(10); sight(5); gaze(13); peep(2); watch(4) at(9); south / eastward / westward/southward(4); from(8); on(6); with(1); for(4); over(1); afar(5); far way(1); round(1); out of(2); in(3);	48	51
视觉路径动词 (General Path Verbs)	回望(2)、回顾(1)、归目(1)、回头下望(1)、四望(1)	6	7	Turn... eyes on...; stretch... eyes to...; fix on...; take a look at... (4)	4	4
总计		84	100		94	100

从表 4 可以看出,唐诗视觉路径表达主要以零路径为主。杨京鹏等[20]认为汉语中有其特有的三种表示虚拟运动语义的词汇化模式,零路径就是其中一种。“零路径”指表达式中不含明确的视觉路径表达形式,但读者仍可从构式所表征的视线移动中推断出路径<sup>[11]</sup>。唐诗中零路径的主要构式就是“视觉动词+零路径+被体验对象”,该构式高达 67 句,占总视觉路径表达的 82%,其中视觉动词包括望、见、看、窥、目、览等。

(7) a. 明朝望乡处,应见陇头梅(宋之问《题大庾岭北驿》)<sup>[17]</sup>

(7) b. Tomorrow looking for my homeland, I can only see mume trees stand.

(8) a. 一日看尽长安花(孟郊《登科后》)<sup>[17]</sup>

(8) b. I've seen within one day all followers on the trees.

(9) a. 禽窥素艳来(齐己《早梅》)<sup>[17]</sup>

(9) b. Birds peep at you still white.

(10) a. 一览众山小(杜甫《望岳》)<sup>[17]</sup>

(10) b. It dwarfs all peaks under our feet.

例(7)a、(8)a、(9)a 和(10)a 都是唐诗中典型的零路径构式。由于诗歌语言的凝练性,其路径信息通常暗含在诗句中<sup>[21]</sup>。因此句中并没有明确的语义成分编码视觉路径,而是强调视线的最终达到,忽略了视线路径的起点和中间位移过程。例(7)b 唐诗的许版译本构式也是典型零路径,视觉动词 see 后直接接加视线作用的对象 all followers。受原文构式影响,许版译本中有将近 45% 的是零路径表征,但英语作为卫星框架语言,主要还是由卫星结构表征。如例(7)b、(9)b 中,唐诗零路径表达译为英文时,其构式转为“视觉动词+卫星词(Visual Verbs + Satellite)(look for, peep at)”,目的同样是强调路径的终点。由表 4 可知许版译本卫星结构共有 48 句(53%),主要由介词(at, from, on, with, for, over, in)表征,共有 44 处,有 4 处是由副词(southward, westward, eastward)表征。唐诗中亦有卫星结构,如西望、东望、南望等。卫星结构主要是由副词构成,且放在视觉动词之前,构成“Satellite + Visual Verbs”。

(11) a. 回头下望人寰处(白居易《长恨歌》)<sup>[17]</sup>

(11) b. Turning her head and fixing on the earth her gaze.

(12) a. 举觞白眼望青天(杜甫《饮中八仙歌》)<sup>[17]</sup>

(12) b. Wine cup in hand, he turns white eyes on the blue sky.

(13) a. 拔剑四顾心茫然(李白《行路难》)<sup>[17]</sup>

(13) b. Drawing my sword and looking round, I hear my heart beat.

例(11)a、(12)a、(13)a 是唐诗中少有的视觉路径动词的表征,其构式是“路径动词+视觉动词”,例如“回、举”描述的是体验对象视线的移动过程,可以从平视到下视如(11)a,或从平视到上视如(12)a;“四顾”强调的是体验对象看向四周的过程如(13)a;该构式不仅编码了虚拟运动过程,也编码了路径本身<sup>[12]</sup>。许版译本则是由较为复杂的卫星结构表征,即“一般路径动词+卫星结构”。一般路径动词和与眼睛有关的名词搭配,可用于视觉路径表达,如例(12)b、(13)b 中 turn one's eyes on; fix one's eyes on,总体上唐诗及许版译本中此类表征占比较小。

综上,唐诗及许版译本视觉路径虚拟位移表达式中均使用零路径、卫星结构和视觉路径动词表征。唐诗以“视觉动词+零路径+被体验对象”为主,其卫星结构构式为“Satellite + Visual Verbs”,且多用副词表征;英译本零路径与卫星结构构式大致相当,卫星结构编码为“Visual Verbs + Satellite”,且主要由介词表征。

### 3.2 英汉语听觉路径表达对比分析

听觉虚拟位移路径概念的构式与视觉路径稍有不同,研究发现唐诗及其英译本中听觉虚拟位移皆存在以下表征(见表 5)。

唐诗听觉路径中零路径表达共有 47 处,占比 92%,此处与视觉路径一致,因此可知唐诗感知虚拟位移表达主要以零路径为主。听觉路径零路径表达分为两类:零路径听觉动词和零路径发音动词及名词。听觉动词(Auditory Verbs)包括“闻”“听”“响”,共出现 29 处,对应许版译本中的 hear 等,主要编码形式为“体验对象+听觉动词(Auditory Verbs)+被体验对象”,见例(14)a、(15)a:

(14) a. 又闻子规啼夜月(李白《蜀道难》)<sup>[17]</sup>

(14) b. And see the female birds fly, and hear home-going cuckoos deep.

(15) a. 愁听清猿梦里长(王昌龄《送魏二》)<sup>[17]</sup>

(15) b. You would be grieved to hear monkey's wail in you dreams.

表5 译本中听觉虚拟位移的表征

	汉语	总计/个	频率/%	英语	总计/个	频率/%
零路径听觉动词 (Auditory Verbs for Zero Paths)	闻(18)、听(7)、响(2)、见(2)	29	56	Hear(42); sound(2)	44	70
零路径发音动词及名词 (Articulatory Verbs & Nouns for Zero Paths)	动词:啼、鸣、哭、吟(9) 名词:声、曲、歌、鼓(9)	18	36	Cry(5); crow(1); chirp(1); call(1); drumbeats(1)	9	14
听觉路径动词 (General Path Verbs)	入(1)、来(1)、上(1)、中(1)	4	8	路径介词 (Path Preposition): over	1	2
卫星结构表征 (Auditory Verbs + Satellite)	*	0	0	Heard of(1); to(1); in(2); listen to(4); talk with(1)	9	14
总计		51	100		63	100

正如前面提及的,唐诗中听觉路径呈现体验对象缺位。例(14)a、(15)a中唐诗均无体验对象编码,隐去转喻型体验对象“诗人”,后接听觉动词“闻、听”及被体验对象“子规啼、猿”,无路径概念编码;“猿”发出的声音为被体验对象,唐诗中通过转喻用“发声实体”指代“被体验对象”;许版译本补充相应的被体验对象,如(15)b中的 monkey's wail。除了听觉动词以外,唐诗听觉路径表达还有一类发音动词,其构式是“被体验对象+发音动词 (Articulatory Verbs)”,体验对象以及路径同样不编码(见例(16)a、(17)a、(18)a、(19)a)。

(16)a. 向晚猩猩啼 (李白《清溪行》)<sup>[17]</sup>

(16)b. At dusk the monkeys cry.

(17)a. 杜鹃啼血猿哀鸣 (白居易《琵琶行》)<sup>[17]</sup>

(17)b. But gibbon's cry and cuckoo's home-ward-going call

(18)a. 灯下草虫鸣 (王维《秋夜独坐》)<sup>[17]</sup>

(18)b. By lamplight the insects chirp in my hall.

例(16)a、(17)a、(18)a中,“猩猩、猿、草虫”都是被体验对象即“声音”的指代,属于转喻型位移主体<sup>[19]</sup>,后接发音动词“啼、鸣”,无路径编码,突显被体验对象发声过程,忽略声音的到达,其目的在于衬托特定的意境;许版译本对照翻译如(16)b、(17)b、(18)b,即“转喻型的位移主体(被体验对象)+发音动词(cry; call)”,此类构式在分析语料中并不多。除了零路径之外,唐诗中也有发音名词编码为位移主体本身“声音”做主语的情形,如“属加种差”结构的各种声音<sup>[22]</sup>,后附加路径动词表示位移及路径的相关概念。

(19)a. 霓裳一曲千峰上(《过华清宫绝句(其二)》)<sup>[17]</sup>

(19)b. The song of Rainbow Cloak over thousand peaks green.

例句(19)a中“上”是一个方位动词,此处表示歌曲的位移及其路径,由下到上,突出其运动路径及声音影响之远,许版英译本则由介词 over 编码。此外,除了上述“体验对象+位移主体”“转喻型被体验对象+发音动词”“被体验对象+路径动词”外,唐诗中还有另外一类表达,即隐去了体验对象和路径概念,仅保留编码为“发音名词”的构式,如:风多杂鼓声(with the howling wind mingle our drumbeats《从军行》),此句既无体验对象编码,又无路径概念编码,仅保留了被体验对象“鼓声(drumbeats)”,属于零路径的发音名词表征。许版译本则根据唐诗原文构式呈现两种编码形式,使用发音动词 cry、chirp、crow 或者名词形式 cry、call、official drumbeats、he blooming drums。经分析语料发现,唐诗中听觉路径编码除了上述形式外,一个显著的特征是无卫星结构表征;而许版英译本听觉虚拟路径中不存在路径动词的表达,存在一处路径介词编码 over 为(19)a,还存在9处卫星结构,即“听觉动词+卫星结构”为例(20):

(20)a. 闻郎江上唱歌声(《竹枝词二首(其一)》)<sup>[17]</sup>

(20)b. My gallant in a boat is heard to sing a song.

唐诗原文为“体验对象缺位+听觉动词(闻)+被体验对象(歌声)”;许版译本中,声音发出者为主

语,谓语动词为被动语态, to 则表示主动关系,强调声音的到达;除了 to 以外,还有 of、in 等介词。综上所述,《唐诗三百首》汉英诗句中听觉路径表征主要以零路径为主,汉语诗句中听觉路径编码形式较为复杂,但路径表征零路径构式居多,有 4 处路径动词编码,且无卫星结构表达;而许版译本中无表示位移路径的路径动词编码,但有少量的卫星结构编码,其构式主要是“听觉动词+卫星结构”。

#### 4 结论

借助 Talmy 的位移事件框架理论和虚拟位移理论,探讨了许渊冲译《唐诗三百首》(中英文对照)中汉英感知路径“位移主体”和“位移路径”概念表达的异同。研究发现:唐诗中感知路位移主体多为体验对象,且呈现缺位状态(即无编码形式);许版译本中通常会以“增主语”的翻译技巧对转喻型位移主体(体验对象)进行占位,唐诗及许版译本感知路径构式都存在大量零路径编码;路径编码差异在于:唐诗中的视觉路径卫星结构以前置为主“Satellites + Visual Verbs”,卫星结构副词担任;而许译本则是以卫星结构为主,主要由介词表征,构式为“Visual + Satellites”;唐诗听觉路径中有发音路径动词编码,无卫星结构编码;而许版译文无路径动词编码。本文结论适用于许渊冲译本,其他译本感知虚拟位移表达是否具有此类构式特征还需研究。除感知路径外,未来也可研究其他类型“虚拟位移”构式,以期更加系统全面地对比解析虚拟位移的中英文表达的异同,有助于探析汉英语言背后的认知差异。

#### 参考文献:

- [ 1 ] TALMY L. Fictive Motion in Language and “Ception” [M]//BLOOM P. Language and Space. Cambridge: MIT Press, 1996: 307 - 384.
- [ 2 ] TALMY L.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ume 1): Concept Structuring Systems [M]. London: The MIT Press, 2000: 99 - 163.
- [ 3 ] TALMY L.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ume 2): Typology and Process in Concept Structuring [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0b: 21 - 46.
- [ 4 ] LANGACKER R. Virtual reality [J]. Studies in the Linguistic Sciences, 1999(2): 77 - 103.
- [ 5 ] 李福印. 认知语义学 概念结构系统: 卷 1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79 - 100.
- [ 6 ] SLOBIN D I. Relations between Paths of Motion and Paths of Vision: A Cross-linguistic and Developmental Exploration [C]//Gathercole V M. Routes to Language: Studies in Honor of Melissa Bowerman. Mahwah: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8: 197 - 221.
- [ 7 ] MATSUMOTO Y, AKITA K. Linguistic representations of visual motion: A crosslinguistic experimental study [J]. ResearchGate, 2021(1): 1 - 33.
- [ 8 ] MATLOCK T. Fictive motion as simulation [J]. Memory & Cognition, 2005(8): 1389 - 1400.
- [ 9 ] CACCIARI C, BOLONINI N, SENNA I, et al. Literal, fictive, and metaphorical motion sentences preserve the motion component of the verb: A TMS study [J]. Brain and Language, 2011(3): 149 - 157.
- [ 10 ] BRUHN M J. Frame shifting and fictive motion in Shelley's poetic sublime [J]. Journal of Literary Semantics, 2022, 51(2): 93 - 109.
- [ 11 ] 郑国锋, 舒丽敏, 吴叔尉. 基于语料库的英汉语视觉虚拟位移路径表达对比研究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1, 44(1): 36 - 44, 159 - 160.
- [ 12 ] 舒丽敏. 英汉视觉虚拟位移事件路径词汇化对比研究 [D]. 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 2020: 23 - 34.
- [ 13 ] 黄妮. 英汉感知虚构运动事件的路径语义对比分析——基于小型自建语料库 [J]. 上海理工大学学报, 2021, 43(2): 135 - 141.
- [ 14 ] 杨京鹏, 袁凤识. 隐喻, 转喻, 还是隐转喻? ——虚构运动认知理据研究 [J]. 现代外语, 2022, 45(4): 451 - 463.
- [ 15 ] 周文芳, 金逸峰, 陈幸怡. 位移事件框架下各类虚拟位移的虚拟性、区别性特征及认知理据 [J]. 现代外语, 2024(4): 1 - 13.
- [ 16 ] 李正栓, 严云霞. 许渊冲翻译思想在对外文学话语体系建设中的贡献及其启示 [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0(1): 93 - 98.
- [ 17 ] 许渊冲, 译. 唐诗三百首(中英文对照) [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 2007: 371 - 374.
- [ 18 ] 钟书能, 傅舒雅. 英汉虚拟位移主体认知对比研究 [J]. 外语学刊, 2016(2): 32 - 36.
- [ 19 ] 白雪飞. 汉语虚拟位移主体的编码形式与认知分析 [J]. 汉语学习, 2020(5): 52 - 59.
- [ 20 ] 杨京鹏, 吴红云. 空间界态的句法语义接口研究——以运动事件的英汉词汇化模式对比为例 [J]. 外语学刊, 2017(4): 45 - 50.
- [ 21 ] 王东. 许渊冲与哈里斯对唐诗中散射型虚拟位移句英译的比较研究 [D].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22: 83 - 106.
- [ 22 ] 王寅. 认知语言学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146 - 150.

## 我国科技伦理的当代特征与现实展望

余国江<sup>1</sup>, 胡 璨<sup>2\*</sup>, 王 宁<sup>3</sup>

(1. 合肥大学 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处, 安徽 合肥 230011;

2. 安徽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 安徽 合肥 230039;

3. 合肥大学 教育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11)

**摘要:**科技伦理具有连贯性的体系化发展过程,国内外学者以各种研究视角对科技伦理进行深层次探索。以科技伦理的发展脉络为切入点,建构起本土化的科技伦理概念,并结合我国在规范科技伦理、推动科技伦理体系化进程中的经验,总结出我国科技伦理的当代特征,从本土化的科技伦理观、制度规范以及治理机制三方面的特征,提出一些思考。

**关键词:**科技;科技伦理;科技伦理治理

中图分类号:G255.5;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24)06-0093-07

## Contemporary Characteristics and Realistic Prospect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thics in China

YU Guo-jiang<sup>1</sup>, HU Can<sup>2\*</sup>, WANG Ning<sup>3</sup>

1. Department of Teaching Quality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Hefei University, Hefei, 230011, Anhui;

2.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Anhui;

3. School of Education, Hefei University, Hefei, 230011, Anhui

**Abstrac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thics is a coherent and systematic development process. For a long time,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have deeply explor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thics from various research perspectives. In this pap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thics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it constructed the localiz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thics concept, and combined with the experience in the proc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thics, the process of ethics, summed up the contemporary characteristic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thics, from the localiz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thics, system specification and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three characteristics, it put forward certain thinking.

**Key wo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thic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thics governance

基于 CITESPACE 进行计量分析,数据来源为 CNKI,搜索主题为“科技伦理”,时间限定为 2016 年 1 月 1 日 - 2024 年 4 月 18 日,文献来源均为学术期刊,通过阅读文献题目、摘要、关键词等内容剔除与主题不相关的文献,最终共纳入 533 篇论文,并以

Refworks 格式导出。分析显示 Q 值为 0.6705,大于 0.3, S 值为 0.9104,大于 0.7,说明该聚类得到的网络社团结构是显著的,且聚类结果具有高置信度。(见图 1)。

根据聚类结果显示,近八年来,我国对于科技伦

收稿日期:2024-03-13 \* 通讯联系人

作者简介:余国江(1965-),男,安徽合肥人,教授,硕士;胡璨(2000-),女,安徽淮南人,硕士研究生。E-mail:1176805754@qq.com

理的研究多聚焦于人工智能、大数据、基因科技等尖端技术所引发的科技伦理问题,对习近平科技思想的研究,对于伦理审查和伦理风险的研究,根据时间图谱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对于科技伦理研究的长期性、持续性。

目前我国对于科技伦理研究领域影响较大的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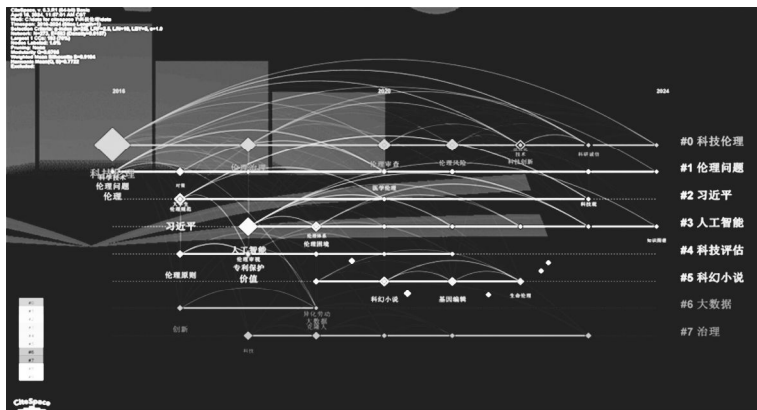


图1 聚类结果分析

本文以科技伦理思想的发展脉络为切入点,试图建构起本土化的科技伦理概念,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新质生产力引领科技研发与创新的时代新象下,对我国科技伦理的当代特征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思考。

## 1 科技伦理的发展脉络

### 1.1 萌芽期

西方的科技伦理思想萌芽于学者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对道德知识的追问。在古希腊时期,人类试图以一个非纯粹思辨的角度,解析道德的客观原理,并将其建构起的“道德”作为群体内部的言行规范。毕达哥拉斯提出“数是万物的本源”,主张从“数”中探寻人类的“美”,在他的著作《金言》中提炼出谦逊、友谊等调控学派内部人物关系的共同道德准则。同时期的“希波克拉底誓言”<sup>①</sup>,对医生这一群体做出了戒律要求。

我国的科技伦理思想萌芽于人民对自然的认识过程中,源于生存意识的不断觉醒。先秦是我国生产力大转变时期,依靠生产力发展所兴起的农业、手工业取代了传统的捕猎文化,人类由蒙昧阶段实现道德觉醒。发展着的农业、工商业包涵着政府对社会的治理、对人民的管理以及对产品的技术要求。“农本工商末”的社会分工促进了行业群体的形成,在技术实践的过程中渗透着主流价值观、行业群体共同道德规则的规范形成了技术规范体系。将道德原则应用于生态和技术领域,赋予一般道德原则以

者有肖红军、李正风、薛桂波等人,肖红军将研究视角聚焦于数字科技伦理的治理方面;李正风以当代科技前沿问题的现代化治理为切入点展开研究;薛桂波以“负责任的创新”为出发点,对科技伦理的规范和治理进行探析。

科技伦理意涵,是先秦科技伦理形成的一个标志<sup>[1]</sup>。

### 1.2 跨越期

自中世纪以来,西方学者研究的对象经历了从自然到宗教再到“人”的转向。哥白尼提出“日心说”、牛顿建立“经典力学”、达尔文“进化论”这一系列自然科学思想的跨越式发展,奠定了“人定胜天”的思想基础,人类不断掌握对科学的话语权,并建立起“以人为本”的科技伦理道德。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和积累,到18世纪中后期,西方开启了机器替代人类劳动的工业革命时代,资产阶级不断扩大商品倾销市场,进而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机器热潮,利用技术实现对工人阶级的隐秘剥削,逐渐异化的“科技”本质,迫使人类加速了对科技伦理的探索进程。

同时,我国在天文学、数学、医学和农学四大传统科学中,世界同期表现出超前的创造力和智慧,《乾象历》、《算经十书》、《千金方》、《齐民要术》等著作的出现,代表着我国在科技发展的过程中,以“经世致用”为理念的实用性特征。由于科技的大发展始终遵循着主流价值观的演进,受“大一统”思想和“儒家思想”为核心的道德观影响,体现出“以道驭术”<sup>②</sup>,即技术伦理附着主流道德的科技伦理发展路径。

### 1.3 独立发展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资本主义帝国阶段,资本主义迅速扩张的政治愿景和资产阶级的内在矛盾不断异化科技和人类的边界,

不规范、不公正、非正义的恶性科技伦理事件频发,例如:1956 年的柳溪肝炎研究(Willow brook experiments),受试者是患有智力障碍的儿童;1963 年的犹太人慢性病医院癌症研究,具有认知功能障碍的患者被注射活体癌细胞;1972 年的塔斯基吉梅毒实验,黑人作为实验对象受到生命和尊严的巨大侵害。新时期的科技伦理发展,涉及更深的社会领域,波及更广的社会群体,甚至影响社会价值观的革新,同时也有可能引发国际争端,危及各国政府声誉。

科学共同体作为社会大系统中一个小系统,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和严谨的科研精神,开始对科技伦理进行内涵式研究。费尔巴哈概括总结出科学家“十大守则”<sup>③</sup>;美国社会学家默顿向科学家提出“普遍性、公有性、无功利性、有条理的怀疑”<sup>[2]</sup>四大原则;1946 年 7 月,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 14 个国家科学协会的代表成立了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

1946 年,纽伦堡法庭制定了国际上进行人体实验的行为规范,即《纽伦堡法典》。20 世纪 60 年代颁布并不断完善的《赫尔辛基宣言》,创造性地提出了需建立独立透明运作的科技伦理委员会。1979 年,美国颁发《贝尔蒙报告》,是由医院人员、高校人员、法律、宗教、伦理学、心理学等专家组成委员会,该委员会为解决由涉及人体科技引起的道德问题提供一个框架和指导,提出了世界科技伦理三大原则“尊重”“有益”“公平”。此后,科技伦理不断朝着由权威的管理主体参与、严格的规章制度制定的方向独立前行。

## 2 科技伦理的内涵及界定

### 2.1 科技伦理的内涵

科技包涵“科学”和“技术”,“科学”science,源于拉丁文 scientia,本义是知识和学问,“技术”technology,源于希腊词 techne(技艺、工艺、技能)和 logos(言辞、逻辑)的组合。国内学者曾对二者作出区分,例如:周光召认为科学是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所创造的,是正确反映客观世界现象、物质内部结构和运动规律的系统理论知识。技术是在科学的指导下,通过总结实践的经验而得到,在生产过程和其他实践过程中广泛应用的,从设计、装备、方法、规范到管理等各方面的系统知识<sup>[3]</sup>。白春礼认为科学以探索发现为核心,主要是发现、探索研究事物运动的客观规律。技术以发明革新为核心,着重解决“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sup>[3]</sup>。科学与技术本质的区别在于:科学以认识自然、探索未知为目的,虽然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但是却有它

的不可预见性<sup>[4]</sup>,而技术上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见的,也完全是可以规划的。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科学通过研究和发现事物运动和变化的客观规律,寻求正确反映世界的知识体系,技术以科学知识为指导,应用生产为出发点,不断进行实践革新。

“伦理(ethics)”源自希腊文“thos”一词,是由“风俗”“习惯”沿袭而来,在罗马征服希腊后,曾一度被“道德(moral)”所替换,因此,伦理从一开始就是人类长期世俗生活中所形成的习惯,演变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规范。在我国古代曾记载,《礼记·乐记》曰:“乐者,通伦理者也。”<sup>④</sup>郑玄注“伦理”曰:“伦,类也;理,分也。”<sup>⑤</sup>“伦”在《说文》中载为“伦,辈也”<sup>⑥</sup>。据此,伦理的本义是处理人们相互之间关系的礼仪规范和行为准则。

在科技领域,存在科技人员与合作者、受试者和生态环境之间在权利保护、利益分配时出现冲突的伦理困境<sup>[5]</sup>,科技伦理就是人类在探索和研究自然界的认识和实践活动过程中,确立具有普遍意义的行为规范,同时也是对人类社会科技的道德属性建构,促进“负责任的创新”,最终实现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目标。

### 2.2 科技伦理的外延

从科技伦理的主体来看,科技伦理的主要行为主体是科技工作者,国家作为科技伦理大政方针的制定者,引导科技伦理的方向,规范了科技伦理的标准和规则。此外,凡是从事科学研究的机构,例如高校、企业、科技机构、医疗机构,都是科技伦理的参与者,都需承担相应的科技伦理责任。1975 年,阿西洛马会议引起了人们对伦理审查必须前置思想的关注,确立了公众参与伦理问题讨论的先河<sup>[6]</sup>。

从科技伦理与科技道德的辩证分析来看,科技道德侧重于对人类从事科学研究中的价值观塑造,科技伦理侧重于对人行使科技权利时的行为规制,后者具有更强的问题导向性。科技伦理以科技道德为基础,科技道德问题往往表现为学术不端、科技诚信等行为,而科技伦理问题则表现为受试者生命和福利是否受到损害。科技伦理问题随着科技发展会不断扩大科技伦理的涉及范畴,并带动焦点问题的持续升格。

从科技伦理的价值意义来看,它涉及如何规范科技伦理,实现更全面、更有效的科技伦理治理。一方面,有助于科技人员在科学研究中遵守伦理规范,进一步理解科学研究的社会价值,促进科技向上、向善;另一方面,有助于公众增长对科学研究的信心,

并且支持科学研究更具伦理价值的发展,从而构筑科技和谐、公众信任的社会环境。

### 3 我国科技伦理的特征

#### 3.1 中华传统文化的浸润

我国古代的科技伦理观在浓厚的工匠精神中孕育出伦理价值。先秦时期,“功致为上”和“毋作淫巧”是技术活动中的两个基本伦理规范,“功致为上”要求技术工作者制作器物应以其实际功用出发,提升质量水准;“毋作淫巧”要求技术工作者不得有“奢伪怪好”的技术活动和生产“过制之巧”的产品<sup>[2]</sup>。除此之外,行业内部施行“物勒工名”的管理机制,工匠要将自己的名字刻在所造的器物上,对自己生产器物的质量优劣和效用好坏负责,这表明产品的生产承载着工匠的诚信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我国古代的科技伦理始终秉持着“以人为核心”的价值理念。《尚书》中有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进一步解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老庄思想中内含着“天人合一、三生万物、万物一体”的科技伦理思想。科学技术与自然、人构成了万物的基础,并在自然与人类社会和谐演进的过程中以“道”驭己,扮演着促进人类文明的角色。由此可见,我国自古以来就秉持着“民为本”的治国和伦理思想。自我国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向善的伦理要求,坚持科技造福人民的宗旨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科技价值导向,提出“要加大科技惠及民生力度,推动科技创新同民生紧密结合”<sup>[7]</sup>。习近平总书记主张“科学研究既要追求知识和真理,也要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sup>[8]</sup>。

我国的科技伦理自古以来就秉承“共善共行”的治理方式。《论语·子路》篇有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sup>①</sup>,费孝通先生凝炼出的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都表明了当代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治理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在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的同时探索中国经验,贡献中国智慧。用“科技向善、伦理先行”的文化理念引导科技成果共享、科技造福人类的理想,努力促成不同文明体在平等互鉴的共识中实现伦理思想的异质交流。

#### 3.2 完备的法律规范

从法律阶位看,有关“科技伦理”的法律规范作

为医药、数据和技术等相关法律的重要章节被写入。2022年,我国颁发《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这是首个国家层面的科技伦理治理指导性文件,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通过分析我国科技伦理监管过程中的法律细则,可以看出,我国注重伦理委员会的设立。例如:2019年,我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订通过《药品管理法》,首次将伦理审查写入法律。同年发布伦理审查委员会建设指南,并提出伦理审查协作互证模式。2020年,我国发布新版GCP,更加强调伦理委员会的职能。2022年1月,我国施行的《科学技术进步法》,第一百零三条明确规定了国家建立科技伦理委员会,健全科技伦理审查机制,开展科技伦理审查。

从发文主体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民法典》《科学技术进步法》《网络安全法》等关联法律进行宏观管理,下级部门通过多部门联合颁发文件的形式增强科技伦理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从文件的制定领域来看,首先是一以贯之的对医疗领域进行伦理规制,其次,随着科技发展范围的扩大,对科技伦理研究的深度增强,在相关互联网、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前沿领域也都相应地提及并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

除此之外,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独有的、原创的医学科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医学文化和实践。1986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作为重点规制领域,2010年,中医药局颁布《中医药临床研究伦理审查管理规范》,规范中医药临床研究伦理审查工作,尊重和保护参加中医药临床研究受试者的安全与权益,并提出中医药临床研究的医疗卫生机构、科技院所、高等院校等负责设立本机构的伦理委员会。

#### 3.3 分级建设科技伦理规范

我国2009年出台的《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填补了我国在医疗技术准入管理领域的空白,并建立了符合我国行政运行机制的三级伦理审查模式,卫生部处理涉及重大伦理问题的第三类医疗技术;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处理涉及一定伦理问题的第二类医疗技术;各个医疗机构进行常规管理,第一类医疗技术可以由医疗机构自行审核也可以根据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进行技术审核<sup>[9]</sup>。

从科技监督类别来看,我国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开展的相关伦理审查监督,国家中医药局负责涉及人的中医药伦理审查监督,教育部负责全国高校的伦理审查监督,科技所及其他高校也相应按照行政隶属关系由相关部门负责<sup>[10]</sup>。



从科技监督层级看,科技部负责统筹指导全国科技伦理监管工作,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是最具有权威性、专业性的机构,省、市、县作为地方行政部门,按照职责权限负责本地方的科技伦理监督工作,可以设立地方的伦理审查规则。除此之外,我国推动建立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认证机制,鼓励相关单位进行科技伦理审查互证。

不仅如此,省级作为科技伦理治理的重要一环,在 2023 年,各省根据地方自然环境、经济水平以及地域文化实行省级科技伦理全治理。例如,四川省出台 17 项举措加强科技伦理治理,选择有现实需求的重点优势产业领域,先行探索试点,进行科技伦理治理工作<sup>[11]</sup>。建立科技人员、科技机构、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的责任传导机制。并构建源头、事前、事中、事后、结果五方面协同布局,防范化解科技领域重大伦理风险。同年,海南发布《海南省科技伦理治理实施方案》,支持崖州湾科技城、博鳌乐城先行区、海口国家高新区等具备条件的园区建立区域性科技伦理审查中心和探索实施科技伦理快速审查,并将科技伦理违规行为相关失信信息纳入海南省科技诚信系统失信行为数据库<sup>[12]</sup>。2023 年,湖南省区域科技伦理审查中心正式成立,“湖南经验”主要是推动区域伦理审查中心和科技伦理委员会的建设,采取“政府主导+事业化+公益化”的模式建设审查中心<sup>[13]</sup>。其他省份,例如浙江、海南等省也在 2023 年,建立地方的科技伦理委员会,加入全国科技伦理治理的棋局中。

## 4 对我国科技伦理发展的展望

### 4.1 防范国际伦理倾销

伦理倾销是指科学家因为严格的伦理审查在自己的国家无法开展,而被转移到伦理规则较宽松或者说不健全的中低收入国家进行的不道德的科学研究<sup>[14]</sup>。究其原因,科技人员试图在获得科技成果的同时期望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在全球科技活动一体化,各国科技合作项目日益增长的背景下,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科技伦理健全程度的差异,势必导致各国的伦理审查标准的差异,从而引起伦理倾销的国际流动。中国科技伦理审查起步晚,又处在剧烈变化的社会阶段,所处社会阶段特殊,不仅要针对生命科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伦理问题提出对策,更要符合自身国情,根据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制度规划,进行综合治理和加强审查力度。

针对伦理倾销的威胁,一方面,要与国际接轨,面对跨国合作项目双重甚至多重法律和伦理标准的

情况,加强国际伦理互认机制,建立区域或者国际伦理委员会。其一,要明确区域伦理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和职责权限,我国在处理伦理审查失范案件时,通常是“先行政后司法”的立法方式,因此,可明确区域伦理委员会的行政地位,保证权利救济通道畅通。在委员会正式成立前,利用独立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sup>[15]</sup>,将违反区域和国际科技伦理审查规范的行为纳入刑法,以起到震慑作用。其二,对入会委员的资质进行遴选时进行多重认证,以确保公正性和专业性,入会委员应是具备丰富科研项目经验的专业学者,兼备合格的语言、心理素养和共同体意识。另一方面,科技伦理风险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加强科技伦理治理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完善我国科技伦理治理学术研究机制,需要健全国际合作研究机制,加强国际交流、对话和合作,学习借鉴国际科技伦理治理的先进经验;积极参与科技伦理问题的国际合作研究和规则制定,在国际科技伦理领域发出更多中国声音。

### 4.2 中央地方双向发力

自德国在 2013 年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提出“互联”为核心的工业 4.0 概念,各国政府迅速做出政策反应,迅速影响世界。2015 年 5 月,国务院正式印发《中国制造 2025》,部署全面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与此同时,科技伦理范围扩大至生物医学、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领域,社会关注度持续上升。但有关科技伦理的法律规范效力等级大多停留在部门规范层面,因此,国家要抓牢科技伦理法律出台,文件颁发的统筹规划,做强做优顶层设计。科技伦理的治理是一个多主体参与、多主体利益协调的过程,多部门发布文件虽然能扩大科技伦理的影响面,但权利错位、权责不明的混乱状况会导致出现科技伦理问题时无从追责,例如:科技人员进行项目申报时,缺乏可依据的标准和程序,在科技活动过程中,多头管理影响科技知识和技术生产的效率。因此,要进一步细化科技伦理程序,让科研人员的活动有据可依。

对于地方来说,在遵守国家级标准和设置“红线”的规则范围内,根据本地区的科技发展进程、经济和人口环境以及地方性资源,因地制宜地制定地方法则。各省市要明确科技伦理是“以伦理为水,以科技为舟”的不可割裂之关系。从各省对科技伦理审查的治理经验可以看出,各省的政策敏感性强,对政策法规及时做出反应,努力促进“全国一盘棋”的格局。各省在建立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和区域科技伦理审查中心的规划上都达成了一致意见,还需

探索地方经验,从重要优势产业切入,逐步普及科技伦理审查工作,例如海南利用沿海城市的地域特性,实行园区间伦理审查合作。

#### 4.3 完善伦理审查程序

伦理审查前,需明确免除伦理审查类别。各级政府及单位应明确,免除科技伦理审查并非放宽伦理审查门槛,而是更精确地规制风险,提升科技活力。我国2023年出台《涉及人的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规定了免除伦理审查的类别,主要包括:不会干扰公共行为的数据和匿名化的信息,以及有关生物样本的研究和使用<sup>[16]</sup>。我国免除伦理审查的类别局限于生物医学和科学方面,并未涉及更广泛的社会科学研究和非研究性活动中可能造成的伦理问题。因此,社会科学领域的教育实践活动,例如教育测试、调研以及公共服务应纳入政府伦理审查考虑,在扩充免除审查类别的同时,制定数据安全和信息保护的具体策略,建立伦理公共审查数据信息共享平台,促进信息共享。

伦理审查中,应严格遵循伦理审查步骤。当前,我国伦理审查方式包括会议审查即正式审查、简易审查、紧急情况审查和应急审查。审查程序虽有差异,例如简易审查只是在程序上免除了会议审查,应急审查是在国家出现紧急重大事件时进行的快速审查。但都遵循一致的审查指南,用最高的科学和伦理学标准对项目进行审查,同时保证伦理审查的质量<sup>[17]</sup>。经委员会达成一致决议后得以通过。

伦理审查后,应及时跟踪检查,并做好资料的归类整理,落实好科学研究的“最后一公里”。可以采用美国学者戴明创立的“PDCA”理论,这套理论最初用于产品质量的持续改善,后成为重要的管理方法<sup>[18]</sup>,字母P对应的是计划(plan),计划阶段可以制定跟踪检查频次、检查队伍构成以及检查所需材料;字母D对应的是实施(do),实施过程中需根据程序、按照规则做好受试者隐私保护、资料检查数字化工具的使用,减少人力物力成本,提高办事效率;字母C对应的是检查(check),检察小组要对科研人员、伦理审查委员会的活动进行监督,做到实施和检查并行;字母A对应的是行动(action),办事人员需职权对应,增强档案管理意识和个人信息保护素养。通过各环节的联动,形成循环式的紧密管理体系。

#### 4.4 优化参与主体质量

##### 4.4.1 权威伦理审查主体——伦理审查委员会

伦理审查委员会作为重要的组织形式,需不断提升委员的资格准入水平,加强科技伦理培训力度。

我国伦理委员会委员资格的获得,应当经过科技伦理的基本专业培训并获得省级或以上级别的科技伦理培训证书,伦理培训以两年为一个周期,通过一定时数的伦理课程教育并获得证书,证明自身具有一定的科技伦理意识和知识。我国当前采用每两年一次的课程培训,应当也相应地实行两年一次的资格认证<sup>[17]</sup>。培训合格证书可以以课程考试的形式,证明具有从事相关工作人员的知识和能力,课题库的设置应当是由政府人员、法学专家、新闻记者等各领域学者共促共建的成果。

伦理审查委员应参加多种继续教育培训(包括线上或线下),不仅限于伦理课程和伦理审查讨论会等专业活动,有关科技论坛、科技峰会、思政活动、以及各专业学术活动都应参与学习。不仅如此,要加强科技伦理宣传,例如定期举办科技伦理教育活动,加强党建以及共青团建设,订阅和印发科技伦理杂志以实现常规化制度。此外,引入科技伦理实践操作过程,例如,提供伦理审查真实案例,让委员和工作人员全过程参与材料审核、实际调查和协调利益冲突,在实践中熟悉规则和细节。

##### 4.4.2 科技伦理创新主体——高校

高校是培养科技人员、承担科技活动的重要主体,肩负着承担科技伦理教育的重要使命。我国科技伦理课程教育的途径往往是线上教学,并作为选修课程进入高校视野,并不能引起学生足够的重视。一方面,高校缺乏科技伦理课程的专业化建设,在教材编写与选择上缺乏符合本国实际的本土化教材;另一方面,高校教师也缺乏科技伦理的专业知识,伦理教育教学方式较为单一。

对于高校来说,首先可以设置专门的科技伦理课程作为各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并依托思政课程渠道和科技实践活动潜移默化地渗透学术伦理教育,并且将科技伦理教育融入专业课程;其次,高校应结合国家政策方针和科技伦理指导方案,编写科技伦理教材,项目资助企业、机构均可提供建议和素材,建立符合我国规范的高质量的特色教材;此外,通过举办竞赛和社会调研等形式的科技伦理活动,例如国内的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武汉大学等陆续开设针对科技伦理的讨论班,营造科技向善的氛围,引导学生将伦理规范内化于心,避免重科技而轻伦理,加强学生的责任意识。

##### 4.4.3 科技协作主体——科技协会

科技协会、社团等组织不仅要制定行业规范,也要树立行业内科学精神,营造追求真理、崇尚价值、合作共建的学术氛围。科技研发是一个需要长期探

索的过程,科技成果能否产出往往也有一定的不可预测性,因此,科技人员需要对科学研究有清晰的认识和合理的预期。科技伦理治理需要内外合力,重在科研人员的自觉和自律,应着力引导科技人员加强科技道德修养,提升科技伦理意识。

## 注释:

- ① 希波克拉底誓言:最早提到这份誓词的是 1 世纪罗马皇帝克劳狄一世身边的一名罗马医生,希波克拉底生活在公元前 460 年至前 370 年,这之间没有任何文献提到过这份誓词,因此该誓词的来源不详。而誓词的文字在不同的时间里也不断被改变来适合当时的需要,并一直沿用。
- ② 以道驭术:出自老子《道德经》,本文采取庄子说法“以道驭术、术必成”,意为技术的行为和应用受到道的制约,应该用道驾驭技术。
- ③ 费尔巴哈的科学十大守则:费尔巴哈: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在 19 世纪,总结了近代科学研究活动和科学家的道德实践,提出了科学家应遵守的十大守则。
- ④ 乐者,通伦理者也:出自《礼记》,解释为:乐与事物的伦理相同。
- ⑤ 伦,类也;理,分也:泛指事物类别、条理。
- ⑥ 伦,辈也:《说文解字》中解释“伦”本义为辈、类。
- ⑦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思想体系的一部分,意思为:君子追求与人和谐相处并非盲目附和,小人盲目趋同却不能与人和谐相处。

## 参考文献:

- [1] 徐朝旭. 中国古代科技伦理的起源与形成研究[D]. 福建:厦门大学,2008:7.
- [2] R·K·默顿. 科学社会学[M]. 鲁旭东,林聚任,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365.
- [3] 中科院院长:科学、技术和工程的区别和联系[EB/OL]. [2018-08-20]. [https://www.sohu.com/a/248852311\\_781358](https://www.sohu.com/a/248852311_781358).
- [4] 中国科学院. 邹承鲁、王志珍院士:科学与技术不可合二为一[EB/OL]. [2003-08-05]. [https://www.cas.cn/xw/zjsd/200906/t20090608\\_643040.shtml](https://www.cas.cn/xw/zjsd/200906/t20090608_643040.shtml).
- [5] 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领导小组. 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参考大纲[M].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3.
- [6] 李建军,唐冠男. 阿希洛马会议:以预警性思考应对重组 DNA 技术潜在风险[J]. 科学与社会,2013,3(2):98-109.
- [7] 民生科技,创新惠民[EB/OL]. [2020-06-29]. [https://www.most.gov.cn/ztzl/zdxx/mtjj/202006/t20200629\\_6583.html](https://www.most.gov.cn/ztzl/zdxx/mtjj/202006/t20200629_6583.html).
- [8] 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EB/OL]. [2016-05-30]. [https://www.gov.cn/xinwen/2016-05/30/content\\_5078085.htm#1](https://www.gov.cn/xinwen/2016-05/30/content_5078085.htm#1).
- [9] 卫生健康委网站. 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EB/OL]. [2018-08-13]. [https://www.gov.cn/zhengce/2018-08/13/content\\_5713811.htm](https://www.gov.cn/zhengce/2018-08/13/content_5713811.htm).
- [10] 关于印发《科技伦理审查办法(试行)》的通知[EB/OL]. [2023-10-08]. [https://www.most.gov.cn/xxgk/xinxifenlei/fdzdgnr/fzgc/gfxwj/gfxwj2023/202310/t20231008\\_188309.html](https://www.most.gov.cn/xxgk/xinxifenlei/fdzdgnr/fzgc/gfxwj/gfxwj2023/202310/t20231008_188309.html).
- [11] 四川省出台 17 项举措加强科技伦理治理[EB/OL]. [2023-02-21]. [https://www.most.gov.cn/dfkj/sc/zxdt/202302/t20230221\\_184679.html](https://www.most.gov.cn/dfkj/sc/zxdt/202302/t20230221_184679.html).
- [12] 海南发布. 海南省科技伦理治理实施方案[EB/OL]. [2023-03-01]. [https://www.most.gov.cn/dfkj/hain/zxdt/202303/t20230301\\_184832.html](https://www.most.gov.cn/dfkj/hain/zxdt/202303/t20230301_184832.html).
- [13] 湖南省区域科技伦理审查中心正式成立[EB/OL]. [2023-02-21]. [https://www.most.gov.cn/dfkj/hun/zxdt/202302/t20230221\\_184702.html](https://www.most.gov.cn/dfkj/hun/zxdt/202302/t20230221_184702.html).
- [14] 周森,许小委. 科技伦理倾销的概念辨析及其启示[J]. 科学管理研究,2019,37(6):29-35.
- [15] 张红. 让行政的归行政,司法的归司法——行政处罚与刑罚处罚的立法衔接[J].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0,23(4):57-66.
- [16] 关于印发涉及人的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的通知[EB/OL]. [2023-02-18].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02/28/content\\_5743658.htm](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02/28/content_5743658.htm).
- [17] 涉及人的临床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建设指南(2023 版)[EB/OL]. [2023-06-28]. <https://cmsfiles.zhongkefu.com.cn/zgyiyuanc/upload/zgyiyuan/file/20230628/1687948047777857.pdf>.
- [18] 刘振洪,张鼎,王美杰,等. 应用 PDCA 循环开展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管理的实践与思考[J]. 浙江医学教育,2022,21(2):110-115,120. 责任编辑:寇国庆

# 新时代国际中文教育的数智化质量监控体系探究

刘水

(安徽师范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教育信息化背景下建立国际中文教育的新型质量监控体系体现了时代发展趋势和要求,但在现实中,当前质量监控体系面临诸多传统意义的困境。以费根堡姆的“全面质量管理理论”为指引,提出践履数智化监控的三原则:立体专精原则、数智协同原则、系统开放原则。分别从组织架构、平台资源、实施路径、评估内容、分析反馈五个层面全面构建国际中文教育的数智化质量监控体系,以助力推进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机制的改革与提升。

**关键词:**国际中文教育;数智化;质量监控

中图分类号:H19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24)06-0100-04

## Digital Intelligence Quality Monitoring System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LIU Shu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Anhui)

**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quality monitoring system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reflects the trend and requirements of current era, however, the current quality monitoring system faces many difficulties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Guided by Armand Vallin Feigenbaum's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Theory and based on in-depth analysis, three principles for implementing digital intelligence quality control were proposed: principle of multi-dimensionality, specialization and precision; principle of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collaboration; and principle of system openness. A comprehensiv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quality monitoring system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was then constructed from the following five aspect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platform resources, implementation path, evaluation criteria, and analysis feedback, which expected to profoundly promote the reform and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quality and talent training mechanism.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digital intelligence; quality monitoring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以教育信息化“构建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sup>[1]</sup>;《“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明确要求“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推进信息技术、智能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的教育教学变革”<sup>[2]</sup>。新时代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高科技的发展对于高等教育的质量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对国际中文教育的质量监控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质量监控体系要以数智化

变革为基础,改变传统的监控与评价模式,构建更为先进、科学的运行机制,以保障国际中文教育质量的内涵提升,实现对线上线下教学全过程、全要素监测与评价,不断建立与完善动态化的质量监管体系。

### 1 当前存在的问题

#### 1.1 扁平化,思想价值引领薄弱

基于国际中文教育前沿改革的视角,新时代质

收稿日期:2024-05-25

基金项目:教育部语合中心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课题一般项目(21YH17C);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攻关项目(2021CX533)。

作者简介:刘水(1976-),女,安徽阜阳人,讲师,硕士。E-mail:2377313193@qq.com

量监控不仅强调数智化变革的工具理性价值,更需凸显其背后深刻的人文主义理念。高校国际中文教育本科课程体系一般开设40门左右,除了最新的“理解当代中国”高级中文听说和读写两门课程之外,其他基本仍在沿袭传统教育模式——往往多注重于本体汉语言知识,包括语音、汉字、词汇、语法等的传授,却忽略了更为关键的要义,即思想引导和价值引领,淡忘了“弘扬中国精神,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根本任务,尤其未将中国的“文化自信”深入融入国际中文教育的全过程,籍此增进来华留学生对中华文明文化的景仰、对社会主义中国的理解、对中华民族的认知。新时代数智化质量监控体系要立足于工具理性与人文理性的“视域融合”,在运用大数据网络监测教学场域、平台、资源、手段等“客体化”要素的同时,更注重对于教学主体、理念、设计、培养模式等“主观化”要素的考量,实现质量监控体系的全过程、全方位优化。

### 1.2 套式化,专业监控标准缺乏

当前国际中文教育的质量监控体系在层级上,一般可分为校级、院系级和基础级(例如教研室)三个级别。其中就专业性而言,尤其应该凸显院系级(国际教育学院)的主体责任,赋予其有关教学质量监控的自主权与主导权,学院可以根据自身的学科建设、专业特色、人才培养等需求,从中观和微观层面设计更具专业性、精细化的监控指标体系,制定具体、可操作的意见、办法与举措。但在实际中,国际教育学院的主体责任往往并未受到重视,各层级之间的监控目标与任务没有真正区分开来,下一级标准习惯于套用上一级,导致校、院、基础三个层级之间趋于雷同,彼此混淆,缺乏层次性、针对性与实效性,进而导致质量监控流于形式,无法真正发挥效能与作用。

### 1.3 常规化,传统监控模式陈旧

当今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各种数智化平台“技术已经成熟,面对海量的教学质量监控数据不仅能够实现实时分析,并且能够保证分析的科学性”<sup>[3]</sup>,然而在现实中,很多高校国际中文教育的质量监控体系依然采用传统的常规化模式,监控方式仍然以线下的课堂教学评价为主,评价数据主要来源于学生评教、同行评教、督导听课、领导听课等人工操作。即便有腾讯、雨课堂等智慧教学手段,也只是作为质量监控的辅助项目或是加分项目,而基于“数智化”理念开展的大数据收集、分析、判断、反馈等先进模式并未实质性地成为主流。不少高校虽然也认识到“数智化”应当成为未来主导方向,但

却因循守旧,没有制定长远战略规划并付诸行动,导致其质量监控体系变革始终无法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也难以走向系统化、规范化和开放化。

## 2 优化理论依据与新型监控原则

当下欲走出困境,必须立足于人文主义价值视阙,从“智能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的视角寻求优化模式与路径。基于此,我们借鉴美国阿曼德·费根堡姆的“全面质量管理理论”<sup>[4]</sup>,引申作为优化的指导思想,该理论主要包括:一是构建类似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专业化质量检测标准;二是强调过程化管理,将专业化质量标准贯穿管理全流程;三是高度关注需求反馈;四是严格质量规范与改进四步骤,即“制定质量标准、评价标准的执行、当偏离标准时采取纠正措施、安排计划改进标准”<sup>[5]</sup>,由此呈现螺旋上升的趋向。

### 2.1 立体专精原则

国际中文教育从内容到形式都需排除“扁平化”,走向“立体化”,整体监控要凸显思想价值引领,在数智化变革的基础上,以“传播思想、培养能力、提高留学生素质”为目标,以“弘扬中国精神,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脉,对于教学各种“客体化”和“主观化”要素予以综合考量。同时在立体化基础上,将类似ISO9000质量认证模式和“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引入监控全过程,特别在质量监控的三个层级中,需凸显国际教育学院的主体责任与主导权,制定专业化、精细化教学质量监控标准,具体包括:教学状态评估指标体系、线上线下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语言文化实践评价指标体系、毕业论文评价指标体系等,以此作为上下一致、各环节贯通的尺度和标准。

### 2.2 数智协同原则

在数智化时代,如果质量监控体系依然停留于人工操作的阶段,则其产生的低效率、出错率、狭隘度显而易见。各高校应积极出台数智化长远战略规划并付诸行动,在“全面质量管理理论”指引下,构建国际中文教育的信息化监控系统平台,充分运用大数据收集、分析、处理、跟踪等先进模式,发挥其反映、预测、评价、监督功能,精准分析留学生“学情”与教师“教情”,把握其思想、状态、心理、行为走势,为全面落实质量监控体系的深度变革提供支持。与此同时,需引导各个相关部门协同配合,学校在设计制度时要力求上下一盘棋,覆盖到国际中文教育的全过程和全要素。校、院系、基础三个级别的监控目标与任务要有明确区分,从宏观到微观呈现出层次

性、针对性,从而使各层级人员真正发挥作用,也有利于调动广大师生参与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 2.3 系统开放原则

国际中文教育的质量监控体系“要从整体和全局角度把握质量保障的方向和效率,建立……符合人才培养目标要求的教学质量监控组织架构”<sup>[6]</sup>,需在监控理念、主体、标准、路径、机制等方面“精雕细刻”,形成系统化、规范化的运行模式。需在数智化平台建设、规模化应用、智能化调控等方面进一步开发,运行“全面质量管理理论”的“持续改进”思想,形成开放化、全过程、全方位的功能布局。要以人文主义价值理念为指引,以国际中文教育人才培养方案为蓝本,对课程结构、专业设置、教学进程、学习效果、文化实训等环节有力渗入与监管,最终落实培养留学生“知华、友华、助华”的思想情感和成长为“思想、知识、素质、能力、创新”合一的目标人才。

## 3 构建数智化质量监控体系的运行机制

在上述三原则指引下,国际中文教育的数智化质量监控体系拟从组织架构、平台资源、实施路径、评估内容、分析反馈五个方面予以构建。

### 3.1 组织架构

该监控体系需着眼于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步骤,在组织架构上构建校、院系、基础三个层级,彼此在功能划分上互有侧重,各司其职:第一,在校级层面,主要由教务处组织校级督导组专家实施,监控目标与任务侧重于国际中文教育办学定位的精确度、办学指导思想的方向度、教学大纲的支撑度、人才培养目标的达成度、数智化教学资源的保障度等的落实;第二,在院系级层面,主要由国际教育学院党政负责人、教学质量管理人员、院级督导组专家等组织实施,相对侧重于国际中文教育的学科评估、专业发展、教学管理、课程建设、师资力量、学生培养、文化实践等的推进;第三,在基础级层面,主要由教研室教师和所带年级、班级留学生组成,相对侧重于同行评价与留学生评价,具体落实于教学改革、数智化探索、教学组织、教学满意度、实践成效、师德师风等的提升。三个层级协同一体,形成上下联动的质量监控有机闭环。如教育部副部长吴岩所强调的:“高校内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总体思路即为‘努力形成一个有目标、有标准、有机构、有评价、有反馈、有改进的闭环质量保障系统’<sup>[7]</sup>。”

### 3.2 平台资源

立足于学校全局的顶层设计,上述组织架构之间需建立“集成化”的综合智慧监管系统,实现专业

信息一体化建设,达致共通、共享、共开发。目前不少高校各个部门的软硬件系统仍处于独立运行的“散兵游勇”状态,彼此“形成了以‘数据孤岛’‘应用孤岛’等组成的‘孤岛架构’”<sup>[8]</sup>,这极大影响了质量监控工作的效率与状态。因此,校、院系、基础三个层级在“集成化”理念下急需建构统一的数智化质量监控平台,进行数字资源关联配置,为质量监控提供直观、准确、高效的信息基础。

而立足于“教”和“学”的基层一线需求,有必要建立国际中文教育的资源汇聚“云平台”,该平台集教育、学习、娱乐、运行、技术、监管于一体,可提供一体化中文课程库、“语游戏”、微社交、学习趣缘社区等资源,确保其种类丰富,体系性强。更重要的是,平台还可以支持元宇宙、虚拟仿真等高科技的连接,师生通过手机终端在探究和学习时,其行为轨迹、浏览内容、学习画像均自动生成,储存入云端大数据,后续便于随时调取,可为开展精准的质量监控、学期考核等工作提供常态化、动态化的可靠依据。

### 3.3 实施路径

第一,精准监控。在数智化平台的支持下,质量监控人员可以悄无声息地进入到国际中文线上、线下教学的每一节课堂,“在授课教师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实时深入教学的各个环节,也能够以观察员的角色无痕地访问在线教学平台上各个课堂的各类教学活动”<sup>[9]</sup>,不仅要对出勤率、到课率、数字设备使用率、听课纪律等“客体化”要素进行监控,更要对教学思想、课堂言行、教案设计、内涵方法、教学态度等“主观化”要素进行认真考评,审视是否真正践行了“弘扬中国精神,传播好中国声音”“传播思想、培养能力、提高留学生素质”等目标,从而实现了对理论课堂与实践教学的全流程、全细节监控。

第二,全面监控。质量监控人员通过全息教学监课大屏,或通过现代直播、录播等技术,不仅可以监控到任何一个微观课堂,还可以总揽全局,对同一时段国际中文教育的全体教学状况进行宏观把控。不仅可对教师上述教情进行周密检测,还可以对留学生的习得理念、内容与方法、作业提交率、实践参与度、考试合格率等多方学情进行随机监控。甚至还能借助人脸识别技术,对于过去难以解决的留学生在课堂上正、负面学习态度及有关行为进行抓拍、分析,为教学反思与策略调整提供数据来源,保障质量监控的整体对比度与完整性。

### 3.4 评估内容

数智化监控体系主要关注提升国际中文教育的质量,给留学生带来更佳的习得体验。

第一,教师素质和能力评估。评估教师致力于国际中文教育的价值理念、专业涵养、“双线”教学组织能力、科研创新能力等,特别是在时下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的开发、应用能力,以考核其在数智化语境中的业务素质与成长潜质。

第二,课程设计和开发评估。评估国际中文课程的数字创意和设计开发水平,具体包括内容的思想性与新颖性、资源的运用度与丰富度、科技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构思的灵活性与宽泛度等,以及是否引入新理论、新方法、新标准,从而有效支撑教学目标的实现。

第三,教学方法与手段评估。评估是否运用“语块教学理论”“文化教学法”等方法论,是否充分运用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情境式等手段,数智化教学理念是否先进,是否高效整合数字资源,师生是否熟练使用一体化平台,开展“双线”教学是否卓有成效等。

第四,留学生学习态度与效果评估。评估留学生学习兴趣浓厚度、学习积极主动度、师生默契配合度,以及出勤率、活动参与率、作业完成率、测试达标率等。综合考核其语言应用能力、实践能力、思维能力等,借此反思国际中文数智化教育的得失与成效。

第五,教学组织与管理评估。评估教学计划执行力、教学过程系统优化、教学诸环节合理安排、“教、学、练、测、评、考”等有序衔接、文化实践有效组织、学情分析与反馈常态化开展情况,以及针对异质化、国别化的留学生个性化施教,促进师生、生生交流互动等环节。

### 3.5 分析反馈

质量监控平台通过数智化技术对国际中文教育教情、学情的海量数据进行梳理、分析,分三个层面予以反馈。一是对于学校和国际教育学院的反馈,宏观分析目前的教师教学水平、留学生习得状况,为校、院的动态决策与管理提供依据,及时改进人才培养方案、教学大纲、计划流程等不足之处,不断优化学科、专业、课程、师资、教研等方案,促进教育质量的整体提升。二是对于教师的反馈,通过监控结果数据,促使其提升自省意识,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整与改善,深度改进教学思维、方法、技能、效果等,从而优化教学策略,提升素质、能力与水平。三是对于留学生的反馈,调动其参与语言习得、能力实践的自觉性与能动性,进一步明确其学习目标、学习态度、学业标准等,落实专注力提示、学业预警等机制,引导其对标完成培养目标任务,不断提升专业水平。总体而言,通过数智化监控体系的分析反馈,引导校、

院更加高效管理、教师更加用心教学、学生更加勤奋学习,从而把“学生忙起来、教师强起来、管理严起来、效果实起来”等目标落实到位。

## 4 结论

国际中文教育的数智化质量监控体系变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在前述三原则的指引下,从组织架构、平台资源、实施路径、评估内容、分析反馈五个层面进行立体化构建,将会深度推进国际中文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机制的改革与提升。放眼于新时代,“高校想要实现新发展,需要基于大数据背景,做好质量监控与评价”<sup>[10]</sup>,该系统工程需要与高科技发展、与学校实际紧密结合,切实以留学生为中心,以弘扬中国精神与文化价值为己任,进一步提升质量文化,强化评价标准,完善机制路径,巩固反馈体系,从而有效推动跨文化交际型人才的能力培养与素质提升,逐步形成“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格局。

## 参考文献:

- [1] 中国新闻网. 教育的全面数字化转型已成必然趋势[EB/OL]. [2022-04-11]. <https://www.chinanews.com.cn/sh/2022/04-11/9725126.shtml>.
- [2] 鲁东大学教育技术信息部. 《“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专家谈:加快教育信息化 支撑终身数字教育[EB/OL]. [2022-08-26]. <http://www.met.ldu.edu.cn/info/1043/1304.htm>.
- [3] 马秀麟, 袁克定, 刘立超. 从大数据挖掘的视角分析学生评教的有效性[J]. 中国电化教育, 2014(10): 78-79.
- [4] 吴国玺, 王晓静, 师彬彬, 等. 全面教学质量管理的组织运行、评价与实践[J]. 大学教育, 2023(20): 5.
- [5] 沈云交. 质量理论体系的一个模式——费根堡姆全面质量管理理论研究[J]. 世界标准化与质量管理, 2007(9): 38-39.
- [6] 巩丽荣. 教学质量监控创新: 宽度、跨度与温度——以三亚学院为例[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3, 45(S1): 84.
- [7] 吴岩. 构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4: 77.
- [8] 周丹, 朱新辉, 杨鲜丽, 等. 高校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数字化平台建设思考[J]. 高教论坛, 2023(9): 74.
- [9] 姚倩. 五位一体线上教学质量监控方案探索与实践[J]. 高教学刊, 2023(17): 112.
- [10] 张雄.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高校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探究[J].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2(4): 201.

# 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对外转让研究

张健

(合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1)

**摘要:**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的财产性和股权权能不包括民主管理权,对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的对外转让进行分析,提出从对外转让的条件、外部受让人的持股限额、股份转让价格的确定、受让股份的最长期限等主要实体法规范,以及农村集体同意改为书面通知和形式审查、股份转让内外部的效力判断、农村产权交易流转平台的推广等主要程序法规范这两个维度加以规制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的对外转让。

**关键词:**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股权;对外转让

中图分类号:F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24)06-0104-05

## Research on Foreign Transfer of Shares of Rural Collective Operating Assets

ZHANG Jian

(School of Marxism, Hefei University, Hefei, 230031, Anhui)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perty and equity rights of rural collective operating assets shares excluding democratic management rights, the external transfer of rural collective operating assets shares was analyzed in this paper, and the main substantive legal norms were put forward such as the conditions for external transfer, the shareholding limit of external transferee,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transfer price of shares, and the maximum period for transferring shares, as well as the rural collective agreement to change to written notice and form review,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ffectiveness of share transfer, the promotion of rural property rights trading and circulation platform and other main procedural laws regulate the foreign transfer of rural collective operating assets shares.

**Key words:** rural collective; operating assets; shares; equity; external transfer

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的对外转让是指农村集体成员将其持有的经营性资产的股份向本集体以外的人员转让,进而不再享有集体经营性资产带来的收益。2016年12月26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集体产权改革意见》)提出现阶段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的有偿退出方式包括本集体内部转让和集体赎回两种方式。但未禁止对外转让这一退出方式,理论界和地方实践开始触及该有偿退出方式,对外转让亦能够实现股份的交换价值进而

满足集体成员的资金需求,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不断壮大,市场化运行是必然趋势,本文从对外转让实体和程序两个维度加以规制的角度进行研究。

### 1 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对外转让争议

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能否对外转让,支持者和反对者均给出了相应的理由,但在各自论证范围内出现了权能混用的认知偏差,有必要厘清相关概念,才能给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的对外转让找到依据。有反对的学者提出因农村集体成员的股

收稿日期:2024-05-17

基金项目:安徽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重点项目(gxyqZD2019092);安徽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2022AH053056)。

作者简介:张健(1973-),男,安徽合肥人,副教授,硕士。E-mail:2295955749@qq.com



份流动仅限于集体内部,故禁止对外转让<sup>[1]</sup>。还有学者提出必须严格限制股份转让,除内部自由转让外,不允许集体外部人员受让股份<sup>[2-3]</sup>。此外,因《集体产权改革意见》的政策导向,多数改革地区的农村集体资产股份转让方式主要有集体内部转让和集体赎回两种,没有提及对外转让的方式。比如较早规定有偿退出的上海市,在总结闵行区经验的基础上出台了《上海市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条例》,禁止向外转让<sup>①</sup>。出台类似规定的还有北京市大兴区、浙江省德清县等。

赞成的学者提出允许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对外流转,明确社会投资者仅享有收益等财产权利,不享有表决权等民主管理权利,并对其持股比例加以控制<sup>[4]</sup>。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学者建议以集体经营性资产收益为折股量化对象的股权可以对外转让给社会资本方,社会资本方持有的股份只是一项财产权,不享有民主管理权,资方持股的比例为成员平均持股数量的五倍以下<sup>[5]</sup>。除了社会投资者持股份额的限制外,还有学者提出了其他限制,如有条件的允许集体外部成员受让集体资产股份,且外部成员不享有选举权等权能,单个外部成员以及全部外部成员均由占股比例限制,在集体资产股份设置资格股和投资股的情况下,仅规定投资股可以对外转让,资格股禁止流转<sup>[6]</sup>。

由是观之,赞成者均认为集体外部受让人仅享有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带来的收益,不能享有监督权、被选举权、表决权等民主管理权。在笔者看来,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市场化运行是必然趋势,通过市场可以优化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的流转,转让者可以获得更优的转让价格,农村集体组织也可以选择更合适的社会投资者,况且,允许有条件地对外转让,还会使集体成员增加一条退出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的渠道,在农村集体内部转让和集体赎回均行不通的情形下,适度地放开对外转让,能够及时地满足集体成员通过股份的交换价值获取股权转让款的资金需求。如2012年1月19日实施的《关于开展规范和完善顺德区农村股份合作社组织管理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规定了社会股东这种类型,承认可以向集体外部转让<sup>②</sup>,又如2022年2月1日实施的《秀洲区农村集体资产股权转让与退出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符合条件的人员经成员大会表决可以成为受让人<sup>③</sup>。

进言之,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成员权和以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为对象折股量化的股权两个权利性质和权能论证来看,自然得出集体外部受让

人不可能享有各种民主管理权,理由如下:

第一,成员权的内容即权能体系可以分为实质上的受益权能和程序上的参与表决权能,受益权能为成员有权从集体组织分得利益的权利,参与表决权涵盖上述学者提到的监督权、被选举权、表决权等各种民主管理权形式<sup>[7-8]</sup>。

第二,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的股权只是作为成员分配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收益的数量依据,股权本质上是一种财产性权利,不和各种民主管理权挂钩,即各种民主管理权本不属于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的权能<sup>[9]</sup>。之所以出现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的股份持有者既享有收益等财产性权利,又有表决等各种民主管理权,原因在于股份的初始配置是按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来定的。在流转阶段即股份的再配置环节,仅仅转让的是股权的收益权能。至于受让主体是否具有民主管理权,取决于其是否取得农村集体组织的成员资格。例如2018年12月13日实施的(现已失效)《海淀区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股权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五条规定,股权也可以转让给股东本人的配偶、子女、父母。受让股权享有的权利根据受让人身份来确定,受让人为非普通股股东的,其受让股权只享有收益权。

## 2 股份对外转让的实体法规范

### 2.1 对外转让的条件

多数地方规定了农村集体内部转让时转让人应当取得其他替代性生活保障作为有偿退出的条件,如此规定在于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具有社会福利属性和承载社会保障功能。农村集体收益固然对成员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但不可将其与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社会保障功能相提并论,集体经营性资产在运行过程中存在收益不确定性,在集体经营性资产未获得收益甚至亏损情形下,集体成员将无法取得经营收益<sup>[9]</sup>。笔者认为,不应当将取得其他替代性生活保障作为集体内部股份转让的条件,同理也不应作为对外转让的前提条件。前文述及,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是一种财产权利,对集体成员的保障既可以是持续的占有股份也可以是通过转让来体现,不管集体内部转让还是对外转让并不影响其生活保障功能,均有利于实现集体成员通过量化的股份增加财产性收入的目标。但对外转让股份,不能与集体内部转让同等对待,集体内部转让无需设定额外条件,对外转让时应当优先满足集体内部成员的受让需求和集体组织的赎回需求,只有当集体内部成员和集体组织不行使优先权时,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股份持有者才可以对外转让。

## 2.2 外部受让人的持股限额

外部受让人的持股限额包括个人持股限额和所有外部受让人总的限额。外部受让人持股越多,意味着农村集体经营性收益的大部分将分配给集体以外的人员,长此以往,将严重影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农村集体内部成员将不再关注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的经营收益情况。与此同时,集体外部人员将反对利用集体收益改善社区治理和集体公益,不利于集体成员所在社区的有效治理<sup>[6]</sup>。当下的难点在于如何界定外部人员的持股限额,上文提到有学者建议社会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平均持股数量的五倍以下。笔者认为,可以参照集体内部股份受让人的持股限额来推出外部受让人的持股限额,且外部受让人的持股限额应低于内部受让人的持股限额。由于社会投资者都被视为单一主体,在比较考察集体内部转让时仅关注成员个人的持股上限即可,分别有1%、2%、3%、5%、10%和成员个人平均持股额的五倍<sup>④</sup>,在推行对外转让试点过程中社会投资者的持股上限可以取中间值3%—5%之间,由于集体股逐渐将被公积公益金取代,外部受让人的占股基数为本集体组织个人股份之和,外部受让人总的持股上限不超过成员个人平均持股额的五倍,具体限制比例可以依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并结合自身情况来定,实际运行过程中可以经成员大会或代表大会决定适时动态调整。

## 2.3 股份转让价格的确定

总结各试验区的做法来看,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以上年度结束时审计后的账面净资产为计算依据,比如“驻马店市正阳县股权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股权转让价格一般以上年度末审计的账面净资产为依据。另一种以转让双方协商为准。笔者认为,首先可以参照上年度结束时审计后的账面净资产由双方自行协商确定,属于私法自治范畴的股份转让价格应由双方协商实属妥当<sup>[5]</sup>,集体成员作为民事主体当然享有对股份的处分权,只要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就应当尊重并予以认可,双方在意思表示过程中,为了避免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欺诈等,应当对股份的价值作一个合理的评估,评估标准之一可以参照上年度结束时审计后的账面净资产,参照的目的是为了自己清楚股份的价值,但最后的成交价格取决于双方谈判进而达成一致的结果,可能高于或低于股份价值本身。其次,随着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的不断深

入推进,加快建设并运行农村产权交易市场才能更好地促进集体成员的股份转让,在农村产权交易市场中,转让人和受让人通过市场调研充分掌握股份的价格、供求关系、市场行情等信息,能够为双方对股份价格作出符合市场行情的理性判断,进而为股份的顺利成交提供保障。

## 2.4 受让股份的最长期限

股份期限取决于转让人与受让人在股份转让协议中协商确定,期限的长短直接影响股份转让价格的高低。倘若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带来的收益一直处于稳中有升的状态,那集体成员在转让股份时价格相对偏高,外部受让人当然也希冀永久持有股份来获取更多的利益。但是农村集体成员持有的股份应当是以其生存为期限的<sup>[9]</sup>,这就决定了外部受让人的股份持有最长期限为转让人的生存期限,双方可以在受让人持有股份起到转让人死亡之前约定一定的期限作为持股期限,或者出现转让人死亡时外部受让人将不能再持有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与此同时,还要规定外部受让人死亡时其继承人不能继承股份持续分享集体经营性资产带来的收益,可以将股份折现将股款返还给其继承人。如此规定的原因在于对外转让只是作为集体成员有偿退出的一种方式,其目的主要在于通过转让股份获取股份转让款满足集体成员的资金需求,一旦外部受让人死亡,其股份应当由集体回购而不是由其继承人持续占有。另外,若经营性资产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终止,外部受让人将无法持有股份,可以规定外部受让人在约定的持股期限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终止的,其持股期限提前终止。

## 3 股份对外转让的程序法规范

### 3.1 农村集体同意改为书面通知和形式审查

前文述及,只有在集体内部其他成员和集体组织不行使优先购买权时,才可以对外转让股份。放开股份对外流转,设置将对外转让股份告知集体,由集体组织公告本集体成员,无需设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审批的程序<sup>[9]</sup>。但该告知程序是否足以保障对外转让的顺利进行,比如外部受让人的持股限额谁来审查等,告知是书面告知还是口头告知,若是书面告知有没有具体要求,尚不够明确。也有学者提出外部受让人的股份是否超过最高比例等实质事项都需要农村集体进行实质审核,不论内部转让还是外部转让都需要集体的同意权<sup>[6]</sup>。类似的在农村集体资产股份质押时有学者反对集体同意<sup>[10]</sup>。

笔者认为应当将集体同意权改为书面通知和形

式审查。理由如下:

首先,农村集体同意权(即集体内部其他成员按照章程规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进行决定)容易使人产生若集体不同意将会阻止股份的对外转让的认知,同为合法性的公司设置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的立法目的主要是确保其他股东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为了避免产生不同意即不能转让的理解,2024年7月1日实施的《公司法》直接删除了外部转让中的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sup>⑤</sup>的条款。

其次,既然不需要集体的同意,就可以采用书面通知的方式保证集体其他成员和集体组织行使优先购买权进而满足对外转让的条件,在参照有限责任公司外部转让的基础上,书面通知应当包括股份转让的数量、价格、期限、支付方式等,同时载明其他成员和集体组织在收到书面通知三十日内未答复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最后,为了保障对外转让的顺利进行,除了要符合对外转让的条件外,宜保留集体组织的形式审查权限,主要审查范围包括:第一,外部受让人的持股限额。若出现本次交易受让人的受让数额和已持有的数额超过持股限额,需要分类讨论本次交易是否有效。第二,转让股份的权属。如果转让人不诚信导致股份有权属争议,比如,股份转让后未及时办理变更股份证明、农村集体组织的成员名册等,转让人又将股份转让给第三人。集体组织的形式审查则可以避免股份转让导致的民事纠纷。第三,外部受让人的持股期限。前文述及,双方在股权协议中要明确外部受让人的持有期限,以及出现相关情形时外部受让人期限届满,其股份由集体回购。

### 3.2 股份转让内外部的效力判断

首先是双方在股份转让协议签字后,外部受让人何时取得股权,即何时可以分配集体经营性资产带来的收益。为避免此环节带来麻烦,需要在转让协议中明确且需要在集体组织说明或登记。从地方实践来看,一般都规定受让人自办理变更登记后才能成为股份合作社的股东<sup>⑥</sup>。笔者认为,变更登记需要集体组织向农村集体组织登记机关及时办理,若双方已签订转让协议并提出变更登记的请求,但集体组织未及时办理变更登记,恰逢集体组织分配经营收益,是分给转让人还是受让人,按照地方做法应当分配给转让人,转让人若不交付给受让人,那对受让人来说存在风险。可以参照2024年《公司法》第八十六条规定股权转让的,受让人自记载于股东名册时起可以向公司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股份的变更无需登记仍可确认

权属,且成员名册的变更可以由集体组织自行完成,外部受让人自成员名册变更后可以向集体组织主张集体经营性资产收益的分配权。登记与否影响集体组织外部交易事项,比如外部受让人没有被登记为股东,其和外部第三方进行交易,外部受让人很难成立善意第三人。抑或者,转让人没有变更登记仍在成员名册里,其又和第三人签订转让协议并完成变更登记,那么,这里的构成善意的第三人就是集体组织的股东,外部受让人将无法再取得集体组织股东身份。

### 3.3 农村产权交易流转平台的推广

随着农村交易市场的不断完善以及股份流转市场化的不断推进,将来时机成熟有必要推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股份转让通过农村产权交易流转平台进行,该平台上将集聚转让人的转让信息和需求人的信息,信息一致的更容易匹配,更加高效地促成股份的外部转让。

#### 注释:

- ① 2018年4月1日《上海市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条例》第11条:农村集体资产份额可以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转让、赠与,也可以由本集体经济组织赎回,不得向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外的人员转让、赠与。
- ② 2012年1月19日实施的《关于开展规范和完善顺德区农村股份合作社组织管理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三、股东及其权益(二)股份合作社股东设村居股东和社会股东两种类型:村居股东按所持股份享有相应的资产产权和收益分配权,同时享有股份合作社的表决权、选举与被选举权。社会股东按所持股份享有相应的资产产权和收益分配权,不享有股份合作社的表决权、选举与被选举权。
- ③ 2022年2月1日起实施的《秀洲区农村集体资产股权转让与退出管理办法(试行)》第九条第二款对本村作出一定贡献的“两进两回”人员,经村集体成员民主表决通过,也可以成为受让人。
- ④ 佛山市顺德区《关于开展规范和完善顺德区农村股份合作社组织管理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顺农改[2012]2号)六其他事宜规定为1%,《甘肃省永昌县农村集体资产股权设置与量化管理指导意见(试行)》(县委办发[2020]23号)4.股权转让规定为2%,2016年5月1日起施行的《浙江省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条例》第三十条规定为3%,《湖北省当阳市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有偿退出实施办法(试行)》第3条规定为5%,《西宁市城中区农村集体资产股份设置与量化管理指导意见》第四条规定为10%,《河南省驻马店市正阳县农村集体资产股权设置与管理办法(试行)》(正产改办[2020]2号)第二十六条规定为成员个人平均持股额的五倍,其他地

方也有类似的规定。

- ⑤《公司法》第八十四条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的,应当将股权转让的数量、价格、支付方式和期限等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权。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未答复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 ⑥《顺德区股份管理意见》规定受让人自办理完毕转让手续之日起,转让手续的最后一步就是变更登记;《中山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行和完善我市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府〔2018〕28号):个人的继承和流转中按照规定程序股权变更登记后方可生效。

## 参考文献:

- [1]郭洁.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营利法人地位及立法路径[J].当代法学,2019,33(5):79-88.
- [2]方志权,蔡蔚.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有偿退出与继承的理论研究和地方探索[J].上海农村经济,2018(4):27-30.
- [3]方志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若干问题

(上接第75页)

## 4 结论

近些年来徽商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度在不断加大,但仍面临着诸多困境,从文化翻译、传播学、译介学等视角来看,徽商文化的国际传播在传播方式、渠道、媒介和人才培养、具体翻译策略等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翻译具有地域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不仅能增强中华文化的感召力和影响力,而且能促进世界文化的沟通 and 交流。徽商文化的对外传播使富有历史积淀、独具特色且不可复制的地方文化和文明通过翻译走向国际,对于发展本地域的经济、旅游等具有“软”推动力,是一种隐性“推手”。多维度地向世界译介传播徽商文化,让外国受众接受并认可,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地方实践,其经济效益虽未能在短时间内见诸于世,但其社会效益将在持续推进中日趋显著,必将推动外界真正认识徽商文化,提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

## 参考文献:

- [1]詹全旺.地域文化翻译研究——以海外徽学著作翻译为例[J].安徽大学学报,2020(4):64-69.
- [2]唐军,褚艳艳.浅谈目的论对徽文化翻译的启示[J].江淮论坛,2011(2):187-191.
- [3]丁立福,汪洛圭,张娜.论安徽地域文化对外译介既存问题与出路[J].安徽理工大学学报,2019(6):77-81.
- [4]牛津,沈昕.徽学研究成果译介问题探析[J].江淮论

[J].中国农村经济,2014(7):4-14.

- [4]房绍坤,任怡多.论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有偿退出的法律机制[J].求是学刊,2020,47(3):73-83.
- [5]张先贵.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股权有偿退出的法律表达——写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颁行前[J].河南社会科学,2023,31(1):15-25.
- [6]高海.集体资产股份有偿退出的特别性及其规范[J].法治研究,2022(1):129-140.
- [7]张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构造与救济[J].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1(4):74-82.
- [8]韩松.论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集体成员受益权能[J].当代法学,2014,28(1):50-57.
- [9]韩松,段程旭.农民集体成员持有的集体经营性资产收益分配股份的自愿有偿退出[J].河北法学,2024,42(2):79-100.
- [10]张运书.农民集体资产股权质押的法理逻辑及设立规则[J].政治与法律,2019(10):72-83. 责任编校:袁媛

坛,2016(6):188-192.

- [5]夏定飞.《徽商与芜湖》(节选)英译实践报告[D].芜湖:安徽工程大学,2022.
- [6]方懿文.纽马克翻译理论在英译徽文化及徽商期刊文章中的应用[D].海口:海南大学,2015.
- [7]朱琳.汉语历史文本中文化专有项英译策略研究——以《徽商》英译为例[D].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2020.
- [8]元恬.《徽州商人和明清中国》翻译实践报告[D].杭州:浙江工商大学,2015.
- [9]吴秋红.《尘劫记》——徽州文化海外传播的硕果[J].黄山学院学报,2016(6):19-22.
- [10]史安斌,盛阳.“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对外传播的创新路径[J].新闻与写作,2017(8):10-13.
- [11]吴赞,牟宜武.中国故事的多模态国家翻译策略研究[J].外语教学,2022(1):76-82.
- [12]田晨颖,龚钦杨,彭飞.“一带一路”背景下杭州地域文化对外传播研究[J].科技创新与生产力,2021(10):71-74.
- [13]BASSNET S. Translation Studies[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38.
- [14]吴石英,周莉.“走出去”战略视域下安徽地域文化对外传播的价值与路径[J].皖西学院学报,2021(3):68-71.
- [15]宋尧,周学鹰.徽州马头墙文化及其价值[J].江淮论坛,2021(1):106-111.
- [16]WEISSBROD R, KOHN A. Translating the Visual: A Multimodal Perspective[M]. New York: Routledge,2019:113.

责任编校:袁媛

# 债权人保护视域下公司信息披露法律制度问题与对策

胡道明<sup>1\*</sup>, 吕清正<sup>2</sup>

(1. 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2. 安徽大学 法学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以债权人保护为视角进行分析,我国现行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在法律效力位阶、信息披露内容、信息披露程序和信息披露法律责任等方面均存在问题,不利于公司债权人保护。为提升债权人保护水平,在推进公司资本制度改革进程中,必须针对我国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存在的问题,采取创新公司信息披露立法模式、完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完善公司信息披露程序性规则、强化公司信息披露法律责任等对策予以解决,系统推进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

**关键词:**债权人保护;公司信息披露;法律制度;债权人利益

中图分类号: D922.2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24)06-0109-06

## Qu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 on China Legal System of Corporat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editor Protection

HU Dao-ming<sup>1\*</sup>, LYU Qing-zheng<sup>2</sup>

(1.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Medical College, Hefei, 230601, Anhui;

2. School of Law,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Anhui)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editor protection, the current corporat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ystem in China has problems in terms of legal effectiveness leve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cont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procedures, and legal responsibilities for information disclosure, which are not conducive to the protection of corporate creditors. To enhance the level of creditor protection,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the company's capital system, counter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addres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China company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ystem, such as innovating the legislative model of company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mproving the content of company information disclosure, perfecting the procedural rules of company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strengthening the legal responsibility of company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n order to systematically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ompany's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ystem.

**Key words:** creditor protection; company information disclosure; legal system; creditor's interests

2013年我国实行认缴登记制改革,取消最低注册资本、出资期限和首期出资比例等方面的强制性规定,改革虽然方便了公司设立,激发社会创业活力,公司数量激增,但在实践中却出现了大量“注册资本注水”公司,股东认缴期限过长,对交易安全和债权人利益保护带来严重威胁。为此,2023年修订

的《公司法》确立新的公司资本制度改革路径:有限公司实行“限期认缴制”,规定公司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必须在五年内缴足,股份有限公司实行实缴制。同时,新修订的《公司法》规定了登记机关公示公司登记事项和公司通过企业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特定事项等。这些改革举措对于债权人保护具有积极意

收稿日期:2024-06-17 \* 通讯联系人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SK2020A0664)。

作者简介:胡道明(1971-),男,安徽舒城人,副教授,硕士。E-mail:491729497@qq.com

义,但并不能避免公司在运营过程中出现资不抵债现象,债权人的债权依然可能处于风险之中。截止2022年底,我国企业总数为32 828 734家,其中股份有限公司117 052家,有限责任公司达2 060 569家<sup>①</sup>。但数量如此庞大的市场主体主要的融资方式是什么呢?根据国家权威机构发布的数据,2023年6月我国实体经济部门的宏观杠杆率为284.6%<sup>②</sup>。从宏观层面看,我国实体企业的负债约为股权资本的2.65倍,可以看出,作为一种融资方式,债权融资对公司的运营具有极为重要意义。要发挥债权融资的积极作用,就必须强化债权人利益保护。就债权人保护体系而言,法定最低资本、利润分配限制、契约保护以及信息披露制度是其主要构成内容<sup>[1]</sup>,而信息披露制度尤为关键,因为它不仅能够为债权人提供保护,而且它还是其他债权人保护制度作用的前提。我国现行公司信息披露法律制度仍存在诸多弊端,同时2023年《公司法》公司资本制度的革新又无法有效对冲债权人保护的弱化效应。因此,基于债权人利益保护之目的,在深化资本市场改革进程中必须正视信息披露机制的积极作用,提升公司透明度应成为完善公司债权人保护制度的一项迫在眉睫的重要课题。职是之故,基于债权人保护之目的,笔者对我国公司信息披露制度进行研究,以期在公司资本制度改革进程中对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 1 公司信息披露之于债权人保护的价值

有学者指出,就公司和债权人而言,信息披露的意义是不同的,对于前者是一种监管措施,而对于后者是一种保护措施<sup>[2]97</sup>。信息披露不仅具有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制度功能,而且是其他债权人保护制度有效实施的基础。

### 1.1 公司信息披露之于债权人保护的制度功能

首先,平衡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交易失衡。相对于债权人而言,公司的组织化使其处于掌握信息的优势地位,进而引发信息不对称现象。“实际信贷市场的普遍缺陷就是信息分配的不对称,这极易使掌握优势信息的一方有机会将交易相对方的财产向自己转移。”<sup>[3]1047</sup>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是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直接后果。对于债权人来说,成功阻却股东的逆向选择进而规避风险,就必须通过一定渠道搜寻并掌握对象公司的有关信息,而且在交易达成后,因充分了解了对象公司披露的信息,债权人也能够有效遏制对象公司在缔约后的机会主义行为。有效的信息披露是债权人规避市场风险的前提和保

障,因为,在缔约前,高质量的信息披露可以帮助债权人评估潜在交易对象是否值得交易,在缔约后,债权人能够根据交易对象的信息披露情况采取措施及时止损。因此,对于公司和债权人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交易失衡状态,信息披露能够起到有效的平衡作用。

其次,提高交易效率,保证交易安全,维护交易秩序。现代商事活动需要交易效率的提高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交易安全是交易效率的保证。对于债权人来说,如果在与债务公司交易时对其商业信誉、资产状况能够充分掌握,便可以是对是否交易进行判断,即便交易达成,也可以提前采取措施来降低债务公司的违约风险。正如有学者指出,如果债务公司相关信息能够被公司债权人便捷获取,会极大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安全和交易效率<sup>[3]1047</sup>,因此,有效的信息披露对于交易效率和交易安全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信息披露还可以对市场失灵起到预防作用,避免“柠檬效应”对市场的冲击,对维护交易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 1.2 公司信息披露是其他债权人保护制度发挥效用的基础

包括资本制度、合同设计制度、诚信义务制度、公司分配限制制度、刺穿公司面纱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等在内的一系列制度构建了债权人保护制度体系。在资本制度改革对注册资本担保功能大大削弱的背景下,强化其他债权人保护制度就成为债权人保护体系逻辑运行的必然结果。合同制度、诚信义务制度、公司分配限制制度、刺穿公司面纱制度等“虽可以起到预防和规制债务人欺诈行为的效用,但其有效运行也需要依赖于信息披露制度,在信息披露制度缺失的情况下,这些制度的立法目的往往难以顺利实现”<sup>[4]</sup>。对于债权人来说,对债务公司信息的充分掌握是合同制度发挥作用的前提,换言之,债权人与债务公司的合同条款设计需要以债务公司的有关信息,尤其以财务信息为前提,否则就会给公司损害债权人利益以可乘之机;诚信义务制度旨在要求公司董事、经理等公司高管忠诚于公司,并在处理公司事务时尽职尽责,诚信义务的履行对于商事判断规则极为依赖,其核心的判断标准是公司高管决策时是否依据充分的信息,因此,债权人对公司高管是否违背诚信义务的判断只能依据充分的信息披露;公司分配限制制度设计的初衷在于要求公司分配应于法有据,公司的分配不能损害债权人利益,而公司分配损害债权人利益与否,须以包括财务会计信息在内的公司信息充分披露为判断依据;刺

穿公司面纱制度设立初衷是规范股东对控制权的行使,如果公司股东滥用控制权,股东有限责任的面纱将被刺破,但公司股东是否滥用控制权要以披露的信息为判断标准,因此,刺穿公司面纱制度的有效实施仍以公司信息披露为前提。

## 2 我国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存在的问题

### 2.1 我国公司信息披露法律效力位阶方面存在的问题

综合分析我国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可以看出一个突出的问题便是效力位阶方面存在缺陷。虽然《公司法》《证券法》等对公司信息披露作了规定,但这些高位阶法律对公司信息披露实施规制的初衷是为了满足股东的知情权,债权人知情权只是股东知情权制度外溢的结果。换言之,对于债权人而言,与公司信息披露相关的高位阶法律存在针对性不强的缺陷。另一方面,与债权人知情权密切相关的《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只是行政法规,存在效力位阶低下的缺陷,而且该条例规制的对象除了公司外,还包括合伙、个人独自企业等实体。“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则应是权威性指令。”<sup>[5]</sup>公司信息披露法律效力位阶方面存在的问题严重影响了法律的权威性以及法律对公司信息披露的规制效果。

### 2.2 我国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方面存在的问题

首先,公司信息披露的原则不完善。《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明确真实、及时是企业信息公示的原则,2023 年新修订的《公司法》确立了真实、准确、完整的公司公示信息原则。在我国资本市场改革深入推进的背景下,现有原则性规定能否适应债权人保护需要是值得推敲的。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交易状况瞬息万变,相关性和便捷性的信息对债权人来说同样重要,因为只有遵循包括这两项原则在内的信息披露原则披露信息才能使债权人对对象公司产生信赖,避免因信息失真而致债权人利益受损。因此,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在信息披露立法中确立了相关性和便捷性等原则,并要求公司在信息披露过程中严格遵循,以此来强化债权人保护,而我国现行公司信息披露法律中未将相关性和便捷性确立为原则,难以有效发挥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对债权人的保护功能。

其次,强制性信息披露的范围存在不足。强制性信息披露是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的直接表现,是法律为维护债权人利益对公司信息披露的硬性要求。目前,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对公司披露信息硬性要求主要集中在

公司登记备案信息、股东出资信息、公司经营范围及期限信息、公司对外投资信息等方面。从强化债权人保护来看,这些披露的信息作为债权人决策依据显然是不充分的。公司信息披露意在为债权人的理性决策提供信息依据,因此,公司重大违约情形、重大涉诉等公司信用信息及公司重大资产转让、风险投资、关联交易、对外提供重大担保等公司偿付能力信息,对债权人交易行为的决策具有更为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对于资产和负债总额、对外担保、收入、利润等应当纳入强制性披露范畴的信息,《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九条明确规定公示与否由企业自主选择,这些信息没有纳入公司强制信息披露范畴,显然非常不利于债权人利益保护。

### 2.3 我国公司信息披露程序方面存在的问题

首先,公司信息披露时点和频率方面存在不足。一方面,相关法律关于公司信息披露时点的规定存在冲突。如《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向社会公示上一年度年度报告,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82 号)第十三条规定,上市公司年度报告应当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四个月内向社会披露,很显然,对于上市公司年度报告的披露,两部法律规定产生了“法律冲突”现象,它不仅给公司披露信息带来了制度障碍,增加了公司的披露成本,而且给债权人获取公司信息带来了诸多不便。另一方面,公司信息披露频率存在不足。关于信息披露频率方面,我国公司信息披露法律规定了定期信息披露和临时信息披露两种制度。在定期披露实践中,无论是一年一次的年度报告披露,还是一年两次的财务会计报告披露,很多公司都选择在法定期限届满日实施信息披露,造成信息堵塞,且这种披露频率过低、间隔期限过长、信息严重滞后等缺陷,导致公司信息披露对公司债权人保护的时效性大打折扣。在临时信息披露实践中,许多公司为了自身利益,人为改变披露的内容和披露的时点,有的公司竟然将临时披露内容拖延至定期披露报告中一并披露,损害了临时信息披露的时效性,侵害了债权人知情权,不利于债权人利益保护。

其次,公司信息披露方式方面存在不足。一方面,网上信息披露机制存在缺陷。有学者指出,“利用传统纸质方式披露财务信息的政府会越来越。”<sup>[6]</sup>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给公司信息网上披露带来极大便利,可以说,采用网上披露公司信息是因应技术进步的必然选择。因此,《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规定企业向社会公示信息应当通过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来完成,但因信息公示法定步骤不明确、披露方案设计存在漏洞等原因,导致公司造假、滞后披露甚至某些重大事项故意遗漏披露等现象时有发生,导致债权人知情权受到侵害,加之,企业纳税信息、企业质量信用信息等也存在缺少公示平台,无法使债权人能够方便快捷地获取公司信息。另外,《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未对公司可以通过自身门户网站披露信息进行明确规定,也是网上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的体现。另一方面,债权人主动查询制度不健全。债权人主动查询权是积极行使知情权的体现,即债权人通过主动查询或者向有关主管机构、法院申请查询债务公司偿付能力的有关信息来达到知情之目的。目前,我国公司财务、会计制度以股东知情人为核心,对债权人知情权的规定非常之少,至于债权人的主动查询权没有任何规定,债权人主动查询机制极不健全,不利于债权人主动查询权的行使和利益保护。

#### 2.4 我国公司信息披露法律责任方面存在的问题

首先,刑事责任威慑力不足。强化公司信息披露刑事法律规制,对信息披露义务人会产生强大的震慑,无疑对公司依法依规披露信息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现行刑法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涉嫌犯罪的刑事处罚机制不健全,突出表现在刑事责任的适用条件和刑罚裁量规定不够具体,可操作性较差,导致刑事责任威慑力不强。如,我国刑法“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适用要件是“提供虚假或隐瞒重要事实”或者“不披露重要信息”并“严重损害股东或者其他利益”,但在司法实践中,因为重要事实、重要信息和严重损害等具体条件并不明晰,给司法实践中具体案件的处理带来困难。尽管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颁布的《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六条对立案追诉的具体情形进行了规定,但仍存在未对上市公司和非上市进行严格区分、适用条件较模糊、量刑标准缺失等问题,给案件处理带来不确定性。诸如此类的问题导致难以有效发挥刑事法律对公司信息披露的规制作用,刑事责任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威慑力不足,从而不利于刑事责任机制在债权人保护方面发挥作用。

其次,民事责任机制严重缺失。综观我国公司信息披露法律体系中,关于公司及其高管在信息披露过程中实施违法、违规行为给债权人造成损失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规定凤毛麟角,绝大多数的处罚措施是罚款等行政处罚,导致债权人因公司违法或违规披露信息受损而无法获得赔偿。对债权人来

说,行政处罚方式其实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可以说适得其反,因为对公司处以罚款会减少债务公司的流动性资产,导致公司偿付能力减弱,从而对债权人利益产生间接损害<sup>[2]113-120</sup>。因此,民事责任机制的缺失导致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对债权人保护效果不佳,是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存在缺陷的一个重要方面。

### 3 完善我国公司信息披露法律制度的对策

在深入推进公司资本制度改革进程中,构建科学合理的公司信息披露法律制度,对保护债权人利益意义重大。因此,必须强化具体的制度设计,完善我国公司信息披露法律制度。

#### 3.1 创新我国公司信息披露立法模式

以股东利益为中心对公司信息披露进行法律规制的单边价值导向在我国公司信息披露法律体系中有鲜明的体现。这种立法模式抹杀了信息披露对于股东和债权人保护价值的差异性,“股东关注的是对其投入到公司的资本是否有影响的信息,对于债权人来说,债务公司在债务到期时是否具备偿付能力的信息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sup>[2]113-120</sup>因此,笔者建议以债权人保护为主导,对我国《公司法》《证券法》《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中公司信息披露的有关规定进行全面梳理和有效整合,由国家立法机关通过法定程序在《公司法》中进行专门规定,将已成熟的公司信息披露规定和司法实践经验,上升为更系统化的法律规定,提升效力位阶,以制度创新为债权人保护赋能,强化公司信息披露对于债权人保护的权威性和实效性。

#### 3.2 完善我国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 3.2.1 明确我国公司信息披露的基本原则

确立公司信息披露基本原则对于统一标准、弥补法律漏洞、在具体法律规定缺失的情况下执法和司法中的个案处理等有着重要意义。笔者以为,就债权人保护而言,公司信息披露的基本原则除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规定的真实性、及时性原则以及2023年新《公司法》确立的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则外,还应包括相关性原则和便捷性原则。具体而言,相关性原则是指公司披露的信息应与债权人的决策需求相关,有助于债权人根据信息评价和预测公司经营状况和偿付能力;便捷性原则是指公司须在法定的地点和以法定的方式披露信息,方便债权人获取公司信息,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性。因此,笔者建议在公司信息披露制度中确立这两项原则,确保信息披露法律的完整性、有效性和调控能



力,更好地保护债权人利益。

### 3.2.2 进一步明确强制性披露信息的范围

为切实保护债权人的知情权,强制性信息披露是法律对公司的强制性要求,所有公司必须严格遵循。考虑到债权人知情权和公司商业秘密之间的平衡,在确定公司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时有三点需要把握:一是公司披露的信息是最低要求的信息,从而保证债权人能够理性作出交易决策;二是公司披露的信息是对债权人交易决策产生重大影响而债权人无法轻易获取的信息;三是公司披露的信息不是会损害公司竞争优势的商业秘密信息<sup>[7]</sup>。

对于债权人来说,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是债权人的债权得以保全的关键。因此,除了公司设立、注册、出资等基本信息外,应将反映公司债务履行能力的信息纳入公司强制性信息披露的范围。反映公司债务履行能力的信息包括公司信用信息和公司偿付能力信息。具体而言,公司信用信息包括公司被行政处罚信息、公司重大履约违约信息、公司涉及已决重大诉讼及承担法律责任信息等,这些信息反映公司的信用状况,为理性债权人判断公司守信与否所必须知晓;公司偿付能力信息包括公司重大担保信息、重大资产转让信息、资产评估信息、风险投资信息、关联交易信息、发行公司债信息、现金流状况信息和涉及未决重大诉讼信息等,这些信息是包括债权人在内的外部人难以获取的重大信息,对债权人判断公司的偿付能力意义重大。上述这些信息均不是反映公司竞争优势的技术和经营方面的商业秘密,从不同侧面反映公司的偿债能力,对债权人评估交易行为及面临风险时的救济决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因此,笔者认为,将这些信息纳入强制性信息披露范围,便于债权人防范交易风险,能够更有效地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交易秩序。

### 3.2.3 建立自愿性信息披露制度

相较于强制性信息披露最低要求而言,自愿性信息披露具有彰显公司核心竞争力、体现公司社会责任和吸引投资者投资等作用,公司自愿披露的信息对债权人的交易决策同样具有参考意义,因此,应当对自愿性信息披露制度的价值和功能给予充分肯定。我国目前公司信息披露法律规范没有对自愿性信息披露的有关方面,如内容、时间、方式和责任等进行具体规定,但披露与公司发展前景、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公司社会责任履行等方面的信息,对债权人的交易决策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笔者认为,为了提升债权人保护水平,我国应当建立自愿性信息披露制度,对公司自愿信息披露进行规范,比如,明确

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充分性原则,避免公司选择性披露,明确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及时性原则,确保信息的时效性,明确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法律责任,发挥责任机制对公司自愿披露的规范作用等。

## 3.3 完善我国公司信息披露程序性规则

### 3.3.1 关于信息披露的时点和频率方面

首先,笔者认为应对公司信息披露的时点作统一要求,避免出现“法律冲突”现象。如,对公司定期报告的披露时点作统一规定,临时报告应在公司重大事件发生当日或 24 小时以内予以披露等。其次,建议增加公司信息披露的频率。考虑到公司的规模和影响范围,对于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应区别对待,上市公司增加季度报告的披露,非上市公司增加中期报告的披露,满足债权人的信息知晓需求。

### 3.3.2 关于信息披露的方式方面

首先,拓展网上信息披露方式。笔者建议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建立全国公司信息公示平台,将公司信用信息、纳税信息、质量信用信息、信贷信息、涉诉及执行信息等置于该平台统一披露,保证债权人能够全面而便捷地获取公司信息;允许和鼓励公司利用其门户网站披露信息,强化公司自律和社会责任意识,实现网上信息公示渠道的多元化。其次,健全债权人主动查询机制。笔者认为应赋予债权人法定查询权,对于影响公司偿付能力的重大担保、重大资产转让、风险投资、关联交易等信息,债权人可以主动查询或向有关国家机关申请由该国家机关查询。第三,构建第三方信息披露机制。作为资本市场的守护者,会计师事务所、信用评级机构等第三方机构在信息披露体系中的作用不言而喻<sup>[8]</sup>。充分发挥第三方信息披露的作用,可以方便债权人通过第三方机构获取公司信息,更好地实现债权人的知情权。为此,应充分肯定第三方信息披露机制对债权人知情权的实现具有重要作用,加强第三方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对第三方信息披露主体的信息收集、披露、市场服务、监管及法律责任等进行明确规定。

## 3.4 强化我国公司信息披露法律责任

法律责任指“因某种行为而产生的受惩罚的义务及对引起的损害予以赔偿或用别的方法予以补偿的义务”<sup>[9]</sup>。完善的法律责任机制对债务公司会形成有效威慑,确保公司依法披露信息,保证债权人的知情权。因此,有必要对当前我国公司信息披露刑事和民事责任机制的缺陷加以纠正。

### 3.4.1 健全公司信息披露刑事责任机制

首先,在刑事责任主体方面,笔者认为对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应进行严格区分,因为二者实施信

息披露刑事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存在显著差别,“一刀切”做法有悖法律的公平和正义。其次,立案追诉的具体情形应进一步细化。如“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适用要件不够明晰,建议出台司法解释予以细化;《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六条第九款规定“多次”实施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应予立案追诉,这里的“多次”不够清晰,建议应进一步具体化,明确具体的判断标准等。最后,量刑标准应更加明确具体。笔者建议对于违法披露信息构成犯罪的刑事责任主体的量刑档次,应根据犯罪性质、主观动机、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等进行明确界定,便于司法部门在具体案件中实施刑罚裁量。“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性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sup>[10]</sup>明确的刑罚裁量标准体现罪刑法定原则,能够增强司法的可操作性,避免人为因素损害法律的权威性。总之,只有不断健全公司信息披露刑事责任机制,才能更有效地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形成震慑,促使其依法依规披露信息,从而发挥公司信息披露刑事责任机制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作用。

### 3.4.2 健全公司信息披露的民事责任机制

民事责任是现代社会常见的法律责任,主要为补偿性的财产责任<sup>[11]</sup>。相对于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来说,民事责任可以调动公司债权人参与监控公司信息披露的积极性,利用赔偿机制惩治公司信息披露中的违法行为,具有政府执法部门无法比拟的优势。因此,为有效发挥民事责任对公司信息披露法律规制作用,笔者建议最高法院出台司法解释,明确公司信息披露民事赔偿责任相关事项,包括责任主体的认定、违法披露信息的行为与债权人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认定依据、归责原则和免责事由、赔偿范围和计算方式等,便于法院审理公司信息披露的民事侵权案件。若公司违法违规披露信息给债权人造成损失,债权人就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披露义务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 4 结论

在公司资本制度改革进程中,唯有强化债权人保护制度,对股东权益和债权人权益进行有效平衡,才能保证资本制度改革行稳致远,从而激发社会投

资效率,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公司信息披露制度为债权人获取理性交易决策所需的信息提供制度保障,不仅能够发挥该制度对于债权人保护的信息效应,而且是其他债权人保护制度有效发挥功能的基础。因此,在深入推进公司资本制度改革进程中,我国应重视信息披露对于公司债权人保护的制度价值,针对我国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存在的问题,系统完善公司信息披露制度,从而提升公司债权人保护水平。

### 注释:

- ①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s://www. stats. gov. cn/sj/ndsj/2023/indexch. htm](https://www.stats.gov.cn/sj/ndsj/2023/indexch.htm). 2023年8月20日访问。
- ② 数据来源于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网站. <http://114.115.232.154:8080/>. 2023年10月25日访问。

### 参考文献:

- [1] ARMOUR J. Share capital and creditor protection: Efficient rules for a modern company law[J]. The Modern Law Review, 1999(3):63.
- [2] MERKT H. Creditor protection through mandatory disclosure[J]. European Business Organization Law Review, 2006,7(1):95-122.
- [3] MAHONEY P G. Mandatory disclosure as a solution to agency problems[J].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1995,62(3):1047-1112.
- [4] 王欣新,丁燕. 论破产法上信息披露制度的构建与完善[J]. 政治与法律,2012(2):2-12.
- [5] 约瑟夫·拉兹. 法律的权威——法律与道德论文集[M]. 朱峰,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45.
- [6] ATTMORE, ROBERT H. A look forward from the GASB chairman[J]. Journal of Government Financial Management, 2009,58:20-24.
- [7] 宁金成,梁学涛. 公司信息公开问题研究——以债权人保护为视角[J].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5(3):90-95.
- [8] 洪玫. 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提升我国债券市场透明度[J]. 上海金融,2018(7):47-53.
- [9] GROUP W. Black's Law Dictionary[M]. 5th Edition. Palo Alto: West Publishing Co., 1983:1197.
- [10]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71.
- [11] 张文显,主编. 法理学[M]. 3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169. 责任编辑:汤庆国

## 习近平文化思想赋能高校学报高质量发展路径分析

刘璐<sup>1</sup>, 何莉<sup>2</sup>, 姚仁斌<sup>1\*</sup>

(1. 蚌埠医科大学 学报编辑部, 安徽 蚌埠 233030; 2. 安徽工业大学 学报编辑部, 安徽 马鞍山 243000)

**摘要:**习近平文化思想为高校学报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针对目前高校学报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高校重视不够、发展动力不足,优质稿源匮乏、内容同质泛化,编辑素养不高、服务意识欠缺,刊媒融合欠佳、传播效应较弱等问题,高校学报应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下,坚定争取多方支持、推进集约改革、厚实讲好中国故事的土壤,坚持守正创新、打造精品特色、壮大讲好中国故事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育全能型编辑、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智力支持,秉持开放包容、加促刊媒融合、提升中国故事传播渠道,实现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高校学报;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G120;G23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24)06-0115-04

## Pathway for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Academic Journals Empowered by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LIU Lu<sup>1</sup>, HE Li<sup>2</sup>, YAO Ren-bin<sup>1\*</sup>

(1. Department of Editorial Office, Bengbu Medical University, Bengbu, 233030, Anhui;

2. Department of Editorial Office, 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aanshan, 243000, Anhui)

**Abstract:**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provides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academic journals with basic guidance and working direction. In response to the current problems i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rocess of university journals, such as insufficient attention from universities, inadequate development force, lack of quality manuscript source, homogeneous generalization of its content, short of editorial literacy, deficiency of service awareness, poor integration of journals and media, and relatively weak propagation effect, university academic journals are supposed to develop under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through securing support from multiple sources, implementing intensive reform, enhancing the foundation to tell China Story, upholding integrity innovation, building quality feature, strengthening the power to tell China Story, firming cultural confidence, cultivating versatile editor, providing intellectual support for telling China Story, adhering to a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path of openness and inclusion, increased promotion of publication and media integration, and enhanced dissemination channels for China Story, and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Key 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university academic journal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随着《关于深化改革 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sup>[1]</sup>《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sup>[2]</sup>等一系列促进科技期刊发展的政策陆续出台,中国科技期刊发展已进入快车道。根据《中国科技期刊发

展蓝皮书(2023)》数据,截至2022年底,中国科技期刊总量已达5163种<sup>[3]</sup>。在数量庞大的科技期刊金字塔中,大多数高校学报身处“塔身”或“塔基”,与政策期许的高质量发展目标存在较大差距。在全

收稿日期:2024-05-30 \* 通讯联系人

基金项目:安徽省重点教学改革研究类项目(2021jyxm0172)。

作者简介:刘璐(1986-),女,安徽安庆人,副编审,硕士。E-mail:liulu8000@163.com

球学术交流模式不断创新及“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学报发展转型升级成为必然。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sup>[4]</sup>。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关于科技期刊出版方面的论述全面而深刻: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精神和会议要求,精准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和价值取向;提出要把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到办刊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切实做到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奋力谱写新时代新征程科技期刊高质量发展新篇章<sup>[5-7]</sup>。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包括高校学报在内的科技期刊出版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sup>[8]</sup>。

本文针对目前高校学报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困境,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导下,提出推动高校学报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以期高校学报高质量发展提供路径参考。

## 1 高校学报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困境

### 1.1 高校重视不够,发展动力不足

高校学科分布广、人才梯队好、科研实力雄厚<sup>[9]</sup>。然而,作为学术阵地的高校学报,却未“近水楼台先得月”。当前如火如荼的高校“双一流”建设很少将高校学报纳入规划。高校未看到学报对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的重要性,也未看到高水平学报对提升高校在国内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性。学报在高校组织机构中往往被列为教辅单位或某职能部门的下属单位,在政策、资金及资源等方面得到的扶持均有限;有些高校存在“一校多刊”,而人力、财力、物力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集群化、规模化、市场化程度低。

就学报本身而言,由于隶属于高校,办公经费、场所和人员编制均由高校提供,不参与市场竞争,无须担心发行和盈利问题,生存和发展的压力相对较小,因而办刊思想相对保守,缺乏主动创新和市场经营意识,发展的动力不足。

### 1.2 优质稿源匮乏,内容同质泛化

高质量稿源是实现高校学报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然而,目前大多高校学报虽然质量一般的稿源较为充足,但长期以来被标注“小、散、弱、乱”标签,传播力、影响力一般,优质稿源较为匮乏。加上目前科研和人才评价标准仍存在“唯SCI至上”导向问题,优质稿源大多外流至国外期刊或国内专业核心期刊,高校学报处境尴尬。虽然国家出台了《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

动的通知》等政策,但导向的转变和政策的落地尚需时日。

此外,编委会未给学报争取更多的优质稿源。有些高校学报的编委会形同虚设且职责不清,编委对待学报组稿约稿等工作的积极性不高,编辑部与编委之间也缺乏有效联动,编委会的智库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sup>[10]</sup>。再者,同类学报内容存在同质化不良竞争,栏目设置未突出内容特色和学术个性,缺乏品牌意识、精品意识。

### 1.3 编辑素养不高,服务意识欠缺

数智时代的高校学报编辑应具备较高的政治素养、业务素养和媒体素养<sup>[11]</sup>。然而,部分高校学报编辑可能缺乏政治敏感性,对涉及敏感问题的稿件审查不严,对意识形态工作重视不够。有些高校学报编辑非学科专业出身,对特定学科领域的内容和热点不甚了解,业务素养有待提高。一方面是编辑对新技术、新理念的兴趣和认知不足,不愿参与;另一方面,学报编辑部专职编辑人员少,日常工作事务繁杂,刊媒融合发展在延长出版链条的同时增加了编辑的工作量,编辑虽然接受刊媒融合理念,但没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系统性地投入到刊媒融合技术的学习和应用中,对专业学科领域成果价值的发掘力有限,同时也缺乏数字融合出版思维与新媒体宣传推广经验。

此外,高校学报编辑的用户服务意识有待提高。如处理稿件时效率不高,对于作者、读者咨询或反馈的问题回复不及时,解决不到位,缺乏主动服务意识。

### 1.4 刊媒融合欠佳,传播效应较弱

“四全媒体”时代为高校学报的刊媒融合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sup>[12]</sup>。目前,大多高校学报通过与大型商业数据库合作,建设期刊官网、微信公众平台、在线采编系统等进行的刊媒融合实践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在与大型商业数据库的合作中,学报的处境相对被动,学报前期的工作几乎不产生收益,数据库服务商获得发行收益,而学报还要支付高额费用才能获得对数据库的使用权,这大大降低了学报进行刊媒融合的积极性。其次,期刊官网和微信公众平台在运营方面存在无专业人员维护、内容简单重复纸刊、更新速度慢导致的频率低、与作者读者审者互动缺乏、用户体验感较差等问题<sup>[13]</sup>。再者,在线采编系统也未实现集选题策划、协同编辑、结构化加工、全媒体资源管理为一体的流程再造。

此外,编辑部对于高校学报的传播效果亦少有

顾及。一未及时追踪学术热点、学术前沿,二未对纸媒内容进行后续的深度挖掘、二次加工和精准推送,三未带动作者、读者、审者等学术共同体之间的交流合作,四未很好地进行品牌的宣传与推广,亦未进行跨期刊、跨机构的传播合作,缺乏市场化运营的思维和能力。

## 2 习近平文化思想赋能高校学报高质量发展路径

### 2.1 争取多方支持,推进集约化改革,厚实讲好中国故事的土壤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sup>[14]</sup> 这为包括科技期刊出版在内的文化强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高校学报应利用好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科学的行动指南<sup>[15]</sup>,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为打破目前高校学报发展的现实困境,高校学报应借助文化强国、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双一流”高校等建设发展的时代“东风”,争取多方支持,推进集约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

学报应积极主动地参与国家、地方重要扶持项目申报;争取母体高校在政策、资金及资源等方面的支持,如有些高校规定高级职称教师每四年必须在本校学报发表一篇论文,承担国家级、省部级项目的教科研人员在结题时必须在本校学报发表一篇论文,这些导向性政策贯彻落实了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的《关于规范高等学校 SCI 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要求,解绑了 SCI 和影响因子对科研的束缚,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本校教科研人员优秀成果外流。

2019 年,中国科协、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改革 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指出要“提升科技期刊规模化、集约化办刊水平”。高校学报应顺应科技期刊集群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改革单刊发展思路,推动集约化管理改革。由此可突破各自为营的运营模式,与其他高校、科研机构、学术组织、行业协会、学术出版商等建立深度合作关系,变单刊为集群,通过资源整合、分工协作,形成学术品牌和规模效应,扩大学报的影响力,加强对外竞争优势,在实现共赢的同时,为学报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sup>[16]</sup>。

### 2.2 坚持守正创新,打造精品期刊,壮大讲好中国故事力量

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史哲》创刊 70 周

年时给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中强调“高品质的科技期刊就要坚守初心,引领创新,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sup>[17]</sup>。因此,高校学报在坚守正确政治方向、坚守学术道德诚信、坚守学术质量标准的前提下,必须主动创新,吸引优质稿源,重点建设特色栏目,打造学报的品牌形象。

学报应创新组稿约稿方式方法。首先,应优先就近考虑本校专家、教授、博士等科研人员,重点关注学科领域内的优秀青年学者,围绕其立项课题有效约稿。其次,可争取学校政策支持,邀请校外专家学者来校作学术报告,同时向校外专家学者约稿,并制定定期拜访专家学者制度,密切关注专家学者的最新科研动态。再次,学报应把握关键时机,利用母体高校优势,打造纪念性专栏或专刊。如《蚌埠医学院学报》在 2018 年建校 60 周年之际向校友刘德培、段树民、陈孝平等院士顺利约稿并出版了校庆专刊、院士述评专栏;又因 1983 年第 3 期曾发表了时为校生化教研室老师的刘德培院士、79 级学生的王福生院士、附院肿瘤外科医生陈孝平院士的文章,所以在 2023 年第 1 期又策划出版了院士论坛,社会反响热烈。

高校学报还应充分发挥编委会的能动性,通过积极组织召开编委会,在官网或新媒体平台展示编委风采等,激发编委对学报发展的责任与热情,为学报带来优质稿源,发挥专家办刊的核心作用。此外,学报还可结合母体高校优势学科、特色学科、重点学科做大做强特色栏目,同时剔除与期刊定位关系不强、自明性较差的内容栏目,突出栏目学科性和专业性特征,拉近自身与母体高校及所属学科领域的距离,强化影响力和传播力。如《蚌埠学院学报》的“淮河文化”“蚌埠研究”<sup>[18]</sup>、《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楚淮文化”<sup>[19]</sup>、《锦州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医学伦理”<sup>[20]</sup>等特色栏目的建设发展让这些学报有了亮点、看点和支撑点。

### 2.3 坚定文化自信,育全能型编辑,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智力支持

在 2018 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努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sup>[21]</sup>。可见,复合全能型编辑人才是高校学报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作为主流意识形态阵地,高校学报应定期开展政治理论学习,提高编辑的思想政治站位,加强对稿件意识形态问题的审查,把好政治导向关。还应建立长效学习机制,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编辑业务学习,邀请同行

专家到编辑部进行参观交流,支持鼓励编辑参加学术会议和培训班,提升编辑的业务素养,把好编校质量关;建立“传帮带”培养机制,通过资深编辑帮带年轻编辑,发挥资深编辑的骨干作用,激发年轻编辑的创新意识。最重要的是,学报应加强对编辑在新媒体技能方面的培养,提高编辑的媒体素养。制订适应时代发展需求、贴合岗位实际、目标定位明确的编辑人才引进、培养、考核方案,着重引进学者型编辑人才、技术应用型人才和新媒体运营人才,并完善编辑人才管理制度,从而为学报学术影响力提升、数字出版转型和新媒体推广运营提供支持。

此外,编辑部应注意强化编辑的服务意识和编辑部的口碑意识。编辑应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作者的劳动成果,及时提供专业的建议,帮助作者提升论文质量,还可积极为作者提供学术咨询、论文写作指导等服务,协助他们解决在论文写作和发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编辑部应优化稿件处理流程,合理控制出版时滞;关注作者、读者的反馈和需求,优化学报的内容、排版和呈现形式,提高用户阅读体验;还可通过在线上或线下举办作者读者座谈会、学术沙龙等活动,加强与作者、读者的互动交流,巩固、扩大核心用户群体。

## 2.4 秉持开放包容,加促刊媒融合,提升中国故事传播渠道

2019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sup>[22]317</sup>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全媒体”概念是对媒体融合发展方向的精准定位。为适应“四全媒体”时代的发展,作为学术传播体系重要力量的高校学报,应进行全方位的革新发展,打开刊媒融合的新局面,坚持导向为魂、移动为先、内容为王、创新为要<sup>[22]317</sup>,打造新型传播平台,建成新型主流媒体,加快构建融为一体、合二为一的全媒体传播格局<sup>[22]318</sup>。

高校学报一可突破时空尺度,注重更强的时效性和敏感性,及时捕捉并全程关注、报道学术前沿动态,利用网络首发、优先出版等,实现研究成果的即时发布,缩短论文的发表周期,且在成果发布后继续跟踪后续动态,与作者、读者进行实时常态化的沟通。二可突破物理尺度,借助多媒体技术,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信息形式融合起来进行增强出版,如采用三维模型、可交互式图表、可视化数据、虚拟实验室等多元化内容立体、生动地传播,并利用

数据分析、用户画像等技术手段精准推送,丰富读者的阅读体验,提高读者的黏性。三可拓宽与读者、作者和学者的互动渠道,利用微信群定期推送深度内容、热门文章及科研动态和学术活动信息,通过社交媒体分享转发科普文章,吸引更多的参与者和关注者,打造以编辑为核心,作者、读者、审者、学者全员参与的学术生态圈。四可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与其他期刊、机构、学术团体进行转载、讨论,或联合举办学术研讨会等活动,会前造势,会上宣传,会后报道,增强学报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 3 结论

习近平文化思想为高校学报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压实了使命担当,凝聚了磅礴力量。学习与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应该成为当下高校学报出版人的一种思想和行动自觉。高校学报出版人应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品格,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担负起新时代出版使命,为文化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 参考文献:

- [1] 中国科协,中宣部,教育部,等.关于深化改革 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EB/OL].(2021-04-02)[2024-05-26].[https://www.cast.org.cn/xs/zcfg/YWHD/art/2021/art\\_3c24b26982554efbac53f672322388c0.html](https://www.cast.org.cn/xs/zcfg/YWHD/art/2021/art_3c24b26982554efbac53f672322388c0.html).
- [2] 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A/OL].(2021-06-25)[2024-05-26].[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2106/t20210628\\_540716.html](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2106/t20210628_540716.html).
- [3] 中国科协学会服务中心.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23)[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3.
- [4] 曲青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为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贡献党史和文献力量[J].旗帜,2023(11):8-11.
- [5] 刘建生.全面理解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着力推动出版行业高质量发展[J].出版与印刷,2023(6):1-7.
- [6] 范军,息慧娇.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新时代出版自信自觉自强[J].中国出版,2023(22):5-9.
- [7] 李春峰,陈雨珠,王一波.文化自信、开放包容、守正创新——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品格[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4(1):8-13.
- [8] 田伟,齐文安,魏均民.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我国科技期刊发展的思考[J].编辑学报,2024,36(1):1-4.
- [9] 张铁明,刘志强,陈春莲.我国高校科技期刊高质量发展的政策环境分析[J].科技与出版,2021(9):6-11.

# 非遗产业化视角下凤阳花鼓的发展及创新路径

李应青

(滁州学院 科研处,安徽 滁州 239000)

**摘要:**以凤阳花鼓为探讨对象,通过概括凤阳花鼓的文化价值,调查凤阳花鼓发展现状及产业化意义,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体现一个国家或民族软实力的文化名片。提出凤阳花鼓产业化的创新路径,从而实现活态传承、生产性保护“非遗”的目的,以期凤阳花鼓长远、稳定地发展提供系统的理论与实践支撑。

**关键词:**凤阳花鼓;非遗产业化;发展现状;创新路径

中图分类号:J722.212;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24)06-0119-05

##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Path of Fengyang Flower-drum Op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dustrialization

LI Ying-qing

(Scientific Research Department, Chuzhou University, Chuzhou, 239000, Anhui)

**Abstract:** It proposed the innovation path of industrialization of Fengyang Flower-drum Opera in this paper,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a cultural card that reflects the soft power of the nation. Taking Fengyang Flower-drum Opera as the research objective, by summarizing the cultural value of Fengyang Flower-drum, investigating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industrialization significance of Fengyang Flower-drum, it so as to realize the purpose of living inheritance and productiv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provide systematic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upport for the long-term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Flower-drum opera.

**Key words:** Flower-drum opera; industrializ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development status; innovation path

2024年10月17日至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再次强调:“深入挖掘和运用好红色文化资源育人功能及旅游价值。加强传统村落、传统建筑保护传承利用,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sup>[1]</sup>在我国漫长的文化发展史中,诞生了一批以凤阳花鼓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艺术文化,2006年被列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的凤阳花鼓不仅成为安徽省文化品牌代表,更是皖东地区优秀传统文化的象征;2022年凤阳花鼓又成功入选“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建设典型案例。滁州学院的音乐学院作为教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对

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凤阳花鼓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做出一些尝试。本文拟对凤阳花鼓的文化价值进行分析,调查凤阳花鼓发展现状及产业化意义,提出凤阳花鼓产业化的创新路径,从而实现活态传承、生产性保护“非遗”的目的,以期凤阳花鼓长远、稳定地发展提供系统的理论与实践支撑。

### 1 凤阳花鼓的文化价值

#### 1.1 艺术价值

首先,从宏观的层面解析,凤阳花鼓有着很强的综合性与专业性。它既包含了戏曲,也含有表演、乐

收稿日期:2024-07-11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重点项目(SK2021A0691)。

作者简介:李应青(1969-),女,安徽枞阳人,编审。E-mail:czxyxb@126.com

器等元素,是我国历史悠久并形成完善体系的表演艺术。最初的风阳花鼓源于人们利用花鼓、小锣进行乞讨,后来因形式新颖不断流传开来,逐渐发展成卖艺表演。因凤阳花鼓广泛地传播,引来了大量以打花鼓为生的艺人,从事者的增多进一步促进了凤阳花鼓的创新发展,凤阳花鼓的体系也逐渐得以完善,形成了以小鼓、小锣伴奏为主,多伴奏乐器下的歌舞表演。

其次,凤阳花鼓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特点形成了艺术属性的多元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有所侧重地突出某种艺术属性,具有历时性的特点。其曲艺形式从乾隆年间一直延续到当下,2011年以来还能采录到210首曲目,保持着共时性发展的并存格局。

最后,为了适应人们不同的审美需求,凤阳花鼓不仅在细化为大花鼓和小锣花鼓两种表演体系,也形成了“唱门头”和“坐唱”两种表演形式。在当前环境下,凤阳花鼓仍然没有停止发展的脚步,在先进设备的支持下,凤阳花鼓通过表演、剧目的创新已然由此前的民间艺术蜕变成为专业的表演艺术,其独特的艺术属性显示出勃勃生机。

### 1.2 民俗价值

凤阳花鼓是凤阳地区人民积极生活、努力奋斗的真实写照,具有宝贵的民俗价值。首先,凤阳花鼓产生于我国安徽省的凤阳府临淮县地区,是当地人民创造出的独特戏曲艺术,通过凤阳花鼓中的音乐、故事和表演均能够生动地体现出本地区人民的勤劳与智慧。同时,在诸多的凤阳花鼓剧目中,有许多关于当地群众生产与生活的民俗的内容,对于当地的民俗文化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其次,凤阳花鼓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能够胜任于多种场合的表演与演出,从而迎合不同功能的需求。据史料记载,凤阳花鼓最早是服务于民间社事中的娱神歌舞表演,并逐步普及到日常生活和各种生产的场合之中,可以说凤阳花鼓记录了凤阳地区人民发展、生活中大大小小的故事,这是凤阳地区人民一代又一代薪火相传的民俗文化和精神寄托,通过凤阳花鼓可以更加深入地研究本地的民俗文化。

### 1.3 历史价值

凤阳花鼓是历史延续的载体,据有关资料记载,凤阳花鼓起源于明代时期,相比于众多起源于清代的民间艺术来说,凤阳花鼓有着更加久远的历史。首先,根据明朝时期的诗人田艺衡所著《留青日札》中提及凤阳花鼓的艺术形式为:“吴越间妇女用三

棒上下击鼓,谓之三棒鼓,江北凤阳男子尤善。”由此可见凤阳花鼓在当时已经初具规模。其次,在发展的过程中,凤阳花鼓历经了多次改进与创新,如清朝时期许多文献和诗文中,记录了凤阳花鼓表演由此前歌舞并重的形式转为了以唱为主的形式,其中的舞蹈元素因环境的变化逐渐淡出了凤阳花鼓的表演体系。最后,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文艺工作者的研究,凤阳花鼓又重新加入了原有的舞蹈元素,并通过创新采用双条鼓锤进行花鼓的伴奏,使表演氛围进一步得到了提升。

通过历史线索的梳理,凤阳花鼓的发展可谓贯穿于明代至现代历史的全过程,具有十分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对于历史考古、音乐研究均有着重要意义。通过史料中所提供的线索,可以更加清晰地反映出早期凤阳花鼓的艺术特征,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能够真实还原凤阳花鼓的重要参考。

## 2 凤阳花鼓发展现状及产业化意义

### 2.1 凤阳花鼓发展现状

近年来,我国因时代的发展、多元化的艺术环境以及群众审美需求变化等原因将非遗艺术的发展推向了绝境,凤阳花鼓与其他民间非遗艺术一样面临着传承结构老龄化、开发形式较粗放、校地合作欠紧密、发展模式守传统等多方面的问题。

传承结构老龄化。滁州市政府和凤阳县政府和社会各界为保护凤阳花鼓不断加大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力度,引导民间团体积极参与花鼓的保护工作,加强传统演员的培养和传承,尽管“凤阳花鼓”国家级唯一代表性传承人孙凤城先生及近80高龄仍活跃在舞台上,但近年来,老一辈凤阳花鼓艺人呈现严重老龄化的趋势,且从事者的年龄完全集中在中老年阶段,已经呈现出了结构优化不足的问题。

开发形式较粗放。除了几届凤阳花鼓文化旅游节、重大庆典活动大型花鼓戏表演,已有的“中国凤阳花鼓文化旅游节”对旅游资源文化内涵挖掘不够,项目带动战略的实施力度亟需加大。<sup>[1]</sup>

校地合作欠紧密。滁州市政府和凤阳县政府高度重视对凤阳花鼓这一充满浓郁民间传统和地方特色的艺术进行保护与传承,在凤阳花鼓文化产业总体规划、资金支持、平台搭建等方面下大功夫,但政府与安徽科技学院、滁州学院等属地高校合作欠紧密。滁州学院注重传承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凤阳花鼓,聘请“凤阳花鼓”国家级唯一代表性传承人孙凤城为客座教授,培育4名专任教师分别获批省、市级非遗传承人,以专兼结合的教学团队口传身授、



活态传承,带领学生开展技艺创新、剧目创编等相关工作。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国庆阅兵式后的群众游行中,花鼓艺术团 4 名学生在“美好安徽”彩车上表演凤阳花鼓,展示安徽形象;先后赴省内高校成功举办 51 场“鼓乡情韵——高雅艺术进校园”专场演出;完成省内高校首次赴台“鼓乡情韵”专场文化巡演;完成非遗进高校、农村、社区、企业、部队的“五进基层”专场演出 200 余场等。在此基础上,高校非遗传承之路得到了不少主流媒体的关注,中央电视台、“学习强国”“人民网”、安徽卫视等网络媒体多次对基地传承工作给予了深度报道,凤阳花鼓艺术的社会影响力和传播力稳步提升。

发展模式守传统。凤阳花鼓文化产业市场不够健全,传统的模式完全需要依靠各方艺人的努力才能够推动发展,但在当前文化艺术竞争日渐激烈的复杂环境下,各自为政的力量显然无法依靠一己之力带动凤阳花鼓整体的发展。所以,现阶段的主要任务需要将分散的力量统一起来,通过宏观调控来合理分配资源。

## 2.2 凤阳花鼓产业化意义

从上述调查可以看出,凤阳花鼓在当前环境下只有通过专业的带动和管理才能形成良好的生态环境。产业化是众多非遗艺术选择的道路。“农村文化产业指县、乡(镇)村行政区域内的文化产业,是围绕农村民间文化传统和文化资源,利用现代经济理念和产业经营模式而开展的经济活动。”<sup>[3]</sup>产业化能够以多样的形式带动凤阳花鼓的传播,产业化可以通过产品的转化将凤阳花鼓包装成各类产品,“凤阳花鼓农村文化产业主要包括花鼓曲艺演出产业、花鼓制作等手工工艺文化产业、凤阳花鼓乡村文旅产业。”<sup>[4]</sup><sup>59</sup>如当下热门的文创产品,这些产品的形式多样,可以是服装、纪念品、书籍等,实体产品的传播并不存在地域的限制,能够让凤阳花鼓获得更多的关注。

旅游行业是目前非遗艺术融合深度较高的行业,以凤阳县为例,凤阳县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其中古城、明皇陵、小岗村均是重点开发的物质文化遗产,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凤阳花鼓只能作为附属在当地旅游业中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所以,只有扩展产业化的方向,摆脱在旅游行业中附属的位置,成为独立的非遗产业,与更多行业达成融合与合作才能使凤阳花鼓更加具有竞争力。当然,真正实现完善的产业化是一项长期工作,要达到这种程度需要充足的准备和时间。

## 3 凤阳花鼓产业化的创新路径

“凤阳花鼓农村文化产业发展首先要将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自发调节有机结合,推动形成‘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合力。”<sup>[4]</sup><sup>60</sup>从而推动了凤阳花鼓的创新和发展,最终可形成人、戏、产业互惠互利的铁三角关系。凤阳花鼓产业化的创新路径离不开地方政府积极作为和市场作用有效发挥。

### 3.1 建立统一的组织,促进领导机构科学监管

建立统一组织、统一监管是促进非遗文化发展和创新的关键,同时也是非遗产业化中的首要环节。首先,建立统一组织和领导可以有效地规划资源,从而彻底摆脱原有自然、原生的发展模式,合理的规划可以使大型的表演团体获得更加高端的资源与项目,而小型或家庭规模二段表演团体也能够获得生存的空间,使每个凤阳花鼓的从业者均能够享受到合理的资源,最终形成非遗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局面。其次,统一规划的产业化模式能够通过管理组织进行大数据分析,从而对当前的市场进行更加深入的了解,如果市场发生变化也能够即使对现状进行调整,确保发展过程中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最后,创新需要在一定的框架下开展才能够迎合当前时代的环境与观众的审美,通过建立组织进行培训和指导才能够使创新变得更加有效。

### 3.2 创新培训模式,加大曲目的创新力度

适时开展培训是保证凤阳花鼓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以凤阳县为例,该地区已经设立了专门的培训机构用于训练专业的培训员,但这样的模式所能控制的范围有限,仅能够保证本地区非遗文化的传播,而本地区以外的地方则成为了推广的盲区。凤阳花鼓已经在凤阳乃至安徽其他地区拥有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当前发展凤阳花鼓的关键在于向安徽省以外的其他地区扩展。所以,除了现有的线下模式外,还应该建立线上培训的模式,形成线上、线下共同促发展的完善培训体系,这样就能够让更多地区的观众了解凤阳花鼓,并逐渐在当地形成一定的凤阳花鼓氛围。

另外还要高度重视曲目创新,这是凤阳花鼓除表演之外的核心内容。首先,曲目是最直接与观众接触的元素,如果曲目的内容无法激起观众的形式,再热烈的表演也无法引来驻足。纵观凤阳花鼓现存的曲目,虽然有一定的创新,但至今流传的曲目仍然是早前的经典曲目,如《凤阳歌》《鲜花调》等,所以,当前除了在表演形式上进行创新以外,更重要的在于创作出迎合时代的凤阳花鼓曲目,使凤阳花鼓得

到更广泛年龄群体的关注。同时,曲目不仅要创新,还需要推广,仅依靠比赛、演出或广告推广新作品显然无法得到大众化的普及。如何得到更加有效的推广,基层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如凤阳县在每个基层均设有培训师,具体可将创新作品先对培训师进行培训,然后再落实到基层中每日锻炼的市民,这样就能够起到比广告更加有效地广而告之效果。

### 3.3 培养乡土能与专业队伍,善于借力

凤阳花鼓农村文化产业发展要突破人才外来引进难、后继传承难等制约瓶颈。一是育强本土“领头雁”。加强对农村非遗传承人、民间艺人等“土专家”培养使用,提高花鼓艺人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二是打造人才“生力军”。强化政校企多方合作,多形式多渠道引入有文化、懂市场、善经营的复合型人才,改善农村地区物质生活环境和配套设施建设,以优惠政策和优厚待遇将人才留在本地、用在本地,赋能非遗文化产业<sup>[4][6]</sup>。

在此基础上,还要高度重视扩大招商引资力度,善于借助外力。政府部门要根据凤阳花鼓非遗文化产业建设需求,借助民营企业、外资等外力精准招商,广泛宣传推介,引进新项目入驻。善于借助活动交流对接,开发运营花鼓非遗展示、民宿、生态康养等项目,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拓展发展空间。同时,针对未来投资体量大、带动能力强的优质项目,预先精准对接,做好政策服务,加速推进洽谈进度,推动项目尽快签约。后期持续做好签约项目服务保障工作,成立项目服务专门对接组织,联合各个职能部门齐心协力,破解项目可能存在的难题,让投资商放心满意,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共享凤阳花鼓非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新机遇。

### 3.4 创建品牌,优化产业结构

创建品牌是打造高端项目的必经之路。在非遗产业化的链条中,既要有迎合大众的中低端文化产品,同样也要有高端的品牌项目在产业链中做支撑,品牌是保证非遗文化更加广泛传播的重要力量,而通过品牌的效应也可以带动产业链中的中低端产业发展,形成更加立体的产业化体系。与此同时,品牌模式在吸引人才与创新中更加具有吸引力,能够在短时间内聚集人才和发展创新。其次,品牌相比于一般的文化产品更具深度和权威性,从以往的文化产品的经验可以看出,一味的注重非遗本体的创新很容易使创新进入瓶颈期,导致大量“换汤不换药”的作品流入市场,引起观众的审美变得疲劳。但品牌则有所不同,通过品牌的包装,可以让凤阳花鼓向

其他领域进行扩展,这样不仅能够促凤阳花鼓的发展,更可以不断优化产业结构,使产业中的产品逐渐丰富起来。如近年来较为流行的文创产品,可以将凤阳花鼓的内容印在服装、茶具等物品之上,从而起到广泛宣传和促进营收的效果。

### 3.5 搭建“非遗网络直播”平台,扩大对外影响

“新媒体能够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新平台,促进缩小城乡文化传播差距、提升文化平等性。”<sup>[5]</sup>互联网在当前环境下已经成为了“兵家必争之地”,凤阳花鼓的产业化要想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站稳脚跟,就必须在互联网中走出符合自身特色的运营模式。近年来,有大量的非遗文化艺术涌入互联网进行发展,但经过大量的实践可以看出,非遗文化在互联网中并没有优势可言,现代艺术仍是互联网、短视频中的主力军。如何打开局面,首先需要重视地区之外的资源投放。在互联网和手机的短视频中,推送资源均是以就近原则为主,而凤阳花鼓在本地区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名气,过多的向本地推动只能造成资源的浪费。所以,在凤阳花鼓在外地演出、表演时更要做好资源的推送工作,从而进一步扩大对外的影响力。其次,重视线上的同时也要保证实体的质量,如果地区之外的观众来到凤阳周边欣赏凤阳花鼓,发现和线上的推送有很大区别则会影响到凤阳花鼓的形象。如近年来在互联网与线下斩获双赢的淄博烧烤,正是互联网与线下结合发展的典范。凤阳花鼓也可以借鉴淄博模式,在自媒体盛行的当下搭建“非遗网络直播”平台,把握信息化时代品牌传播特点,拓宽方式渠道,扩大品牌空间影响,构建良好传播生态。

### 参考文献:

- [1] 中国政府网. 习近平在安徽考察时强调: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EB/OL]. [2024-10-18]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10/content\\_6981326.htm](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10/content_6981326.htm).
- [2] 杨尚翥. 产业融合视角下凤阳花鼓文化旅游产业模式研究[J]. 铜陵学院学报, 2019, 18(1): 22.
- [3] 田珂.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河南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研究[J]. 河南农业, 2020(6): 32.
- [4] 徐世平. 农村文化产业发展路径研究——以安徽凤阳花鼓为例[J].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 2023(9): 59.
- [5] 何雯. 试谈新媒体环境下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策略[J].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 2022, 39(1): 78.

责任编辑:谢政伟

## 皖北中原官话绝对程度副词研究

张琳琳

(蚌埠学院 文学与教育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

**摘要:**皖北地区方言以中原官话为主。学界在梳理皖北方言副词系统时,发现皖北方言程度副词数量较多,极具特色,且绝对程度副词的用法与普通话区别明显。以皖北中原官话为基础,按照程度量范畴的分类重点研究过量级、极量级、高量级和略低级四类绝对程度副词,从语义特征、句法功能、语用功能三个层面进行考察,有利于揭示皖北中原官话绝对程度副词蕴含的规律和价值,有助于拓宽语言研究的领域,揭示语言规律,以期为研究汉语方言副词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关键词:**皖北中原官话;绝对程度副词;量范畴

中图分类号:H1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24)06-0123-06

## Study on Absolute Degree Adverbs of Zhongyuan Mandarin in Northern Anhui Province

ZHANG Lin-li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Education, Bengbu University, Bengbu, 233030, Anhui)

**Abstract:** Central Plains Mandarin is the main dialect in Northern Anhui. When sorting out the adverb system of North Anhui dialect, it found that the number of degree adverbs in North Anhui dialect is quite large, and the usage of absolute degree adverbs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Putonghua. Based on Zhongyuan Mandarin in Northern Anhui, it focused on four types of adverbs of absolute degree in this paper, namely excessive, extreme, high and slightly low, and investigates them from three dimensions: Semantic feature, syntactic function and pragmatic function, which is helpful to reveal the law and value of adverbs of absolute degree in Zhongyuan Mandarin in Northern Anhui, and helps to broaden the field of language research. To reveal the language law, in order to provide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dialect adverbs.

**Key words:** Northern Anhui Mandarin; adverbs of absolute degree; category of quantities

皖北地区主要指安徽省淮河以北地区及沿淮地区,行政归属包括淮北市、亳州市、阜阳市、宿州市、蚌埠市以及淮南市所辖的凤台县共22个县市。贺巍先生在《河南山东皖北苏北官话的分区(稿)》中将其归属于中原官话区。受历史、地理、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皖北淮河流域方言形成独特的语言系统,在表达程度上呈现独特的表达方式。

程度副词是现代汉语副词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一类,吕叔湘在《中国语法要略》中提出,汉语表达程

度的主要手段是副词<sup>[1]</sup>。当人们在表达较为抽象的数量关系时,与“量”有关的则纳入到程度范畴中去,那么各种程度表达手段的集合就是程度范畴的集中表现。新世纪以来,随着皖北方言研究的逐步展开,相关学术研究氛围浓厚、成果斐然,如王琴《皖北阜阳方言同音词汇》、贡贵训《安徽淮河流域方言语音比较研究》、徐红梅《皖北方言词汇研究》、侯超《皖北中原官话语法研究》、张德岁《皖北方言表达程度的方式》、胡利华《皖北地区方言与民俗的

收稿日期:2024-03-18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AHSKQ2022D186);蚌埠学院科研项目(2020SK02)。

作者简介:张琳琳(1983-),女,安徽宿州人,讲师,硕士。E-mail:yulin533@126.com

互动关系研究》等分别从皖北方言语音、词汇、语法以及皖北方言与民俗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拓展了皖北方言的研究领域。皖北某些地区方言研究成果显著,如对阜阳方言、涡阳方言、怀远方言的研究等。由于学界侧重于对皖北地区方言某一专题(诸如语音、词汇、语法、民俗)展开研究,而在皖北中原官话程度副词研究方面稍显薄弱。

## 1 皖北中原官话绝对程度副词

王力先生在《中国现代语法》中把程度副词分为绝对程度副词和相对程度副词,分类的标准在于是否存在明确的比较对象。若无所比较或只是粗略地描述程度的,即为绝对程度副词;凡有所比较,即

为相对程度副词<sup>[2]</sup>。马真在《程度副词在表示程度比较的句式中的分布情况考察》中从程度副词的功能上证实王力先生对程度副词分类的合理性。张谊生在《现代汉语副词的性质、范围与分类》中进一步继承、发展、完善了王力先生的二分法,根据程度副词在语义功能方面的度量等级差异,将绝对程度副词细分为“过量级、极量级、次高级、低量级”;将相对程度副词细分为“最高级、较高级、比较级、较低级”,并列举了88个常用副词<sup>[3]</sup>。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将现代汉语副词放到皖北方言语境中进行分析,得出比较完整的皖北中原官话程度副词系统(见表1)。

表1 皖北中原官话常用程度副词分类表

程度量级	普通话	皖北中原官话
绝对程度副词	过量级 太、万分、分外、过、过分、过于、异常、透顶、透	死、太、透、煞、剔
	极量级 极、极其、极度、至、至为、极端、绝顶、绝伦、无比、绝对、绝、满、够	极、瞎、虚
	高量级 多、多么、非常、好、很、老、颇、颇为、十分、相当、挺、何其、何等、甚、甚为、大、好不、深、深为、特别、大大、尤其、尤为、殊、特	焦、稀、刚、血、冰、黢、恁、忒、争、生、很
	略低级 有点儿、有些、不大、不太、不很、不甚、不胜	不咋、不很、不太、宁(宁尢尢)
相对程度副词	最高级 最、最为、顶、最最	最、紧
	较高级 更、更加、更为、更其、越、越发、越加、愈、蛮、益发、愈加、愈益、愈为、大大、格外、备加	更、越
	比较级 比较、较比、较、较为、还	挺、怪、较
	较低级 稍、稍稍、稍微、些些、些微、微微、略、略略、略微、稍许	稍微、略微

由以上分类可以看出,皖北中原官话中相对副词和绝对副词在量级分布上是不一致的。张桂宾认为,相对副词与绝对副词有无比较对象在语法上表现为:相对副词能进入比较句,绝对副词不能进入比较句<sup>[4]</sup>。正因为相对副词有比较对象,人们在表达情感时难免夸大其辞;绝对副词没有比较对象,仅基于主观标准评价,量级向上偏移的可能性更大。绝对副词量级的高低与表达者主观情感强烈程度密不可分,皖北中原官话在程度量上的表达习惯是往大了说,语义重心会由比较对象偏离到程度量级上。一些高量级的相对副词也逐渐往绝对副词上偏移和演化。张谊生认为,随着主观化的促发,说话人在陈述客观事实时都会带上主观情感色彩,从而导致相对副词“最”忽略比较范围,最终虚化为绝对极性程度副词<sup>[5]</sup>。皖北中原官话相对程度副词在数量上比普通话少,常见的相对程度副词与普通话用法基

本相同,大都是作状语放在中心语的前面表达性质形容词的程度量,在方言表达中以使用单音节程度副词为主,像“越发、更加、稍许、略微”之类的多音节词则更多地应用于书面语当中。具有方言特色的程度副词大都是绝对程度副词,包括“死、太、透、煞、剔、极、瞎、虚、焦、稀、刚、血、冰、黢、恁、忒、争、生、很、不咋、不很、不太、宁(宁尢尢)”等。其中有的用法与普通话差别不大,属于普通话与方言共通的绝对程度副词,如“太、极、多、不咋、不太”等。因此,我们研究的重点是与普通话用法差异较大的绝对程度副词,如“血、稀、剔、瞎、宁”等。结合这些词程度义的高低,按照量级不同选取最有代表的皖北方言绝对程度副词进行研究,探究它们在语义特征、句法功能、语用功能方面的差异,分析皖北中原官话绝对程度副词的特点。

## 2 皖北中原官话绝对程度副词的量级类型

### 2.1 过量级绝对程度副词“死 s<sup>135</sup>”“剔 t' i<sup>213</sup>”“透 t' əu<sup>51</sup>”的比较研究

过量级就是极量级,方言中通常是“程度副词+性质形容词”的表达形式,表达程度突破了最高范畴,且与说话人的态度密切相关,感情色彩义较强。皖北中原官话“死”“太”“剔”“透”“煞”使用频率较高,由于“太”“煞”跟普通话意义和用法极为相似,这里主要研究“死”“剔”“透”的用法。

#### 2.1.1 句法功能

“死”“剔”“透”均可置于中心语前作状语表示程度,主要修饰单音性质形容词,构成“死/剔/透+A”结构。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中“死”词条下只列出了动词和形容词的用法<sup>[6]</sup>,认为作补语的“死”仍是形容词。例如“死贵”“死硬”“死抠”“死沉”“死重”“死懒”“死冷”“死笨”“死丑”“死倔”“死犟”。“剔”主要修饰状态形容词,例如:剔圆、剔亮、剔直。“透”主要修饰状态形容词,例如:透亮、

透精等。

“死”还可以作状语修饰动词或者动词短语,构成“死+V/VP”结构,主要修饰能愿动词。“剔”“透”则没有这种用法。例如:“死撑”“死吃”“死要面子”“死会吹”“死能吃”。

皖北中原官话中“死”有时会与否定副词“不”连用,构成“死+不/不老丈+A/VP”结构。如“死不贵”“死不硬”“死不重”,能与性质形容词搭配的都可用在“不”后,表示肯定义的程度之深。用法上“死=死不/死不老丈”,表示肯定义。而“死不要脸”“死不听话”“死不老实”则表示“坚决否定义”,强调动作不可能发生的程度。“剔”和“透”强调形容词的肯定方面,一般不与否定副词“不”连用,不说“剔不直”“剔不亮”“透不精”。

#### 2.1.2 语义特征

“死”“剔”“透”作为过量级程度副词,常修饰性质形容词,表示程度之深,有“特别”“异常”的含义,语义特征都可表示为“程度”“极量级”“主观性”(见表 2)。

表 2 过量级绝对程度副词搭配表

过量级绝对程度副词	程度(高)	极量级(突破最高范围)	主观性(厌恶、不满意)	可加否定副词(不)
死	+	+	+	+
剔	+	+	-	-
透	+	+	-	-

正如表 2 所示,“死”“剔”“透”单独使用,都表示极高的程度量。由于“死”修饰的形容词多表示说话者的负面心理感受,因此可以加上“不/不老丈”来加深这种厌恶情绪。而“剔”“透”修饰的形容词多具客观性,说话者的心理感受较为正面,因此就不再嵌进本身就是否定副词、略带贬义的“不”字。

- (1)你袋子里装的什么,死不重的。
- (2)今天死(不)冷,一点不想出来逛街。
- (3)今天是十五吧,怪不得月亮剔圆的。
- (4)这小妮一看就透精的。

例(1)例(2)表示说话者厌恶、排斥的主观感受,“不”加深了这种程度;月亮圆缺是客观存在,例(3)“剔圆”是对月亮极度圆的客观描述,不带有负面感受,甚至还带有惊喜、赞叹的感情色彩。例(4)中“透精”也是对小女孩的聪明持肯定态度。

#### 2.1.3 语用功能

“死”“剔”“透”在使用上具有极强的主观性。由于“死”字本身具有消极颓丧的感情色彩,多用在否定方面,表示说话人的厌恶、不满意程度之深。因

此语用效果上多凸显负面评价功能。“剔”“透”是中性词,表示客观事物完美的程度较深,所以感情色彩上偏向中性和褒义。“圆、直、亮、精”都是形容较为完美的事物,前面加上“剔”“透”来修饰,代表极度的完美。

- (5)这孩子死犟,一点不听大人话。
- (6)逮到肉就死吃,跟饿死鬼投胎的样。
- (7)这根木头剔直,正好做张桌子。
- (8)这孩子真会说话,透精透精的。

此外,皖北方言还通过重音来凸显焦点功能。对“死”“剔”“透”重读,使它们成为句子焦点,句子由客观陈述转为主观程度的表达。

### 2.2 极量级绝对程度副词“瞎 cia<sup>213</sup>”“虚 cy<sup>213</sup>”的比较研究

极量级绝对副词在程度上仅次于过量级绝对副词,皖北方言中使用频率较高的是“极”“瞎”“虚”。“极”的用法跟普通话相似,具有较强的书面语特征。这里主要研究皖北中原官话特殊副词“瞎”“虚”的用法。

### 2.2.1 句法功能

皖北中原官话“瞎”“虚”作为绝对程度副词,跟普通话中的“非常”“很”意义接近,用作状语修饰单音节形容词,构成“瞎/虚 + A”结构。但是“瞎”跟“瘪、轻、黑、薄”等少数性质形容词搭配,构成“BA”“BAA”结构,如“瞎轻/瞎轻轻”,主要描述事物小的方面,语气中带有不满、贬低的意味。而“虚”则是与表性状或颜色的形容词“尖、青/清”搭配,构成“BA”“BABA”结构,如“虚尖/虚尖虚尖、虚青/虚青虚青”。

“瞎”还可以作状语修饰动词或者动词短语,构成“瞎 + V/VP”结构,主要修饰能愿动词。“虚”没有这种用法。例如:“瞎逞强”“瞎能”。

“瞎、虚”都能与否定副词“不”连用,构成“瞎/虚 + 不/不老丈 + A”结构。如“瞎不轻”“虚不尖”。

### 2.2.2 语义特征

“虚、瞎”表示语义程度较深,“虚”在修饰表颜色的形容词时可以表示褒义,在修饰表性质的形容词时略含贬义,表达说话者对事物程度过深的不赞成。

(9) 恁看恁买的啥花生,个头大,里头瞎瘪。

(10) 这个袋子瞎轻/轻轻,里面能有几斤面。

(11) 今年冬天下了两场雪,地里麦苗长得虚青虚青的,真不孬。

(12) 铅笔虚尖虚尖的,写字时注意点。

例(9)例(10)中“瞎瘪、瞎轻”均表示“瘪、轻”的程度超乎想象,表达说话者主观上的不满情绪,带有贬低和批评义。例(11)表示对麦苗长势喜人的赞赏,例(12)则表达对铅笔头尖得过分的担忧。“瞎”一般不用于肯定、赞扬方面,不能说“瞎重、瞎厚、瞎亮”等。

### 2.2.3 语用功能

“瞎、虚”在句中主要表达说话人的情感态度,依赖上下文语境,具有较强的主观评价性。“瞎、虚”本身具有消极含义,一般用在否定方面,语用上侧重负面评价,但如果“瞎、虚”后面跟着中性或积极信息,也使句子具有偏中性或者褒义的感情色彩。

## 2.3 高量级绝对程度副词“稀<sup>ci<sup>213</sup></sup>”“血<sup>ciə<sup>213</sup></sup>”的比较研究

高量级绝对程度副词在皖北中原官话中例字最多,其中“焦”“生”“很”在方言和普通话中用法相似,一般以固定词组出现,如“焦干”“焦黄”“生疼”“很多”。“刚”是一个特殊的方言副词,有固定搭配“刚稠”,形容稠度高,且不能用于相反的意思。高量级程度副词“稀”“血”在皖北中原官话徐淮片和

商阜片使用频率较高,范围较广,相当于普通话中的“非常、极”,组合功能与“死”类似。

### 2.3.1 句法功能

皖北中原官话中“稀”“血”在句中作状语,构成“稀/血 + AP”结构,以修饰单音节性状形容词为主,可以修饰消极意义的形容词,也能修饰积极意义的形容词。如“稀脏、稀烂、稀碎、稀脆、稀甜”“血苦、血酸、血瘦、血坏、血矮、血乱、血贵、血倒霉、血难受、血难看、血能干”等。“稀”和“血”虽然表程度的量级相同,但是“稀”可修饰的形容词范围较窄,一般不修饰动词,“血”则可以修饰能愿动词、心理动词和感受动词以及属类动词词组。构成“血 + VP”结构,如“血捣蛋、血会说、血不讲理、血会过、血会来事”等。在句中主要充当谓语,偶尔也作补语,但不能作定语。

含消极意义的“稀/血 + 形容词动词”还可以跟否定词“不/巴”连用,表示更加消极的语义色彩,构成“稀/血 + 不/不子 + AP”结构,用以表达说话人不满、厌恶的情绪。

### 2.3.2 语义特征

“稀”“血”表程度较深,主观性较强,一般表示人的味觉、触觉等感受以及事物的状态。

(13) 刚出炉的面包稀软,好吃哩很。

(14) 刚出炉的面包稀不软,一碰就碎。

(15) 这个药血苦,大人都吃不下去。

例(13)“稀软”是个中性词,根据后文“好吃哩很”,表达说话者肯定、喜爱的态度。而例(14)“稀不软”则表示对这种软度的不满和厌烦。例(15)“血苦 = 血不苦”,加上“不”字,除了语气稍显舒缓外,意义并没有发生变化。

### 2.3.3 语用功能

“稀”“血”两者都是主观性程度副词,感情色彩都由句中的语境决定。既可呈现正面或者中性的评价,又能表达批评否定的负面评价。

(16) 菠萝用盐泡泡,再用糖腌一下,稀甜的!

(17) 你煮稀饭干嘛放恁多糖,稀甜的。

(18) 这家店里的东西血贵,以后不来了。

(19) 这小姑娘血会来事,才一个月就跟大家混熟了。

例(16)例(17)都是指甜的程度,但是从全文语境来看,例(16)是积极正面的评价,而例(17)则是消极负面的评价,因此两句中“稀甜”的意义完全不同。同样,例(18)例(19)也是由上下文语境决定的。例(18)后半句的“以后不来了”说明对“贵”的程度的不满和指责。例(19)后半句“才一个月就跟

大家混熟了”说明她能在短时间内与大家相处和谐,表达对其会来事的佩服和赞赏,属于正面评价。另外,说话人如果表达消极的主观感受,可以在

“稀”“血”后面加上一个否定词“不”,构成“稀不/不老丈”“血不/不老丈”的结构,增添了厌恶的感情色彩(见表3)。

表3 高量级绝对程度副词色彩意义搭配表

高量级绝对程度副词	稀		稀不		血		血不	
色彩	褒义	贬义	褒义	贬义	褒义	贬义	褒义	贬义
	+	+	-	+	+	+	-	+
例句	稀甜、稀俊	稀累、稀脏	/	稀不烂、稀不甜	血机灵、血能	血坏、血白舍	/	血不苦、血不酸

(20) 鱼炸得太酥了,稀不老丈脆,一碰就掉渣。

(21) 今个橘子买假了,血不酸!

“稀脆”本是中性的词,结合“一碰就掉渣”,说明“酥得太过了”,加上带有方言粗鄙俚语色彩的否定词,表达不满、厌恶的情感。

## 2.4 略低级绝对程度副词“宁 ŋiŋ<sup>213</sup>”的语法研究

皖北中原官话中常用的低量级绝对程度副词中,“不咋”“不很”“不太”“宁(滴滴/孕孕)”都表示程度低或者数量少,语义偏否定,一般用于消极意义。“不咋”与“不很”“不太”相比,口语性更强,多修饰性质形容词和动词短语,如“不咋甜”“不咋乖”“不咋好处”,但三者用法与普通话相似,因此这里主要研究“宁”的用法。

### 2.4.1 句法功能

“宁”这个程度副词很特殊,跟普通话中的“有点儿”用法相似。一般表示很小很轻的程度,作状语修饰单音节形容词,构成“宁+A”结构。如“宁细、宁瘦、宁近、宁薄、宁小”等。后面的形容词可以重叠使用,构成“BAA”结构,不管第二个A本来是什么声调,一律变成55调。这种形式表示程度上更高级。<sup>[7]</sup>此外,“宁”还可以与否定副词“不”构成“宁+不(子)+A”结构,表达不满意、不赞成的感情色彩更为强烈。“宁+A”结构在句中主要作谓语。

### 2.4.2 语义特征

“主观量表达的是说话人对量的大小的主观评价,但是已经表达出来的量是不是主观量,是主观大量还是主观小量,就不再取决于说话人自己的判断了,而应从言语的形式特征上寻找到客观依据。”<sup>[8]</sup>沈家煊指出“语言的主观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说话人的情感,说话人的视角以及说话人的认识。”<sup>[9]</sup>

(22) 这块木头宁细,哪管做桌子。

(23) 这小丫头宁不瘦,又不好好吃饭。

(24) 一个月累死累活,挣这宁不点钱。

(25) 这纸宁不薄,一遭就烂。

例(22)例(23)例(25)中“宁细、宁(不)瘦、宁(不)薄”表达主观小量,表达说话人不赞成的态度。“宁A”中“A”本是中性的词,只有进入到具体语言环境中,在说话人认知的基础上,表达其在感情色彩方面的差异。在强调程度时也可采用“ABAB”式重叠,如“宁细宁细、宁瘦宁瘦”<sup>[10]</sup>。正如例(24)中“宁点点大”和“宁点点小”中受“点点”修饰,无论是“大”还是“小”都表示主观小量。“宁点点粗”和“宁点点细”也是如此。

## 3 结论

通过对皖北中原官话绝对程度副词在句法功能、语义特征以及语用功能三个方面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皖北中原官话绝对程度副词的总量较普通话多。普通话中的绝对程度副词“大、极、最、过于、尤其、有点儿”等在皖北地区也经常使用。少数古语词虽然在方言中不常用,但是多用于书面语,如“甚为、愈加、极其、绝伦、何其、颇为、不胜”等。

皖北中原官话绝对程度副词在语义表达上更偏重于往大处说、往深处说,较少往小处说。由表1所示,皖北中原官话高量级程度副词数量较多,与普通话相比差异明显。它们在表达程度上具有阶梯差异性。无论是过量级的“死、太、剔”还是极量级的“虚、极”,又或是高量级的“稀、血、刚、黢、冰”等,它们在意义表达上都倾向于程度的加深,只有个别极量级的“瞎”和低量级的“宁”可以表达较轻的程度,如“瞎轻、宁细”。而且皖北中原官话程度副词有的只能用于好的方面,有的只能用于坏的方面。表示消极意义的绝对程度副词后还可以加上中缀“不/不子”“巴/巴子”,甚至有的方言片区还能插入“不老丈/不熊/扁”等消极色彩最浓、带有粗俗意味的

晋语缀,来表达说话人极为嫌恶的态度。这些均表明皖北中原官话绝对程度副词的特殊用法之多。

贺巍先生根据语音特征将皖北中原官话分为三个片区:徐淮片、商阜片、信蚌片。赵日新对皖北中原官话的分类与贺巍先生基本一致,区别在于怀远方言的归属。赵日新认为怀远南部应归江淮官话,北部属于中原官话信蚌片,这与贺巍先生认为怀远方言属于中原官话信蚌片不同。皖北中原官话虽大部分地区语义相通,但三个片区内部并非完全一致,而是互相影响,处于淮河流域的中原官话信蚌片深受江淮官话洪巢片的影响,在少数绝对程度副词的使用上存在差异。如“死”在商阜片使用较多,而“血”则在徐淮片、信蚌片使用较多。

皖北中原官话绝对程度副词在语用功能方面体现出较强的主观色彩性特征,与说话者情感表达密切相连,并且可以通过重音、重叠凸显焦点功能。

## 参考文献:

[1] 吕叔湘. 中国文法要略[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44.

[2] 王力. 中国现代语法[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43:140 - 141.

[3] 张谊生. 现代汉语副词的性质、范围与分类[J]. 语言研究,2000(2):62.

[4] 张桂宾. 相对副词与绝对副词[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2):93.

[5] 张谊生. 从相对到绝对:程度副词“最”的主观化趋势与后果[J]. 语文研究,2017(1):22.

[6] 吕叔湘. 现代汉语八百词[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8.

[7] 李申. 徐州方言志[M]. 北京:语文出版社,1985:255 - 256.

[8] 陈小荷. 主观量问题初探——兼谈副词“就”“才”“都”[J]. 世界汉语教学,1994(4):18 - 19.

[9] 沈家焯. 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4):269.

[10] 张德岁,蒋宗霞. 皖北方言表达程度的方式[J]. 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5):45. 责任编辑:谢政伟

## (上接第 118 页)

[10] 刘珊珊,孙晓芳,王浩然,等. 重唤编委对高校学报发展的责任与热情[J]. 编辑学报,2020,32(2):195 - 197.

[11] 王海艳. “四全媒体”时代科技期刊编辑胜任力素质的现实要求与提升进路[J]. 出版广角,2020(6):56 - 58.

[12] 王慧. “四全媒体”框架下高校学报融合出版的路径选择[J]. 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8(1):107 - 111,116.

[13] 刘璐. 医学高校学报微信公众号现状及优化路径[J]. 科技传播,2021,13(11):1 - 5.

[14]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 (2022 - 10 - 25)[2024 - 07 - 04]. <https://www.12371.cn/2022/10/25/ARTI1666705047474465.shtml>.

[15] 曲青山.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N]. 人民日报,2023 - 10 - 24(13).

[16] 李侗桐,徐一臻,任延刚. 高校科技期刊集群化建设的需求、难点及对策——基于一所高校的深入访谈研究结果[J].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23,34(9):1168 -

1172.

[17] 习近平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EB/OL]. (2021 - 05 - 10)[2024 - 05 - 26].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1-05/10/c\\_1127428330.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1-05/10/c_1127428330.htm).

[18] 朱家席,绳会敏,李桦,等. 《蚌埠学院学报》近五年载文与作者群分布情况分析[J]. 蚌埠学院学报,2019,8(6):90 - 96.

[19] 范君. 普通高校学报融合发展思路解析——以安徽理工大学两刊为例[J]. 中国传媒科技,2021(8):47 - 49.

[20] 冯君,胡水清. 特色栏目在高校学报建设中的引领作用研究——以《锦州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医学伦理》栏目建设为例[J]. 榆林学院学报,2024,34(2):124 - 128.

[21] 习近平. 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更好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EB/OL]. (2022 - 10 - 25)[2024 - 07 - 04]. <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8/0823/c40606-30245183.html>.

[22]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责任编辑:寇国庆



# 蚌埠学院学报

(综合类双月刊)

编辑委员会

主任:陈国龙

副主任:孙艳辉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艳春	韦文联	吕效华	朱兰保	朱家席	邬旭东
刘春景	许 晖	孙兰萍	孙西超	孙艳辉	李大胜
李文瑛	李宗群	吴长法	何 蕾	张茂林	陈发来
陈国龙	陈恩红	武 杰	郑晓奋	胡 飞	赵东勇
袁 飞	郭有强	黄迎辉	崔执树	魏天路	

主 编:孙艳辉

副主编:郭有强 邬旭东 朱家席

## 目次

### 党的二十大理论创新与实践·思政理论研究

- 新质生产力赋能下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研究 ..... 苏云(1)  
新质生产力促进出版业创新发展路径研究 ..... 许璘琳,袁媛(7)

### 文学理论与新闻传播

- 清代江村江氏家族的词学取径与词风嬗变 ..... 卞嘉傲,薛玉坤(12)  
想象孝子:论南北朝王祥的符号化 ..... 范子依(18)

### 艺术创作与设计

- 系统观念下的寿州窑陶瓷手工艺传承人保护研究 ..... 周光云(23)  
安徽大别山民歌活态传承现状、意义与路径  
——基于场域理论的研究 ..... 李姗姗(28)

### 乡村振兴·区域经济建设与管理

- 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以安徽工业企业为例 ..... 王艳,白蒙(33)  
数字经济对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 程芬芬,黄纪元(39)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与企业创新成效的分析  
——兼议管理层持股的治理效应 ..... 安玉侠,王利君(47)  
旅游业视域下的乡村振兴策略创新与实施路径研究  
——以霍山县“旅游兴县”为例 ..... 韩瑞,刘仁金(58)  
财政透明度对预决算支出偏离的影响研究  
——基于268个地级市财政预决算数据的分析 ..... 欧阳世晨(64)

### 外国语言研究

- 新时代徽商文化国际传播的困境与出路 ..... 吴宜涛(72)  
叙事学视角下林语堂编译《促织》探析 ..... 范海遐(76)  
“找译法”与“创译法”在食品安全专业术语翻译中的应用探究 ..... 刘雪莹,陈娜,唐静(81)

唐诗及其英译中的感知路径虚拟位移探析 ..... 赵茹梦,冯传振(86)

## 高等教育与教学

我国科技伦理的当代特征与现实展望 ..... 余国江,胡璨,王宁(93)

新时代国际中文教育的数智化质量监控体系探究 ..... 刘水(100)

## 综合研究

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对外转让研究 ..... 张健(104)

债权人保护视域下公司信息披露法律制度问题与对策 ..... 胡道明,吕清正(109)

习近平文化思想赋能高校学报高质量发展路径分析 ..... 刘璐,何莉,姚仁斌(115)

## 淮河文化研究

非遗产业化视角下凤阳花鼓的发展及创新路径 ..... 李应青(119)

皖北中原官话绝对程度副词研究 ..... 张琳琳(123)

# Journal of Bengbu University

Vol. 13 ,No. 6 ,Sum. No. 78 ,2024

## Main Contents

- Realistic Dilemma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under the Condi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 SU Yun(1)
- Research on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Promoting Innovative Developing Path of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 XU Lin-lin, YUAN Yuan(7)
- The Path of Ci and the Evolution of Ci Style of Jiang Family Living in Jiang Village in Qing Dynasty ..... BIAN Jia-ao, XUE Yu-kun(12)
- Protection of Inheritors of Shouzhou Kiln Ceramic Handicraft under the System Concept ..... ZHOU Guang-yun(23)
- Current Status, Significance and Path of the Living Heritage of the Dabieshan Mountain Folk Songs in Anhui Province Based on Field Theory ..... LI Shan-shan(28)
- The Impact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vestment on Firm Performance Basing on Anhui's Industrial Enterprises ..... WANG Yan, BAI Meng(33)
-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ffect of Construction Industry from Digital Economy by Empirical Analysis of Spatial Durbin Model ..... CHENG Fen-fen, HUANG Ji-yuan(39)
- Deduction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xpense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Discussing the Governance Effect of Management's Shareholding ..... AN Yu-xia, WANG Li-jun(47)
- Dilemmas and Solution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Huizhou Merchant Culture in the New Era ..... WU Yi-tao(72)
- Lin Yutang's Compilation of *Cricke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rratology ..... FAN Hai-xia(76)
- Contemporary Characteristics and Realistic Prospect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thics in China ..... YU Guo-jiang, HU Can, WANG Ning(93)
- Digital Intelligence Quality Monitoring System for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 LIU Shui(100)
- Research on Foreign Transfer of Shares of Rural Collective Operating Assets ..... ZHANG Jian(104)
- Qu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 on China Legal System of Corporat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editor Protection ..... HU Dao-ming, LYU Qing-zheng(109)
- Pathway for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Academic Journals Empowered by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 LIU Lu, HE Li, YAO Ren-bin(115)
-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Path of Fengyang Flower-drum Op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dustrialization ..... LI Ying-qing(119)
- Study on Absolute Degree Adverbs of Zhongyuan Mandarin in Northern Anhui Province ..... ZHANG Lin-lin(123)